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關向光 博士



李大釗的政治思想與實踐

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Li Dazhao

研究生：陳進傑 撰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一月



## 謝 誌

還記得那日夜裡，杵在行政大樓旁候車亭的我，手中拿著剛通過不久的研究計畫，一邊煩惱著何時才能完成畢業論文。會如此擔心亦有原因，當時的我不僅還在政大修習日本研究碩士學分學程，同時又應尙志師之邀，回母校新北市清水高中任教一年。在這段一枝蠟燭多頭燒的日子，想想還是最適合用「刻骨銘心」四個字來加以形容了。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時常常在圖書館待到閉館，深夜獨自一人回家的生活；還有因壓力和作息不正常導致身體免疫系統變差，而攬上一身「皮蛇」的痛苦。可喜的是，寫作論文前前後後雖長達一年又七個月，但總算憑著執著和毅力，還有親友師長們的加油打氣熬了過來。

首先，要感謝我所上的指導教授，關向光師。全篇論文約二十三萬餘字，關師從頭至尾一字不漏的仔細閱讀，並糾正不少書寫錯誤，學生從中實在獲益良多。尤其是關師傳授的論文寫作十六字訣，更是一輩子受用不盡的財富。

其次，還要感謝擔任口委的王遠義師和克思明師。在大綱初審和論文口試中，王遠義師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觀點和修改意見，使學生對李大釗的研究有了更清楚而深入的認識；而克思明師在口試過程中對於學生努力的肯定，則是學生最好的回饋。正所謂「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個人深切期望能以此論文作為檢討和改進的契機，作為往後人生學習道路上穩固的基石。

在東亞所待了近四年半的漫長時間，感受到的是許多來自師長們的關愛。寇健文師對於教學的熱誠和學生的照顧，常使學生感懷於心；關向光師長年專於中共黨史的研究與教學，在所上開設的「大躍進專題研究」課程未能修得，則是令學生引為憾事；李英明師的研究方法課程條理分明、邏輯清晰，時時讓學生在速抄筆記之餘，歎為觀止。而每當一回到所辦，又總是能見到笑臉迎人的張姐，讓東亞所更是倍加溫暖。此外，還要謝謝伴我走過研究所人生的同學和朋友，在政大無數的角落，都曾有與你們相處的美好回憶，使得生命更增添豐富的色彩，在此就不一一具名。書寫至此，一想到要暫別政大，最思念的莫過於是走在冬陽下的楓香步道，還有欣賞後山宿舍區四處綻放的山櫻花了。

最後，要感激的是我的父親陳坤仁先生和母親彭明玉女士。如果沒有你們生我、養我、栽培我，就不會有今日這本論文的誕生。我願以此書敬獻二老，報答您們多年的養育之恩。

2013年2月3日 陳進傑 于板橋家居書齋



# 李大釗的政治思想與實踐

## 【論文提要】

李大釗（1889-1927）是民國初年重要的政論家和五四時期的青年導師，同時也是中國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人物和中共成立後的北方革命領袖。西方和日本學界很早便注意到李氏在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意涵；相對地，自中共建政以來，由於受到革命史觀和政治因素影響，以致長期對於李的歷史認識和評價晦暗不明。直到 70 年代末進入改革開放，中共在政、經方面的控制逐步鬆綁之後才有所改善，近年因而出現「李大釗熱」的研究現象。

深入研究李大釗的意義在於，以李作為「關鍵個案」（critical case）觀察其政治思想的內涵變化，不僅有助於說明五四知識分子如何從自由主義民主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過程；透過與同時期重要人物的思想比較，亦能闡明李氏在中國革命史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它突破了過去以毛澤東為中心的單一黨史觀，使得中國共產革命有了更多元的面貌。基於此，本論文綜合了中外研究成果，縱述李大釗一生政治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並藉由李氏勾畫出早期中共在北方革命的圖像。全文一開始先是介紹李大釗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又透過歷史事件和相關文獻的分析，主要回答李氏如何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及為落實其政治理想的實踐過程。根據研究發現，李大釗政治思想的變化，除了受到歐戰和十月革命等外來因素影響，來自中國及其自身的內在因素也是重要的變因。尤其必須注意的是，李氏政治思想的來源，並非全是被動地接受外來思想，而是透過詮釋中國問題以「選擇」其思想內涵，進而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案，其中蘊含個人的意志濃厚。這一點，在其後北方共產革命的過程亦有充分展現。中共成立之後，即使李大釗亦不免受到共產國際方針的外在制約，但其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發揮的互助與調和策略，使得李於現代中國革命者的序列當中，能夠介於陳獨秀與孫中山之間，而成為具有獨特、重要作用的中介者。

關鍵詞：李大釗、民初政治、民彝思想、青春、調和、五四社會思潮、互助、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革命



# 李大釗的政治思想與實踐

## 【目次】

### 第一章 緒論 1

-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 二、文獻回顧與檢討 3
- 三、研究途徑、方法與架構 9

### 第二章 早期的生活背景和教育歷程 13

- 第一節 從士人教養到西學教育 13
- 第二節 以法政為志，救國為業 24
- 第三節 因自視缺然，負笈日本 43

### 第三章 民主憲政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57

- 第一節 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國化 57
- 第二節 民族與國家的青春哲學 70
- 第三節 政治和社會矛盾的調和 81

### 第四章 社會主義思想的醞釀到成熟 97

- 第一節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根源 97
- 第二節 社會主義思想上的發展 110
- 第三節 李氏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136

**第五章 在北方共產革命運動的實踐 161**

第一節 中共在北京的組織過程 161

第二節 中共組織的聯合與鬥爭 174

第三節 國民革命的經過到犧牲 197

**第六章 結 論 221**

附錄一：中國鐵路分布圖 ( 1879-1948 ) 231

附錄二：1930 年代前期的河北省 232

徵引書目 235





# 第一章 緒論

##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知識分子通常是引領國家、社會方向的重要角色。由於知識分子受過良好教育，有高度的知識學養，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社會皆有著深切的人文關懷。一如歐洲中古時期的基督教士（priest），不僅擔負延續西方文明的重責大任，對王權政治亦有強大影響力，而且還是一般民眾信仰生活的導師。在中國文化中，則有自周封建時代結束後逐漸形成的「士」階層。中國傳統士人常抱有「澄清天下之志」，以「明道救世」為目的，甚至形成以儒家學術和政治理想為主流的「道統」，與帝王權勢的「政統」互相抗衡，以期將國家導入正軌。

但自近代歷經法國、俄國、中國三大革命之後，隨著現代化的加速進展，不論中西，上述傳統的「先知型」知識分子已有漸趨隱晦之勢，在二十世紀中葉取而代之的則是出現愈來愈多的「專業技術型」知識分子。雖然在這分工愈趨精細的時代，後者能以其專業和技術貢獻於社會，然而相較於前者，他們卻沒有足夠的人文通識，欠缺對國家、社會整體架構的安排和省察的能力。<sup>1</sup>吾人以為，作為現代知識分子，事有「專精」固然重要，但那至多僅能獨善其身；若要達到傳統知識分子皆嚮往那兼善天下的大同理想，那麼必然要具備有超越性的道德關懷以及對於人間事物的「通達」觀點。基於此，本論文的初始動機即希望透過歷史人物的研究，闡發知識分子的本義，期許當代知識分子能重拾對於國家社會遠大的政治理想抱負。

1919 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重要的轉型期，雖然中國自 1905 年廢除科舉，中國傳統的「士」階層在名義上已然消失，但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都仍接受過傳統的儒學教育，所以即便在內憂外患以及新舊思想交雜的矛盾之下，他們仍能夠「以天下為己任」，思考救亡圖存的辦法。在五四中國的遽變中，因而出現許多有名的思想人物，其中李大釗值得吾人注意。李氏生於 1889 年，卒於 1927 年，

---

<sup>1</sup> 張灝，〈世界人文傳統中的軸心時代〉，載於張灝，《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24。

其生存年代跨越「中國歷史未有之一變」，歷經清末立憲改革、辛亥革命、反袁運動、五四運動、中共建黨、第一次國共合作等等重大歷史事件，透過研究李大釗可以瞭解這一段波折的歷史發展情形。

另一方面，與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相較，李大釗政治思想的變化不僅獨特，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謂的政治思想，其初衷是來自對於人間秩序一種合理化的安排。首先，李大釗最初即不滿於清末專制的腐敗，於是從立憲轉向支持革命。當辛亥革命成功，李氏冀望於西方的民主議會制度，能夠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然而，又因為對軍閥政治的失望以及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李大釗最終走向了激進的社會主義，成為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前後不過短短十餘年的時間，李大釗的政治思想卻已歷經三變，可謂獨特。其次，在近現代中國激進與保守思想的發展過程，基本上由於沒有政治「現狀」可守，當時保守主義很難有立足點，於是只能倒向激進的。<sup>2</sup>在眾多趨於激進主義的知識分子當中，李大釗選擇艱澀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顯然是其中少數的異類，但由於李氏自保守走向激進而完整的思想變化，實可充分表現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心境轉變，因而有其代表性。

雖然李大釗及其政治思想所呈現的歷史意涵相當豐富，但卻由於諸多因素，使得李大釗的研究長期以來被史學界有意地忽略。自從蔣介石「清黨」之後，在國民黨的歷史書寫中往往將五四的青年領袖李大釗，描寫成一悲劇人物或是陰謀家。直到國民政府遷台到了現在，同樣是中共創黨元老陳獨秀，相關的研究學位論文共計 10 篇。相較之下，名氣不比陳的李大釗則僅有 3 篇。<sup>3</sup>至於中共方面，由於毛澤東在黨內的得勢，一部遵從毛「正確路線」的中共黨史遂逐漸形成。因而如何書寫、評價毛的先輩李大釗，便成為一棘手的「政治」問題，而非僅僅是「學術」問題。一直要到中國改革開放後，雖因中共對創黨歷史的重視，出現一股「李大釗熱」的研究現象，然而其中有許多研究仍難逃「革命史觀」的論述。所謂「革命史觀」即是指以革命功績來衡量歷史人物的地位，它主要是為政治而服務，所以李大釗在中共官方的論述中便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具有獨到的歷史遠見，識破中國未來必然走向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其中曲折的細節往往容易被刻意隱晦。

<sup>2</sup> 詳見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載於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頁210。

<sup>3</sup> 三篇論文依年代序為：馬建白，《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台北：中國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宋教瑛，《中共建黨前知識份子思想探源（1915-1921）—論陳獨秀、李大釗思想之轉變》（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林秋志，《李大釗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

五四精神早已強調「學術」須獨立於「政治」，而如今走出威權體制的民主台灣，已漸能擺脫過去單一的黨國觀念，學習從一個超然的學術立場來重新省視整個中國現代史，因此有利於對李大釗的研究。相較於前述中共的「革命史觀」，本論文的思考前提在於：沒有一個人天生就背負革命家的使命，李大釗亦然。吾人希望能從李大釗最初的思想出發，研究李當時生活的歷史背景與其個人與社會環境間的互動，分析其思想建構並觀察其政治實踐，以理解其政治思想的變化，說明李大釗由一名從事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者的過程。其中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第一，李大釗作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新舊時代的交替下，是如何成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二，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又是如何策劃中國革命的藍圖並予以實踐？透過分析李氏文章和相關的一手資料，本論文期許能夠回答上述問題，並透過李大釗說明中共早期在北方發展革命的過程。

## 二、文獻回顧與檢討

研究李大釗的思想，不可避免會帶出早期中共發展性質的問題，戰後西方的中國研究對此相當重視。如西方學者史華慈（B. I. Schwartz）和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問題上皆有所探討。史華慈在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受到 1949 年後「新中國」和美國關係急凍的局勢影響，史氏最初的研究關懷即在於共產中國究竟是如何興起的；而邁斯納對於 1949 年後共產中國的研究，如其名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所散發出的學術光芒，似乎掩蓋了他曾經研究過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起源的貢獻。

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問題，史華慈回顧李大釗和陳獨秀二人的思想內涵，認為他們都是在反傳統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外來的進步思想。然而，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說明，共產革命只會發生在那些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顯然無法適用於當時中國的國情。即使李大釗於 1918 年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震撼，是中國第一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但他還不能算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史氏看來，馬克思主義真正進入到中國，最先是俄國十月革命給與了中國啓示，以及隨後共產國際顧問將馬列主義中革命組織的原理帶入中國而展開的。<sup>4</sup>

<sup>4</sup> 史華慈（Schwartz）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21。

相較於史華慈，邁斯納將焦點放在李大釗和中國馬克思主義起源的問題。邁氏筆下的李大釗早年並無自成體系的政治哲學，李氏大都是在日本留學時期，間接吸收到許多西方政治思想，逐漸形成李在中國實踐民主立憲的思想。當李大釗自日本歸國後，隨即讓湯化龍延入有保守傾向的進步黨工作。然而民初政黨政治的混亂以及軍閥對政治的干預，不禁讓李氏失望，轉而選擇盧梭式的社會民主與群眾意志，並否定了個人的極端自由。<sup>5</sup>

邁氏更進一步分析，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初，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馬上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迴響，<sup>6</sup>直到李大釗於 1918 年 7 月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才開始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意義提出正面評價。李氏在文中說明，俄國十月革命代表了世界進步的浪潮，這個浪潮將會席捲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到五四事件之後，<sup>7</sup>中國知識分子分別成立許多社會團體，參與者有許多是後來的中共領導人。如當時李大釗也在北京和天津地區，和他的學生張國燾和鄧中夏進行社會啓蒙運動。李氏真正接觸到俄國共產黨員也是在這一時期。根據俄方資料，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Г. Н. Войтинский）到中國協助中共建黨之前，Muller 和 Bortman 兩位俄共黨員已於此時和李大釗在北方接觸，並加以協助。<sup>8</sup>

比較史華慈和邁斯納二人的研究，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加強了「十月革命」和「中共建黨」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並強調共產國際在其中的指導作用。<sup>9</sup>中共成立的歷史在如此既定的敘事背景下產生，便沒有其他解釋的迴旋空間，而李大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也就容易被弱化。

在接下來西方的研究世代，德里克（Arif Dirlik）乃站在批判前者研究取向的立場，進行中國共產主義起源的研究。德氏雖也認同「俄國革命」和「共產國際」兩者是中國共產革命起源的重要因素，然而他更關注當時中國思想界中的無政府主義及其在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形成中所造成的影響。易言之，中國的共產主義是以五四時期的激進思潮為基礎而展開的，李大釗在其中便成為主動而積極的思想媒介。

<sup>5</sup>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1-34.

<sup>6</sup>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p. 61-63.

<sup>7</sup> 「五四事件」是指 1918 年 5 月 4 日，中國因抗議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的處理態度而引發的學生愛國運動。而「五四運動」的概念，則涵蓋自民初以《新青年》的創刊為契機在北京發展而成的新文化運動，以及隨後的愛國運動；此後一直要到《新青年》編輯部轉移到上海，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主的刊物為止。

<sup>8</sup>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 115.

<sup>9</sup>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Press, 1989), p. 5.



德氏論述下的李大釗生活在內憂外患的五四中國，知識分子以為凡是有利救國的藥方皆可一試，於是當時思想界的混亂現象幾乎可以用「病急亂投醫」一語形容。德氏主張 1921 年之前的李大釗，並非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舉證李氏在〈階級鬥爭與互助〉一文中，甚至以俄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克魯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的「互助論」（mutual aid），繞過馬克思主義對於革命暴力的論述，因此李氏馬克思主義乃建立在批判觀點之上。<sup>10</sup>與前人不同，德氏在此所要反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布並非是完整地被中國知識分子無條件接受，然後中國就自然地走向共產革命；此處德氏強調要回歸到以「人」作為思想的主體，個人思想的建構具有自主的「選擇權」，無政府主義思想在此也成為李大釗政治思想內涵的重要選項之一，甚至成為日後李氏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但西方學者因其文化限制，多傾向從外部視角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例子即是李大釗文章中屢談及的「互助」，其實更多是在強調「同志間的相助」，而非德氏所認為無政府主義者的「互助論」意涵。<sup>11</sup>

較之西方，東方的中國研究則能以其文化優勢，從內部視角研究東方人的思想。以日本學者為例，早期後藤延子即對李大釗的思想有所研究，包括李氏的民主思想、東西文化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等。新一代的學者如石川禎浩及其所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歷經十餘年而完成。其中內容豐富，考證詳細，為五四運動到中共一大之間的歷史提供了完整圖像。石川氏提出的重要觀點在於，中國的共產革命應從亞洲的範圍來考慮，中國、朝鮮和日本的共產黨幾乎是在同個時期成立，它們皆受到「十月革命」和「共產國際」的革命輸出影響，所以中共建黨並非偶然，而是亞洲整體的歷史脈動。

石川氏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建黨前的必要條件，而日本正是亞洲馬克思主義宣傳的重要中心。<sup>12</sup>當時作為先進國的日本，由於對西學有系統的翻譯和介紹，使得日本成為留日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學的媒介。石川氏筆下的李大釗在留學日本期間，便曾接觸日本社會主義者的激進思想；此外李氏的時空觀和文明觀，還受到日本文明評論家茅原華山的影響，這在李的其後著作中都有跡可循。當李大釗歸國

<sup>10</sup>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pp. 51-52.

<sup>11</sup>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載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台北），第 13 卷，第 4 期，2001 年，頁 486，註 3。

<sup>12</sup> 當時恐怕毛澤東也知道，在中共建黨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以日本為中介的。詳見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序章〉頁 6。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 年），頁 8-9。

之後，其早稻田大學的學友陳溥賢，<sup>13</sup>即在北京《晨報副刊》刊登許多轉譯自日本且較有深度的馬克思主義文章，甚至被其他報刊爭相轉載，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貢獻甚大。<sup>14</sup>綜上所述，日本學者對李大釗的研究，除了直探李氏的思想世界，更著墨於李氏思想中來自日本的因素。

中國學者早年對李大釗的研究觀點，受其革命傳統的限制甚大。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萌芽自 1930 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其後中共史學家經過馬克思主義的訓練，學會運用唯物史觀和歷史的五個階段論來解釋中國歷史的發展。此舉不但將西方歷史所經驗過的現代化過程套用到中國的場域，在現實意義上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革命路線提供了理論指導。其後學者對其進行審視和批判，指出中共自建政以來，其史學即帶有一種「厚今薄古」的特徵，他們強調歷史必須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此即是為政治而服務。此外，中共史學還必須符合「黨性原則」，歷史書寫必須滿足黨的利益，而不能違背黨的意旨。<sup>15</sup>

中共以馬克思主義觀點處理中國歷史的書寫，除了有濃厚的政治意涵，其中人類社會進化的階段論，正是五四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西方「現代化敘事」的極致表現。若無反省此研究觀點的預設立場，便容易將李大釗置入現代化敘事的框架。在其中，李大釗將成為五四時期引進外來新思想的重要人物，對於中國的現代化有強大的推進作用。但如此的歷史詮釋，忽視了李大釗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主動性，他將僅是在西方思想浪潮下扮演協力的角色。

此外，中共在黨史的研究領域中，對於「黨史人物所持政治路線是否正確」的批評，更透露出「革命史敘事」的基礎架構。中共在意識形態鬥爭的年代，長久以來未能給予李大釗在政治上的定性和評價，其中自有原故。然而從 90 年代始，李大釗的創黨地位先後被江澤民、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公開肯定，引起黨史界對李大釗研究的旋風。如今李大釗在黨的革命敘事中，不但成為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預知中國未來必然會走向共產世界。如此看來，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所構築的烏托邦的理解，僅僅是作為「先知」的角色，而不是從「未知」到「已知」的發展。換言之，在唯物史觀下的歷史發展已然受到限制，便是由下層經濟結構的變化，

<sup>13</sup> 陳溥賢，筆名淵泉。王遠義教授認為應該將「溥」更正為「博」。參見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 487，註 4。

<sup>14</sup> 石川禎浩著，王捷譯，田子渝校，〈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思想與茅原華山、陳溥賢〉，《文史哲》（濟南），第 5 期，1993，頁 12~19。

<sup>15</sup> 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台北：時報文化，1979 年），頁 11~13。

影響到上層建築的政治體制的過程。其中沒有人為作用，吾人僅能觀察李大釗的先見之明，而無法探知李氏是如何詮釋馬克思主義，以適用到中國共產革命的過程。

當然，自始也有部分中國史家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有所反省。他們肯定中國長久以來的史學傳統，客觀運用西方的史學方法，相信歷史學追求的最高價值是「真」，而非對抽象歷史規律的追求，或是將歷史用作「資治」的工具。<sup>16</sup>尤其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思想相對自由，經過方法論的省思，摒棄以論代史的寫作風格，中共學者對李大釗進行不少的考證工作，包括李氏的出生年月、<sup>17</sup>曾居於北京的住所、相關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時間；此外還包括關於李大釗的史料彙編，如張靜如的《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以及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出版的《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等等，成為研究李大釗的重要參考資料，這些基礎工作皆有助於還原李大釗的歷史真相。

對考證著力甚深的朱成甲，其著作《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運用厚實的史料，成功地擺脫李大釗徹頭徹尾是一個共產革命者的形象。文中對李氏的生活年代有深入的了解，並以歷史環境襯托出人物價值。在朱氏筆下的李大釗，其思想轉變是由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變遷過程，他接受了李大釗早期的「反動」思想，走出過去易於扭曲史實的革命敘事立場，因此有利於對中共創黨領袖早期的思想淵源進行探索。其後學者對李大釗思想則有進一步的專題分析，如晉榮東對李大釗哲學的研究，<sup>18</sup>以及胡漢全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研究李大釗，<sup>19</sup>這些後起研究從不同的觀點切入，並建立在史實基礎上，使吾人對李大釗能有更多元的認識。

隨著中共日益重視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呂明灼則從李大釗早年所受的傳統儒學教育進行發揮，說明李氏的儒家思想轉移到共產主義思想的三條路徑：以大同思想發展成共產主義思想，從仁愛思想發展成社會主義道德，由民本思想發展成無產階級民主。<sup>20</sup>雖然這篇文章具有現實目的，是自十年文革浩劫後，重新強調儒家文化是中國的代表文化；但此也說明了思想變遷的重要性質，因隨著時間的推移，思想的變遷應具有前後的連續性，而非斷裂、頓悟式的，它同時也提供以傳統儒家思想的視角來探討李大釗的政治思想。

至於台灣方面，關於李大釗最早的研究是在 1979 年，當時兩岸關係仍舊處於國

<sup>16</sup> 楊念群，《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序章〉，頁 4。

<sup>17</sup> 朱成甲，《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6。

<sup>18</sup> 晉榮東，《李大釗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sup>19</sup> 吳漢全，《李大釗與中國現代學術》（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sup>20</sup> 呂明灼，〈李大釗對儒家理想社會觀的繼承與創新〉，《文史哲》（濟南），第 5 期，2000 年。頁 93~99。



共鬥爭，馬建白的碩士論文《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即在此歷史背景下完成，其中雖能將李大釗放到當時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來看，然而其文卻將李氏定位為一個「犯了錯」的人物，「其歷史就是一個民初知識分子的悲劇史，待其死後還產生了更大的悲劇。」如在國共鬥爭的政治框架下，將無法客觀認識李大釗的思想。其後 1985 年，宋教瑛的碩論《中共建黨前知識份子思想探源（1915-1921）—論陳獨秀、李大釗思想之轉變》，作者以政治文化的概念探討陳獨秀和李大釗思想的轉變。政治文化不同於政治思想，文化表現的是一個可觀察到的現象，包含對政治的主觀認知、行爲、活動，而政治思想則是指隱藏在政治文化背後的思想體系。換言之，從該文雖可見到李大釗外觀的政治取向，但卻無法深入理解李氏政治思想的結構變化。

近期研究李大釗的碩論，是 2000 年由林秋志所撰的《李大釗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該文主述李氏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及唯物史觀，其中僅用一章探討李大釗的早期思想發展，但史學觀念和政治思想無法斷然劃分，所以亦不能輕易忽視，因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更直接影響到李大釗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選擇。此外，近來值得注意的是王遠義師研究〈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的單篇論文，其中參考中外前人重要的相關研究成果，認為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超越」（或誤解）了馬克思，並提出了一個適用於中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sup>21</sup>該篇論文使得台灣史學界能夠和李大釗研究的學術接軌，並闡發李氏思想研究的價值。但有鑑於台灣對李大釗的政治思想和實踐仍未有完整的認識，竊以爲此乃一塊相當值得耕耘的學術園地，有進行整理研究的必要。

總體而言，中外學者對李大釗研究的關注焦點，仍然放在李氏如何成爲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這個問題的歷史意義在於，中國知識分子爲了建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在方法上是如何進行認識和選擇的。五四時期，西方新思想不斷引進，在各思潮團體間彼此競爭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又是如何被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和重新詮釋的。李大釗作爲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吾人能透過對李氏的研究來理解這段論爭過程，也能觀察到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特徵。

在理解問題的意義和重要性的同時，必須對中西學者的相關研究提出質問。在新的研究起點上，首先必須避免隱藏在研究者身後的大敘事立場；它所反映的問題在於，研究者自身受到文化環境影響而無法擺脫的思考前提。其次，對於中共創黨前後的歷史論述，要儘量能提出中國本位的觀點。過往研究過於偏重西方外來因素

<sup>21</sup>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 477~513。



的影響，尤其是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革命的介入被視為決定性的因素，如此便容易忽略了另一條由中國激進主義分子在五四運動前後所領導政治活動的歷史線索，及其和中國共產革命起源的關係，如能重新省視李大釗的研究，無疑對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能夠提出新觀點。再者，要重新看待極端的「文化本質論」問題。此論認為中西文化兩者沒有共通性，是完全相異的兩個實體，因此它認為東西文明在近代的文化接觸沒有溝通和交流的可能，如此自然會給中國一種神祕且滑稽的印象。<sup>22</sup>在李大釗研究上應突破文化本質論，強調中西文化具有共通性，如此才能對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內在思想過程，有更清楚的認識。

雖然前人已闡明李大釗的歷史角色和作用，但建立在對上述問題的反省，撰者期望能將李大釗的思想轉變過程作一整體的觀察和分析，將李氏的思想變遷分作三個階段觀察：第一，為接受中國傳統儒學教育的階段；第二，是吸收西學後轉而信仰自由主義，並應用在政治上的階段；第三，則是蛻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並實踐其政治理想的階段。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是希望能以「人」為中心的生命史研究觀點，強調李大釗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 三、研究途徑、方法與架構

受到 19 世紀孔德(Comte)實證主義的間接影響，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說明歷史是一門有「系統求知」的科學。<sup>23</sup>1903 年英國劍橋史家比瑞(J. B. Bury)更直言：「歷史是科學，不少也不多。」<sup>24</sup>但到了後現代，當歷史學界對「絕對主義」的實證論有所懷疑並進行檢討之後，吾人則更傾向於相信科學的性質是一種「相對主義」，尤其是在人文學科領域。這也就是美國科學哲學家孔恩(T. S. Kuhn)曾提出的概念，學術研究的方法論也有屬於它的歷史，當它受到外在環境刺激，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便會產生典範轉移。<sup>25</sup>或許吾人不必相信處於極端的後現代主義

<sup>22</sup> 柯文(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62。

<sup>23</sup> 詳見汪榮祖，《史學九章》(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頁60。

<sup>24</sup> 原文出自 J. B. 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augural lecture of January 1903. 轉引自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9年)，頁370。

<sup>25</sup> 「在一套規則指導下進行的遊戲，無意中產生了某些新東西，為了消化這些新東西就需要精心製作另一套規則。當這些新東西成為科學的組成部分之後，科學事業，至少是這些新東西所在之特殊領域的那些專家們的事業，就再也不會與以往相同了。」引自孔恩(T. S. Kuhn)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48。

者，及其所宣稱的歷史虛無主義；但不可否認的是，後現代主義為吾人找到歷史研究的新典範。

撰者以為，歷史研究就像是三稜鏡一般，它必須觀照到三個方面才能算是好的歷史研究。第一，歷史具有科學性。史家收集史料，運用科學方法分析，進而產生對歷史的理解，它是有根據而非想像的。第二，歷史又涵有藝術的成分。藝術強調的是史學作品的可讀性，同時它還帶有個人的主觀意念，而主觀性正是歷史研究常被批評的重點。史家在選取材料和產生論述的過程當中，難免會有個人喜好和文化因素，但基於「文化相對主義」觀點，如能接受多元的歷史觀以相互參照，反而恰能呈現歷史的真相。第三，歷史研究具有對現代的啟發意義。正如義大利史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所言：「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sup>26</sup>歷史研究者生活的時代背景，往往為他們提供了研究的興趣和關懷，正因為歷史研究關注於當代課題，才能夠引起社會的共鳴。

相較於西方學者的中國研究，本文的研究策略則期望從中國的角度探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布的相關問題；李大釗因在其中扮演積極角色，因而成為此問題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但是，如研究李大釗的個人生命史，史學工作者仍必須事先拋開李氏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起源的關聯，以避免預設立場。

對於歷史人物的研究，本文強調「個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分析。個人行為乃是受到社會環境刺激所造成的反應；而個人的社會反應，又同時會反過來影響到社會環境；所以「個人」與「社會環境」兩者是循環互動且相生相成的關係。如李大釗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必然會面臨該時代獨有的政治難題；並依據其個人的政治思想，提出相關難題的解決辦法。而在難題解決的過程當中，李氏亦不斷地調整其思想和策略以適應時代環境，這就造就了個人思想變遷的過程。研究歷史人物必須要考慮到，個人是緊緊地被「鑲嵌」（embedded）於其生存時代的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則說明當時的政治狀況、經濟條件以及社會集體意識等等環節，彼此相互交扣且相互影響的狀態。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透過李大釗相關文獻的分析，梳理出李氏政治思想變遷的過程。為了能正確解讀文獻，首先必須清楚理解民國前後內政和外交方面的重大歷史事件，並將李大釗置入該時代的歷史脈絡來觀察。如此

<sup>26</sup> 詳見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著，安思利（Douglas Ainslie）英譯，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2。

從李氏的政論文字中，便可見到當時的政治議題，以及當時人的時代意見。這雖僅是對一個民初菁英分子的研究，但卻能側觀五四前後思想界的狀況，並同時了解民國初期歷史發展的梗概。其次，解讀李大釗文字務求入情入理。為能夠對李大釗進行「同情的理解」，撰者也選擇在生活中關懷台灣社會的重大議題，因而可以體會到李大釗在國難當前，那種憂國憂民的複雜心緒。若能如此，對李大釗的文字自能達到心領神會。

一個有新意的歷史研究，必然奠基於史料的廣泛閱讀之上。本文使用的史料，是以 2006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李大釗全集》為主。《全集》當中搜羅了李氏在各報章發表的政論文字，以及未刊的書信、詩詞、布告等等，是目前最為完整的版本。將李大釗在不同時期所發表的政論文章依照時序編排，大致可以明白其思想變化的時間縱線。為避免侷促一隅，在其他材料的選擇上，李大釗曾經待過的相關報刊社，例如章士釗在日本創刊的《甲寅》，或是由湯化龍主持的進步黨報紙《晨鐘報》等，其中文章也相當值得參考。透過同時期的時論文字，則可在時間的橫斷面上了解該時代整體的思想環境，和不同於李大釗的其他思想意見。此外，為與其他五四人物進行思想比較，如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年譜、文集，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在闡明李大釗政治思想變遷的同時，將李氏和同時代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進行比較，也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因為透過思想比較，才能知道同時代人物思想的共通性和該人物思想的獨特性。而在思想比較之前，撰者以為政治思想的結構可以分作三個層次討論。第一個層次是宇宙觀的部分，屬於思想的內核，可以中西文化的差別為例。第二個層次是自宇宙觀延伸出的價值觀，屬於思想的中層，可以儒家思想、民主思想或社會主義為例，此處也是政治思想比較的重點，為何李大釗會從民主思想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有些人則否，其中可能受到來自不同的內、外因素影響。第三個層次是思想的外圍，包括自價值觀延伸出的主張、方法或策略，是最容易比較出異同的地方，也是屬於思想的實踐層面，如李氏從擁袁到反袁的過程。比較思想的目的，是希望能突顯李大釗的政治思想在同時代人中的特殊之處，彰顯李大釗人物的歷史特色，這是本文所期望能夠達到的目標。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分為緒論、本文的二到五章以及結論六個部分。緒論著重在文獻回顧和研究方法，旨在說明撰者的研究關懷和問題意識。第二章主要介紹的是李大釗的求學經歷，包括李氏從傳統儒學教養到西式學堂教育，以及留學日本的過程，目的是要理解李大釗的知識背景，以便掌握李氏政治思想變遷的基礎。第三章

指出李大釗在民初時期的民主憲政思想。在政治思想上，「民彝」觀念的提出，即是將西方民主中國化的思想工程，為的是要讓中國人易於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在政治實踐方面，李氏則主要希望透過西方民主議會實現中國的民主。第四章主要探討李大釗政治思想從自由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過程。由於來自內、外因素的影響，使得李大釗不得不放棄原有的議會民主觀，轉而投入到激進的社會運動，最終成爲一馬克思主義者。第五章要說明的，是李大釗成爲馬克思主義者之後的政治實踐活動。在中國革命理想與現實環境的兩難中，可見李大釗富有彈性的革命策略和政治手腕。最後的結論，則要總結各章內容，進而理解李大釗在中國現代史以及中共黨史中的歷史意義和具體作用。





## 第二章 早期的生活背景和教育歷程

研究歷史人物的早年思想有一定程度地困難，因為個人思想尚未成熟，沒有定型的內在架構可循；同時，研究人物思想的一手史料，包括個人的文字、書信也相對不足。如要呈現歷史人物思想的早期風貌，實有必要旁敲側擊。本文的研究對象李大釗是清末民初的歷史人物，爲了找到李氏政治思想的起點，首先必須對清末政治和思想情況有大致的了解，才能明白李大釗政治思想來源的基礎。其次，李大釗早年接受的中國傳統士人教育，對其日後思想發展亦有重要影響。必須注意的是，應將李大釗和同時代進步知識分子同樣放入西風東漸的歷史脈絡，觀察其政治思想的西化轉向。當青年李大釗初步完成教育，具備基礎知識，便順著清末的立憲運動潮流，以法政爲志，救國爲業，從此踏上改革中國政治的艱辛道路。

### 第一節 從士人教養到西學教育

傳統中國的士人教養，是清末民初知識分子早年必經的教育過程，儒家教育對李大釗早年思想和價值觀的形成，至關重要。從李氏的文章即可發現，他對中國文化思想和歷史典故相當嫻熟。隨著西學大量湧入，清末亦開始重視西式教育，在教育制度的改革下，新式學堂紛紛建立起來；更重要的是，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對當時仍重視功名的士人社會而言，無疑是很大的打擊；然而這卻促使李大釗往後進入永平府中學堂就讀，初步接受中西合璧的教育。就在此刻，李氏與同時代的中國知識人一樣，從傳統士人格局中跳脫出來，奠定日後成爲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的基礎。爲了更清楚李大釗政治思想的產生背景，有必要簡介清末民初的政治和思想。

#### 一、清末民初的思想背景

清末以來，內憂外患雜沓而至，中國最後一個王朝走向覆滅，其原因多端，尤其因內政不修，導致地方農民揭竿而起。1851年興起的太平天國，洪秀全雖以宗教

爲號召，實則爲反滿的民族革命。<sup>1</sup>他的主要目的在於重整歷久而崩壞的土地制度，以實行「土地公有」的理想；但在曾國藩、李鴻章所率領的地方團練的圍剿下，起事終歸失敗。在平亂的過程中，由英、法組織的常勝軍也發揮了作用，對於這些外來者而言，穩定的政經環境將有利於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

帝國主義對東方的壓迫，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從中英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中國被迫輸出許多利權，其中尤侵犯國家主權者，包括割讓土地、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等等。在見證西洋武器的強大之後，清末的有識之士，如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馮桂芬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觀點，<sup>2</sup>它們日後成爲洋務運動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想基礎。然而，因爲這些高階士紳的思想過於保守，在自視中國爲「天朝」的同時，僅注意到「夷狄」器物的優越，而忽略了他們的政法制度，於是中國在甲午戰爭敗給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因而失敗。

在內外交困的環境，尤其是受到西方所帶來的「現代化」衝擊，不得不讓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一方面自詡爲儒家道統的繼承者；另一方面，要合理化其所處的環境，以達到經世目的。這是思想變化的兩種面向。換言之，前者以思想作爲主體，思想者爲客體，象徵中國思想一貫的保守性格；後者則是以思想者爲主體，思想作爲客體，並以此解釋瞬息萬變的世界，形成文化創新的力量。例如甲午戰後的中國面臨列強瓜分危機時，康有爲、梁啓超等人聯名上萬言書要求光緒變法。不同於前者「洋務派」的思想，康、梁等變法人士認爲，中國傳統的「道」已非絕對的價值標準，學習洋人技藝的同時，應包含相對應的制度內涵，非此不能達到富強之目的。隨著時勢變化，「變法派」不得不改變原有思考方式，作出彈性的選擇。

在思想上走得更遠的是「革命派」的孫中山，他自稱洪秀全第二，要進行打倒滿清的民族革命，建立民主的共和政府。雖然孫氏和康、梁同樣都主張要建立一民主政體；但不同的是，孫認爲非打倒滿人政權，不能結束傳統中國以皇帝爲中心的專制思想。孫中山的革命行動，隨著甲午戰敗、因義和團而引起的八國聯軍事件而日益堅定，最後在眾人對庚子後新政的失望下，群起協助革命派，使得辛亥革命因而成功。晚清政治思想從洋務、變法到革命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保守」與「創新」兩種力量相抗的辯證性發展。

<sup>1</sup>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頁238~241。

<sup>2</sup>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台北：學海出版社，1967年），頁151~152。

由歷史觀之，整體時代的思想變化特色是緩慢的。隨著時勢轉變，當它朝向新的方向前進時，又時時會受到舊思想的牽引，這在每個時代中的個人，也都具體而微的展現出來。以個人原來接受的教育為基礎，當他面臨到一個變化快速的環境，就不得不產生新舊價值觀的矛盾；然後又跨越這暫時的矛盾，尋得內心世界與外在環境的統一。如此思想轉變的過程，往後都會重覆出現，李大釗的思想變化亦然。這一點，可以在他從一個狹隘的地方知識階級，提升至全國性乃至於世界性的大知識分子的歷程中看見。然而，日後李氏政治思想雖經過不斷改變，但其保守性格亦不能忽略；李大釗所接受的傳統儒學教育，其中過於迂腐的觀點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淘汰，但儒家對大同世界的嚮往及其終極理想，卻會長駐於內心。以下，便先從李大釗的出生和教育背景開始談起。

## 二、出生環境和傳統教育

李大釗，乳名憨頭，少年時名耆年，字壽昌。後改名為大釗，字守常。清光緒15年（1889）10月29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

樂亭縣位於華北平原的東北隅，地處清河之東，灤水之西，橫山之南，渤海之北。其地自古由於近海，非交通要地，亦非兵家必爭之所，所以極少刀兵之禍，於是古稱「樂安亭」，取其為人民安居樂業之地。雖然該地免受戰亂，但是灤河常常於此處發大水，造成洪災。自然界的災難造成人民流離失所，卻也因禍得福，樂亭縣的內地土壤肥沃，主要便是由灤河夾帶大量泥沙沖積而成，樂亭縣人民有務農者，於是向有「冀東糧倉」之稱。此外，該縣人民除了專事農業，亦精於經商：

清代以後，樂亭人到東北經商的人很多。據《樂亭縣志》載：「邑地近邊關，經商者多，出口貿易挾貨營運謂之財主，代人指籌為之伙計，故謀生之道也。」

因為樂亭在東北三省經商的人很多，所以在東北商界有「樂亭幫」之稱。<sup>3</sup>

分析樂亭人民經商的理由，不外乎三點。第一，從積極的想法來看，經商是為了累積財富，購置地產，成為地主，以提升宗族的社會地位。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從事商業累積財富與參與科舉取得功名，同樣是提升社會地位的途徑，尤其土地甚為重要。「土地不僅是財富的來源，還代表著穩定的社會地位，只有擁有土地才有生活和

<sup>3</sup> 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5。

向上流動的權力，任憑知識和官員權力，難以長久地躋身上層階級。」<sup>4</sup>第二，因地近之便。清軍入關建立清王朝後，由於中國東北原為滿人的祖業之地，於是長年嚴禁漢人進入開墾。自晚近俄、日帝國主義進窺東北，清廷才逐漸開放漢人進入開墾，行移民實邊之故事。樂亭縣地靠東北邊關，便於和關外居民互通有無。第三，消極且最為可能的動機是為維持基本生活之溫飽。樂亭縣雖然土壤肥沃，但畢竟瀕臨渤海，多為無法開墾的鹹鹵之地，加上旗人又圈地自用。於是農暇時期，各民戶必須兼營傳統手工業，像是紡織、日常用品以補貼家用；或是將子弟送往東北當店員、伙計，藉以謀生，否則鄉民生活實難以自給：

邑東南近海，西北臨河膏腴之地可屈指，計入國（清）朝順治年間，盡歸旗圈地之屬，民者不過十分之二，率者皆水洼沙灘。農以勤力勝之，畝獲不過斗餘，所賴以養生者惟在旗地。豐年償租外，聊以糊口；凶年則所入不供所償。又有壓租借租等名，租已先交而所收不給，坐以賠累者甚多。邑中非無水利，而不種水田，不講蓄泄之利，耕耘之外一聽之天。麥田甚少，梁、谷、棉花為最。三、四月得雨，麥乃熟，六、七月雨甚下地，率多淹浸。早年或有蝗災……。自灤河東徙，水患始除，然高上之田，每虞干旱；卑濕之地，仍苦淫雨。……若年谷難望順成，且地隘人稠，糧食難以自給。窮苦農民只有逃荒要飯，流落關外謀生。<sup>5</sup>

李大釗自小生活於大黑坨村，該村在樂亭縣城東南 30 華里（1 華里約等於 0.5 公里），向南距離渤海僅 20 華里，早年經常鬧倭寇。其建村始於明永樂二年（1404），李家據傳是自山東遷徙而來，最初即為參與建村的居民之一。大黑坨村之所以稱為「坨」，主要是因為當地具有沙丘的自然環境特徵，凡在草木叢生的地方，沙隨風積，時間一久便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沙土高丘。當地居民為了逃離灤河水患，便會聚居於高地之上，於是村莊多以「坨」稱之。至清末民初，大黑坨村已然發展成為樂亭縣東南沿海的大村莊，全村土地共 5700 畝，居民 250 戶，人口約 1200 人。當地望族有谷家和趙家，他們掌握村裡大部分的土地，十有六七皆集中在這些富戶手裡。李家在當地算的上是小戶，衣食用度尚且自足。上述便是李大釗早年生活環境的概況。

<sup>4</sup> 朱開宇，《科舉社會、地域秩序與宗族發展：宋明間的徽州，1100-164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4 年），頁 8，註 11。

<sup>5</sup> 原文出於《樂亭縣志》。轉引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4~5。



接著來看李氏宗族。李大釗的直系曾祖父，李為模，字廣訓，生於嘉慶六年（1801），卒於同治十一年（1872），生李如珍、李如珠和李如璧三子。值得介紹的是長兄李如珍，因他膝下無子，於是根據當地傳統習俗，過繼二弟李如珠的次子李任榮為嗣。李任榮，字華亭，因他敏而好學，知書達禮，是個尚未考取秀才的童生，未來有志於功名，讓李如珍很是喜愛。但李任榮體弱多病，而且又受到地震驚嚇，不久即於 1889 年因肺病過世。李任榮的妻子周氏，則於該年生下李大釗，周氏因悲傷過度，在李大釗出生不過 16 個月，亦離開人間。李如珍便成為了李大釗的祖父，對於李任榮的思念和期許，便轉移到孫兒李大釗的身上。

有關李大釗早期生活的一手史料不多，根據其〈獄中自述〉所言，李氏的身世悲苦，「在強裸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姊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sup>6</sup>於是在李大釗早年的求學過程中，祖父李如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李如珍，生於道光七年（1827），卒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其一生好學，青年時期曾到關外學做買賣，並於長春、萬寶山等地經營過貨鋪，擁有 90 餘畝的土地。此外，他還戴著從九品的「登仕佐郎」官銜。<sup>7</sup>如今已無法確知其官銜是因正途抑或是捐官而得，但可以確認的是，李如珍雖出身農家，不僅習於經商營利，還相當重視傳統士人的功名。為提升社會地位，除了經商一途，便是讓家族的男性參加科舉取得功名，以光耀門楣。於是在祖父的調教之下，李大釗自小就接受了中國傳統的儒學教育。李自 3 歲起便已開始認字。4、5 歲時，學習蒙學，讀《百家姓》、《千字文》和《三字經》。<sup>8</sup>7 歲，進入本村的谷家私塾讀書，師事單子鰲。單子鰲是一位秀才，相當喜愛李氏，李大釗少年時期的名字即由單氏所命，取其長壽之意。李大釗從此正式接受傳統私塾教育，學習四書經史。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 7 歲進入私塾教育的這一年恰為 1895 年，中日之間發生了甲午戰爭並簽訂《馬關條約》，當時康、梁等進步知識分子主張變法，孫中山正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籌組革命。而要大上李大釗近 10 歲的陳獨秀，也於次年考中秀才；其出外見多識廣後，亦開始鄙薄科舉。從這個時間點，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在代際之間，對於中國現狀有著不同的想法。有趣的是，可以想像到在中國有許多像是大黑坨村這樣的地方，它們大多和外界隔絕，無法緊跟時代潮流的脈動；地方

<sup>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獄中自述〉，頁 226。

<sup>7</sup> 朱成甲，《李大釗傳（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8。

<sup>8</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1。

基層的士大夫多是墨守成規，仍未受到西方文化衝擊。<sup>9</sup>當清廷急於應付甲午戰後的殘局，而進步士紳正忙於求變的同時，地方思想觀念的遲滯卻也完全展露無遺。

因河北有早婚習俗，且家中亦無人，於是李大釗在 10 歲時，即與本村的趙紉蘭結婚。趙紉蘭出身農家，正直樸實，賢慧熱誠，往後在李大釗於天津求學的日子中，獨自操持家務，典當挪借，以支持丈夫就學，是具有傳統婦德的典型舊時代女性。同年，單氏請李如珍為李大釗另尋名師。1900 年，發生義和團事件，引發八國聯軍。這一年李氏 11 歲，進入本村張家專館跟隨趙輝斗學習。趙輝斗曾接受李大釗岳父的資助，到北京國子監念書，具「增廣生員」資格。<sup>10</sup>13 歲，李大釗轉到城北井家坨村，到宋舉人那求學。宋舉人原名宋森蔭，設了宋家學館，延請黃玉堂為師。黃玉堂亦為樂亭縣人，於城北小聖廟村，也曾在北京國子監學習過，當時也是個「優貢」。<sup>11</sup>李氏刻苦求學，成績優異，亦受到黃玉堂讚賞。有一次，黃在課堂曾談及太平天國和洪秀全的政治主張，李大釗一聽便激動地說，將來要效法洪秀全。<sup>12</sup>在黃先生那接受了三年指導，李氏也即將要踏上傳統中國的科舉之路。

### 三、從詔廢科舉到永學堂

李大釗第一次參加科舉的地點在永平府。永平府下轄一州六縣，一州為灤州，六縣包括盧龍、遷安、昌黎、樂亭、撫寧和臨榆，永平府治設於盧龍。1900 年時值庚子，當義和團事件一發生，盧龍城內的拳民便將教堂盡皆焚毀，而後八國聯軍為討滅義和團，亦曾進入盧龍。所以相較於大黑陀村，李在永平府更能親身體驗來自義和團「扶清滅洋」所蘊涵的民族思想，以及近距離感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威脅。

1905 年秋天，李大釗 16 歲，經過 10 年寒窗苦讀，背負著宗族期望，李氏來到永平府參加府試，但沒想到「試未竟，而停辦科舉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學校肄業，

<sup>9</sup>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載於《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文化，1985 年），頁 25。

<sup>10</sup> 「增生」一詞，始自明代。明初凡在學生員皆給廩食，但有一定名額；其後逐漸增加在學名額，至宣德年間，增廣之名額與給廩之名額相等，於是增額者稱為「增生」。清代沿襲此制，二者名額規定，仍舊相同。詳見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台北：考選部，1991 年），頁 52。

<sup>11</sup> 「優貢」亦稱優貢生，清代始有之。初僅規定府學二名，其餘各學一名，起送赴（國子）監肄業，而無「優貢」之名。至雍正十一年（1733），始分析貢、監名色，凡優生由廩、增生升入太學者，准作「優貢」。乾隆四年（1739）起，規定嗣後舉保優生升入太學，除確訪品行，考試經義外，並限以大省不超過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如不得人，寧缺勿濫。詳見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頁 58。

<sup>12</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20。

在永讀書二載。」<sup>13</sup>該年，張之洞與袁世凱奏請廢除科舉，清廷不久便於9月下詔：「即自丙午科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sup>14</sup>也就是說，李大釗在應試的過程，因廢除科舉的詔令而中途停止。根據相關研究，李大釗不但通過初試，也參加了複試；而複試的通過已非為甄選秀才，而是決定能否進入永平府中學堂就讀的資格。<sup>15</sup>李大釗於府試後順利地進入永平府中學堂，想見李大釗的資質在同年齡層的孩子中，相當出類拔萃。從宗族立場來看，族人能進入府治就學亦能感到榮耀，就好比是考中秀才。但不可諱言的是，清末新政的「廢科舉」和「興學堂」政策，著實給予中國傳統士人社會巨大的影響，對李大釗以及同時代的讀書人來說，內心所受衝擊可以想像。

為更清楚了解詔廢科舉對李大釗及其所處社會的意義與影響，吾人可以從明清社會史的角度觀察。清代地方社會組織的形成，不能忽略「科舉制度」以及「宗族組織」兩者，它們彼此的關係是相互倚賴的，然而這些中國地方社會的傳統因素，卻也造成地方思想觀念的遲滯。

先由科舉制度談起。中國傳統士人的科舉之路，一去便難以回頭。從最初的秀才，通過地方鄉試，成為舉人；再以舉人身分，通過北京舉辦的會試，而成為進士；最後進到皇城，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決定官職品位。透過從地方到中央一層一層的考驗，篩選出全國優秀人才，成為天子門生為皇帝所用。他們皆屬於中國傳統社會的高級士紳，而全中國的士人亦無不以成就至高功名為最終目的。<sup>16</sup>可惜的是地方考試均設有重重關卡，各地方的錄取人數亦皆有定額。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

<sup>1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獄中自述〉，頁226。

<sup>14</sup> 轉引自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29。

<sup>15</sup> 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32。

<sup>16</sup> 當時人對於科舉功名的看法，也可以從陳獨秀自述的個人經驗來觀察：「因為在那一時代的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虛榮，實已支配了全社會一般人的實際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時捐班出身的官，人們還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須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時還未發明），做大官才能發大財，發了財才能買田置地，做地主（那時存銀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還未發明），蓋大屋（並非洋房），欺壓鄉農，榮宗耀祖；那時人家生了兒子，恭維他將來做剛白度（即買辦）的，還只有上海十里洋場這一塊小地方，其餘普遍的吉利話，一概是進學、中舉、會進士、點狀元；婆婆看待媳婦的厚薄，全以兒子有無功名和功名大小為標準，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頭上，沒有功名的連用人的氣都得受；貧苦農民的兒子，舉人進士狀元不用說，連秀才的好夢都不敢做，用盡九年二虎之力，供給兒子讀幾年書，好歹能寫出百而八十字，已經算是才子，如果能夠跟著先生進城過一次考，胡亂寫幾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場就榜上無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頭地，窮兇極惡的地主們，對這一家佃戶，便另眼看待，所以當時鄉間有這樣兩句流行的諺語：『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先爭口氣』。農民的兒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將來做土豪劣紳的基礎，一生吃著不盡，所以無論城鄉，屢考不中的人們，往往埋怨祖墳的風水不好，掘出屍骨來改葬，這便是那般聖人之徒揚名顯親的孝道；在這樣的社會空氣中，在人們尤其是婦女的頭腦裡面，科舉當然是一件神聖事業了。」引自陳獨秀，《實庵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頁31。



許多士人仍徘徊在下層士紳的地位。但從地方的角度來看，這些地方級的下層士紳雖然功名不高，但在地方上卻又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再由宗族制度觀察，中國傳統社會屬於父系社會，其觀念向來是安土重遷，重視族系的薪火相傳，生育後代的男性繼承人便成為宗族的重要大事。然而僅僅生育男性是不足的，最好是使宗族的男性能夠接受儒學教育，通過政府舉辦的科舉取得功名，以發揚宗族聲望，提高社會地位；所以宗族香火的興旺與否，除了是否有男性繼承者之外，和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亦是息息相關。而那些通過地方科舉，而未進一步取得較高功名的下層士紳，由於天高皇帝遠，在地方上更成為重要人物；地方士紳除了主導民間公共建設，如建廟、造橋、鋪路等等之外，在民眾發生爭論糾紛時，還運用傳統儒家那套「春秋決獄」來化解地方爭議。這不但是士紳階級的權力，也是其對於地方的責任。

自南宋形成的「科舉社會」以迄明清，下層士紳一直發揮著積極的社會功能，他們不但維繫著地方秩序，還是天子在地方上的代言者。然而此種以「科舉制度」和「宗族組織」形成的地方社會結構，在中國面臨西方列強的威脅時，卻仍舊維持其傳統社會具有的遲滯性：第一，從制度面看，地方士紳忠於清廷，對於科舉制度仍舊信任，惟有取得功名才能光耀門楣。第二，從思想面看，在新政還未開始前，各地的新式學堂尚未普遍，地方士紳對於西學所知不多，思想上所受的衝擊亦不大，所以也無現代的「民權」思想。第三，最重要的是，地方士紳的觀念僅局限於地方。他們安逸在地方上的管理，滿意鄉人對他們的敬重；其關懷的重心多在地方，對於國家整體事務未能知悉，較不會有所謂現代的「國家」概念。地方的遲滯性，便倚賴在這群地方士紳於道德和管理上的權力而維持下去，而受到管理的庶民們，更不用說會有突破現狀的想法出現。

早年李大釗在應試前的心理，或能從上述地方社會的三個層面來揣摩。首先，他會認為參加科舉，除了符合祖父的期望，還希望能夠考上秀才，這是中國傳統士人功成名就的最初夢想。其次，李大釗自小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教育，透過閱讀儒學經典，內化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和世界觀，這部分亦展現在日後李大釗的著作之中。再者，李大釗出身自樂亭的李氏宗族，此時觀念大概仍舊局限在於地方。仍未受到外來刺激的李大釗，當然也不會有所謂的民權和國家觀念，小小的心靈裡更多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這些早期思想在李大釗往後經歷更多的人生體驗之後，才能有所突破和轉變。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地方士紳並非全是停滯不前，其中也有例外。那些受過西方教育和學術影響，政治上傾向激進和改革，能從國家利益角度去思考的人，便成爲了進步士紳，例如前文曾提到的變法派和革命派。

爲了瞭解李大釗早期思想的突破過程，不妨參考梁啓超、陳獨秀的經驗。晚清進步士紳擺脫地方遲滯的途徑，不外乎外地經驗，以及接觸外來新思想。梁啓超爲廣東新會縣人，小時候的啓蒙教師亦是祖父，名爲梁維清。梁同樣是在2、3歲便開始識字，4、5歲讀《四書》、《詩經》，6歲後從父梁寶瑛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8歲學爲文，9歲便能綴千言。11歲中秀才，16歲參加廣州鄉試中舉。梁啓超的功名之路可謂相當順利。其思想的轉折，發生在他17歲那年參加北京會試落榜之後，途經上海購得《瀛環志略》一書，「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並「頗有愴於中外強弱之迹」。<sup>17</sup>這一年是1890年。秋天，梁啓超和同學通甫一同拜見當時「舉國目爲怪」的康有爲，梁當時內心受到的震撼，有如下動人的記述：

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毀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罔罔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sup>18</sup>

自康、梁二人相見之後，梁身爲舉人，竟拜康秀才爲師。次年，梁又受業於廣州萬木草堂，前後共四年光陰。到1895年參與康有爲的公車上書，1898年成爲震動全國的戊戌變法代表人物之一。這件事說明，梁啓超對於過去追求傳統功名的自我產生了懷疑，思想開始有大大地轉變；而康有爲講述的西學，縱使有中體西用的痕跡，但那正是梁過去曾未接觸過的新學。於是梁在此後，可以算是從一位局限於地方社會結構的士紳，蛻變成爲關懷全國事務的進步士紳。

再舉陳獨秀爲例，日後與李大釗有密切關係的陳獨秀，是安徽懷寧縣人。看他早年的學習，從6歲到9歲也是跟隨著祖父陳章旭讀書，教以四書五經。12歲始，

<sup>17</sup> 梁啓超，〈《適可齋記言記行》序〉。載於梁啓超著，吳松、盧雲昆、王文光、段炳昌點校，《飲冰室合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30。

<sup>18</sup> 梁啓超，〈三十自述〉。載於梁啓超著，《飲冰室合集點校》，頁2223。

改由兄長執教。但陳獨秀極不喜八股文章，卻偏愛《昭明文選》。1896年，陳獨秀時年18歲，便通過童試，中秀才。在他應試的過程中，有著一段有趣的回憶：

像我那樣的八股文程度，縣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試，宗師（安徽語稱學院為宗師）出的題目是什麼「魚鼈不可勝食也材木」的載搭題，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給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縐著眉頭足足有個把鐘頭一聲不響，在我，應考本來是敷衍母親，算不得什麼正經事，這時看見大哥那種失望的情形，卻有點令我難受。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sup>19</sup>

上述陳獨秀鄙薄科舉的想法，雖是對往事的追憶。但從中亦能感受到科舉在當時人的想法，以及陳對於科舉的不滿。陳獨秀的不滿，也並非來自外來新思想的刺激，更多地是反映當時普遍對於傳統八股取士制式化的批評。19歲時，陳獨秀參加江南鄉試，未中；但南京此行，陳卻閱讀了梁啟超主編的進步報刊《時務報》，思想於是開始產生變化。「談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灿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sup>20</sup>隔年，陳獨秀入杭州求是書院。這是一所新式書院，傳授新式教育，課程有英文、法文、天文學、造船學等新學。1901年，陳到日本東京留學，並結交其他的留日學生，開始由改良路線走向革命運動。到了1904年，陳獨秀回鄉自辦《安徽俗話報》，並發表了〈論國家〉一文，從中可見陳獨秀已然完全突破地方格局，成為中國的新知識分子：

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那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

<sup>19</sup> 陳獨秀，《實庵自傳》，頁33~34。

<sup>20</sup> 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第2卷，第2號，1916年10月1日。

消受，我一個人如何逃脫得出呢。我想到這裡，不覺一身冷汗，十分慚愧。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個大家的大義。……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sup>21</sup>

從梁啟超到陳獨秀早期的學習經驗和所受的思想衝擊來看，外在世界的刺激顯然相當重要。他們都是從地方開始往上爬，共同參與科舉，走過士人的必經之路。當時在中國各大城市，資訊顯然要比地方發達，思想受到刺激的機會很多。只要地方秀才到各省大城參加「鄉試」，<sup>22</sup>便能增廣見聞，對現狀產生懷疑；而李大釗同樣能透過上述模式，在思想上突破地方局限。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李氏在年歲上較梁啟超小16歲，較陳獨秀則小10歲，其生活背景與先進前輩相比自然有些距離。1905年廢除科舉，連帶的政策是建立新式學堂，李大釗正好搭上這班新政策的首班車，這個特殊的歷史因素，也決定了李大釗往後和梁啟超與陳獨秀二人的不同。

李大釗就讀的永平府中學堂建立於1902年，1903年初開始招收學生，並開設2個班，學生共80餘人，學制4年。1904年又增設2個班，學生增至160餘人。但早期學費幾乎全由學生負擔，所以學生來源多具有官紳背景，少有貧家子弟。1905年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時，政府挹注更多的經費於該校，該學堂正式成為官辦學堂，像李大釗這樣的貧窮學生，也因而能負擔得起學費。在學習內容上，根據當時清廷規定，中等學堂必須開設中國文學、外國語、歷史、地理、算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理財、圖畫、體操等12門課程。此外還強調講經課程，每周要上9小時，占總時數的四分之一，未脫離張之洞在辦學時強調的「中體西用」精神。

至於李大釗進入永平府中學堂的2年間，究竟在思想上受到多大的衝擊，能夠看到的一手資料並不多。在李氏於留學日本期間，以英文撰寫的〈我的自傳〉中提到：「我到了永平府，在中學校裡學習啓蒙科學。這是我學英語的開端。在那兒我度過了兩載光陰。」此外李也開始接觸新學，閱讀康、梁文章，初步了解西洋的政治

<sup>21</sup> 三愛（陳獨秀筆名），〈說國家〉，《安徽俗話報》，第5期，1904年6月14日出版。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7~18。

<sup>22</sup> 此處的「鄉」，非同於今日行政單位中的鄉。科舉制度的鄉試，多是在地方上的大城進行，例如廣州即是鄉試的舉辦地點，而台灣在清治時期未設省之時，考科舉尚要渡海到福建與試。考上鄉試者即為舉人，接著就是上北京參加會試。



經濟概況。<sup>23</sup>同時由於清末立憲運動熱潮，所以清廷在各地廣設法政學堂，以儲備未來從事政治之人才。而李氏亦本其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興趣，以法政為志，救國為業。在李大釗的學習過程中，永平府中學堂的教育無疑是李氏從傳統儒家士人教養到西式教育的轉折；並且由地方士紳，逐漸轉變為進步士紳。它也是李大釗開始確立人生未來志向的重要里程碑。

## 第二節 以法政為志，救國為業

清末中國有兩種救國途徑，其一是推動體制內改革，其二則是體制外的革命。但不論改革或是革命，在傳統中國面臨現代化的時代要求，都必然要反省傳統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並且在中國建立起西方民主制度。李大釗正是在永平府學習的過程中，接觸到了康、梁等改革派的政論文章，對於政治制度產生興趣，從而抓緊這個時代的主要課題，立志研究政治。李氏除了在法政學堂努力學習西方政法，還實際參與社會的國會請願運動。即使到民國之後，袁世凱總統在日益專政的情況下，李大釗亦作為一位政論家，從在野的立場，對民國政治進行針砭和建議。這說明了青年李大釗，除了立下宏願要成為研討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專家之外，他同時還是一位能有具體實踐精神的社會菁英。

### 一、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

李大釗在永平府中學堂的學習，初步接觸到了英文以及外來知識，為他日後的西學教育奠定基礎。按照清廷所頒布的《寅卯學制》，其中規定中學堂的修業年限，應為5年。<sup>24</sup>但李氏此刻內心的不安，乃有感於國勢之陵夷，同時也想接觸外界未知的新事物，到資訊更充足的大城市學習，於是李大釗僅讀2年，便於1907年的暑假和二、三位志同道合的同學，到天津報考其他學校：

釗感於國事之陵夷不振，頗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之思想。遂與二三同學，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學校。其時有三種學校正在招考：一係洋軍醫學校；一係長蘆銀行專修所；一係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軍醫非我所喜，故未

<sup>23</sup> 李大釗年譜編寫組，《李大釗年譜》（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5。

<sup>24</sup> 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38。



投考。銀行專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財致個人之富，亦殊違我素志，乃決心投考法政專門學校，幸被錄取。<sup>25</sup>

1905年發生日俄戰爭，君憲立國的日本擊敗了沙皇專制的帝俄，此事掀起清末的立憲運動風潮，清廷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重視國內立憲工作。職是之故，清廷的新式教育，在原僅有少數的語言、工藝和軍事學堂的基礎上，又於各地增辦了師範、法政學堂，以備將來教育發展和預備立憲的需要。<sup>26</sup>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成立於1906年12月，是由直隸總督袁世凱所創辦，分專門、簡易兩科。專門科的宗旨是「以造就法政通才為主」，簡易科則是「以養成審判人員及律師，與地方自治人員為主」。<sup>27</sup>從該學堂的宗旨來看即可明白，它是在上述立憲風潮的脈絡下建立起來的。李大釗之所以志於法政，選擇該校就讀，即是為國家和民族利益著想；他認為惟有改變中國傳統專制政體，學習西方的民主立憲，才能改變中國艱苦的現狀。

李大釗就讀的專門科，是仿自日本法律學校學制，前3年為預備科，著重在外語和中學知識的學習。到第三學年，開設法學通論、經濟學原理等基礎課程，為進入正科作預備。後3年進入正科後，分為法律和政治兩門，課程內容幾乎移植自外國，全以日語教學，甚至遠自日本聘請教習，例如日本著名學者吉野作造、今井嘉興等人，都曾執教於法政學堂。<sup>28</sup>李氏自1907年9月入學，到1913年6月畢業，前後共6年時間，其心境是「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志趣，亦日益騰高」。<sup>29</sup>但李大釗當時的家境，已隨著祖父的謝世而日漸貧困，所以「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sup>30</sup>

在天津求學的過程，李大釗除了外語和政治知識有所成長，在其實際參與的社會運動中，也獲得豐富的經驗。在學前期，李大釗參與了清末立憲派領導的國會請願運動，與法政學堂同學們共同經驗時代轉變的脈動。辛亥革命期間，法政學堂的地理教員白雅雨在北方領導的灤州革命遭遇失敗，也帶給李氏很大的衝擊。在學後期適逢辛亥革命，此時李氏參加北洋法政學會的學生組織，負責編輯學會代表刊

<sup>25</sup> 1927年4月，李大釗於蘇俄大使館遭軍閥張作霖逮捕。牢獄其間，李氏作〈獄中自述〉一文，共有三稿，此處文字引自初稿。見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頁523~524，註5。

<sup>26</sup>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頁3。

<sup>27</sup> 原載於天津《大公報》，1907年6月27日—7月23日。轉引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33。

<sup>28</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26。

<sup>2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獄中自述〉，頁226。

<sup>3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獄中自述〉，頁226。

物《言治》月刊，亦擔任其主要的撰文者。到了民國之後，李氏正式進入政論文章的寫作生涯。以下則就上述事件，分而述之。

## 二、參與清末的立憲運動

1910年間，立憲派領袖孫洪伊、張謇等人領導各省代表和國民，進行速開國會的請願運動。該運動的發生原因是：根據1908年清廷頒布的《憲法大綱》，原預計於1916年正式召開國會，但前後竟需9年的預備。張謇等人覺得預備時間過長，且「痛外侮之劇，部臣之失策，國勢之瀕危，而人民不可一息即於安」。於是「合謀上書，請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sup>31</sup>從慈禧太后詔示預備立憲開始，時人不難察覺，清廷欲藉實行立憲之名，以鞏固其日漸動搖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立憲派亦乘此勢順水推舟，藉立憲之風潮以達到政治改革；經過3次的國會請願，各省代表動員國民簽名，由孫洪伊代表上書皇帝，要求明年即開國會。清廷最終雖提出讓步，預備時間由原來的9年改為6年，但又嚴厲聲明不得再議更張，否則便要依法懲辦。

### （一）國會請願運動的經驗

北洋法政專門學堂的設立，即是以培育將來為清廷所用的人才為目的，但清廷卻無法直接控制學堂師生們的思想。法政學堂師生的政治傾向，正是清末政治改革與革命兩條途徑具體而微的展現。隨著國家政局變化，法政學堂內部的學生也漸漸分化為立憲派或革命派，其中立憲派人數較多，此時李大釗的政治傾向則算是偏向立憲派。在第三次國會請願之後，有些省分如江蘇、浙江、貴州等，滿意清廷開出的條件便不再繼續請願。然而清廷的回覆，卻又讓直隸省（今河北省）的人民通電請願代表，拒絕散歸，堅持續請。<sup>32</sup>法政學堂的學生又都是「習法政學，受刺激深」，是以「風潮最烈，收束亦難」。<sup>33</sup>加上當時「中國北部政治運動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學校為中心」。<sup>34</sup>於是，李大釗即作為法政學堂學生的代表之一，於1910年底參與第四次國會請願。其事件始末，依據李大釗事後回憶如下：

<sup>31</sup> 張謇，〈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書序〉，《國風報》，第1年，第2期。轉引自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67。

<sup>32</sup> 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70。

<sup>33</sup> 出自李矩在直隸法政專門學校紀念會上的紀念詞。轉引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37。

<sup>3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十八年來之回顧〉，頁383。

時當宣統二年（1910），日本要強迫攫取安奉鐵路，東省代表來津求援，天津學生在東馬路開會歡迎，共舉溫世霖為會長。本校同學立憲、革命兩派，立憲派公開運動，革命派秘密運動。同學多數屬於立憲派，少數屬於革命派，于永滋、王德齋兩位先生是革命派中心人物。立憲派打算全體往北京請願，要求政府開國會。本校同學在東大講堂開會，同學秦廣禮斷指寫血書，激揚民氣。同學孫可君斷肘，大家非常激烈。孫君斷肘之後，全身為血所染，許多同學鼓掌叫喚，都以淚相見。此時同學只以血淚相見，李監督、鄧和甫都勸大家不必自殺，可以積極想法就是了。那種悲慘激昂的光景，我終身不能忘！大家鬧了一天，夜間開會，相約明天黎明整隊到廣東會館開會，作請願的運動。過河的時候，碰見李監督，李監督善言相勸，教大家回學校再商議，學生不肯。平時學生對監督談話時非常客氣，這時候也不客氣了。一直到了廣東會館，商議上府院請願。全天津學校的校長及提學司也都來到廣東會館，勸阻大家不要走，大家不聽，把諸位校長及提學司圍在中間。這時後的群眾心理，那裡還可以理喻？若工夫一大必有不測。李監督為人聰慧機警，見這般光景，實有不了之勢，他就站在臺上，對眾嚷道：「你們要請願，我們幫著你們。」眾鼓掌。「大家出發的時候，必須有秩序。」眾鼓掌。「我們要先走一步。」眾鼓掌。於是各位校長及提學司得免於難。大家全體出發，電車也停了，到了府院衙門前都坐下，要求立時給北京打電報，使其立憲開國會，還要立時等回電。又整隊往省議會去請願，在道上碰見道台坐著馬車，大家把道台打了個不亦樂乎，馬車也碎了。後來同學勸止，才把道台放走，逃了一條命！這是大眾的狂熱，於事業上沒有多大效果，但當這時候也沒法勸止，後來學生各歸本校。<sup>35</sup>

第四次國會請願的原因，除了緊跟著前次速開國會的步調，還有東北安奉鐵路問題的持續延燒。1909年2月，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向清廷要求對安通至奉天的鐵路，及其沿線礦物享有特權。8月又照會中國，日本已決定自行改築安奉鐵路。此事引起京津地區及東三省民眾的激烈抗議，<sup>36</sup>以至於東北愛國學生代表們紛至天津求助。當時天津學界即全國學生運動的中心，學生團體常會跨省互相聲援，在國事日非的情況下，加上學生激進改革的心理，最終促成第四次國會請願。眾推溫世霖為天津

<sup>3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十八年來之回顧〉，頁383~384。

<sup>3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頁521，註8。

學界請願同志會會長，率領天津商民聯合行動，到督府要求直隸總督陳夔龍即日電奏，<sup>37</sup>速開國會。李矩是當時北洋法政專門學堂的監督，態度較為保守。他和其他學校監督及學務官員們，對李大釗等立憲運動的學生代表進行勸阻，但學生仍執意透過罷課、集會遊行、靜坐等方式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政府當局對此次國會請願運動的處理則是：

風潮鬧完之後，當局方面以為風潮起的原因，都因為會長的鼓動，於是把溫世霖放逐到新疆去，學校方面提倡提前放假。當時大家沒有出息，見學校裡提前放假，都歸家去了！像這狂熱的政治運動，不一時就消滅。這次風潮的結果，大家把溫世霖先生送到新疆，誰也不聞不問了！<sup>38</sup>

陳夔龍原來是接受陳請，允諾代奏；但清廷卻仍聲稱原訂期限不可更張，並要陳宣示維持舊論，不可再行瀆奏。<sup>39</sup>這樣的結果自然不能使請願學生滿意，甚至還要進行下一波的行動。天津學界提出了全國總罷課的動議，雖未獲表決，仍通電雲南、貴州、四川、新疆、甘肅各省宣告，奉津學界「現已一律罷課」。<sup>40</sup>由於各學堂監督無法整飭學生的激進行動，紛紛提出辭呈；陳夔龍知道此事大怒，不得已只得派軍警前往，強迫學生集會解散。對學生施壓的同時，亦不願事態擴大，僅將請願代表溫世霖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再者，學校也都提議放假讓學生各自回家，減緩學生激動的情緒，第四次的國會請願也就無疾而終。

從中國政治史來看，清末的國會請願運動是一個很大的跨越。在立憲運動中，慈禧太后宣布「大權統歸朝廷」，同時也承認了「庶政公諸輿論」的原則。雖然清廷要進行的是假立憲的改革，但卻也讓社會有言論、集會、結社等方面的自由。各地的立憲促進團體接連出現，1906年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成立，梁啟超在日本成立政聞社，推動立憲政治的改革，最後則是由各省代表動員全體國民的力量，上書皇帝要求進行速開國會，這是過去歷史上不曾發生過的事。

特別要強調的是，第四次國會請願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立憲派要求速開國會的目的，但是相較於前3次的國會請願，其意義甚為重大，它表示學生團體的力量開始出現於中國的政治舞臺。甲午戰爭結束時，新式學堂仍未普及，學生未能成爲一個

<sup>37</sup> 此時袁世凱已遭清廷罷斥歸鄉。

<sup>3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十八年來之回顧〉，頁384。

<sup>39</sup> 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72。

<sup>40</sup>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頁337。



社會團體。但到了日俄戰爭之後，由於新政的推動，廣設新式學堂，讓社會出現了新的學生團體。在政府給予較多的自由下，其影響逐漸由區域性，轉變為跨省的全國性力量。他們藉由集會結社、出版刊物來表達其政治言論，並實際參與政治請願活動，不僅像前次要求上書，還以聚眾遊行、靜坐、組織罷課等方式提出政治訴求。促進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現代意義的學生民主運動實肇端於此。<sup>41</sup>李大釗有幸能躬逢其盛，他代表著學生群體，形成推動中國進步的力量，此種特殊的出身經歷和特質，使李氏不同於同時代的進步知識分子，其影響及於往後政治改革的方式。日後的李大釗不像上一代進步士紳，如梁啟超般直接進入政治集團內部進行政治改革；而是看上學生年輕活力的特質，從而領導學生團體由外部對政府提出改革建議，甚至是嚴厲批評。此特徵與李大釗一開始的政治活動背景，不無關係。

## （二）從國會請願到灤州革命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天津就讀時期的李大釗是否已具備革命思想。根據現行研究，李大釗早年確實有反滿傾向。<sup>42</sup>李氏自小即喜聽太平天國的故事。更直接的證據是，李於 1909 年歲末寫作的《歲晚寄友》2 首詩，詩中有云：「九世仇堪報，十年願未違。」<sup>43</sup>自清順治至光緒年間，正好歷經九世。由句意推敲，李大釗似是要報復當年滿人入關時，漢人受到的「揚州十日」和「嘉定屠城」的民族舊恨。詩中又云：「何當驅漠北，遍樹漢家旗。」<sup>44</sup>李氏之意，似乎是要將滿人全趕至關外，以恢復漢人政權。然而李大釗「興漢排滿」的思想究竟單純是為民族大義？還是和現實政治改革有關？更準確地說，身為漢人的李氏，內心確曾忌恨滿人長久對漢人的種族歧視，但這僅止於普遍漢人的想法。和當時大部分的立憲派同樣，李大釗對於清廷推行的立憲運動仍處於觀望態度，他深切期盼清廷能夠大刀闊斧，改革腐敗的內政。

就總體情況來看，在國會請願運動時期，中國與外部帝國主義的矛盾尚暫且壓過國內滿、漢的民族矛盾。但隨著事態發展，如同李大釗所言，第四次國會請願風潮「算立憲派運動失敗，而革命派進行越發有力，從此立憲派的人也都傾向革命派」。

<sup>45</sup>中國同盟會在 1911 年 4 月於廣州進行革命活動，後來稱為黃花崗之役，這次起義

<sup>41</sup>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頁 303。

<sup>42</sup> 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 80~82。

<sup>4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歲晚寄友〉（二首），頁 235。

<sup>4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歲晚寄友〉（二首），頁 235。

<sup>4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4 卷，〈十八年來之回顧〉，頁 384。

「雖遭失敗，卻是後日成功之母，而一般革命家都因之而起。」<sup>46</sup>此役的轟烈也讓社會人心有所震動，李大釗亦不例外。對李氏有切身衝擊的革命活動，則莫過於辛亥革命期間在直隸響應起的灤州革命。

灤州革命的領導人之一，白毓崑，字雅雨，江蘇通州人。其「生而穎異，髫齡能文，倜儻有大志。……於時憤國勢岌危，嘗慨然有澄清中原之志」。<sup>47</sup>他以教育後進為己任，先後在南洋公學和滬上澄衷學堂擔任講習，也曾在北京地區擔任客座教習，在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則擔任地理教員。他當時給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笑，在各校授歷史地理，為學生所欽仰」。<sup>48</sup>在國會請願運動時，天津學界曾找白雅雨商會，但他卻回應「與虎謀皮，庸何有濟。諸君曷留熱血以供後日用乎？」<sup>49</sup>此處明顯表現出白雅雨的革命熱誠，他希望能夠推翻腐敗滿清，建立一個新中國。1911年10月武漢事起，東南皆響應。白雅雨便邀集革命同志，說明「京津為根本重地，京津不動搖，則南軍恐不易收效」。遂自1911年底開始運動北方革命，領導天津共和會進行反清，並聯絡灤州新軍第二十鎮舉兵起義；但因各方力量協調未當，加上雙方兵力懸殊，最終白雅雨便於革命中壯烈犧牲。

此次白雅雨的犧牲，對李大釗而言，內心所受的衝擊，並非在於北方革命的失敗，而是親師白雅雨的革命熱誠。就事實所見，當社會運動面臨到群眾激進情緒的臨界點時，「速請國會」和「反清革命」兩者，那僅僅是一刀兩面；所不同的是，刀口是朝向自己，還是對方。一旦朝向自己，便是斷指切臂，血諫以明志；一旦是朝向對方，那就是要雙方開戰，直到現狀顛覆為止。不可否認的是，李大釗的心境和當時大多數的立憲派人士相同，正是從參與國會請願運動後又轉而同情革命的過程。而白雅雨從容就義的革命形象，也從此深植李大釗的內心當中。

### 三、民初政治言論的發表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能完全歸功於革命黨，更多的是對清廷失望的立憲派，還有地方士紳、會黨和新軍，這說明了這場革命性質的多元以及濃厚的地方性格。過去歷史學界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往往認為其成果是它成功推翻了清王朝，使

<sup>4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十八年來之回顧〉，頁380。

<sup>47</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66。

<sup>48</sup> 此言為李矩所誌，出自《直隸法政專門學校十八周年紀念特刊》。轉引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41。

<sup>49</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66。

中國結束了兩千年的封建專制政體，邁入新的民主共和國。然而實際的情況則是，這場革命不過是為往後的不斷革命揭開的一場序幕，當時各地革命力量分散，而清朝仍穩固華北的統治，所以才讓野心家袁世凱得以乘隙而入。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雖為中國政治帶來新的面貌，但社會人心對於新的政治觀念和價值劇變卻仍未跟上，民初有識之士早已根據相關學理提出、並試圖解決上述新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李大釗即為其中一人。不同於清末時期，李氏此時更能暢所欲言，並且在與同儕合辦的《民治》月刊發表政論；其中環繞在「擁袁」和「反袁」的問題，不但表現出早期李大釗政治立場的保守性格，同時也反映李氏政治思想的理想和超越。

### （一）袁氏當國

袁世凱，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故時人又稱袁項城。袁自幼出身官紳家庭，其早年參加過兩次鄉試，皆未能中，於是轉入軍人行伍。日後袁在朝鮮的「甲申政變」率領清軍擊退日軍，<sup>50</sup>從此遂有「知兵」之名。1895年，袁受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推薦，於天津小站編練新軍，從此奠定其在北洋軍系的基礎。袁世凱之所以在民國初年孚有人望，不僅因為他是握有軍隊的實力派，還包括其帶有的清新改革形象。自李鴻章於1901年逝世之後，袁世凱接任了直隸總督與北洋大臣，在清末新政中扮演重要的改革角色，其中包括督辦新軍、廢除科舉、建立新式學校、獎勵工商等等。李大釗就讀的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即是在此背景下設立。直到1908年，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過世，因袁涉有戊戌政變的告密情事，被同情維新運動的攝政王載灃罷職還鄉，因而暫時退出政壇。

1911年，因四川保路運動而引發的辛亥革命，得到中南各省的支持，形成中國南北對峙的局面。北方雖也有如白雅雨領導的革命力量響應，但畢竟事發緊鄰北京政治中心，其戒備森嚴，最後仍以失敗告終。清廷面對南方危急的革命形勢，不得已只得再度起用袁世凱來主持大局。袁世凱起初是半推半就，直到他獲得清廷任命

<sup>50</sup> 1884年12月，朝鮮李氏王朝的獨立黨人金玉均發動甲申政變，期間受到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的協助，企圖掃除朝中事大黨傾向清廷的保守勢力。在掌握朝政之後，獨立黨人提出廢止對中國的朝貢制度、建立獨立自主國家、廢除身分等級制度、修正地租法規、充實國家財政等改革方針。然而在獨立黨取得政權後，事大黨便準備聯合袁世凱進行反撲，其軍力共約1500人。另一方面，支持獨立黨的日軍約200人，且態度猶豫未決，而其餘獨立黨軍人早已盡散，於是政變不過3日便失敗，金玉均因而亡命日本。此政變的發生表面雖是朝鮮人追求國家獨立，但實際上反映的卻是清廷和日本互相爭奪對朝鮮的領導權，並埋下往後中日甲午戰爭的遠因。詳見李瑄根著，林秋山譯註，《韓國近代史》（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7年），頁183~206。

爲內閣總理大臣時，袁始願意率領新軍南下打擊革命派。袁世凱是個善於觀察世局而行事的人，在攻擊革命軍的同時，當他認爲革命的趨勢已無法阻擋，便運用其靈活的政治手腕，轉而傾向與黃興等革命派進行談判議和，以從中獲取個人最高的政治利益。南北對立的局勢，在袁世凱居中協調之下，上演著逼宮戲碼，清帝屈辱地接受了皇室優待條件而退位。民國的建立和革命黨及同情革命的立憲派雖有直接關係，但和袁世凱的「傾向共和」亦是密不可分。

在南北議和的政治交易下，袁世凱被革命派暗許爲新共和國的總統，而袁達到了政治目的，自然也樂意接受擔任新民國的領導人。爲何有如此利於袁世凱的交易內容，其因之一是袁在當時可謂備受各界期待，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代表之所以擁袁，爲的是希望能保住得來不易的革命成果。另一方面，清廷所代表的舊封建勢力亦期待袁世凱能爲其效命，消滅革命力量，因而交由袁全權處理。再者，列強方面爲保住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和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對袁世凱終止中國戰亂的實力亦抱有希望。<sup>51</sup>袁本身的條件優秀，除掌握軍隊，又擁有民望的政治資本，於是袁在時勢的簇擁下，走向政治舞臺的高峰。和大多數人的心態一樣，李大釗對當時情況曾有如下表述：「方風馳雲擾之會，所以震伏群魔、收拾殘局者，固不得不惟此梟雄是賴也。」<sup>52</sup>袁世凱在世局中的梟雄角色，以及世人的「求治」心態，使得他被推上共和國總統的位置，實際點出最初的民國政治即具有中國傳統濃厚的「人治」色彩，<sup>53</sup>同時也埋下日後袁大總統專政的遠因。

民國初建，中國知識分子們正準備迎接新中國的到來。在過去的封建王朝是「學而優則仕」，知識分子通過科舉，以參政爲正途；進入民國後，則更換以不同的風貌，士人參政必須透過組黨，以爭權位，於是表現在政治上，便是政黨林立。<sup>54</sup>政黨政治是民初政治史的一大課題，若論其大勢，過去以梁啟超爲代表的立憲派，在民國後合併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成爲進步黨，其政治態度傾向保守，<sup>55</sup>主張維持中央權力集中的穩定政府。其對立面，則是以過去孫中山爲代表的同盟會爲主體，於民國

<sup>51</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1年），頁63。

<sup>5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論民權之旁落〉，頁41。

<sup>53</sup> 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204。

<sup>54</sup> 張玉法，〈民國初年對政黨移植問題的爭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期，上冊，1973年，頁137。

<sup>55</sup> 民初政黨的激進派，有四方面的意義。第一，它是與政府對立的。第二，政綱超越政治傳統，但切實亦行。第三，運動方向注意一般社會大眾。第四，其運動力足以引起政府和社會的相當關切。詳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73。



後改組為國民黨，其政治態度傾向激進，<sup>56</sup>意圖架空袁世凱權力，實行責任內閣制。民初國會的運作即是在進步黨與國民黨間，針對政策進行「擁袁」與「反袁」的角力戰，而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代表的學生團體，此刻也被捲入這場政黨鬥爭的漩渦。

## （二）《言治》月刊的發行

1913年的暑假，在李大釗自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前後，李與其第一屆畢業生共同組織了北洋法政學會。其成員約200人，下設執行部、評議部、編輯部與庶務部，李大釗同他在法政學堂的好友郁嶷共同負責編輯部，出版學會代表刊物《言治》月刊。該刊自4月出版，前後共6期。李大釗和郁嶷等編輯部成員，同時也是《言治》的主要撰稿人，李氏早年許多對政治的想法和態度，都充分表現在該刊上。在第一期發表的〈宣言書〉，說明了學會和該刊的創立精神：

本會之設，固以群居研究為職志，而無所於黨，其於茲刊也亦然。今日以為是者，明日復有說焉，足以相勝，則今日之說可以廢。吾所持論，深自信者，他人能舉吾失而吾告，則復移而贊同他人之說焉。而無所容於心，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但取決於真理，去感情之縛，絕意氣之私，當仁不讓，視敵如友。凡所論列，一以同人自由研究之所得，為獨立之發表。苟其說，持之有故而言成理，則兼收並包，無所於排。循是以往，雖不敢希縱周秦諸子，具體大思精之偉著潤澤百世，而視彼作黨人之機關，持一致之言論，惟鋤異己，不審理真者，固可告無罪於國人矣。<sup>57</sup>

〈宣言書〉雖然宣稱該刊在政治立場上的超然，強調以理服人，不作黨人之機關。然而其中收錄的多篇文章，卻主要在批評國民黨的作為。此處茲舉幾例，如郭須靜之〈憤世篇〉指明當時國民黨，自「統一而後，二三凶頑，擁兵自固，河東肘腋，遽敢倡亂，贛粵要區，梗命中央，名曰統一，實則割據」。<sup>58</sup>以及李大釗的好友白堅武，於〈痛言〉一文中更直呼「武漢一隅，首義之地載余以來，竟為集亂之府，陰謀破壞，生靈戕殺」。<sup>59</sup>細察之，文章作者多主張提高總統權力，降低《臨時約法》

<sup>56</sup> 民初政黨的保守派亦有四方面的意義：第一，擁護政府政策，或依附政府；第二，政綱的精神不脫離政治傳統，或較為溫和；第三，運動方向以官界和上層社會為主；第四，其運動力足以引起政府和社會的相當注意。詳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76。

<sup>57</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50。

<sup>58</sup> 郭須靜，〈憤世篇〉，《言治》，第2期。轉引自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132。

<sup>59</sup> 白堅武，〈痛言〉，《言治》，第2期。轉引自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133。

對總統的制約，使中央高度集權，以實踐真正統一，其立場明顯是站在擁袁一方的陣線。<sup>60</sup>如從北洋法政學會成立的背景來看，其內部師生的人際網絡多與過去立憲派過從甚密，該學生團體無異是袁世凱的子弟，《言治》月刊又無異是作袁氏之喉舌。李大釗在學會中的編輯部做事，自然很難不受同儕影響而站到擁袁的一方。

但僅從擁袁的政治立場來理解李大釗的政治思想，則未免失之簡略。實際從李大釗的一生來看，其對於真理的追求，實高乎任何其他的人生選項。從上述〈宣言書〉中揭示的「但取決於真理，去感情之縛，絕意氣之私，當仁不讓，視敵如友。」此言明白地說明往後李大釗的處事原則，所以儘管剛自法政學校畢業的李大釗，其政治思想尚處於幼稚階段，未能清楚判斷當時複雜的詭譎政局，但此刻李氏政治思想中所具有初生之犢般的理想和超越性，隨著時勢變化，也將改變往後李大釗對袁世凱的態度。所以李氏的擁袁，實是一種「有條件性的擁袁」。

### （三）政治言論的發表

縱然李大釗有著初出茅廬的意氣風發，挾其大刀闊斧的改革之勢，但亦不免在現實政治中遭受挫折，產生對於民國政治的悲觀想法。以下將就「政黨政治」、「中央政府組織與憲法」以及「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三個面向，儘量以時間先後為序，說明李大釗在《言治》表達的政治思想和立場。

#### 1. 政黨政治

最初李大釗政治思想的超越性，展現於1912年6月所作的〈隱憂篇〉一文，其中李氏對於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問題，有客觀的分析：

蒙藏離異，外敵伺隙，領土削蹙，立召瓜分，邊患一也；軍興以來，廣征厚募，集易解難，餉糈罔措，兵憂二也；雀羅鼠掘，財源既竭，外債危險，廢食咽以，財困三也；連年水旱，江南河北，庚癸之呼，不絕於耳，食艱四也；工困於市，農歎於野，生之者敝，百業凋蹙，業敝五也；頑梗未淨，政俗難革，事繁人乏，青黃不接，才難六也。凡此種種，足以牽滯民國建設之進行，矧在來茲，隱憂潛伏，創國伊始，不早為之所，其貽民國憂者正巨也。<sup>61</sup>

<sup>60</sup> 關於《言治》月刊中的擁袁表現，詳見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130~134。

<sup>6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隱憂篇〉，頁1。

由上段文字可見，李大釗將清末以來面臨的國家難題，大致總結為「邊患」、「兵憂」、「財困」、「食艱」、「業弊」、「才難」六者，其內涵涉及層面廣泛，自政治、社會，以至外交，無所不包。李氏並指出其中厥要者，是「黨私」、「省私」和「匪紛」。從字裡行間可感受到，李大釗對民國的殷殷期盼。猶記前些年，李氏同法政學堂的夥伴，甫參與速開國會的請願，至今民國已然成立，此時準備走入社會的李大釗，有著傳統中國士大夫憂國憂民的情懷。他急於將其所習的法政專長，用以改造中國。

李大釗認為，民國首要注意的政治問題在於「黨私」，即政黨政治。自清朝專制統治結束後，原本民意被束縛的社會，其「言論自由，如水決堤，潮流橫溢」。<sup>62</sup>加上清末士人「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心理，在民國惟有透過參與政黨，始有從政可能。於是民國才剛成立，各地「黨」、「會」便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根據相關統計，其中政治類團體就高達 312 個，且多集中於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sup>63</sup>

1912 年 1 月，民國臨時參議院於南京成立，當時院內在政見上就形成了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同盟會，以及章炳麟、張謇等人合併形成的統一黨之間的對立。期間經過南北和議，袁世凱被選為第二屆臨時大總統。原來臨時參議院議決民國首都設於南京，要求袁南下就職，但袁世凱卻藉口北方軍情不穩，於是最後袁於北京就職。4 月臨時參議院北遷，南北算是形式上的統一了。然而南方革命黨人和北方保守政黨之間的黨爭卻日益激烈，其表現在制定國會的組織法，以及參、眾議員的選舉法問題；同時袁世凱接受梁啟超建議，為了在臨時參議院形成與同盟會對抗的勢力，所以拉攏統一黨與甫成立的共和黨。但即便如此，院會上同盟會仍占有人數優勢。民國政治的現實情況和李大釗所想像的政黨政治原理，顯然有很大距離：

黨非必禍國者也。且不惟非禍國者，用之得當，相為政競，國且賴以昌焉。又不惟國可賴黨以昌，凡立憲國之政治精神，無不寄於政黨，是政黨又為立憲政治之產物矣。而何以吾國政黨甫萌，遽斷斷焉警之、惕之、箴之、戒之、詆之、謀之，甚至慮為亡國之媒者。豈吾華歷代君主失國之際，均豫有黨爭為之朕，而有以促其亡，俾後之人受歷史之迷惑，一聞黨字，遂談虎色變，而以舊歷史之眼光，視今之政黨歟？非也。唐之清流，宋之蜀、洛、朔，明之東林、復社，均一時幹國英傑，使在今日，吾人且鑄金事之。徒以君子小

<sup>6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是非篇〉，頁 57。

<sup>63</sup> 張玉法，〈民初政黨的調查與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 5 期，1976 年，頁 124。

人，有如水火。一方既以道義相號召，則嬖幸之流，恐不見容，遂而熒惑誹謗，以泄其私，舉正人義士，排擠傾軋於無餘。私心黨見之足以禍國，詎以時之今古而殊耶？試觀今日之政黨，爭意見不爭政見，已至於此，且多假軍勢以自固。則將來黨爭之時，即兵爭之時矣。黨界諸君子，其有見及此者乎？盍早圖之。<sup>64</sup>

在李大釗看來，政黨組織應該是和立憲共和相表裡的政治設計，這是向當時英倫、法蘭西和美利堅的政治經驗學習而來，民國是要賴之以昌的。李氏爲了向當時社會普遍不滿於政黨的民眾，說明政黨在政治運作的正向作用，接著又說過去中國傳統政治常常將「黨」施以汙名化，認爲是有害政治穩定的禍首，這是錯誤的觀念。那是因爲過去一時被譽爲「幹國英傑」的結黨，被一群「嬖倖之流」的小人所蒙蔽陷害的結果。至於民初政黨，已是體制化的政治制度，與中國傳統的結黨自是不可同日而語，一旦用之得當，相爲政競，不但可以反映民意，還可促進社會各界意見的交流。李大釗最後話鋒一轉，認爲今日政黨所以被社會批評的原因，在於其「政競」。不是爲人民的公共利益，而是爲了政黨的私利。如此政治判斷，也說明當時民國國會中南北政治格局的不穩，其「將來黨爭之日，即兵爭之時」。對李大釗而言，政黨制度本身並非錯誤，所在非人而已。

1912年8月，同盟會正式改組爲國民黨。另一保守黨派民主黨，也同時成立。此時臨時參議院後期的工作，著重於正式國會選舉，當時國會選舉分爲參、眾兩院，且由於諸多條件不足，選舉程序相當粗糙。就選舉結果而論，國民黨占有完全優勢，不但有組織政黨內閣的可能性，將來還有機會問鼎總統大位，這讓袁世凱感到相當大的威脅。此時，被國民黨總理孫中山任命爲北京代理國民黨理事長的宋教仁，自國民黨於國會選舉大獲全勝之後，遍遊湘、鄂、皖、寧、滬等地，大力宣傳責任內閣制，且隱然自許爲將來的內閣總理，這無異使袁世凱動了殺宋之念。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殺於上海車站，刺宋事件之後，使得朝野黨爭進入更激烈的階段。李大釗針對當時震驚社會的暗殺一事，也有進一步的評論：

戰國之際，任俠成風。秦暴而荊卿獻匕，韓亡而子房椎車。流血五步，壯快千秋，斯以知其時群德之昌也。三韓既並，重根一憤而斷藤，載明一憤而刺李，斯以知韓社雖屋，其群德尚未衰也。晚清之季，吾族男兒，慨中原之陸

<sup>6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隱憂篇〉頁1~2。



沈，憤虜廷之誤國，相率乞靈於鐵血者，則有吳樾之炸五使，徐伯蓀之殪恩銘，燕都橋下，精衛飛來，良弼門前，彭公盡節。一瞑不顧，視死如歸，群德將有復活之機，遂以開民國方興之運。而孰知夫昔以殄民賊者，今乃傷我國士；昔以功我民國者，今乃禍我民國。神州光復之後，吾群德之墮落，乃反有江河日下者哉！痛矣，吾群德之衰也！<sup>65</sup>

李大釗認為，施行暗殺者被社會視為英雄，還是譏為盜賊，其決定標準是以「群德」來加以規範。群德可以看作是社會群體的道德風氣。在過去群德有很好的表現，雖然暗殺本身是罪惡的手段，但「以毀滅罪惡之故，有不得不蹈乎罪惡者」。<sup>66</sup>其反映在暗殺者上，所展現的是為公義而犧牲自我的精神。清末之際，革命派汪精衛便曾計畫刺殺攝政王載灃，可知當時社會群德仍在。然而一到民國，暗殺手段卻仍舊風行，且成為摧賢害能的工具。李大釗衷心期盼宋教仁，在溝通南北問題以及促進中國統一能有所貢獻，但宋卻成為民國政爭中的犧牲品。如此，也不得不讓李氏大嘆社會群德之衰微。

當時查出的犯案兇手名為武士英，本來期望能夠循線搜查出幕後元凶，但武士英不久於獄中即被人毒死。而袁世凱為掩飾罪行，更製造了血光團事件，佯稱血光團於京津地區專門暗殺官員，意圖顛覆政府，又誣指黃興為團長。袁於是下令搜捕血光團，並藉機逮捕國民黨議員，從此袁世凱與國民黨的鬥爭遂浮出檯面。政治上的虛虛實實，讓李大釗如同是霧裡看花，一度受到袁黨報紙輿論影響而傾向袁方。說是「手槍炸彈，爭鳴南北。政會之所，蛇影杯弓。團而曰血光，黨而曰暗殺，不祥之言，聞之駭愕」。<sup>67</sup>在此姑且不以後見之明評析李氏政治判斷的對錯，此處欲說明的是，民初黨爭的過程中，國民黨的激進性格常為保守派所批評，李大釗無疑是身列批評者之一。而袁世凱除了運用黨爭與國民黨相抗衡，為擴大其總統權力，更主動挑起圍繞在改訂《臨時約法》與立憲問題的政治鬥爭。

## 2. 中央政府組織與憲法

黨爭問題之後，接著是李大釗對中央政府組織與立憲問題的看法。最初由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的《臨時約法》，其中央政府組織精神屬於內閣制，於是遷到北京的

<sup>6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暗殺與群德〉，頁22。

<sup>6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暗殺與群德〉，頁23。

<sup>6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原殺〉，頁44。

臨時政府亦係內閣制。但由於國會尚未選舉，所以國務總理仍是總統任命，國務員由國務總理決定，其預定人選都必須經臨時參議院同意。如依照原來規畫進行，民國應會走向內閣制國家。然而戀棧總統權位的袁世凱處處阻撓國民黨的計畫，意圖使民國轉向總統制，袁自然不願受制於《臨時約法》的規定，常常越權行事。第一屆內閣總理唐紹儀即因不能容忍袁世凱對內閣權的侵犯而辭職；再者袁欲行地方軍民分治、集權中央，亦引起國民黨人張振武的反對。張振武曾參與武昌起義，民國後擔任湖北軍務司副司長，在湖北軍界具有影響力。袁世凱欲除去張振武，以委張為蒙古調查委員為名，誘使張入北京。這時黎元洪致電袁，謂武昌發生兵變，是張所指使。<sup>68</sup>1912年8月，袁世凱便不經司法審判程序，逕行處死張振武。此舉引起臨時參議院議員要「彈劾」袁世凱。

暫且不論張案的處置，李大釗作〈彈劾用語之解紛〉一文即是從「法理」觀點，針對參議院議員「彈劾」總統一事而發。章士釗於《獨立周報》著文，主張將彈劾用於法律問題，而政治問題則應實施不信任投票，而不應使用彈劾。在《庸言報》上，吳貫因則認為立法部對於行政部的課責，不論是政治抑或法律問題，都應該使用彈劾權。李氏從法律專業的角度贊同了章士釗看法，認為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應該要確實區分開來。但根據《臨時約法》條文，從其中「參議院對於國務員認為『失職』或『違法』時，得以總員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可決彈劾之」的條文來看，<sup>69</sup>吳貫因的論點也不足為怪，只能說當初臨時參議院制定《臨時約法》時，並沒有將這部分的問題區別清楚。

從上述對總統彈劾問題的爭論可見，民初正是中國從過去人治國家轉換到法治國家必經的一段過渡期。民初政治的亂源，其實就是在這樣新舊觀念的磨合中發生。李氏於彈劾問題，雖然委婉批評當初以同盟會為多數議員所制定的《臨時約法》，但李大釗曾言「吾國果採內閣制抑總統制雖尚未定」一語，<sup>70</sup>可見李氏也非一味傾向袁世凱所要走的總統制。在〈彈劾用語之解紛〉的文末，李大釗的同窗好友郁嶷寫有一篇按語，附和了李氏意見，並從法律角度延伸出對政治制度的價值判斷：

彈劾權議會雖有實力以舉之，其施行之公平，又至不易也。若夫不課行政部以法律上之責任，而施行彈劾制度，但以政治上之手段，實制其死命而有餘。

<sup>68</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90。

<sup>6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彈劾用語之解紛〉，頁5。

<sup>7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彈劾用語之解紛〉，頁7。

如日本者，其憲法上固無彈劾國務員之條文也，然而內閣屢以議會之不信任而迭更，既無組織裁判所，審問判決之繁縟，復無不足以撼動內閣之實力。所以然者，則政黨內閣之制有以致之也。嗚呼！今之兢兢然防政府之專制者，不務於政治上求所以防之之實力，而徒齷齪於法律上彈劾之虛文，何其偵歟？

71

郁嶷於上文中指出，立法部的彈劾權並不足以令行政部負起完全責任，即使議會對政府提出彈劾，仍需要經過審判這一關。而民初司法單位是否能公允作出判決，此又屬於另一個難題了。所以如要能完全監督行政部，防止其專制，使之負以政治責任，走日本式的政黨內閣是很好的選擇。李大釗於此雖沒有表達意見，但受同儕的耳濡目染，也很有可能是偏向支持責任內閣制，而非總統制。

1913年4月，眾人孜孜企盼的第一屆國會終於開幕，國會第一大黨仍舊是國民黨。為與國民黨抗衡，袁世凱暗中聯合保守勢力，5月合併統一黨、共和黨與民主黨，成立進步黨，選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張謇、湯化龍等人為理事。第一屆國會除了有議長選舉的工作，再來就是要完成中華民國憲法，當時政治上有所謂「先選正式總統，還是先制定憲法」的爭論。袁本人自然不願意在憲法體制的約束之下選舉正式總統，於是主張先選正式總統，再立憲法。關於此問題，保守的進步黨卻願意以法治國家立場，與國民黨站在同一方，主張先制定憲法，再選舉正式總統。此刻被歸為保守派的李大釗態度，在立憲問題上應是傾向於國民黨。

由國會選出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其任務即為制憲。但事情進展並非順利。宋案之後，又因袁的善後大借款問題，以及裁撤國民黨都督事件，引發孫中山領導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的失敗，致使部分國民黨議員遭逮捕，以至於憲法起草工作中斷。進步黨認為憲法一時無法完成，於是改而提議先選正式總統，再議憲法。此刻仍在國會的國民黨議員，又因二次革命事起，懼袁世凱對其處置，亦贊同先選舉總統。於是10月袁世凱被選為正式大總統，任期5年，得連選連任1次。該月袁大總統即咨憲法會議，爭取憲法公布權。在法治國家，憲法位階至上，為一切世俗權力來源。袁氏要求實不符法治國原則，李大釗對於此亦曾糾偏：

今日民國之憲法會議，非立法機關，乃憲法團體也。造法者憲法團體之所有事，立法者立法機關之所有事也。立法之結果，為法律之議決；造法之結果，

<sup>7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附〈郁嶷按語〉，頁8-9。

為憲法之制定。既云制定，自包公布權於內了無庸疑。且憲法團體，既為主權之所寄，權力萬能，何所不可，寧獨至於公布權而靳之。然則憲法公布權，不屬之大總統，而屬之憲法會議，証之法理，昭然若揭矣。<sup>72</sup>

此處李大釗明確區分「造法」與「立法」之別。造法是憲法會議的功能，而立法是立法機關的職責，但立法必須在憲法的限制下進行。憲法的權力至高無上，所以憲法頒布權自應屬於憲法會議，而非總統。由於總統是否能頒布憲法的政治議題，引起學界關切，李氏又參考各國憲法，針對總統的法律頒布權作一比較分析：

裁可權雖無使議會否決之法案成為法律之力，而有使議會可決之法案終不成為法律之力；不裁可權則有使議會可決之法案暫不成為法律之力，而無使議會復議仍行可決之法案終不成為法律之力；批行權則又不過檢查其是否蹈憲法之正軌，而無斟酌法案內容之餘地。此其大較也。証以《民國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三十條之規定，大總統之當有法律公布權，法律之公布權亦惟在大總統也，彰彰明甚。更証以憲法草案第二十條、第九十三條之規定，大總統不容有裁可權，然亦不僅有批行權，又無庸置惑者。則政府斷斷自持之理由，固已圓滿無缺，然以僅公布權，固無生死法律之能力，而頒行法律之程式，尤非所論於憲法。政府而知此也，當亦爽然自失矣！<sup>73</sup>

經過各國憲法的比較整理，總統的法律頒布權有3種模式：依序是「裁可權」、「不裁可權」以及「批行權」。此處所謂「裁可權」，簡單的說，國家元首雖不能決定法律內容，但對於國會提出的法案具有絕對的取捨權力。而「不裁可權」則是指，國家元首同樣無法決定法律內容，但對國會提出的法案不具絕對的取捨能力。當總統不同意法案內容時，也只能在公布期內將法案退回國會，重新投票決定，一但又通過，總統也必須無條件接受頒行該法案。李大釗對於「不裁可權」有如下評價：

推斯制之精神，一以為行政部保其憲法上之權力，俾其意思得表示於法律；一以防有時遭政治的激昂易為躁妄惡劣之立法，而以救其敝。實憲法上最完善之規定也。<sup>74</sup>

李大釗對於「不裁可權」的評價極高，其因是此制有制衡之效，無極端之弊。至於

<sup>7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論憲法公布權當屬憲法會議〉，頁61。

<sup>7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法律頒行程序與元首〉，頁66~67。

<sup>7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法律頒行程序與元首〉，頁66。



「批行權」則僅是元首頒布法令的儀式，元首對於法令內容實無置喙之餘地。而就實際的民國元首來看，根據《臨時約法》規定，大總統確實具有法律頒布權；又根據 1913 年 8 月由憲法會議逐漸醞釀出的《天壇憲法草案》規定，未來大總統將擁有的是法律頒布的「不裁可權」。李氏認為，袁大總統對於法律內容實沒有絕對取捨的權力，更不用說是對於憲法頒布權的干預了。

### 3.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

最後要談李大釗對中央與地方分權問題的看法。早在〈隱憂篇〉一文，李氏便曾表示對民國初年各省都督的專政情況，相當憂心：

革命軍興，各省以次脫離滿清羈絆，宣告獨立，自舉都督，此不過一時革命行軍之計畫也。而孰知省界之分，以是及於人心者匪鮮耶。試思一國設省，一省設縣，純因地理人情之便而劃之政治區域，其土地猶是國家之領土，其人民猶是國家之國民，寧可省自私之。乃近頃用人行政，省自為治，畛域日深，循是以往，數年或數十年後，勢至各省儼同異國，痛癢不關，即軍事財政之協助，繫乎國家興亡者，將亦有所計較而不為矣。至神州粉碎，同歸於盡，始追悔痛恨於向者省見之非，晚矣！<sup>75</sup>

當初辛亥革命成功，有許多省分相繼獨立。獨立各省並不全由同盟會所發動，還包括光復會、共進會、文學社，甚至是立憲派、舊官僚乃至於會黨和新軍等。當時獨立各省皆有都督作為代表，軍權仍在地方，各自為政。到了南北議和，臨時政府北遷以後，各省分治的情況依舊存在，國家仍未實質統一，此便是李大釗所擔心的問題。李氏所希望的是建立起中央集權的統一政府，這一點與袁世凱嚮往國家集權的心態是一致的。

1912 年 7 月，袁氏便曾勸黎元洪倡導「軍民分治」，於是引發前述提及的張振武案。軍民分治的內容是：裁撤各省都督，改設督軍掌理各省軍權；另由中央委派民政長，掌管各省民政，藉以杜絕地方軍頭獨立的政治亂象。此舉自是袁世凱為個人政治利益，為剝奪國民黨都督的權力，因而引發各省都督不滿。當時江西省議會甚至還趕走袁世凱所派的民政長汪瑞闓。各省都督的專政，尤其國民黨都督反抗袁世凱中央，是李大釗所苦惱的問題：

<sup>7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隱憂篇〉，頁 2。

政府北遷而後，號稱統一，實則虛與委蛇。不惟指臂之效未收，甚且肘腋之患隱伏。河東逆命，其往例也。至於江南各省，遠在南服，中央之威信不靈，內外之猜嫌紛啟。皖贛湘粵，岸傲自雄，不待宋案發生，借款事起，始有離異之跡也。其他名義上縱稱服從，實力所及，確受中央調遣者，光復後改建之都督外，均未敢必。<sup>76</sup>

不同於袁世凱著重個人政治利益，李大釗冀望中國能夠真正統一，俾使國家能發揮完全力量。但現實情況卻是，民國建立以來，地方未必聽命於中央，上文所述「河東逆命」一事，係指原清政府的山西河東觀察使張士秀倡言獨立，擁護李鳴鳳為山西都督，張自任民政長，拒不接受袁世凱和晉督閻錫山的命令。<sup>77</sup>而「皖贛湘粵，岸傲自雄」則是湖南柏文蔚、江西李烈鈞、湖南譚延闓以及廣東胡漢民等國民黨都督，在宋案和大借款案發生之前，便傾向不與袁政府合作，這其實與當時的國會黨爭表裡一致。而其他未經中央任命的原任都督，亦不敢說會完全聽命中央。

但是，李大釗反對都督專政的原因，不僅在於各省都督竊奪國權，還包括都督對於地方人民權利的傾軋：

曩者神州國體，有德者王，後世獨夫，私相傳襲，縱有專制之形，而平民政治之精神，實互數千百年巍然獨存，聽訟征租而外，未聞有所干涉。諺謂「天高皇帝遠」，斯言實含有自由晏樂之趣味。即其間胡元、滿清，相繼篡奪，而中原民物之安平，未敢稍有所侵擾，安享既久，實效與憲典相侔，而渾噩之中，芸芸者沐其休明於不知不識之間，此其政治上特具之精神，詎容微有所搖撼。自有都督，威勢所及，雞犬不寧，前此自由晏樂之恢餘，漸為強權所侵逼，斯民遂無安枕日矣。彼愚妄之徒，偏欲以地方分權之謬說擁庇之，抑知無論地方分權說，在中國今日，已無存在之餘地，即令萬一可行，而都督擁權，果豈地方所能享有？是都督擁權，非地方分權也！<sup>78</sup>

上段引述內容，是李大釗最早闡述「平民政治」思想的文字，其中說明中國自古以來即蘊含「平民政治」精神。傳統中國雖有專制之形，但政府除了法律訴訟和徵收賦稅之外，對於人民便無多所限制；在國家能力未能深及社會，人民是享有某種程

<sup>7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裁都督橫議〉，頁35。

<sup>7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裁都督橫議〉，頁348，註15。

<sup>7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裁都督橫議〉，頁33。

度自由的。當然這種專制下的自由，和民主體制所追求的自由本質不同，其思想源於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但尚未有「民治」觀念。辛亥革命之後，各省都督集軍、政、財權於一身，中央不但無法收到地方稅收，而各省都督則是「刮民肉血以自肥，削民脂膏以濟黨」。<sup>79</sup>民國共和國體強調的「民權」實際上無法伸張，其原因即在於地方專政。無怪李氏疾呼「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專制君主；革命以後，吾民之患在數十專制都督」。<sup>80</sup>

從地方分權來看，李大釗認為依當時中國情況亦不可行。由於朝野政治言論紛呈，當「國家將為說土裂」，<sup>81</sup>人民的民主政治觀念尚未提升，政治制度仍未穩定，即便實行地方分權，權力也將由都督所獨占。李氏即曾言「吾國非可採聯邦制者，又無容置議」。<sup>82</sup>從李大釗對時局的分析可見，其支持中央集權之心愈堅。在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問題上，其政治立場與國民黨對立，明顯地傾向保守派。

由上述分析可知，李大釗在政黨問題以及地方分權問題上，是站在袁世凱一方，極力主張中央集權，避免國家內鬥。然而，從中央政府組織以及立憲問題來看，李大釗則反對權力集中於總統，倡議責任內閣制，由此可見李大釗政治思想的理想與超越性。隨著袁侵犯國權日深，李大釗也就逐漸從「擁袁」變為「反袁」的政治立場，這就是李大釗當初所持「有條件性的擁袁」態度。

### 第三節 因自視缺然，負笈日本

1913年8月，國民黨為抗袁引發的二次革命以失敗告終。正當袁世凱無視憲法團體起草的《憲法草案》，準備解散國會之際，該年12月底李大釗到了日本，預備就讀東京的早稻田大學。李氏此時選擇留學日本的內在動機，在郁疑所作〈送李龜年游學日本序〉一文中明白可知：

君義氣慷慨，不遜曩時，而傷世痛俗之詞，綿綿汨汨，所以箴砭瞶蒙鼓舞群倫者。方期寬以歲月，薰漬漸被，人心庸有來復之機，世道或少頹下之虞。而君顧自視缺然，不足所儲，更欲游學日本，專究社會經濟學，研考民生凋

<sup>7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裁都督橫議〉，頁32。

<sup>8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大哀篇〉，頁11。

<sup>8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是非篇〉，頁58。

<sup>8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裁都督橫議〉，頁34。

敝之原，探所以抑強橫扶羸弱者，歸而造德蚩蚩，其志遠而視閎，余於君之行又何克尼也。<sup>83</sup>

郁嶷，又名祖述，字憲章，湖南桑植人，是李大釗在法政學堂時期的同學。在此篇為送別李氏而作的文章中，可見二人彼此不捨的情感。此並非一般的友情，而是建立在對國家危亡之上的患難之情。文中寫道，在世道人心未得彰顯之日，李大釗傷世痛俗的文章，對社會總能起到振聵發聵的作用，但李卻是「自視缺然」，所以「更欲游學日本，專究社會經濟學」。李大釗對於中國未來有著更大的理想和抱負，為的是要「研考民生凋敝之原」，原本對政法的興趣，從而延伸到社會民生問題，但又苦於識見不足，於是決意取經日本，這便是李當初留日的內在動機。身為好友的郁嶷在欽佩其「志遠而視閎」之餘，也就沒有理由以私人感情去阻止他了。

問題在於，為何李大釗會「選擇」日本，而捨棄當時更為先進的歐美國家。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清末中國人留學日本的歷史談起。

## 一、清末以來的留日背景

清末以來由政府推動的留學教育，早期以留學西洋為主。中國的留美教育，最初是李鴻章在容闈的敦促與建議之下，於 1872 年派遣第一批最早的留美學生。留學歐洲最早則可溯及至 1875 年，沈葆楨派遣福建造船廠學生隨法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至法國學習造船之法。<sup>84</sup>而留日教育則晚至 1896 年，清政府才正式派遣留學生赴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清廷有感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就，因而開始嚮往學習日本的成功經驗。留學日本的中國人，少數曾在同文館學過日文，其餘大多不通日文者，則必須在日人創設的日華學堂先補習日文。此後隨著留日風潮擴大，不僅中央政府派出留日公費生，各省亦分別派遣學生留日，而自費者也漸多。

1900 年庚子拳亂後，清末變法需求日切。直到日俄戰爭發生之際，在 1904 到 1905 年間，中國留日學生保守估計至少突破 8000 人。<sup>85</sup>此種特殊情況，在任何時期以及任何留學各國皆未曾發生。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日本的君憲政體擊敗了帝俄專制，突顯出君主立憲制的優越；學習日本建立一個君憲國家，因而成為清廷政治改

<sup>83</sup> 原載於《言治》月刊，第 4 期。轉引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52。

<sup>84</sup>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台北：中國出版社，1973 年），頁 14。

<sup>85</sup> 譚汝謙、林啟彥譯，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年），頁 327，附錄三。



革更爲具體的目標。作爲清末新政的代表人物，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除了興辦實業、勵行新政之外，更致力於倡導遊學。在其名著《勸學篇》中，便曾分析中國人留日的好處：

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做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sup>86</sup>

全國推行新政，首先遇到的就是人才問題。爲取得人才，所以要在國內普遍設置新式學堂，在這過程中便產生了許多現實困難：第一，是相關經費不足。但經費不支，尚可循其他途徑克服。第二，是師資來源問題。全國新式教育的師資數量需求龐大，較前者來說更難以解決。遍尋解決上述問題的替代方案，如能留學日本，其「路近省費」、「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無疑是很好的選擇。其次，就是清政府進行改革的「速成」心態。因日本較他國學校的教法爲善，課程較速；而新政施行，又需才孔急。當時就有許多留日學生是速成生，包括師範和法政兩類，這些人日後便成爲全國的新式教育師資，和地方諮議局人員。如此真可稱的上是「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由上述清末中國人留學日本的背景因素，亦可部分用於說明民國時期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外在動機。就李大釗而言，其先於法政學堂修習日文，後受到日本教習吉野作造、今井嘉興的思想影響，此對於前往日本學習已具備很好的條件。雖然李大釗亦曾批評「東人之說，亦由西方稗販而來者，輾轉之間，訛謬數見」，<sup>87</sup>求學於日本，並非是直接學習正統的西方文化，但由於李大釗家庭經濟拮据，得由湯化龍資助才得以出國，李氏不得已選擇費省的日本，亦相當合理。

## 二、論李大釗的留日評價

李大釗到日本東京後，住進基督教青年會館，經過一段長時間英、日語文的學習準備，才正式於 1914 年 9 月註冊進入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學科。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是東京專門學校，成立於 1882 年，由大隈重信所倡建。其建校精神是「學問之獨立」、「學問之活用」以及「成就模範之國民」。該校並於 1902 年改爲現名。1905

<sup>86</sup> 原載於張之洞《勸學篇》。轉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頁 47~48。

<sup>8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自然律與衡平律》識》，頁 87。

年設立清國留學生部，在清末留日教育的歷史過程中，這是一所相當重要的學校，且早稻田大學與中國法政學界，又有直接密切的關係。袁世凱即曾聘用該校法學教授有賀長雄，作為總統顧問。

應當如何理解李大釗留學日本的歷史意義？如從學業角度切入觀察，在早稻田大學就讀時，李氏的學業成績並非理想。在第一學年結束時，李大釗共修業 11 科，總成績 736 分，平均僅 66.9 分，評定為丙等。李在該學年的成績，於班上 106 位同學中排名 40。<sup>88</sup>1915 年 9 月進入第二學年，但此時李氏正熱烈參與當時的反袁運動，因其「長期欠席」，於是在 1916 年 2 月便遭學校「除名」，意思就是被學校退學。顯然而由學業成績來看，李大釗留日的學習成就並不佳。

然而，如僅以學業成績來評價李大釗的留日經歷，則稍嫌不足。要正確理解李氏留學日本的歷史意義，應先清楚當時的中日關係，以及留日對於中國知識界的意義何在。其一，自 1905 年科舉制度廢除以來，留學外國已然成為學子取得功名與晉升官僚之階，部分地替代了過去科舉取士的社會功能。民國成立後，雖一切科名均已取消，但在 1916 年袁政府亦曾有過一次特別為留學生舉辦考試，及格者即授予特殊地位。<sup>89</sup>所以，留學日本對於民初中國知識分子的意義，和取得其個人日後良好的社會地位有密切關係。其二，日本自清末開始，便成為中國革命運動重要的根據地。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即於東京創立同盟會；在民國成立之後的二次革命，孫中山則創中華革命黨於東京。日本與中國革命運動的關係，又是緊密相連。其三，日本可說是當時留日學生發展愛國運動的溫床。日本西化的成功，使其成為東方的帝國主義，因而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日本的感受，可謂陷入了一種現代西方社會學家所說的「羨憎交織」(ressentiment)的文化心理狀態。<sup>90</sup>一方面，中國派遣大量留學生來到日本，意圖間接採收現代化的經驗果實。另一方面，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

<sup>88</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105~106。

<sup>89</sup>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頁 191。

<sup>90</sup> 此處提到的「羨憎交織」(ressentiment)，是余英時先生引自西方社會學者 Liah Greenfield 所著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一書中，用以研究近代民族主義所使用的概念。所謂「羨憎交織」的心理狀態，是起於企羨和憎惡的情緒受到壓制，而又不可能得到滿足。它的社會學基礎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是一個民族（或個人）自認對於它所企羨的對象基本上是平等的；第二，是在現實上它和對方是處於不平等的狀態，以至於這一理論上存在的平等幾乎無法完成。以中國為例，中國對於西方（包括日本）恰好具有「羨憎交織」的兩個條件：其一，中國的文明足以與西方比肩，此係世界所公認之事實。其二，中國在十九世紀與西方的強弱懸殊，處於絕對不平等的地位。由於理論上的平等，中國才有資格效法西方，見賢思齊；由於實際上的不平等，中國才會對西方發生企羨的心理，並在效法無成，長期挫折中轉羨為憎，而激起強烈的反西方情緒。詳見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1999 年），〈自序〉，頁 23~28。

的侵略，中國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也因此逐漸對日本「由羨轉憎」。當時留日中國人如李大釗，其感受無疑是最為深刻的。

如此就上述三個觀點，分析李大釗留學日本的歷史意義。首先，從李氏的留學動機來看，固然留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之一，但從李大釗日後歸國的政治活動顯示，其留日絕非為獵官目的。其次，在李氏留學日本期間，民國政治情況是，袁世凱逐漸獨攬大權，邁向帝制。所以李大釗也從原本保守的政治立場，走向護國運動的革命路線。再者，李大釗留日期間，由於日本對中國的侵犯有增無減，如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引發留日學生的愛國運動，李氏亦參與其中。由此看來，李大釗的留日價值，並非在於學業成績的展現，而是在海外政治運動的實踐，其中包括反袁和反日意味。因此，如從留日學生政治運動的歷史脈絡觀察，或能正確理解李大釗留日時期的歷史意義。

### 三、留日學生的政治運動

清末以來的留日學生和當時中國的革命派，其身分往往不易區別開來。<sup>91</sup>在革命派之中有許多重要人物，都曾經留學日本。例如革命派領袖之一的黃興，最初即是領取官費的留日學生；在黃花崗之役中就義的林覺民，亦曾是日本慶應大學的學生。當孫中山在東京籌組同盟會時，就曾受到大批留日學生歡迎，而參與籌備會的人，大部分也都擁有留日經歷。

此原因無他，在日本言論相對自由的環境，留學生很容易接觸西方的革命思想。當時參與同盟會的日本志士北一輝便曾說：「中國革命非來自太平洋外遙遠之雲間，其實，對岸之島國，日本，其思想乃最重要之原因。」<sup>92</sup>所以中國留日學生不僅在學校讀書，部分學生還會組織社團參與政治運動。他們常常透過翻譯日文的西書，傳播新思想，並藉由出版報章雜誌，團結政治革命的力量。李大釗在留學之初雖並非革命派，但這群前人所累積的活動成果，日後卻提供了李大釗在日本進行政治運動的歷史條件。以下，先簡述早期留日學生政治運動的重要背景。

<sup>91</sup> 譚汝謙、林啟彥譯，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 247。

<sup>92</sup> 引自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轉引自譚汝謙、林啟彥譯，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 248。

### （一）早期留日學生的政治運動

甲午戰後的早期留日學生，其政治意識仍薄弱，他們東渡日本主要是為吸收新知。直到 1898 年，以康、梁為首的保皇派先後流亡日本，積極宣揚維新變法的主張，並與同樣在日本的革命派之間，引發了君憲與革命的衝突。這場衝突表現於《新民叢報》與《民報》之間的競爭，透過報刊文章的發表，闡述他們各自的政治立場，其目的無非是希望能夠讓外界接受，以提高社會輿論支持，這使得留日學生的政治意識轉而成熟。

到了庚子事變，留日學生開始有了社團組織，<sup>93</sup>組織社團是一種集體力量的展現，也是留日學生政治運動形成的前提。最早有戢翼翬、沈雲翔、金邦平等人的「勵志會」，可謂留日學界創立團體之先河。尤重要者，是該會所發行的《譯書彙編》月刊，主要翻譯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論著、政法理論書籍、大學用書，還包括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斯賓塞《代議政治論》等西學書籍，皆是由日文版本翻譯成中文。梁啟超更曾讚言《譯書彙編》能「輸入文明思想，為吾國放一大光明」。<sup>94</sup>留日學生的翻譯工作對國內新文化思想的傳播，可謂貢獻極大；在革命活動方面，亦有推波助瀾之效。

勵志會的性質，原是「聯絡感情、策勵志節」的文化學術團體，但其後隨著學生參加者日益增多，思想越趨混亂而逐漸變質，最終形成激進和穩健兩個派別。激進派走向民族主義與革命運動，組織「青年會」，而勵志會則漸被取代。如此發展，也是順應國內革命情勢的擴大。日後在留日學生出版界，又出現如《浙江潮》、《江蘇》、《湖北學生界》、《二十世紀之支那》等革命刊物。從這些革命刊物的名稱，也可看出留日學生團體，具有濃厚的地方鄉黨性質。

1903 年，因俄國於東三省的撤兵問題，引起了由留日學生領導的拒俄運動。當時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後改為「學生軍」。此運動亦延燒到上海、北京等紳商各界，除針對俄患問題，電奏清政府力爭之外，且爭相捐款支援相關活動。上海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學生則召開會議討論俄事，會中亦提議組織義勇軍以響應留日學生。在上海具代表性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亦稱「中國立國以來兩千餘年，

<sup>93</sup> 留日學界的組織，大致可分為依鄉土關係組織成的同鄉會，或是依共同利益、興趣而結合的派生組織兩類。詳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年），頁 227。

<sup>94</sup> 引自梁啟超，〈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轉引自譚汝謙、林啟彥譯，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 149。



其人民有愛國心者，自此會議始」。<sup>95</sup>其後留日學生的拒俄組織，又因受日本政府干涉而面臨解散命運。

清末留日學生發起的拒俄運動，其意義頗值得探討。首先，此運動不同於前者的革命活動，是留日學生抵禦外侮的愛國運動。雖然在此之前，亦曾有收回路礦權運動、拒法事件等等同樣性質的拒外運動；但此次拒俄運動，卻讓原本依各省分立的留學生組織首次跨越地域隔閡，大規模地組織起全國性留日學生團體，以共同對抗外來強權。再者，此次由留日學界領導的愛國運動，亦造成國內社會各界積極響應，可謂在清末中國第一次因愛國心理，而團結起來的大規模政治運動。

綜上所述，在民國建立前，留日學界的政治言論發表雖受到日本政府控制，但時緊時鬆，相較於清末中國仍保有相對言論自由，其表現在豐富的革命言論報刊的出版。而政治言論的紛呈，也顯示是因為當時日本新知識環境的影響。尤重要者，則莫過於留日學生的組織活動，雖然並非全部的留日學生皆參與政治活動，<sup>96</sup>但是其組織和抗爭方式，卻也為民國之後的留日學生所繼承。換言之，李大釗在留日時期的政治運動環境，已具備有良好的歷史條件；而這些條件，亦充分表現在李大釗對袁政府支持態度的轉變。

## （二）從擁袁到反袁的轉變

民初各政治勢力的分合，隨著袁世凱逐漸邁向專制而產生變化。宋案發生不久，雖然有部分國民黨溫和派如黃興等人，主張以法律解決，但還是無法阻止國民黨激進派轉入地下，計劃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一方面在 1914 年 7 月，孫中山等前國民黨人於東京正式成立中華革命黨，決定以倒袁為目標。9 月議定「青天白日滿地紅」為中華民國國旗。此時李大釗也正在日本，準備進入早稻田大學就讀。另一方面，革命失敗更助長袁世凱的氣燄，袁欲使國民黨溫和派與進步黨聯立的《憲法草案》成為一紙空文，於是解除國民黨議員職務，下令解散國會，另立專屬的政治會議作為立法機關。其後又在 3 月召開約法會議訂定《新約法》，並於 5 月公布施

<sup>95</sup> 此段文字出自〈譯西報記者張園會議事〉，載於《蘇報》，1903 年 4 月 12 日。轉引自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270。

<sup>96</sup> 當時的留日學生，特別關心國事，而且對於政治問題極為敏感。在這些學生之中，有終日開會談政治而不讀書者，亦有終日為課業與政治之取捨問題而煩惱者。但是就一般狀況而言，不預聞政治問題者，仍舊是多數，所以一般咸認為留日學生都與政治活動有關，並非完全正確。詳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18。

行。《新約法》的內容一改原約法中的內閣制為總統制，並加重總統職權；總統以十年為一任期，且得連選連任。依此過程，袁世凱為其走向帝制做好準備。

袁世凱推動帝制，除了滿足了天時、地利因素，尚須人和。早在 1913 年，因社會對民初政爭的不滿，北京已流行共和不適合於中國的言論。11 月，袁世凱聘用的美籍顧問古德諾（F. J. Goodnow）在紐約發表〈中國新約法論〉的演說中，亦主張中國原有的《臨時約法》不符合中國國情，認為「中國數千年來，權集於天子，天子依慣例以為治，而人民無立法之習慣」。之後又繼續申論：

中國社會上，其於經濟一方足以自立，而又能關心公共利益之人。不若歐洲初用代議政治時之多。故其結果，於組織名實相符之代議機關極為困難，而專制政治之發生，則甚易。<sup>97</sup>

古德諾強調，中國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土壤，不適合推行歐洲的代議政治，而「專制」則是較符合中國環境的政治體制。其後古德諾又於 1915 年 8 月，在北京《亞細亞日報》出版的〈共和與君主論〉一文中，更直接得到「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的結論。<sup>98</sup>當時朝中同樣是袁世凱聘用的日籍顧問有賀長雄，亦附和此說；在野則有楊度等人於北京發起籌安會，為發展君憲政體的輿論鋪路。

國內共和政局出現如此大的專制轉向，是李大釗所不願見到的。原來支持袁世凱的保守派，其內部也開始出現分化；進步黨的刊物上，也發表了批評袁氏專制的文章。李大釗在日本就學的準備期間，首先便於〈政治對抗力之養成〉一文，對袁敵視國民黨而廢除國會的問題，提出委婉批評：

武漢一呼，清社以屋，民國承之。激進之子，粗莽滅裂，猶不知懲鑒亡清之失，設法以求有容。於是兩力接觸之際，軋轢不已，卒至南中再亂，烽火連天，國民黨覆滅以殉，政府乘凱旋之餘威，大張統一九服之功。巨敵潛聲，惟所欲為，舉從前艱難締造之政治對抗力，窮年累紀，僅具基型者，至是不惜舉全力以傾之。<sup>99</sup>

此處所謂「政治的對抗力」，係指政治勢力彼此之間能相互抗衡，以期維持「衡平」

<sup>97</sup> 古德諾（F. J. Goodnow），〈中國新約法論〉。參見章伯峰、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第2卷，頁497~498、943。

<sup>98</sup> 古德諾（F. J. Goodnow），〈共和與君主論〉。參見民初時期文獻編輯小組編，《中華民國建國文獻：民初時期文獻·第一輯·史料三》（台北：國史館，1998年），頁451。

<sup>9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政治對抗力之養成〉，頁97。

狀態，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則，如此才能避免當權者「濫施其力」。清末以來，清廷與社會改革勢力無法相互包容，當權者反而是壓抑改革，其後勢引出的革命反作用力，更加無法抑止，終究導致王朝覆滅。民國建立以後，革命派自許為建國功臣，無法容忍與之相抗的反對保守力量，所以導致二次革命。在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不願在國會形成另一個反對黨，反而是「除異務盡」，逼使反對勢力退出北京政府。由是民國政局不穩，是因各政治勢力彼此間沒有出現衡平狀態所造成。於此，李大釗先是譴責國民黨的莽撞，但其後發更直指袁政府，在議會政治上不能夠「棄同存異」，而使得初具雛型的政治對抗力，慘遭摧折。

前者李大釗對於國會存廢問題，已清楚表達其政治立場。其次，對袁外籍顧問古德諾和有賀長雄等人認為共和政治不適用於中國的論點，李氏對此更是加以反駁。1914年11月，李大釗在由章士釗於東京創刊的《甲寅》雜誌上，發表〈國情〉一文表示反對意見。<sup>100</sup>該文一開始便開門見山說明，外人不足以談中國國情：

夫衡憲典於國情，寧匪可尚者，而以客卿論國情，則扞格之處恆多。<sup>101</sup>

這裡提到的「客卿」，即是指袁世凱的外籍顧問。如古德諾之論國情，必宗於美；而有賀長雄之論國情，則必比於日。這些來自美、日的政治學者，縱使其學術專業；但李大釗認為，這些外人對於中國國情的分析，必然會因其生長的外國環境，或是因其國家利益的背景，而有所出入。

接著，李大釗又一一反駁古德諾等人支持「中國不適用於共和體制」的論證。首先，這些外國人認為中國習俗原本即重視地方宗族，不習於公眾的政治事務，歷史上也沒有產生過當代意義的民主選舉制度，因此在中國實行議會政治，並不會為社會帶來安定。對於上述中國社會特色的敘述，李氏是承認的。李大釗依其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其傳統政治確實是「純以放任為治，徵賦折獄而外，人民幾與國家無涉」。<sup>102</sup>但李氏進一步認為，純以歷史分析得出中國不適用於共和的結論，其中犯有「以古論今」的錯誤，因為歷史是「因時而變」的。當時中國的實際狀況，是「近世國家

<sup>100</sup> 李大釗〈國情〉一文的寫作時間，中國學者朱成甲認為，應當在1914年的6月至7月間。此處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完成的時間點，恰在古德諾的〈中國新約法論〉之後，與〈共和與君主論〉之前，前後時間將近二年的時間。由此可見，「中國國情不適用於共和制」的論點，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醞釀而得到的。其中反映出的問題是，當時社會對於民國政治的不滿，同時也給予袁世凱等政治野心家藉口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理由，強而為推行帝制的輿論作出準備。參見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350。

<sup>10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國情〉，頁107。

<sup>10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國情〉，頁108。

政務日繁，財政用途亦日增，人民負擔之重，已非昔比」。<sup>103</sup>所以論中國國情時，也應把現勢考慮進去才是：

夫前之漠然於政治者，以國家權力之及乎其身者輕耳，今則賦重於山矣，法密於毛矣，民之一舉一動，莫不與國家相接矣！縱懸厲禁以關之，民亦將進索政權而不顧，乃謂其不習於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聽命於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實逆乎國情之論也。<sup>104</sup>

在清末中國邁入現代化的過程，人民與政府之間因為「賦重」而拉近彼此關係。繁多的法令，讓人民倍加辛苦。在負擔加重的情形下，如不讓人民預聞政治，民不堪命，而導致群起反抗政府，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所不樂見的結果。所以中國於此刻實行代議政治，也是為避免民眾不滿，造成社會不安，此為順理成章的事。李大釗正是持這種「歷史進步論」觀點，來反駁西方認為中國歷史僵化不變的心態。其中亦可見得，李氏此刻的政治態度，和梁啟超等進步黨人同樣是站在反對袁世凱欲一變共和為帝制的立場。

此外，當時來自國際的力量，已能深刻影響中國內政。如從國際格局的角度思考，袁世凱在推行帝制的過程中，不僅要得到國內輿論支持，還必須徵得環伺列強的首肯。

與前述政治抵抗力的概念相近，李大釗同樣以「力」的概念，對國際局勢進行分析。原來清末中國面臨到一場瓜分風潮，所幸當時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維持了列強在中國貿易的機會均等，於是列強在中國便形成國際力量的「均勢」，一直延續到了民初。李氏和大多數的有識之士都認為這股均勢力量，是中國免於亡國的關鍵，「以中國泱泱萬里，天府之區，廣土豐物，邁絕寰宇，任何一國，欲舉而印度之，勢所弗許。」<sup>105</sup>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李大釗又說「延中國於未亡者，惟此均勢；迫中國於必亡者，亦惟此均勢」。<sup>106</sup>果不其然，如此的均勢狀態在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便旋然面臨崩解的命運。中國也因而面臨新的國際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巴爾幹半島問題而引起，交戰雙方分為同盟國與協約國。戰爭初期，同盟國的主力是德、奧、義；協約國一方則是英、法、俄。戰場雖在歐

<sup>10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國情〉，頁 108。

<sup>10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國情〉，頁 108。

<sup>10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警告全國父老書〉，頁 111。

<sup>10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警告全國父老書〉，頁 113。



洲，但因國際間錯綜複雜的條約關係，讓戰事亦延燒到亞洲地方。此時日本遠觀歐洲事發，考量歐洲列強無力東顧，於是便藉口「英日同盟」關係，以保東亞和平之名，向德宣戰。日本的戰爭目的，明顯是為擴大在中國利益。10月底，日攻擊駐山東青島的德軍。11月初，青島陷落。日據青島，實際上取得和中國進行利益談判的籌碼。1915年1月，日本政府即透過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正式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日雙方經過約4個月的外交攻防，袁政府最終於5月9日，承認日本的要求中，除了第五號之外的第一號到第四號，此即「五九國恥」的由來。究其原因，袁世凱當時正在推行帝制，為得到日方支持，所以在日本的軟硬兼施下，袁政府最終決定接受這喪權辱國的要求。

當中日關係陷入緊張，李大釗眼見中國面臨此危機，自然不會坐視不管。在中日二十一條的交涉過程中，留日學界隨即組織起具全國性質的「中國留日學生總會」，李氏擔任了總會的文事委員會委員。2月，李大釗代表總會發表〈警告全國父老書〉一文。該文說明，東亞原有的國際均勢已遭破壞，中國正處於危亡之際。此外，李並根據中外報章，整理出二十一條要求的大致內容，其內容與官方的正式要求，已相去不遠。須特別指出的是，該文透露出一股民族命運的悲哀：

曩者去國，航海東來，落日狂濤，一碧萬頃，過黃海，望三韓故墟，追尋甲午復師之陳跡，渺不可睹。但聞怒潮哀咽，海水東流，若有殉國亡靈淒淒埋恨於其間者。居東京，適遊就館，見其陳列虜奪之物，莫不標名志由，誇為國榮。鼎彝遷於異域，銅駝泣於海隅，睹物傷懷，徘徊不忍去。蓋是館者，人以紀其功，我以銘其恥；人以壯其氣，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淚，面壁吞聲而已。<sup>107</sup>

李大釗在該文中，憶起他當初毅然負笈日本。當乘輪渡東之時，回想起因甲午戰爭而含恨死去的中國人。在日本，李到了東京的游就館，見到室內陳放著日本自中國奪來的文物，便油然而升起一陣去國哀痛的民族情緒。但是日本的現代化較中國成功，武力較中國強盛，是不可磨滅的事實，這也是李氏為何到日本求學的原因。所以中國人見此，亦只能「背人咽淚，面壁吞聲而已」。如此感受，應可代表著眾多留日生的內心感觸，於是在二十一條要求的催化之下，留日學界開始進行民族主義性質的反日愛國運動，此刻或可稱為是留日學生對於日本開始「轉羨為憎」的轉捩點。

<sup>10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警告全國父老書〉，頁117。

在袁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後，李大釗有感於國家之危亡，希冀國民全體能如同中國古代的越王勾踐一般，臥薪嘗膽，以復前恥，於是李氏又於6月寫作〈國民之薪膽〉一文。其中內容除了描述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的詳細過程，李亦評價了袁政府的整個交涉過程。對袁交涉二十一條過程的評價，中外歷史學家毀譽參半。但就李大釗看來，袁政府已盡全力。畢竟「弱國外交，斷無不失敗之理，吾人今欲論政府辦理此次交涉之失敗與否，惟問其失敗之程度如何」。<sup>108</sup>換句話說，問題不應追究袁政府，而應是中國腐敗的人心問題：

斯則徒為枝枝節節之談，以與政府論外交之得失，自相怨詬，不惟無補，且以紛擾國民之觀感。吾人以為與之辯得失於事後，勿寧與之圖挽救於方來。故對於政府，誠不願加以厚責，但望政府之對於國民，亦勿庸其欺飾。蓋時至今日，國亡家破，已迫眉睫，相謀救死之不遑，更何忍互為諉過，互相歸咎，後此救亡之至計，端視政府與國民之協力。<sup>109</sup>

指責政府之外交過失者，多是反對袁政府的革命黨人，他們認為袁世凱此舉是賣國行爲。但縱使袁世凱廢除國會，暗中推行帝制，李大釗亦前後對此提出異議，但最後李氏還是希望政府和人民能夠團結一心。在國人之中，如能「智者竭其智，勇者奮其勇，富者輸其財，舉國一致，眾志成城」。<sup>110</sup>以人民作為政府之後盾，當可度此難關。李大釗並於文末，衷心對袁政府提出恢復國會的忠告：

吾於最後，欲為一言：政府果不願為亡國之政府，則宜及早覺悟其復古之非，棄民之失，速與天下更始，定根本大計，回復真正民意機關，普及國民教育，實行徵兵制度，生聚訓練，以圖復此深仇奇辱。<sup>111</sup>

總而言之，留日時期的李大釗對袁政府的態度雖前後出現矛盾，但可以確認的是由支持轉而批判。但這不意味著李大釗開始走向激進的革命，因李氏認為此刻革命派的作為，僅僅是「以暴易暴」，<sup>112</sup>並不能解決中國問題。即使袁政府面臨日本威脅之時，還在為帝制進行宣傳；但是當外部民族矛盾大於內部黨派矛盾的情況下，李大釗仍希望國內各政黨能夠化敵為友，維護民主價值。而李大釗要求重開國會，恢復

<sup>10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國民之薪膽〉，頁131。

<sup>10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國民之薪膽〉，頁131。

<sup>11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警告全國父老書〉，頁119。

<sup>11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國民之薪膽〉，頁134。

<sup>11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政治對抗力之養成〉，頁102。

真正民意機關的建言，猶如對袁政府所下的最後通牒。

隨著帝制運動發展，9月，民間呈遞了變更國體請願書；11月，由臨時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進行決定國體投票；12月，開票後通過帝制，袁世凱接受帝位，並明定1916年為洪憲元年。變更國體的決定，讓原本躊躇在帝制與革命之間的中間派系，紛紛走向反袁革命。進步黨領袖梁啟超便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暗批袁世凱的帝制活動；其後待國體變更確定，梁便投入到南方反袁陣營，與蔡鍔、唐繼堯等人主持「護國運動」。隨後，南方各省亦紛紛宣布獨立，響應護國；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亦將其革命力量與之合流。梁啟超政治立場的轉變，很能代表當時多數保守派的想法，一旦袁政府無法信守維繫共和的誓詞，那麼革命亦在所不惜。李大釗自身，也和梁啟超同樣經歷從擁袁到反袁的心理過程。1916年1月，李氏組織神州學會，該學會以「研究學術，敦崇氣節，喚起國民自覺，圖謀國家富強」為宗旨。2月初為響應反袁，李大釗便離日赴滬，在輪船上李有詩云：「八表正同昏，一夫終竊國。」又云：「逆賊稽征討，機勢今已熟。」<sup>113</sup>此刻由李大釗的詩句中，已明顯表現出其對於袁世凱期望的幻滅，以及反袁之決心。



<sup>11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乙卯殘臘，由橫濱搭法輪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頁246。





## 第三章 民主憲政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當反袁成功，中國緊接著迎來的是一場變革舊思想文化的五四運動，而五四時期正是李氏一生思想最為活躍的階段。關於五四運動的時間斷限，學界眾說紛紜，<sup>1</sup>為方便理解李大釗政治思想的發展過程，較適宜的斷法當以 1915 年《新青年》創刊為始，到 1921 年該刊改組為中共刊物為止。這時期新知識分子所珍視的價值，是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五四之初，李氏亦要求自身以科學態度，謀求中國民主政治運作的真理。從思想層面來看，李大釗正是以宇宙進化論為核心，來發展其政治思想的：首先，李大釗在留日時期形成的「民彝思想」，完成了將西方民主思想中國化的基礎工作；其次，李氏返國後發表的「青春哲學」，從民族與國家獨立的角度出發，擘劃出未來理想中國的藍圖；再者，對於當時中國政治、社會面臨到的中西混雜與新舊思想的矛盾，李氏提倡以「調和方法」來加以解決，尤其是北京的黨爭問題。但 1917 年發生的張勳復辟事件，象徵中國在政治調和的破產，此事對李大釗的政治理想亦造成重大打擊，隨後李氏政治思想即在民主理念的基礎上，朝向社會主義和革命方向轉變。

### 第一節 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國化

中國步入現代化的過程歷來艱辛，清末雖有意識改革，但其態度保守，使其結果仍歸於失敗。其後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實行兩千餘年的皇帝制度，開始進行西方民主體制的實驗；但民初政治的混亂，說明了政治革命仍無法解決中國傳統的文化病症，北京政府以袁世凱為首的舊官僚，依然有著帝制思維。這引起陳獨秀等反袁的新知識分子，開始注意到施行民主所需要的文化因素，從器物、制度以至於思想文化層次的「全盤西化論」，一時成為當時知識界的思想主軸。中國現代化發展至

<sup>1</sup> 周策縱認為，以五四運動為研究對象，應盡量將其視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避免因為分期而忽略五四運動其生成背景以及對後來歷史的影響。本文此處分期的想法，則是從李大釗個人為出發點進行分期，以方便後文論述。有關五四的分期問題，詳見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出版社，1984年），頁6。

此，已然重視到如何將西方的「民主」和「科學」與中國傳統思想結合，俾使西方民主觀念在中國土地上落地生根，此當為五四知識分子的重要思想課題，而這一切都必須從中國思想界的改革背景開始談起。

## 一、五四運動的發展背景

中國歷史上的「五四運動」一詞，出現於「五四事件」發生之後，此兩者應有所區別。「五四事件」是指一戰結束後，因中國學生對巴黎和會的山東決議案不滿，導致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的學生遊行抗議事件，其政治訴求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該事件反映民國建立後，中國不斷受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與北京政府的懦弱形象。不久，在北京學生聯合會所發表的〈罷課宣言〉中，首次提到「五四運動」一詞。<sup>2</sup>「五四事件」最初是源自學生的愛國運動，但該事件背後引出更多的是中國仍待解決的政治、社會問題，所以往後「五四運動」的內涵從狹義的愛國主義，擴大為廣義的新思想、新文化改革運動。

廣義的五四運動最早可溯及自 1915 年，該年 5 月 9 日，袁政府接受日本對中國二十一條要求的最後通牒，此舉普遍引起中國民眾不滿。8 月，以袁世凱為首的守舊派推動帝制，使新知識分子感到中國實行民主制度的失敗；陳獨秀等人認為，只有當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年階層在思想文化層次上的覺醒，才有可能改變國家由軍閥統治的亂象。為此，陳氏於 9 月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日後更名為《新青年》。雖然創辦之初並未獲得社會熱烈迴響，但中國現代史上的五四運動，實肇端於此。此刻李大釗在五四運動所扮演的角色亦不容忽視，一方面當時李氏留學日本，其國恥感應較國內人士更為強烈；另一方面，當留日學生準備歸國投入反袁運動的同時，李大釗在日本發行的《民彝》雜誌上發表〈民彝與政治〉一文。在該文中，李氏首先提到關於西方民主思想中國化的問題。

五四運動的醞釀與擴大，和當政者給予的言論自由有直接關係。袁當政時，中國社會的言論自由可謂備受壓抑。南京臨時參議院最初制定的《臨時約法》雖明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集會和結社等自由，但在其他的條款中，亦規定如有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是非常緊急必要時，人民基本權利就必須受到法律限制，<sup>3</sup>這使得袁政府在法律上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同時，袁所掌控的國會在 1912 年到 1914

<sup>2</sup> 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頁 19、213。

<sup>3</sup> 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頁 64。

年間，通過了種種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惡法。<sup>4</sup>雖然在簽訂中日二十一條的前後，袁氏也曾放寬社會言論自由，但那僅是另一種不同於自由精神的政治謀略；要直到袁世凱死後邁入軍閥政治時期，因各方軍閥勢力相互牽制的結果，北京的社會言論才有相對的自由空間。

在上述政治背景下，李大釗自日本返國後，於1916年5月至1917年11月間，即專注於在北京編輯報刊和政論發表的工作。此刻是李大釗生涯中的「北京辦報時期」。期間李氏曾先後主編進步黨系的《晨鐘報》，協辦《憲法公言》，擔任過《甲寅日刊》主筆，也參與編輯《言治》季刊。<sup>5</sup>到了1917年7月，李大釗因張勳復辟而南下上海避難，並於李劍農主編的《太平洋》雜誌上發表政論文字。

除了言論自由因素，新知識分子的聯合運動亦有助五四思想文化的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自法歸國，並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北大前身，即清末新政成立的京師大學堂，民國後改名為北京大學。最初北大以守舊聞名，教授多來自官場，被稱為「中堂」或「大人」，學生則被稱為「老爺」。學生進北大的目的，是以之作爲官場飛黃騰達的墊腳石，而非學術研究的殿堂。教授和學生在社會上亦是聲名狼藉，時常放縱於嫖賭。這樣的情況，到蔡元培接任校長後開始轉變。蔡氏經營北大的主要理念，是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此兩者相輔相成。<sup>6</sup>首先，他希望教育能超然獨立於政治黨派之外，如此才有學術自由可言。其次，他認爲大學教育應容納異議，不論是守舊或革新思想，只要言之成理，都能在北大校園自由發表。

師資來源方面，蔡氏除了聘請舊派保守學者，同時還有許多留學歸國的新知識分子，包括任用陳獨秀爲文學院長，胡適爲文學院教授。1918年1月，李大釗也因章士釗的推薦，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李氏從此進入生涯中的「北京大學時期」。此外，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化運動健將也都在受邀之列。由於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使得這群新知識分子在北大相遇，促成知識界的聯合，成爲領導五四運動的力量。在北大，這一群有新思想的北大教授團和舊派保守學者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對立而又百家爭鳴的景象。對學生的要求方面，蔡元培鼓勵學生自治，其中尤特別的是，蔡氏允許學生參加政治活動。這不僅和北京當局的觀點相反，而且預示了日後新文

<sup>4</sup> 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頁65。

<sup>5</sup> 《言治季刊》是前期《言治月刊》（1913年4月至11月）的繼續，同樣是北洋法政學會的機關刊物，主要編輯成員仍為李大釗、郁嶷和白堅武。後因同人彼此政治思想的分化和經費不足等因素，僅出版三期便停刊，北洋法政學會也從而解體。詳見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138。

<sup>6</sup> 詳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226~229。

化運動分裂為政治和文化兩種不同方向的前兆。在道德風氣方面，蔡氏則在北大特別設立進德會，要求會員接受不賭、不嫖及不娶妾等戒律。<sup>7</sup>李大釗亦為該會的甲種會員和評議員。

李大釗就是在上述社會言論自由相對開放的環境，開始與各界新知識分子們聯繫。雖然這群新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未來的想法彼此意見不一，但是在這樣的聯合互動過程中，他們將易於找尋到志同道合的夥伴。更為重要的是，在民初軍閥專政而不利於民主自由發展的情況下，追求「民主」與「科學」的目的，成為凝聚這群新文化運動領導分子的力量。其中，將西方民主觀念中國化的思想工程，便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首要課題。

## 二、民彝思想的理論基礎

清末民初之際，擁有進步思想的中國知識分子咸認為，中國要達到富強目的，必然要變化當時腐敗的政治，棄專制而走民主，務使民情能上達。李大釗的民彝思想就是在這樣的思想環境下產生。然而此處出現的問題是，中國究竟適不適合民主。接著還要問，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是否有民主思想的資源，能夠用以說服廣大的中國人民接受陌生的西方民主價值。李大釗早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時期，即對中國傳統的「民主」性質作出如下詮釋：

曩者神州國體，有德者王，後世獨夫，私相傳襲，縱存專制之形，而平民政治之精神，實互數千百年巍然獨存，聽訟征租而外，未聞有所干涉。諺謂「天高皇帝遠」，斯言實含有自由晏樂之趣味。即其間胡元、滿清，相繼篡奪，而中原民物之安平，未敢稍有所侵擾，安享既久，實效與憲典相侔。<sup>8</sup>

這段文字，是李大釗用以批評各省都督對人民進行專制，其中順道帶出了中國在專制時代的民主性質。李氏認為，傳統中國被統治的人民，在遙不可及的政治控管下，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縱使外族入侵，也不會輕易改變中國對人民的統治模式。在中國政治傳統中，戰國時代孟子所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觀

<sup>7</sup> 進德會的會員分成三個等級。其中包含甲種會員，要求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於前三戒外，加上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對丙種會員的要求最高，除了前五戒之外，還要加上不吸菸、不飲酒、不食肉三戒。詳見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279。

<sup>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裁都督橫議〉，頁 33。



念，其後延續到中國歷朝各代，形成了維持「民物之安平」的政治理想。在李大釗看來，「民本」與西方的立憲目的有某種程度的相似。

李大釗對於中國式民主的理解，來自其政治傳統中的「民本」思想，然而中西民主觀念之間仍有隔閡。中國傳統政治理想雖是「以民為本」，但在政治上，中國之治亂卻往往因君王一人之英明或昏庸而決定。此種英雄主義信仰，即是西方民主制度未能在中國生根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李大釗對民初政治的觀察中，正是「其例不遠，即在袁氏」。<sup>9</sup>所以根據實際經驗可得知，「民本」並不等於「民治」；而「民治」觀念即是以人民作為政治主體，這是西方民主思想的核心概念。留日時期的李大釗，從反袁政治的實踐中體悟到這一層道理，於是在 1916 年 5 月《民彝》雜誌的創刊號上，發表〈民彝與政治〉一文。文中提出「民彝思想」，用以跨越中西民主觀念之間的鴻溝。在探討民彝思想之前，應先理解李氏是如何對「民彝」概念進行取用：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天生眾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為性，趨於至善而止焉。爰取斯義，錫名民彝，以顏本志。<sup>10</sup>

李大釗在上述文字引用《詩經》內容，欲回答「天生烝民」，其眾民生成的內涵和原則為何。李氏過去曾受傳統儒學教育，對於宋代理學亦當有所涉獵。於是李運用理學中的「器」說明形而下的具體事物；以「道」說明形而上的原理原則。此即所謂「有物有則」。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說明了人民所持執的常道，即「人性」或「民性」，將要使之完全發揮，直到至善為止。李大釗將此申義稱為「民彝」。此名即來自「民之秉彝」，是李大釗民主思想的核心概念。接著李氏又須將上述的民彝概念，轉化為西方民主思想內涵，在此則又必須參考朱熹對於道器的解釋。南宋理學大家朱熹曾言：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

11

<sup>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民彝與政治〉，頁 155。

<sup>1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民彝與政治〉，頁 145。

<sup>11</sup> 朱熹，〈答黃道夫〉，《朱文公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 年），下冊，第 58 卷，頁 979。

相較朱熹和李大釗的解釋，相差不遠。如朱熹所言「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比較李氏所言「道即理也」；再以朱熹所言「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比較李氏所言「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為性」。其中上下內容，幾乎是如出一轍，朱熹對於道器的解釋，似乎完全為李大釗所沿襲。但其中不能忽略的是，李氏取用朱熹對於道器兩者的解釋雖近乎相同，但他們對道器兩者「關係」的看法，卻值得深究並予以區別。<sup>12</sup>

朱熹認為道器兩者的關係，首先有道德層次上的先後次序。依據本末之理，即是「道先器後」。其重要性，當以前者為重，後者為輕。其次，「道器之間，分際甚明。」兩者雖是共體，但卻不能混為一談。中國政治傳統習於「人治」，如以上述朱熹的道器觀念用以解釋「人」，此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解讀，頗具意義。其一，由於「道先器後」，所以人的形成是先有理，才得以決定氣的形式。是先有形而上的人之性，才決定出形而下的人之形體。其二，又因為「道器分離」的概念，所以並非人人因為有人之形體，而具有相同之人性。人性是天所賦予，因人而不同，經由人的體現，便有君子與小人的差別。這在中國的傳統政治，即是君子以其固有的聖賢之性，對於氣質未能齊的小人，施以後天教化，使其恢復原有本性。宋儒如此對道器的解釋，在政治上便是將君主施於人民的統治合理化，成為維繫中國專制的理論基礎。

李大釗與朱熹的理解不同在於，首先，李認為「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其道德原理的先後次序上，便是「先器後道」。其次，由於道是藉由器而體現，所以道器兩者自成一體，無法區別開來。如將此觀念帶入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由於是自人之形體而發出人性，所以人性並非因人而不同，如是即泯除了君子與小人之性兩者的差異，也間接打破君主對人民統治的合法性。在李大釗的解釋裡，中國政治上至高的主體，不再是具聖賢之性的君主，而是人人皆具有的「民性」，此即李氏所謂的「民彝」。在民彝概念中所展現的是：第一，不同於傳統為治之道，是「因民彝而少加牖育之功」。<sup>13</sup>此意為政治主體既在人民，對人民則不需有多餘的教化。第二，民彝者，亦「吾民衡量事理之器」。<sup>14</sup>此即凡事以人民為依歸之意。不同於傳統的「民本」，李大釗闡釋的民彝思想，實與西方「民治」觀念相互呼應。李氏對於中國傳統民主思想的轉化工作，至此可算是告一段落。

<sup>12</sup> 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 385。

<sup>1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民彝與政治〉，頁 145。

<sup>1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民彝與政治〉，頁 145。

李大釗在此，正是運用中國傳統的思想方法，打破中國專制傳統的理論基礎，再逐步引導中國人進入到西方民主思想的世界。然而，李氏對於西方思想的舶來品也並非照搬全套，如細察李大釗的民彝思想內涵，仍能發現其中與西方民主思想有很大的差異。為理解李氏民彝思想中具有中國特性，有必要對其進一步分析。

### 三、民彝思想的內涵分析

李大釗在海外歷經留日，與實際參與反袁運動的政治經驗，使得李氏的政治思想脫離早年法政時期，僅是對政治的「看法」或「意見」，已然成長至具組織性的「觀點」或是「理論」層次。李大釗民彝思想的形成，就是進入此一思想成熟階段的表現。李氏的民彝思想，除了對西方民主思想中國化進行了初步嘗試，其內涵和特色，也說明當時中國思想界的需求。其中包括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以民主思想作為方法，以及以群眾作為思想主體三者。此三者間彼此環環相扣，涵括內容、方法、目的與實踐等等面向，形成了民彝思想的整體架構。

#### （一）以民族主義作為中心

首先探討的「民族論」，以其作為民彝思想的核心，殆無疑義。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思想，在此擬從三點觀察。

第一，即李大釗對於民族代表的崇敬。早在北洋法政學校時期，李氏即曾著文，敘寫明末遺臣朱舜水流亡日本的事蹟，並心儀其抱有民族大義。在留日時期，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思想，更隨著中國處於內外危機的交迫，而顯得日益強烈。從李氏的文字當中，便能感受到：

萬一橫逆之來，迫我於絕境，則當率我四萬萬忠義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黃帝以降列祖列宗光榮歷史之末頁。<sup>15</sup>

這段文字說明，在中日二十一條的外交危機下，李大釗要全國人民聯合起來，為黃帝以降的祖宗之光榮歷史，勇於犧牲身軀，以就民族大義。

第二，在於李大釗對中國國情的論述。李氏的國情論詳見前章。其強調「言國

<sup>1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警告全國父老書〉，頁111。

情者，必與歷史並舉」。<sup>16</sup>萬不可如古德諾氏般以古論今，忽略現勢情況。在此，李大釗要對國情論進一步延伸的觀念是，國家的風土民情雖依各國而不同，政治制度的環境，亦依各國而異。但各民族或是各國之間的差異，彼此間卻是可以溝通和跨越的：

夫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間，而容有我同類之人，而克造國。我則何獨不然？<sup>17</sup>

此處所言國家，自然是指西方，而非中國。英倫憲法之美備，世所稱羨，在於能彰其民彝。民初政治雖仍處於專制之局，那是因其法度，暫未能彰其民彝。<sup>18</sup>其蘊意即在說明，中國人本身亦有能力，建立像西方一般的民主國度。那是因為，中國人和外國人同樣是由天生而為人，其才智和創造能力的差異不大。也就是說，在中國對於西方「羨憎交織」的文化心理狀態下，認為其總有一日，必能迎頭趕上西方文明。此即李大釗表現的中國民族主義心理。

第三，為李大釗愛國主義思想的發展。李氏在〈新書廣告三則〉中，對《世界風雲與中國》的譯書介紹，顯示李大釗此時已有成熟的民族國家概念：

世界既沈於戰亂之中，則凡立國於世者，當無不受其影響。中國與巴爾幹，同為列強勢力集中之點，此後存亡之運命，愈見逼緊，凡在國民，寧容漠視。著者不敏，擬乘暑假餘暇奮筆為此，亦欲檢舉東西冊籍之要，引起民族國家主義之精神而已。<sup>19</sup>

此處，李大釗有感於一次大戰的危機。在列強群起紛爭之時，李氏希望透過翻譯東西冊籍，引起人民對於民族國家主義的注意。先有對於當代民族國家概念的認識，才有愛國主義出現的可能。

其後李大釗的愛國主義精神，亦明顯表現在回應陳獨秀的悲觀。陳曾於 1914 年 11 月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表示：「吾華未嘗有共謀福利之團體，若近世歐美人之所謂國家也。」<sup>20</sup>所以他悲觀認為，「即謂吾華人未嘗建設國家亦無不可。」<sup>21</sup>

<sup>1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國情〉，頁 109。

<sup>1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厭世心與自覺心〉，頁 137。

<sup>1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民彝與政治〉，頁 148~149。

<sup>1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新書廣告三則〉，頁 123。

<sup>20</sup> 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 卷，〈愛國心與自覺心〉，頁 144。

<sup>21</sup> 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 1 卷，〈愛國心與自覺心〉，頁 144。



當時愛國主義從西方輾轉自日本傳到中國，而陳獨秀認為西方人之所以愛其國，是因其國自有其人民可愛之處，而民初袁氏專政的情況卻是，「其凡百施政，皆以謀一姓之興亡，非計及國民之憂樂。」<sup>22</sup>如國人能以理性的自覺心，來察覺中國之情勢，便知「其愛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sup>23</sup>陳獨秀如此悲觀心理，使得李大釗唯恐陳氏該篇文章，對中國引起不良的社會影響。李便於隔年 8 月，作〈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回應陳氏之文對於「自覺」之義，有未盡之意，便欲申其言外之旨：

惟吾民於此，誠當自覺。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sup>24</sup>

相較之下，李大釗則積極樂觀許多。李氏秉其民族精神之大義，認為可愛的國家，必然要靠人民親手創造。李發揮人民自覺心的真義，不應體會國家政治腐敗，而感到灰心沮喪，而是要「改進立國之精神」，化國家不可愛之處為可愛。

## （二）以民主制度作為方法

接著要探討從「民族論」出發，而延伸出的「民主論」。「民主論」在李大釗民彝思想中的位置，即是為達到民族自由、獨立的「方法」。易言之，民族主義是最終目的，民主僅是方式之一。然而，在李氏政治思想發展的過程當中，「民主論」逐漸有躍升趨勢。其表現於李大釗在政治立場上，自擁袁到反袁的過程。原本李氏希冀藉由中央權力的集中，達到國家統一，但是結果失敗。中國因崇奉英雄主義，而回到傳統專制的老路。為解決這個思想問題，民主論才為李大釗所重新重視。待李氏民彝思想的理論基礎建立之後，「民主論」的重要性直逼「民族論」。目的幾等同於手段。意即非民主共和，不能達到民族獨立之目的。

李大釗的民主論，主要表現在「民彝」的概念。前文對民彝理論的基礎，已有論述。接著要說明，李大釗是如何運用中國傳統文字學的詮釋方法，對民彝的「彝」之本義進行說明，並延伸其民主意涵。

<sup>22</sup> 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 1 卷，〈愛國心與自覺心〉，頁 144。

<sup>23</sup> 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 1 卷，〈愛國心與自覺心〉，頁 144。

<sup>2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厭世心與自覺心〉，頁 137。

首先，李大釗認為彝字可訓為「器」。「宗彝者，宗廟之常器也。」<sup>25</sup>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政治的最高領導人，除了是政治王，同時還是祭祀王。此即中國傳統政治「祭政合一」的特色。而祭祀時，所使用的祭器，則象徵政治的最高權力。但隨著中國接納西方民主制度的同時，傳統中國的政治原理，就必須經過重新詮釋，才能適用於當代。李氏便是從事這項工作，為的就是要區別古代之「宗彝」與當代之「民彝」：

明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於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於民彝。宗彝可竊，而民彝不可竊也；宗彝可遷，而民彝不可遷也。<sup>26</sup>

古代政治之神器，在於宗彝，但宗彝可遷。此象徵中國歷代政權的更替。今者政治之神器，在於民彝，而民彝不可遷。此象徵民彝，為一切政治權力之來源，是一個永世不變的真理。

其次，彝字還可訓為「常」。而彝字，又通夷。夷是平的意思。故彝又有保「常平之理」之意。其表現在政治上，即是「為治之道，不尚振奇幽遠之理，但求平易近人，以布帛菽粟之常，與眾共由。」<sup>27</sup>李大釗認為，要實行平民政治，就是要以民意為依歸，處處貼近人民生活。而不是如過去求治之君子，以「己所好者，而欲人之同好；己所惡者，而欲人之同惡。」<sup>28</sup>民彝政治的理想，不僅在於民情能夠上達。而且要政治上位者，能主動體察民情。

再者，彝字還可訓為「法」，「民彝者，民憲之基礎也。」<sup>29</sup>民彝本身代表著政治權力至高之神器，以及在為治之道上具常平之理的原則，而民彝之精神，則在於具體保障人民的憲法規章和相關制度。民彝是中外永世不遷的真理，英倫憲法能展現英國的民彝精神，而中國之民彝則是「鬱而不彰於憲典久矣」。<sup>30</sup>故李大釗在此大力提倡：

吾民於此，其當鼓勇奮力，以趨從此時代之精神，而求此適宜之政治也，亦奚容疑。顧此適宜之政治，究為何種政治乎？則惟民主主義為其精神、代議制

<sup>2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民彝與政治〉，頁146。

<sup>2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民彝與政治〉，頁146-147。

<sup>2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民彝與政治〉，頁147。

<sup>2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民彝與政治〉，頁147。

<sup>2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民彝與政治〉，頁148。

<sup>3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民彝與政治〉，頁149。

度為其形質之政治，易辭表之，即國法與民彝間之連絡愈易疏通之政治也。<sup>31</sup>

這裡強調西方民主主義，是時代之思想潮流。民國初年，它曾被譯為「惟民主義」或是「民治主義」。此即李大釗民彝思想中的民主內涵。此惟民精神，借鑑西方經驗，乃須透過代議制，來加以施行。但在民初的政治經驗過程中，使李氏體認到，實施代議制，並不同民主理想的實現。如代議政治未能體現民彝價值，「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為較代議政治，益能通民彝於國法之制。」<sup>32</sup>

但李大釗也未曾因為對民初議會政治的不滿，而決意放棄代議制度。李氏認為，代議政治之施行，必以「自由」為基礎。此處提出的自由，乃是受西方政治思想家彌爾（J. S. Mill）的影響。是指人的意念自由不受到外界所箝制。其展現在議會上，就是要許人以徑，使其暢達其志。發揮民彝之本能，從而達到至善之境。而且除了自由的條件之外，為「顧自由之保障，不僅繫於法制之精神，而尤需乎輿論之價值。」<sup>33</sup>輿論之價值，指的是言論要避免相互詆毀，或是偏激態度。真正有助於議會政治運作的言論，是要能夠符合「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縱喜其同，莫禁其異。」<sup>34</sup>如此，在議會經過反覆辯論，終能得致言論的中庸之道，而達到國家與民彝間的疏通目的。

### （三）以群眾作為思想主體

李大釗的民彝思想，雖是盧梭「天賦人權」觀念於中國的再現，但兩者概念仍不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差異是，西方民主主義的思想論述主體在於「個人」，強調保障個人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相較於李大釗此期與民主概念相關的論述，並無發現特別針對個人權利保障方面的說明。李氏民主思想中所論述的主體，大多是以「群體」呈現，這或許受到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影響。<sup>35</sup>而李大釗在民彝思想的論證過程中，也主要著重在對群體力量，進行抽象的概念描述。所以「群眾論」可說是李大釗民彝思想中的一項重要特色。

李大釗最早於 1914 年 8 月發表的〈風俗〉一文中，即有系統地闡述「群體」，

<sup>3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民彝與政治〉，頁 149。

<sup>3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民彝與政治〉，頁 158。

<sup>3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民彝與政治〉，頁 158。

<sup>3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民彝與政治〉，頁 161。

<sup>35</sup> 李澤厚曾指出中國近代的新文化運動，雖是全盤西化的運動，但啟蒙的目標還是繼承了中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固有傳統，其最終仍是以國家與民族的救亡為目的。所以中國近代的啟蒙實質，並非專為爭取個人的天賦權利，而是強調集體主義的意識傳統。詳見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 年），頁 12。

以及其延伸出的制度和風俗概念：

蓋群云者，不僅人體之集合，乃具同一思想者之總稱。此種團體，實積有暗示力與暗示於他人者之層級而結合者。結合之容愈擴，暗示之力愈強。群之分子，既先天後天受此力之範制，因以成共是之意志，郁之而為風俗，章之而為制度，相維相繫以建其群之基。<sup>36</sup>

「群體」不僅是人群之聚合，而是指人與人之間，彼此具有共同思想。上文提及的「暗示力」，是人的行為暗示，與社會上人的模仿行為，相互作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隨著模仿行為及其思想逐漸趨同，最終形成一個具有規範性的團體社會。社會規範的形成，不但在先天上教育人的思想，在後天也會箝制人的行為。如在文化面，則為社會之風俗。在典章方面，則成為制度。在概念上，它們彼此相互包涵，成為「群體」的基礎。此外，該文除了說明「群體」的形成，也提到「群樞」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

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樞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樞。風之以義者，眾與之赴義。風之以利者，眾與之赴利。顧群樞之所在，亦因世運之隆汙而殊。世運隆也，其人恆顯於政，而勢與義合，故其致俗於善也較易。世運汙也，其人恆隱於學，而勢與利合，義與勢分，故其致俗於善也較難。<sup>37</sup>

「群樞」代表社會整體道德精神的中心人物，處於領導社會習俗風尚之地位，有中國政治傳統所謂「風行草偃」的意涵。<sup>38</sup>但「群樞」所帶來的人間道義，並非永久彰顯於社會，而會隨著人世盛衰而變化，如果「群樞」象徵的社會道義，能與政治相結合，則社會風俗便能呈現出善的狀態；反之，群樞象徵的社會道義如與政治分離，「群樞」則將隱於野。如此社會風俗，便會隨著無德的政治上位者而日趨敗壞，其中反映的思想，即是中國專制傳統典型的人治觀念。當時李大釗對於英雄主義抱有嚮往，所以寫作此文，也是為提醒上位者要有所持重，擔綱領導社會風尚的責任。

隨著袁世凱在政治上日趨於專制，以及李大釗民主思想的成熟。在李氏心中，中國古代「群樞」的領導地位，已非袁氏，而漸為社會群眾所取代：

<sup>3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風俗〉，頁88。

<sup>3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風俗〉，頁89。

<sup>38</sup> 《論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處比喻人民受德感化，而順從於國君。參見毛子水註譯，《論語今註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93。



托氏之言曰：「何為歷史上事件之因緣？勢力是也。何為勢力？則讓於一定人物之群眾意志之累積也。於如何條件之下，群眾之意志，讓於一定之人物歟？則於『其人物表示群眾之意志』條件之下，讓之者也。」准斯言也，歷史上人物之勢力，莫非群眾意志之累積，而群眾意志，一旦既讓諸其人，其人復得以斯勢力範制群眾，群眾不悟其人物之勢力，即群眾意志之累積，其人物遂得久假不歸。群眾苟自覺悟，則其勢力頓傾。<sup>39</sup>

李大釗於此，引用俄國社會寫實作家托爾斯泰的話，說明過去的「群樞」人物，代表群眾意志之累積的表現。不同於前者的人治觀，此處指出「群樞」的領導地位，是由群眾所讓與，而非天生具備。這與西方社會契約論的觀念相類似。所以傳統中國的政治上位者，其政治權力是來自群眾的託付。但人民卻不悟此道理，於是讓統治者得以實行專制。在李氏看來，此道理一旦讓群眾領悟，那麼這樣的專制力，將會面臨崩潰瓦解。

統治者的權力既是來自群眾，一旦政治權柄為一人所奪，則勢將引起群眾反抗。袁世凱稱帝引發各界撻伐，李大釗對袁氏的批判，自然不遺餘力：

就令英雄負有大力，聖智展其宏材，足以沛澤斯民，而一方承其惠恩，一方即損其自性；一方蒙其福利，一方即喪厥天能。所承者有限，所損者無窮；所蒙者易去，所喪者難返。寢微寢弱，失卻獨立自主之人格，墮於奴隸服從之地位。若而民族，若而國家，即無外侵亦將自腐，奚能與世爭存！即苟存焉，安有價值之可言。<sup>40</sup>

民國初建，社會正瀰漫一股天下歸心的態勢，袁世凱被拱為新中國的英雄，中國統一和民族獨立，似乎惟有靠袁氏不可，李大釗最初也和保守派人士同樣這麼認為。但隨著對英雄的幻滅，李氏在思想上逐漸突顯出對於群眾力量的重視，他要發掘長年以來，在中國專制下所遮蔽的民性。於是，在李大釗的想法中，中國自清末起所追求的民族國家之獨立，已和「群眾」緊緊結合在一起，和民主自由之發揚相連繫。

<sup>3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政治對抗力之養成〉，頁105。

<sup>4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民彝與政治〉，頁157。

## 第二節 民族與國家的青春哲學

李大釗在民彝思想的形成過程中，逐漸放棄中國傳統的人治觀念，而更接近於西方的民治思想。然而，李氏所謂「民主」，在中國救亡圖存的背景下，顯然具有強烈的工具意義。其「民主」蘊涵民族情緒和集體主義的論述，實有別於西方民主與其生長的風土環境。換句話說，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式民主，對中國的困難處境，顯然無提升作用。李大釗的政治思想，雖訴求民主價值，但其深層目的，仍是以國家主義為中心，期待中國走向世界「富強」之林。民族論所以作為民彝思想的核心意義即在於此。為了更深入李氏的民族論內涵，必須理解袁後軍閥政治的背景。其次，是從李大釗歸國後提出的青春哲學中，明白李氏對於中國社會和國家未來的展望。再者，李大釗對於國際關係和涉外事件的理解和態度，亦呼應青春哲學的抽象理想和國家獨立的現實目的。

### 一、軍閥時期的政治情勢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憂憤交加之下死去。因重於人治，中國初具形式的民主憲政制度，尚無法完成政權的和平轉移。導致以袁氏為核心的政治權力分崩離析，中國由此進入軍閥統治。袁死後的新政局，由副首黎元洪接任總統，馮國璋為副總統，皖系首領段祺瑞擔任國務總理。雖然黎氏一當政，隨即恢復舊約法和第一屆國會，廢除管制社會言論自由的法令，重組憲法會議制定新憲法，使得政局頓時煥然一新。但不久後，北京政府又陷入黎、段二人的府院之爭。李大釗在反袁運動成功之後，亦不免捲入其中。

為了明白李大釗在袁後政局所扮演的角色，必須先從三個面向理解軍閥政治。其先後依序為：國內的政治格局、國會的黨派勢力，以及北京政府面臨的政治問題。

首先，從國內政治格局說起，由於袁死後無繼承者，無法節制其他北洋軍系將領，各地軍閥於是各自為政。勢力較大的軍閥更得倚仗軍勢入主北京，取得中央資源。如府院之爭中取得優勢的皖系領袖段祺瑞，最早控制住北京政府。在一段很長的時間，這些軍閥彼此既聯合又對抗，維持勢力平衡，因而無法出現統一的軍事力量。同時，由國際政治角度來看，軍閥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利益的代言人，軍閥必須借助列強力量，擴充其在國內的勢力。

與李大釗等新知識分子尤有關係的是，這些大多數觀念守舊，局限於地方利益而無整體國家觀念的軍閥，亦得接受中國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現狀。研究民初軍閥的歷史學者認為，軍閥政治除了藉由軍事暴力進行社會控制，還必須倚賴社會菁英和知識階層，以獲得統治的合法性，具有「軍紳政權」的性質。<sup>41</sup>如果軍閥要對地方進行統治，除了運用武力，還需借助傳統士紳在地方的影響力，一旦軍閥掌控中央政府，就更需要獲得國會多數議員支持，同時還要與新知識分子合作，才能在立法、經濟與外交等專業領域發揮作用。如李大釗在此期間參與憲法制定的討論上，就有所貢獻。

其次，是國會黨派勢力的變化。原本在袁時期的進步黨和國民黨兩大勢力，因袁推動帝制，而暫時聯合倒袁。在護國運動成功後所恢復的第一屆國會裡，各政黨勢力圍繞在憲法會議重新運作，而進行分合重組。原進步黨中傾向保守者，形成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的憲法研究會，簡稱「研究系」。而原進步黨中傾向於調和的中間立場者，以孫洪伊、張繼為首，形成憲法商榷會，簡稱「商榷系」，其政治立場接近舊國民黨。<sup>42</sup>段祺瑞為了在國會保有勢力，與研究系之間達成合作默契，而研究系也藉著與段氏等具有軍事實力的人物合作，以獲取政治利益。至於，政治立場中偏向激進者，則是日後南下廣州組織政府的孫中山。因為段祺瑞拒不恢復張勳復辟事件所破壞的《臨時約法》，於是孫中山才忿而率領部分國會議員南下護法。

這次國會的勢力重組，對李大釗亦有深刻影響。李氏和湯化龍、孫洪伊等進步黨人原有不錯的交誼，李的留日經費即曾受進步黨援助。但歷經反袁後的李大釗，其政治立場逐漸由保守走向中間路線，接近於孫洪伊和商榷系的調和立場。

再者，動盪不安的政治環境下，北京政府當時面臨的問題是，自民初建立的民主議會制度，仍未能將政治帶向法治常軌。其原因在於：第一，民初國會在政治當權者的控制下，時斷時續，無法達成其應有的議事功能。第二，維護民國法統的共和憲法，亦遲遲無法制定公諸於國民之前。1916年9月憲法會議重開之後，有關憲法內容的爭論，包括省制是否入憲、以孔教為國教是否入憲、中央政府體制應如何

<sup>41</sup> 有關「軍紳政權」的定義，詳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三聯書店，1983年），頁3~4。

<sup>42</sup> 在〈孫公洪伊行狀〉中有一段文字，點明在南北對立時期孫洪伊的政治角色。徵引原文如下：「公在南既與民黨分子多接近，民黨中一部分子，亦欽仰公之德望器識，而親之者眾，遂成南北新舊過程中之唯一政治活躍中心人物。公以此時正式加入國民黨，亦即以調和國民黨北洋派共負建國責任自認。」原載於陸乃翔，《河北月刊》，第4版，第11期。詳見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163。

確立等等。在這些爭論的背後，是各政團彼此間的鬥爭。在省制是否入憲的問題上，主張中央集權的段祺瑞和支持段的研究系，與支持地方分權的商榷系和舊國民黨，相互抗衡。在以孔教為國教是否入憲的問題上，保守和激進雙方展開了辯論，李大釗亦參與其中。有關中央政府體制問題，黎元洪為鞏固總統實權，贊成總統制。段祺瑞為增加總理權力，而主張責任內閣。圍繞在黎、段二人的權位之爭，擴大為府院之間的嚴重矛盾。

李大釗歸國後的軍閥政治背景即如上述。李氏幾乎是鑲嵌於該政治環境之中，在各種政治傾向間游走。值得注意的是，在紛亂的政治氛圍，李大釗將己身定位為一位政論家。政論家的責任是「在常於現代之國民思想，懸一高遠之理想，而即本之以指導國民」。<sup>43</sup>而像黎元洪、段祺瑞、梁啟超、湯化龍等人，在李氏的分類中，都應算是政治家一類。政治家是「宜近具乎事實」，其責任在於「準現代政治實況，立一適切之政策，而即因之以實施於政治，使國民之理想，漸漸顯著於實際政象之中」。<sup>44</sup>姑且不論他們是否有達到政治家的理想標準，政論家和政治家應各司其職，同時互補對方缺少的功能。此處除了展現李大釗的調和觀點，更重要的是，李大釗代表著許多新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懸有高遠之理想，其政論特色具有超然的客觀立場，獨立於政治利益的複雜關係。當袁死後，中國政治露出一道曙光之時，李氏更滿懷樂觀，開始在民彝思想的基礎，著手討論中華民族與國家的性質問題。

## 二、民族與國家的青春論

李大釗自日本返國後，在上海待了將近一個半月，期間與孫洪伊、白堅武等人往來頻繁。他們共同參與有關憲法的研究討論會。<sup>45</sup>待袁死後，7月，李氏接受湯化龍聘請，成為北京《晨鐘報》編輯。《晨鐘報》為當時進步黨的報紙。同時參與編輯工作的人，還包括李大釗的好友，白堅武和郁疑。<sup>46</sup>

由於竊國獨夫已除，此刻李氏對於中國未來，實抱有美好想法。當時北京報館充斥，象徵言論自由的開放。<sup>47</sup>而中國民主政治，又宛若新生。8月，《晨鐘報》正

<sup>4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政論家與政治家（二）〉，頁305。

<sup>4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政論家與政治家（二）〉，頁305。

<sup>45</sup> 過去有學者認為此時李大釗參與的是憲法研究會，但後來證明為誤。詳見朱志敏，〈李大釗參加「研究系」活動質疑〉，選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研究論文選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329~333。

<sup>46</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137。

<sup>4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新現象〉，頁197。



式發行。李大釗在創刊號發表〈《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說明該報的社會使命，是要「振此晨鐘」，以「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sup>48</sup>將以創造青春中華，作為國家前進的目標。9月，李大釗在該報上又發表〈青春〉一文，對於「青春」一詞，進行更深一層的哲學思辨。或許李大釗的「青春」哲學可能部分源於中國傳統，然而，有更直接關係的是來自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 W. Emerson），透過愛默生的啓示，李大釗對於未來更為樂觀，在反傳統的浪潮中，李愈加堅信個人有能力改造其所處的環境。<sup>49</sup>

李大釗青春思想的形成，以及其對於李氏思想承先啓後的轉折意義，頗值得吾人探究。何謂李氏所言的「青春」，可從下文進行分析：

春日載陽，東風解凍。遠從瀛島，返顧祖邦，肅殺鬱塞之象，一變而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為百卉昭蘇之天矣。……彼幽閑貞靜之青春，攜來無限之希望，無限之興趣，飄然貢其柔麗之姿於吾前途遼遠之青年之前，而默許以獨享之權利。<sup>50</sup>

此處李大釗對於青春的觀點，主要有兩種解釋。第一，是指四季中的春季。春季，是象徵萬物滋長的時節，使世界呈現欣欣向榮之貌；第二，是指人成長過程的青年時期。青年，又象徵進步與希望。必須注意的是，此處所指的青年，並無年齡限制。其判準在於思想，是否具備青年應有的奮進精神。<sup>51</sup>如此對於青春的解釋，可以發現青春是美好的，是具有希望的。其大多又是以青年的形象表現出來。從中也容易明白，李大釗所以提出青春思想，無非是要將青春中華，寄望於中國青年一代。

知道了「青春」具有的象徵意涵，接下來就要了解李大釗對於青春概念，如何進行哲學思辨。李氏首先從宇宙論的高度切入思考。其認為，宇宙自然之青春為無盡，且無初無終，於空間則為無限，於時間則為無極。宇宙即是無，此處的「無」，並非指空無一物，而是無所不有，無所不在。這是對於宇宙的一種絕對的說法。至於相對之說，則是指宇宙有進化的過程。既有進化，亦有退化，於是產生萬物的殊相。而世間萬物殊相，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呈現：

<sup>4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頁166。

<sup>49</sup>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編譯，《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頁31。原書見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p. 27-28。

<sup>5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青春〉，頁182。

<sup>5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頁170。

惟其為萬象萬殊，故於全體為個體，於全生為一生。個體之積，如何其廣大，而終於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終於有涯。於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陰即有陽，有否即有泰，有剝即有復，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長，有盈即有虛，有吉即有凶，有禍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壯即有頹老，質言之有而已矣。<sup>52</sup>

人的一生有其限制。根據宇宙的自然法則，人將會遭遇生死、盛衰、陰陽、否泰、剝復、屈信、消長、盈虛、吉凶、禍福、青春白首、健壯頹老的人生過程，一代接著一代，輪迴流轉。然而，從宇宙的絕對觀點來看，李大釗又認為，青春是無盡的。青春之無盡，象徵萬物之中不變的道理：

其變者青春之進程，其不變者無盡之青春也。其異者青春之進程，其同者無盡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進程，其周者無盡之青春也。其有者青春之進程，其無者無盡之青春也。其相對者青春之進程，其絕對者無盡之青春也。其色者差別者青春之進程，其空者平等者無盡之青春也。<sup>53</sup>

在宇宙中不變的道理，或可稱之為真理，盡皆隱匿於人心，李大釗惟希望人能有以察覺之。人一旦在萬物中，能夠「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sup>54</sup>也就是說，人要求得無盡之青春，就必須先體驗到人生不變的真理。簡言之，所謂無盡的青春，並非指人的長生不老。李大釗所要強調的是，此種無盡之青春，能否為人所體驗。如人能自我領悟出來，便能得致無盡之青春。

如能更深入分析李大釗思想的整體，那麼位於宇宙論層次的青春哲學，其位階自然是高於政治層面的民彝思想，而成為李氏思想的核心部分。從李氏以青春觀點，闡發中國民族與國家主義的主張，便能很明顯看到：

人類之成一民族一國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國家，斯有白首之國家。吾之民族若國家，果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國家歟，抑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國家歟？<sup>55</sup>

<sup>5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青春〉，頁183。

<sup>5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青春〉，頁184。

<sup>54</sup> 此言為李大釗引自蘇軾〈前赤壁賦〉之語。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青春〉，頁184。

<sup>5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青春〉，頁186。

從過往歷史的興亡經驗，可以發現民族、國家，和人同樣具有生命，會經歷自青春到白首的過程。李大釗在此，對中國提出了同樣的問題。而答案很清楚說明，古老的中國經過千百年，如今已是白髮蒼蒼，幾無生機可言。

要如何解決中國的日趨衰落，社會有識之士或提倡實業，或是參與、評論當代政治，為維護民主價值而努力。李大釗在此提出的是，要如何挽救中國此刻悲觀的人心。中國青年因國家面臨衰亡，而感到痛苦，生活愈趨消極。甚至有人選擇自殺之路。為矯正社會消頹的風氣，李氏才藉此機會，提倡青春思想。希望以青年為主體，能自覺其有無盡之青春，讓中華能復有新生之貌。所謂中華之義，「中」者，即是希望能以今歲之青春，畫為中點。中以前之歷史，為白首之歷史；中以後之歷史，為青春之歷史。至於「華」，則是文明開敷之謂也。「青春之中華者，白首中華託以再生之華也。」<sup>56</sup>

透過青春思想的闡述，李大釗不僅要解決中國青年精神耗弱的問題，還說明了中國政治和社會價值的領導權，仍舊為白首老輩所壟斷。民初的政治要人，多是清末遺臣，他們大都崇奉孔教。而孔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又多具有規範人心之效。實際上，是統治者施行專制的文化工具。為了邁向青春之中華，李氏認為青年與老輩之間，應該建立起一層新的關係：

蓋一切之新創造，新機運，乃吾青年獨有之特權，老輩之於社會，自其長於年齡、富於經驗之點，吾人固可與以相當之敬禮，即令以此自重，而輕蔑吾青年，嘲罵吾青年，誹謗吾青年，凌辱吾青年，吾人亦皆能忍受，獨至並此獨有之特權而侵之，則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而無所於躊躇，無所於遜謝。須知吾青年之生，為自我而生，非為彼老輩而生，青春中華之創造，為青年而造，非為彼老輩而造也。<sup>57</sup>

這樣一層新的關係，是希望青年能夠尊敬老輩的年齡和經驗。但同時，老輩也要尊重青年的想法，勿使之受到拘束。讓青年與老輩，能夠維持良好互動。其實早在法政時期，李大釗便曾言：「舊者日益衰落，不可淹留；新者遏其萌芽，勿使暢發，此自絕之道也。」<sup>58</sup>此意即是要政治上的老輩，能接受並重視政治新人的想法，免得日後政權新舊交替，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然而，事實上當時中國社會，青年是備受

<sup>5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青春〉，頁188。

<sup>5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青春〉，頁167。

<sup>5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政治對抗力之養成〉，頁98-99。

老輩所壓抑的。李大釗於此提出青春思想，就是要青年能夠自覺其能力。如有老輩「不知蘇生，不知蛻化」，仍舊拿起陳腐的觀念價值，來規誡後輩，那麼青年亦有「揭反抗之旗之權利」。<sup>59</sup>對李大釗而言，只有擺脫白首中國的歷史包袱，才有邁向青春中華的可能。

李大釗的「青春」觀點不僅有愛默生的思想內涵，其實亦受到世界各國的民族主義風潮影響，如其文便曾提及青年德意志、青年土耳其黨，以及印度青年革命的實例，上述皆與各國青年的建國活動有關。<sup>60</sup>雖然青春思想非出自李大釗個人，但它在李氏政治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實具有承先啓後的地位。首先，青春思想的提出，使得李大釗的民族論述更加完備，往後李氏的民族主義思想，即為其政治實踐的重要前提。其次，青春思想使李大釗將注意力轉向青年階層，成為李氏政治活動的基礎，李大釗在青春思想中指出，惟有青年能帶領白首中國走向青春中華。過去李將中國能否實行民主的關鍵放在群眾而非英雄，如今李氏認為在群眾當中，只有青年能夠完成國家獨立的任務。換言之，青年人格特質中所具備的思想革新、源源不絕的行動力，與改變現狀的企圖心，成為使中國歷史巨輪前進的能量來源。

### 三、對於國際局勢的觀察

李大釗實踐青春中華理想的途徑，正是建立在對國際的觀察和理解之上。一次大戰的發生，是國際局勢發展的重要分水嶺。這在李氏思想發展的過程中，亦具同樣意義。大戰前，李大釗和多數的新知識分子，常會運用「均勢」觀點，來分析列強對中國的權力關係：

列強在華之經濟勢力益密，經緯參差，纖維若織，中國等於自縛之春蠶，列強如爭食之餓虎。而蒙、藏與俄、英之關係，較前益彰，各國對我領土之興味，復從茲而益濃。然均勢之基，固未動搖也。是則致中國於將亡者，惟此均勢；延中國於未亡者，惟此均勢；迫中國於必亡者，亦惟此均勢。<sup>61</sup>

甲午戰後，中國陷入瓜分之局。帝國主義見中國積弱未返，便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sup>62</sup>遲來的美國失去角逐機會，因此向各國提出在中國互不干涉，利益均霑的主

<sup>5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青春〉，頁168。

<sup>6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頁169~170。

<sup>6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警告全國父老書〉，頁113。

<sup>62</sup> 其中德國侵占膠州灣，將山東劃為勢力範圍。帝俄強租旅順、大連，闢為關東省。英國則領有長



張，形成往後的門戶開放政策。此種機會均等主義，乃建立在各國彼此在利益關係上的默契，並成爲中國知識分子強調維持各國在中國的「均勢」，免得中國人做亡國奴的觀點。但李大釗認爲，列強在中國的「均勢」有其時效性。隨著時間推移，中國或亡於此「均勢」亦未可知。民國初年，英國和帝俄就曾企圖協助西藏和外蒙獨立，以從遠東獲取利益。日俄戰爭結束後，簽訂普利茅斯條約，日本開始深植南滿勢力，作爲日後在東三省擴張的基礎。「均勢」之局，無法減緩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最終反而成爲中國亡國的主因。

一次大戰對於中國，造成許多不同層面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大戰預示著世界格局的轉變。由於主要戰場發生在歐陸，破壞當地經濟，削弱了歐洲列強勢力。相對地，美、日在國際上的發言權日益提升。外交局勢的變化，自然會間接影響中國的歷史和世界地位。李大釗擔心中國人民普遍對於外交知識不足。希望國民都能夠從報刊，來重視國際問題。<sup>63</sup>李氏自身即相當重視世界局勢，對於一次大戰有如下的認識：

同時其紛紜雜遝，有與之同符者，即所謂近東問題是。……此近東之均勢，又遙與遠東之均勢相為呼應，以成世界全局之均勢。牽一髮，則全身俱動，若待爆之火山，若奇幻之魔窟，風雲萬變，光怪陸離。巴爾幹風鶴一驚，列強莫不皇皇焉戒懼以臨，若大難之將至。蓋企平和於均勢之局，猶厝火積薪以求安也。<sup>64</sup>

李大釗對於世界格局的看法，同樣是以國與國之間政治力的對抗來理解。列強以國家利益作爲基礎向外擴張。同時，國家利益也是各國結盟或是相互征戰的依據。在各國政治力相抗衡的緩衝地帶，彼此維持著「均勢」狀態。這樣的緩衝地帶，在近東爲巴爾幹半島，在遠東則爲中國，兩兩遙相呼應，形成了世界的「均勢」。當時國際間仍然維持著無政府狀態，歐陸各國任意締結同盟關係、發展秘密外交、進行軍備競賽。這些都是歷史學界認爲造成一次大戰發生的基本原因。<sup>65</sup>一旦兩國發生衝突，便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此處驗證了李氏對中國處於「均勢」狀態而充滿的危機

江流域，強租威海衛與九龍半島。法國則意在雲、廣地區。日本則取得福建作爲勢力範圍。

<sup>63</sup> 「以吾國民平時對於世界大勢之冷淡，其關於外交知識之淺薄，似無庸深諱。」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外交研究會〉，頁282。

<sup>6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警告全國父老書〉，頁113。

<sup>65</sup> 悉布費(S. B. Fay)著，于熙儉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上冊，頁27。

感，因為這個例子說明，中國也可能是引發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國際「均勢」最終帶來戰爭，李大釗卻認為在國際勢力重組的過程中，對中國而言，正好是提高國家地位的轉機。

一次大戰發生於 1914 年 7 月，時值袁政府時期。最初中國提出 24 點聲明，宣布中立，表示不介入戰爭。<sup>66</sup>英國雖一開始即希望中國參戰，但日本政府擔心中國參戰會造成其國際地位提高，影響日本在亞洲地位。礙於英日同盟關係，在日本政府沒有同意前，英國不便就中國參戰進行談判。大戰後沒多久，日本即對德宣戰，其目的是為占據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順便報復德國過去三國干涉還遼的舊恨。隨著國際政治對中國內政影響的深化，當歐洲列強無力東顧之時，日本以山東為要脅，乘機向袁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在此顯示日本企圖在亞洲擴張的野心。

從中國內政來看。到了府院之爭時期，黎元洪希望在大戰中維持中立，而段祺瑞則力主對德宣戰。<sup>67</sup>中國是否參戰的問題，於是重新回到國會議程上。日本為鞏固在亞洲地位，不僅在重要國家布置妥當，還與皖段維持互利關係。段祺瑞一方面需要大量資金，強化在國內的政治實力。而日本的寺內正毅內閣，也得以利用段來干涉中國內政。因此，日本政府自 1917 年開始，支付段有所謂的西原借款，引起南方革命黨人強烈反對。

從世界局勢觀察，1917 年 1 月，美國抗議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美國總統威爾遜宣布對德斷交。大戰至此，進入了另一個新階段。2 月，美國號召中立國同樣對德斷交。同時由於歐洲戰場的勞工短缺問題，具有龐大勞動力的中國，便成為協約國積極拉攏的對象。日本方面，除了和段內閣相互倚賴，還在大戰中加強了經濟實力，並取得英、俄、德、法默許日本在中國山東的權利。於是日本此時亦同意中國參戰。李大釗等在野人士，自然對中日秘密外交不完全知情。但李氏對中國是否參戰的問題，卻抱有極高興趣：

前者，東報盛傳英國將引吾入聯合國之側。刻聞美國又力勸世界中立國全行加入戰爭，以抗德政府。方在擬議中，方針猶未決也。然決此非難，一言以蔽之也，曰：中而不立而已矣。<sup>68</sup>

<sup>66</sup> 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頁 97。

<sup>67</sup> 1917 年 5 月，段內閣通過對德宣戰案，並以公民團脅迫國會通過該宣戰案。黎元洪則免除段的國務總理一職。其後，段又利用督軍團叛變，促使黎元洪電召安徽督軍張勳到北京進行調停。6 月，張勳不但迫使黎解散國會，還陰謀進行清室復辟。

<sup>6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中國與中立國〉，頁 251。

當時中國人如要快速獲得國際訊息，閱讀日本報紙是其中一項選擇。李大釗從日本報導中，得知大戰發展趨勢，各國紛紛期待中立國能夠參戰，尤其是中國具有相當的潛力。但李氏此刻卻不忘調侃中國的國際地位，是受到帝國主義侵略下，「中而不立」的中立國。而一旦中國參戰，將會帶給中國突破現狀地位的一個機會。爲了探討李大釗如何實踐青春中華的理想，第一步必須分析李氏的參戰心理。

當美國嚴厲批評德國的新潛艇戰策時，北京政府也跟著給予德國忠告。雖然段內閣實施兩面外交手法，一方面爲獲得美國大量貸款；另一方面也私下通知德國，中國是受歐美國家脅迫，才會與之同調。<sup>69</sup>但不知外交機密的李大釗，卻仍熱情支持中國參戰，其理由並非是自政治家或個人利益的立場出發，李氏是從政論家對政治理想的高度，認知到爲了青春中華的目的，必須先有和世界各國平等的國際地位：

我國與聯盟國攜手之利益，各報言之綦詳，姑略勿論。請進言今後我政府應如何進行，庶歐戰終結時，而我可達到初時加入之目的。……一我國應迅與諸聯盟國接洽，表示加入之態度，並與磋商加入之辦法。一既與聯盟國有所磋商，則不可不有所要求。此要求之條件若何？我國不可不事先通盤籌畫，審慎思維，庶臨議時胸中自有成竹。一既已加入，則不能不有所擔負。然則吾之所能助援者果安在耶？查彼聯盟國之所缺，海軍雄健，軍需充足，其所求之不得者，惟人力耳！<sup>70</sup>

此刻國內輿論多數認爲，參戰將對中國有益，李大釗則相當實際地討論加入協約國的辦法，同時不忘先確認中國參戰的條件，以便和協約國進行說明。這些條件不外乎是戰後中國作爲戰勝國應取得的國家權利，其中包括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與世界各國有平等的外交關係等等。但如要協約國在戰後的平和會議上履行這些條件，中國亦必須有所付出，所以向歐陸派遣華工，以滿足大戰需求，便成爲刻不容緩的事務。必須強調的是，李氏雖和段祺瑞同樣支持中國參戰，但心態卻明顯和段不同。

爲了更深入理解李大釗如何實踐青春中華理想，第二步必須探討李氏對此時日本帝國主義動向的觀察。如前所述，中國能夠參與大戰，和日本態度有很大關係。日本之所以同意，主要是爲確保其在亞洲的利益。日本對於亞洲的野心，首先是提出二十一條：

<sup>69</sup> 李國祁，《民國史論集》（台北：南天書局，1989年），〈德國檔案中有關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項記載〉，頁314~315。

<sup>7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我國外交之曙光〉，頁259~260。

日本此次於中國獲得之權利，占世界各國之優勢，歐洲戰後，攘臂東來，必且忌妒之而暫求償於中國喘餘之微命，勢必形成一亞東之新均勢。此新均勢之實質，將與瓜分之境相去不遠。所以暫留一步者，西方各國方疲命於巴爾幹戰局之中，元氣未復，不願驟興兵爭於東大陸也。迨其國力稍見充實，終必出於一戰，以解決中國問題，而為權利分配之裁判。然則日本今番之行動，吾人認為異日瓜分之戎首可也。<sup>71</sup>

日本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被一些歷史學家評為日本外交史上，得不償失的勝利。<sup>72</sup>李大釗對其後果進行理性分析，認為日本此舉，是趁著西方國家無暇東顧，破壞原有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均勢」。一旦各國在亞洲利益分配不均，日後將成為中國被各國瓜分的遠因，亦未可知。

其後，日本以西原借款結好段內閣，同時日本社會輿論中，又有提倡「極東們羅主義」者。<sup>73</sup>此主義，為日本仿效美國前總統門羅（James Monroe）所發表的外交宣言。其內容，認為歐美國家不應涉足亞洲問題。東方門羅主義的提出，正是在理論上為日本在亞洲建立新均勢而開始鋪路。

隨著近來世界各國興起的民族運動，日本也開始主張「大亞細亞主義」。希望以日本為中心，帶領亞洲脫離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李大釗對此說則有所提防，擔心日本「假大亞細亞主義之旗幟，以顏飾其帝國主義，而攘極東之霸權」。<sup>74</sup>在李氏看來，如果日本是相對於大西洋主義，而提出大亞細亞主義，本是無可厚非。但它必須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

但以吾中華之大，幾於包舉亞洲之全陸，而亞洲各國之民族，尤莫不與吾中華有血緣，其文明莫不以吾中華為鼻祖。今欲以大亞細亞主義收拾亞洲之民族，舍新中華之覺醒、新中華民族主義之勃興，吾敢斷其絕無成功。<sup>75</sup>

最後，「大亞細亞主義」的提出，雖然有背於李大釗所嚮往的世界大同。但它帶給李氏的啟示是，中國作為亞洲的中心，惟有中華民族能夠真正在世界中獨立，實現化白首為青春之中華，才有可能發揮「大亞細亞主義」的理想。對李氏而言，該意義

<sup>7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國民之薪膽〉，頁134。

<sup>72</sup> 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頁102。

<sup>7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極東們羅主義〉，頁290。

<sup>7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大亞細亞主義〉，頁107。

<sup>7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新中華民族主義〉，頁284~285。



絕非作為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實行侵略的藉口，而是必須以中華民族特有的寬仁博大之精神，感化提攜亞洲諸兄弟國，俾使進入獨立自治之域。<sup>76</sup>所以李大釗在此借題發揮，是要在世界民族運動的熱潮中，以「新中華民族主義」，作為「大亞細亞主義」的實質內涵，以期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和影響力。

### 第三節 政治和社會矛盾的調和

對李大釗而言，達到「新中華民族主義」的境界，可謂實踐青春中華的長遠目標。它同時也是李氏對於未來中國的理想圖像。但理想實在過於抽象。若人生僅談論理想而止，則莫不有空虛飄渺之感。此處要強調的是，作為政論家的李大釗，其政治思想並非單純停留在理想，亦重視能否具體實踐。首先，李大釗討論憲法制定問題，即相當具有實踐價值。李氏的憲法理念，不僅在於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更重視憲法的有容觀點，以及強化國家統一的內在目的。其次，在政治社會方面，李大釗亦察覺到普遍存在的新舊矛盾與衝突。於是李氏融會中西觀點，認為「調和」即是解決衝突的最佳方式。李最終期使中國，能夠「舉國一致」，以應對外在威脅。而當時國會政治惡鬥中的新舊思想和團體，便成為李氏首先注意到的調和對象。

#### 一、李大釗憲政思想探析

要實踐李大釗的民彝思想和青春中華，能否制定共和憲法相當關鍵。但民初政治的上位者尚未脫離專制思維，加上國會黨爭等惡劣環境，使得制定憲法成為難題。辛亥革命後雖有《臨時約法》，但那僅適用於過渡時期。袁世凱在位時，議院諸公雖研擬出《天壇憲草》，但因袁氏專權而胎死腹中。民國建立以來，李氏即重視憲法，並曾參與討論，但當時李的憲政思想仍未成熟。直到李自日本返國，1916年5月9日憲法會議重開之後，他才有能力以豐富的西方政治知識，建構出完整的憲政思想。

護國運動時期發表的《雲南宣言》，<sup>77</sup>其內涵精神被李大釗視為中國憲法淵源。

<sup>7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大亞細亞主義〉，頁107。

<sup>77</sup> 李大釗文中所舉《雲南宣言》內容如下：「《雲南宣言》者，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雲南護國軍以沈痛之辭所發之布告也。文中有云：『義師之興，誓以四事：一曰與全國國民戮力擁護共和國體，使帝制永不發生；二曰劃定中央、地方權限，圖各省民力之自由發展；三曰建設名實相副之立憲政治，以適應世界大勢；四曰以誠意鞏固邦交，增進國際團體上之資格。』」詳見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省制與憲法〉，頁223。

其地位等同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這些憲法淵源的共同特徵，皆是以革命者的犧牲，換得的成果。李氏曾言：「憲法者，國命之所由托。……有善良之憲法，始有強固之國家。」<sup>78</sup>但李大釗卻常站在調和立場，反對以暴制暴的革命。革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在此更突顯出革命，與憲法的確立兩者，對民主國家的意義和重要性。以下將依序從憲法實施的基礎條件、憲法的精神與內涵，以及憲法實施的目的等方面，探討李大釗對中國實行憲政的看法。

關於憲法實施所需要的基礎條件，可從政治上位者和立憲國民的素質進行觀察。李大釗注意到西方立憲精神，在於政治家要對人民開誠布公。誠如李氏所言：「專制政治尚秘密，立憲政治尚公開。秘密者，每出詭譎之權謀；公開者，必有鮮明之旗幟。」<sup>79</sup>李大釗認為，不僅要反對各國政府間的秘密外交，制憲同樣是與民眾息息相關的重要事務，政治家應有責任讓人民理解憲法制定的完整過程和內容。憲法不應被當權者視為一紙空文，以一人之力任意摧殘之。<sup>80</sup>

除了政治家要有誠信的品德，人民也應有能力接納憲政的思想和文化。李大釗認為立憲國家的國民，須具備有一定的素養：

立憲國民之修養維何？即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愛、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之人格，各人均以此惕慎自持，以克己之精神，養守法循禮之習慣，而成立憲國紳士之風度。<sup>81</sup>

李大釗認為，中國人民應結合傳統儒家美德和西方文化價值，養成守法觀念。此外，李又以「受教程度」和「社會地位」作為標準，區別人民群體並分別進行要求：

故一入立憲之國，即在下級國民，亦知互相敬愛，鬥毆爭嘲之聲，殊所罕聞。至於中流以上之社會，更重紳士之風度，其舉措之不出法律範圍以外，固無待論，即其事屬於德禮之境，亦且慎為循守，否則為社會之名譽律所不許，而人咸鄙棄之。國人以專制積習之未除，嫉媚褻激、剛愎專擅之風，仍復漫布於社會，雖素號恂恂之君子，亦時於紳士之風度有虧，斯非中外人度量相越之遠，殆吾人之修養有未充耳。<sup>82</sup>

<sup>7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祝九月五日〉，頁201。

<sup>7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政譚演說會之必要〉，頁179。

<sup>8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國慶紀念〉，頁204~205。

<sup>8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立憲國民之修養〉，頁316。

<sup>8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立憲國民之修養〉，頁314。

由於下級國民的教育程度低，所以要求僅止於人們要互相敬愛。中流以上社會者，則要有紳士風度。除了嚴守法律，還要重視規範較高的社會道德和名譽。但因改朝換代未久，專制思想仍普遍充斥於人心。<sup>83</sup>其風氣在凡事以感情為主，不以理性為主；凡事好依腕力之爭，不依法律之爭。在政治上常是以暴易暴，遂成亂局。由於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短時間內難以藉由教育轉變人民氣質。於是李大釗將眼光，投注在社會的領導階層。認為「欲有以救之，惟在上流階級，以身作則，而急急以立憲國民之修養相勸勉。」<sup>84</sup>當革命推翻了傳統社會的特權階級，要快速落實民主制度，就非倚賴社會上有權力且具社會影響力的上流人士不可。

在憲法實施的精神與內涵方面，李大釗首先強調思想、言論自由的保障。自由，是實行民主政治必須維護的崇高價值之一，但大多數的中國人，尚不知自由為何物，這是可以理解的。人民甫從帝王專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一時間仍無法習慣現代自由生活，他們過去崇敬的偶像不是皇帝，就是孔子，<sup>85</sup>當皇帝制度崩潰之後，孔子便成爲了保守人物的心靈依託。但對新知識分子而言，孔子信仰所帶有的權威和教條性質，形成中國邁入民主化的無形障礙，李便曾反對將孔子之道，納入憲法內容：

吾之《天壇草案》，亦頗能模其成規，獨於教授自由一項屏而不載，且於第十九條附加「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一語。是語也，不啻將教授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隱然為一部分之取消，是必有大奸慝懷挾專制之野心者，秘持其權衡。<sup>86</sup>

這一段文字中，李大釗批評《天壇憲草》明文規定，將孔子之道作爲國民教育的根本。爲的是警醒重開之憲法會議，勿要再犯。其理由是，在孔子偶像信仰仍未破除的社會，此條將容易被野心政治家利用，作爲剝奪人民思想自由的工具。除此之外，文中還可發現到，李氏將思想自由的保障分爲四個層面，包含教授、言論、出版、

<sup>83</sup> 關於民初實施共和立憲的人民素養問題，陳獨秀亦曾言及：「今之所謂共和、所謂立憲者，乃少數政黨之主張，多數國民不見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捨也。……立憲政治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多數國民之自動，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賢人政治，其卑屈陋劣，與奴隸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聖君賢相施行仁政，無以異也……。」詳見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載於《新青年》，第1卷，第6號，1916年2月15日。

<sup>8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立憲國民之修養〉，頁315~316。

<sup>85</sup> 當時吳虞（1872-1949）曾對孔子偶像有過激烈的批評：「詳考孔子之學說……莫不以孝為起點；所以教字從孝。……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君與父無異也。……孝之範圍，無所不包，家族制度之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夫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力亦散。」詳見吳虞，〈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載於《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

<sup>8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憲法與思想自由〉，頁228~229。

信仰的自由。而其中的教授自由，更應納入憲法。正好響應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學術自由理念。

一個國家思想自由的外在表現，主要在於言論能夠自由發表，不受政府限制。其中包括演講會、研究會或是出版品等等形式。因此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兩者在實踐層面上，實是一種充要條件的關係。李大釗的言論自由觀念多來於彌爾。其彰顯的價值主要在於：

蓋立憲政治之精神，即在使國民得應有盡有之機會，對於凡百國政，俾人人獲以應有盡有之意思，如量以彰布於社會。而社會之受之者，亦當以虛心察之，不當以成見拒之；當以尚異通之，不當以苟同塞之；當存非以明是，不當執是以強非；當以反復之討議求真理，不當以終極之判斷用感情。<sup>87</sup>

立憲國家的文化特色之一，是任何國民皆能自由提出自己的思想和意見，這是第一義。更為重要的是，不論在政治抑或社會的場合，每個國民都應在包容異見的前提，堅定自我想法，用理性態度和他人辯論，以求得真理。而非以感情衝動，釀成意見不同的群體衝突，此為第二義。這也是李大釗認為民初政治人物所欠缺的雅量。

其次，憲法內容的制定過程，應有充分討論。西方國家制定憲法，不論政府或是民間皆熱衷參與。如翻看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時期的書報，便能感受到實際盛況。李大釗有感於此，希望在中國民間能同樣掀起討論制憲風潮，於是在 1916 年 10 月和北洋法政學會同人，刊行《憲法公言》。該刊政治立場，主要是反對主張中央集權的進步黨人，態度與國民黨人一致。<sup>88</sup>其要旨在於「闡明憲政之精微，助長法律之思潮，以蕩滌專制之邪穢，而湧現一盡美盡善之民國憲法。」<sup>89</sup>

為了凝聚朝野共識，召開「有容」的立憲會議，刻不容緩。所謂「有容」，就是儘量容納社會各方的多數或少數意見。<sup>90</sup>李大釗和孫洪伊參與的憲法商榷會，其宗旨即是融洽意見，促成憲法，如此方能奏長治久安之效。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因召集各州代表參加費城制憲會議，容納各方意見，因而「巧避革命之禍，而暗收改造之功」。<sup>91</sup>經歷了民初慘痛的立憲經驗，李氏認為在

<sup>8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議會之言論〉，頁 298。

<sup>88</sup> 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98。

<sup>89</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143。

<sup>90</sup> 「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詳見章士釗，〈政本〉，載於《甲寅雜誌》，第 1 卷，第 1 號，1914 年 5 月 10 日。

<sup>9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制定憲法之注意〉，頁 206。



制憲上，美國將是很好的學習對象。

因此，李大釗認為制定有容憲法的目的，其一就是調和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雖然李氏在袁政府初期曾極力建議裁撤地方都督，削弱地方分權，主張中央集權政府。但由於袁氏專權，李大釗始知專制之禍，對於省制看法也有了很大的轉變：

近世文明之特質惟在解放，吾國以專制之餘，凡其自體具有權威者，罔不遭君主之束縛，斯不獨個人已也，即省亦何獨不然。中央之力勢所難達，而又不令其自伸其權，自展其力，則省之權既不在中央，又不在人民，且更不在各省，惟有銷沉湮滅於相防相制之天矣。積各省之力而為國之力，省力既不得其相當之分，以為迴翔之地，則上不足以強國，下不足以育民，而成麻木不仁之象，烏有發展向上之途？<sup>92</sup>

李大釗認為，在傳統專制的時代，地方和個人權利同樣會受到皇權束縛。但即便如此，傳統國家對於地方的控制力，仍有統治技術上的限制。到了民國時期，建立起現代國家，地方人民的解放，同時趨向地方分權的形勢已成。此刻就應順應國情，於憲法中，劃清中央與地方的權利義務。給予地方自主權，調和中央與地方的衝突。如學習美國的聯邦制，便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李氏又為澄清社會誤解，深入解釋所謂聯邦制並非是割土裂國，而是國家統一的一種形式。

其二，在化解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之後，憲法制定的目的，就是要進一步容納各方勢力。以避免體制外的力量，造成革命發生：

制憲者當知宏厚憲法之勢力，苟得其道，不必虞法外勢力之橫來摧毀，而蓄意防制也。制憲之事，有不可失之律二焉：一即調和，一即抵抗是也。夫調和與抵抗，其用相反，其質則同。憲法實質之備此二用者，惟在平衡。<sup>93</sup>

憲法雖是國家根本大法，但基本上仍是由國會所制定。凡國會議員的行為，又極易受其政治立場和利益影響。所以在制憲會議上，常會見到不同立場的議員與政團間，彼此針鋒相對。李大釗儘量站在理性、客觀的立場，認為憲法的制定，必須包容國內各方勢力。如在政治場合，便是政黨。在社會上，則是各方種族和宗教團體。簡言之，憲法制定的目的，原來雖是為脫離專制，以實行民主，便於保障人民權利。但更重要的，是要作為「國家統一」的大法，將各方勢力納入國家勢力。所以李大

<sup>9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省制與憲法〉，頁222。

<sup>9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制定憲法之注意〉，頁207。

釗認為，在制憲運作的過程中，應謹守一種「調和」立場。為避免傾倒於一方，還要有相互「抵抗」的過程。應注意的是，「調和」和「抵抗」兩者，並非完全是對立概念。而是彼此互相包涵，維持勢力間的平衡關係，以免導致制憲破局的結果。

## 二、新舊思想之間的衝突

民初制憲過程的顛簸情形，除了說明野心政治家之間的權力爭奪。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深層的社會和文化問題。李大釗憲政思想中強調的「有容」與「調和」的理想狀態，即是為了建立民主政權的厚實基礎，以及解決政黨勢力間惡鬥的現實情況。李氏也意識到，如此矛盾現象，不僅是在政治場合發生，在民間的社會生活中，也能察覺出來：

一言以蔽之，中國今日之社會，矛盾之社會也。今日之政治，矛盾之政治也。今日之法律，矛盾之法律也。今日之倫理，矛盾之倫理也。今日之經濟，矛盾之經濟也。乃至今日之文藝、美術、宗教、哲學，矛盾之文藝、美術、宗教、哲學也。國民之生活以是等為基礎。生活之基礎既陷於矛盾之域，故今日之生活現象，無往而非矛盾之生活現象也。<sup>94</sup>

當時李大釗既不在政府任職，也不似白堅武為軍人辟為僚屬。作為政論家，靠著微薄而不穩定的收入養妻育兒，其經濟生活接近於一般平民百姓。所以，李氏除了在政治上有敏銳的觀察，也能對大眾生活有深入體會。李大釗最後總結出中國社會現狀，從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倫理，到作為國民生活基礎的文哲藝術，實為「矛盾」二字可以形容。

如政治方面，在國會中有主張代議政治者，有鼓吹開明專制者。在優待皇室遺族方面，清帝溥儀仍居紫禁城。民國不但有政府的公家支出，還要提供皇室經費。而在民間社會方面，過新年時，新人有新禮節，舊人有舊禮節，其紛紜錯雜，令人無所適從。在教育學術上，青年學子除了要學習四書五經，還要學習現代西方學術，其中東方與西方學理的矛盾糾結，對學生而言，是心思神腦的負擔。<sup>95</sup>當然，例子不僅僅只此。李氏說明這些社會的矛盾現象，所表現的共通特色是新、舊的不調和，它對於中國社會將產生不良影響：

<sup>9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矛盾生活與二重負擔〉，頁237。

<sup>9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矛盾生活與二重負擔〉，頁236。

新者自新，舊者自舊，同時同地而不容並存者，乃竟各存其形式。即其實質，察其精神，終於新者不能成其新，舊者不能存其舊。凡夫新舊倫理、法制、藝術、哲、宗，將悉臻於破產之境。青黃不接，矛盾相尋，此一階段之國民生活史，最為危險。故曰：矛盾之生活，不調和之生活也。<sup>96</sup>

清末民初，中國接受到一波最早的民主化浪潮。李大釗認為這是世界文明的趨勢，中國日後也需要順應此趨勢，建立起民主體制。此處就涉及到外來文化與在地化的問題。前論李氏民彝思想的提出，即是將西方民主思想融入中國在地文化的一次嘗試。然而，那僅僅是理論和邏輯上的推演，實際的中國社會現況，仍是充滿著矛盾與衝突。外來的新思想、新文化，如不能融入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則新者自然不能成其新。舊有的中國傳統，如不能順應世界民主浪潮而一味抵抗，那將會被遠遠拋在文明國家之後無法前進，舊者亦不能守其舊。在中國進入西方文明在地化的過渡階段，如不能趕上世界民主國家的腳步，融合新舊文明成一新文明，那麼對於中國而言，將會產生普遍而嚴重的內部危機。為分析並解決如此的社會矛盾現象，李大釗深入發掘出新舊文明不調和的原因，主要在於：

一由於累代之專制政治戕賊民性甚，以成此不自然之狀態，並以助長好同惡異之根性，致保守之力過堅，但知拒而不知迎，但知避而不知引。……一由於東西文明接觸之初，未能調融一致，則其相摩相蕩、相攻相守之際，當然呈此矛盾之象，無足怪者。<sup>97</sup>

原因之一，在於人民多浸於傳統專制思想，短時間內未能解放出來。同時，中國引進西方民主的政黨制度。在未能掌握政黨政治運作精髓的情況下，中國人在過去歷史上結黨營私、好同惡異的根性，於此展露無遺。政治上的極端保守勢力，便形成中國推動民主化的嚴重障礙。原因之二，雖然民初政治黨派對立，為取得權力而落入惡性競爭的情況普遍。但這樣的不良現象，應來自於更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這是東西文明接觸初期，使中國社會價值觀產生矛盾與不協調的結果。

李大釗認為，與其將民初政治亂象怪罪於政治家的惡鬥，還不如針對東西文化衝突思考出解決方式。這裡將涉及到李氏對於東西文明的看法和評價。李大釗發現到東西文明有一相對絕異的特色，即是「動」與「靜」的差別。東方文明的特質主

<sup>9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矛盾生活與二重負擔〉，頁237。

<sup>9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矛盾生活與二重負擔〉，頁237。

靜，而西方文明的特質主動。因此，東方文明全為靜的生活，西方文明則全為動的生活。此間的區別，主要是因中西歷史文化發展的基礎不同所致：

以何因緣，東西文明之生活，各馳一端，適相反對？……其最要之點，則在東西民族之祖先，其生活之依據不同。東方之生計以農業為主，西方之生計以商業為主。惟其務農，固利於固定；惟其營商，故利於流通。<sup>98</sup>

東西文明的差異與發展問題，一直是研究世界歷史的大哉問。此處李大釗對於東西文明差異的解釋，在當今史家看來或許略嫌簡略，但取其精義而已。由於東西文明維持生計的依據不同，東方多靠農業，農業生活需要安定。西方則是商業發達，商業則須冒險活動。東西文明的分途發展，導致其在生活形態乃至社會價值觀方面，自經濟的下層建築到政治的上層建築的組織活動方式，有所分別，於是造成當時東西文明巨大的落差。

換言之，如果歷史是從單一直線發展的觀點來看，由於東方主靜，其歷史的發展保守且緩慢；西方主動，所以歷史發展充滿積極而前進的力量。這使得近代中國，不但軍事力量差距西方一大截，在歷史和文化階段的發展上也相對落後。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的歷史單線發展觀點，以及對於東西文明差異的理解，在日後將成為影響其進入馬克思主義思想領域的重要因素，在此先略為一提。而李氏為解決東西文明差距的問題，認為其作法應如下所示：

吾人認定於今日動的世界之中，非創造一種動的生活，不足以自存。吾人又認定於靜的文明之上，而欲創造一種動的生活，非依絕大之努力不足以有成。固甚希望吾沈毅有為堅忍不撓之青年，出而肩此巨任。<sup>99</sup>

從這段文字可以發現，民初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大部份已跳脫出清末的中體西用思想，傾向於全盤西化的文化態度。惟有全盤西化，學習西方「動」的精神文明，才能迎頭趕上東西之間的文明競賽。而在中國能肩此重任者，只有青年。所謂青年，並不以年齡作為絕對劃分標準，而是指能夠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一群人。須特別強調的是，在李氏看來，青年不完全等同於學生。學生群體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上，可劃分為一個階級。<sup>100</sup>而青年則是散布在各個社會階級之中。如前節所

<sup>9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頁96。

<sup>9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頁97。

<sup>10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學生問題〉頁86。



言，青年的任務，爲的是要化白首之中華爲青春之中華。本節更說明其方法，就是要將東方文明的本質，轉而改造成爲西方的文明內涵。

中國當此新舊思想之衝突，在政治上有保守與激進兩派的相互傾軋，在社會上是老人與青年群體的對立衝突。在實行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李大釗首先注意到國內政治的矛盾問題，希冀制定有容且衡平之憲法以求解決。其後，更深入探討社會新舊矛盾的普遍現象，並分析其深層原因，在於東西文明接觸之際，使得新舊文化不相容的現象。爲解決新舊文化的不相容，又需要靠社會上禁得起接受新思想挑戰的青年群眾，融會東西文明，引領中國走向新紀元。然而，要改變中國原有社會文化的本質，必須經歷長時間的教育工作和世代轉移才得以實現。相較於短期內可以即刻見效的政治問題，此刻李大釗，主要是將重心放在處理中央各黨派之間的矛盾。

### 三、調和的過程及其失敗

五四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不少歷史學家將討論重點，聚焦在新文化運動與學生的反帝愛國主義運動兩者的影響和重要性。因此，常會忽略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對於中國民主發展，以及政府與政治等相關課題，亦抱有相當興趣。如學習法政背景出身的李大釗，歷經反袁運動，並受到章士釗政治思想的影響，其政治立場逐漸由保守趨向中間的調和派。五四前期，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政治立場之一是意在調和，以李氏作爲代表。但也有人主張在舊思想文化上進行變革，對政治則抱持遠離態度，如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行之初，即明確說明「批評時政，非其旨也」。<sup>101</sup>到了五四後期，胡適一派主張整理國故運動而趨於保守。陳獨秀、李大釗一派，則主張政治和社會的「根本解決」而趨於激進。

此處出現的問題是，爲何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對於政治的立場和態度有如此大的差別。揆其原因，首先是，西方個人主義式的民主自由思想文化改革，其所具有的抽象及理想性，過於濃厚。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難以發揮作用。<sup>102</sup>其次，就是在政治上進行的調和過程，最後以失敗告終。這個結果，使得李大釗改變原有的調和立場，成爲李氏接受外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契機，轉而投入激進的社會革命運動。因此，政治的調和及其失敗過程，無疑對李大釗政治思想的發展和轉變相當重要。

<sup>101</sup> 陳獨秀，〈敬告青年〉，載於《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

<sup>102</sup>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34。

民初政治的矛盾，大致可分作政團衝突與新舊思想兩者。如前節軍閥政治背景曾述及，政團衝突方面，李大釗自袁死後，在國會政治黨派的勢力重組中，傾向於孫洪伊、張繼等人發起的憲法商榷會。孫洪伊原為舊進步黨人，張繼則為舊國民黨的穩健派。此二人的結合，象徵一種政治上的調和。他們反對段內閣及其中央集權政策，擔心重蹈帝制覆轍。所以主張國會採用兩院制，支持省制入憲、省長民選，以確立地方分權。此刻在國會上與商榷系相對立者，是梁啟超、湯化龍的憲法研究會。原來李大釗和孫洪伊、湯化龍三人有很好的交情，但由於政治立場相異，李、孫二人和湯之間漸行漸遠。研究系主張中央集權，廢兩院制為一院制，省制不規定於憲法。其黨員則抱著漸進主義態度，一貫擁護段內閣。此刻，孫文率領部分議員南下，在中國南方組織的廣州政府，則以護法和革命為職志，成為政治上的激進派。

除了政團間政治利益的衝突之外，新舊思想的矛盾，亦常出現於國會議員間的爭論。其中舊思想的代表是康、梁。清末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雖曾以革新者自居，但隨著外來新思潮和國內政情的劇烈變化，民初的康、梁已然化為政治的保守力量。其後，康有為隨著清帝國的結束而逐漸淡出政壇，但在關鍵時刻又偶會浮出檯面。而梁啟超則繼續在民初國會中發揮其影響力。在新思想代表的李大釗看來，康、梁在政治上仍秉持著專制傳統，主張實行開明專制、賢人政治，有著濃厚的人治思維。對李氏而言，這是「專制其質，共和其皮」的妄想，<sup>103</sup>不符合西方民主主義和法治國家的社會。

新舊人士在民初國會中亦互有主張。段內閣成立之初，康有為即發表〈致總統總理書〉，建請段將孔教立為國教，但引發新思想人士反彈，最終失敗。憲法會議重開後，憲法起草委員會以《天壇憲草》為基礎進行討論。其中未解決的爭議問題之一，即為該草案中第十九條第二項的「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在二讀會中，反對此條的議員認為，該條與第十一條的「中華民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有所矛盾。這是將孔教規定在憲法內，以壓迫他教的做法。相對的，亦有議員不僅贊同該條，甚至主張增加「中華民國以孔子之教為國教」一條。認為孔教是「天經地義，萬不可滅」，而且「不特無排斥外教之心，且有融化他教之力」。新舊思想在此相互折衝，各退一步的結果是，將第十九條第二項刪去，而第十一條則修正為「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sup>104</sup>

<sup>10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辟偽調和〉，頁164。

<sup>104</sup> 陳茹玄著，《民國憲法及政治史》，頁129~130。收錄於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906）》

雖然民初國會因政團對立和新舊思想的矛盾造成紛雜局面，甚至中國專制勢力有隨時伺機而起的跡象。但李大釗認為，政團間的對立狀態或是舊思想的存在，對於民主而言並無害處，而是實行民主政治過程的必要存在。屏除因個人利益造成的政治衝突，李氏強調在象徵民治的國會上，因新舊思想而對立的政團，應有某種程度的競爭。而解決對立所造成惡性競爭的方法，則要靠雙方的調和：

調和云者，即各人於其一群之中，因其執性所近，對於政治或學術，擇一得半之位，認定保守或進步為其確切不移之信念；同時復認定此等信念，宜為並存，匪可滅盡，正如車有兩輪，鳥有雙翼，而相牽相挽以馳馭世界於進化之軌道也。<sup>105</sup>

李大釗認為，要具備政治調和的條件，首先須有保守與激進兩造，各擇其所信真理，並確保其信念堅定不移。其次，保守一方著重在穩固原有秩序。而激進一方的價值，則在突破原有限制以追求進步。此兩股政治力量，對於國家社會而言皆有其重要性。在兩方進行政治角力之時，必須避免權力天秤傾向一方。過於保守則是畫地自限，難以追求進步；過於激進則有失序之憂，造成社會混亂。因此，政治新舊勢力兩造固然要「相抗」，但重點還是在於「競進」。為的是完成新舊思想的調和，以追隨世界潮流達到政治進化目的。李氏實際上就是參考西方民主政黨的兩黨制，考慮到中國政治中有新舊勢力的實際狀況，便運用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調和觀點，融會中西政治思想，以進入政治現代化的常軌。

接著要探討究竟何為李大釗所謂的「真理」。其堅定之政治信念又是從何得來。李氏認為，「真理」是「宇宙之本體，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sup>106</sup>而「真理」的求得，又要符合「基於科學，循其邏輯之境」。<sup>107</sup>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以為「真理」必須從個人及其所處的環境出發，始能求得。<sup>108</sup>換言之，一旦脫離了個人與環境，「真理」就變得抽象而不可得了。這使得李氏政治思想，能隨著政治局勢和環境變化而調整。

根據可見的事實，基於個人的知力及其所達到的理解程度以求得真理後，李大釗認為還必須要靠個人的自信力，來堅定對於真理的信念：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sup>10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辟偽調和〉，頁158。

<sup>10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真理〉，頁244。

<sup>10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真理〉，頁244。

<sup>10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真理（二）〉，頁245。

吾人各有其知力，即各有其知力所能達之境，達於其境而確將其所信以示之人，此即其所見之真理也。言真理者之所謂真理，雖未必果為真理，即含有真理而亦未必全為真理。而能依其自信以認識其所謂真理者，即或達於真理，真理亦將介其自信之力以就之。故言論家欲求見信於社會，必先求所以自信社會之人，能自信者眾，則此自信之眾，即足成其社會之中樞，而能軌範其群於進步向上之途矣。故真理者人生之究竟，而自信者，又人生達於真理之途徑也。<sup>109</sup>

在關於真理內涵的敘述中，可以發現李大釗的科學觀。科學的目的就是為求得真理。李氏即是用科學態度，希求政治運行的道理。但李大釗也明白，真理的性質是一種普遍存在，且超乎個人經驗。於是個人只能要求趨近於真理，而不能奢望完全達到真理的境界。既然真理內涵難以周延，而依個人知力所求得之真理也不盡相同，此時惟有加強連結個人與其所求真理之間的自信力，使其所信，昇華到信仰層次，進一步使他人也能夠相信。即使違背了真理，因自信力所帶來信仰的力量，亦能夠對整體國家社會產生正向影響。簡言之，真理除了要用科學證據來加以證明，還必須藉自信力來加強其信力和社會影響力。<sup>110</sup>

李大釗在現實生活中亦應用科學態度追求真理，並發揚調和精神達到信仰的境界。李氏在章士釗主辦《甲寅日刊》發表的文章即力主調和，<sup>111</sup>認為「宇宙間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滿之境遇，罔不由異樣殊態相調和、相配稱之間蕩漾而出者」。<sup>112</sup>調和在此提升到了美學高度。處於政治的調和立場，李在政團對立的過程中，極力主張中國加入協約國，參與一次大戰。但這並非說明李氏此刻脫離商榷系，而傾向段內閣和研究系，應說是李大釗要從外交長遠的角度，提升中國弱勢的國際地位。

在新舊思想矛盾方面，李氏雖然明確排斥舊思想人物將「孔教立為國教」，也反對《草案》中「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一條。但李大釗也說明其反對的理由，並

<sup>10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真理之權威〉，頁102。

<sup>110</sup> 李大釗此處的想法，有類於李澤厚所作的以下論斷。其認為中國在五四運動後，雖強調西方的科學價值，但這些外來的西方理論，如進化論或是唯物史觀等，在中國主要不是被當作實證科學來研究，而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是信仰。詳見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178。

<sup>111</sup> 當時李大釗和高一涵二人皆受章士釗邀約，從事《甲寅日刊》的撰稿和編輯，直到張勳復辟事件發生為止。章士釗在為張次溪《李大釗先生傳》所作的序言中，曾有如下回憶：「1917年，吾發行《甲寅日刊》於北京，約守常共事，守常在日刊所寫文章較吾為多，每日到館辦事亦較吾為勤。但此刊意在糾正當時政治偏向，與所持學理及所奉主義無涉。未幾，彼此都覺厭倦，因將日刊停止。」載於張次溪，《李大釗先生傳》（香港：神州圖書公司，1951年）。

<sup>11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調和之美〉，頁241。



非孔子本身，而是藉孔子偶像行專制之實。換句話說，就李氏看來，孔子思想亦有其真價，所以「取孔子之說以助益其自我之修養，俾孔子為我之孔子可也。奉其自我以貢獻於孔子偶像之前，使其自我為孔子之我不可也。」<sup>113</sup>因此在法律上，李大釗認為孔子思想，應與其他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思想居於同地位。

當皖段掌控北京政府時，李大釗在這段時間秉持著調和理想，希望藉其自信力，使社會能夠漸趨於調和之境。然而，卻事與願違。李氏在袁死後，對中國未來曾有有的樂觀情緒，隨著政局日下而逐漸消失。一方面，李大釗傾向中間派的商榷系，雖然在國會形成一大政社，但由於臨時倉促成軍，內部派別成分複雜，彼此並無緊密結合。日後，以張繼為代表的客廬系走向擁護段祺瑞。而孫洪伊的韜園系，及舊國民黨激進派的丙辰俱樂部，則繼續反段。結果是商榷系走向分裂。<sup>114</sup>此事件意謂著調和在政治上的破產，對李氏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

另一方面，1917年7月的張勳復辟事件，象徵舊思想的專制力量以及革命後第二度帝制的復甦。李大釗在復辟事件後，即南至上海孫洪伊住處避難。這不得不讓李大釗總結民國以來的歷史經驗，隨即在李劍農主辦的《太平洋》雜誌上，<sup>115</sup>先後發表〈辟偽調和〉和〈暴力與政治〉二文。說明導致政亂的禍首，原是在於政治的「偽調和」：

蓋調和者，兩存之事非自毀之事，兩存則新舊相與蛻嬗而群體進化，自毀則新舊相與腐化而群體衰亡。故自毀之調和，為偽調和。抑調和者，直接之事，非間接之事。直接則知存人即所以存我，彼此易與以誠；間接則以雙方為鷸蚌，局外反成漁父。故間接之調和亦為偽調和，二者均在吾人排斥之列。<sup>116</sup>

相較於調和觀點，李大釗所謂的「偽調和」，第一點，是指新舊思想兩方能夠「相抗」，而不能「競進」的情況。此為非導致其中一方毀滅不可的競爭。如舊思想一方勝利，將使中國無法脫離專制，進入民主。如新思想一方勝利，中國則走向激進，導致社會失序，人民將無所措其手足。第二點，是說明在調和的過程中，新舊思想雙方必

<sup>11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憲法與思想自由〉，頁228。

<sup>114</sup> 陳茹玄著，《民國憲法及政治史》，頁332~333。收錄於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906)》（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sup>115</sup> 《太平洋》雜誌於1917年初創刊，是中國的留英學生所創辦。其刊宗旨為：「在考證學理，斟酌國情，以求真是真非；於財政經濟各問題，尤多論列；不為何種政團張其黨勢，亦不自立門戶，別成一新政團之機關。」雜誌主編最初為李劍農擔任，其後為楊端六、周鯁生等人。詳見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234。

<sup>11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辟偽調和〉，頁155~156。

須有堅定之信念，進行直接的調和，否則即「偽調和」。李氏認為，即使有不新不舊的第三勢力出現，也必須要依其定性，選擇納入新舊的雙軌，以避免有心者為謀求自身政治利益，而周旋於新舊兩方之間獵取名望和地位。若如此則有背於調和意旨。

上述兩種偽調和的狀況，可謂民初政局動盪的原因。而李大釗更是直接點明，當時國會的偽調和派，即是保守的緩進派：

由是觀之，民國以還，政爭迭起之真因，窮本溯原，固在新舊思想之衝突，官僚與非官僚之暗鬥。而常短兵相接，首當其沖，相攻相搏之方面至廣，程度至烈，時期至久，嫌怨至深者，乃不在急進派與特殊勢力或官僚之間，而轉在急進派與緩進派之間。……而當二派交哄之日，即為緩進派依傍特殊勢力之日。政治上之巨變，往往即肇興於此時。<sup>117</sup>

此處提到的緩進派，在袁政府時期是進步黨。在其後的段內閣時期，則是指研究系。而特殊勢力則是指控制中央政府的軍閥。過去袁世凱在干涉憲法制定時，進步黨即與之同謀。當段祺瑞為了強迫國會通過參戰案，誘使督軍團叛變時，研究系亦參與其議，以致造成復辟的鬧劇。從這些事實來看，民初政亂的發生，並非是辛亥革命後，急進派與中央軍閥之間權力的矛盾關係。而是來自緩進派與急進派發生衝突時，緩進派會與中央軍閥聯合起來抵制急進派，導致新舊思想調和的失敗。原因之一，在於緩進派為了政治利益，無法堅持其真理力爭，於是對政治無法產生良好影響。原因之二，就是緩進派對急進派的態度，是意圖消滅而非競立。其結果就是，當急進派勢力已盡之時，緩進派的命運便盡皆掌握在中央軍閥之手。於是緩進派只能再引急進派，來抵制中央軍閥。如此循環不已，政治亂局因而久久無法平息。

張勳復辟無疑對李大釗的政治思想和立場有很大的影響。<sup>118</sup>如果前文〈辟偽調和〉代表著李氏放棄對緩進派的期望，<sup>119</sup>那麼後來發表的〈暴力與政治〉則象徵李大釗徹底地和緩進派劃清界線。並且在政治上，轉換為一種較為激進的態度。在後文中，李氏更直接對緩進派領袖梁啟超，作出嚴厲批評：

<sup>11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辟偽調和〉，頁163~164。

<sup>118</sup> 不僅是李大釗受到復辟事件影響，當時整個中國思潮都受到了衝擊。如周作人曾憶及：「復辟這齣把戲，前後不到兩個星期便收場了，但是它卻留下很大的影響，在以後的政治和文化的方面，都是關係極大。……因為以後蓬蓬勃勃起來的文化上諸種運動，幾乎無一不是受了復辟事件的刺激而發生、而興旺的。」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中）》（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頁427。

<sup>119</sup> 「愚曩與緩進派之一部人士過從頗稔，亦嘗時時為述若斯之感想。方愚去某報時，臨別贈言，尚托辭寓意以為諷勸。至於今日，事實所示，已全不敢作此奢望。」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辟偽調和〉，頁165。

愚雖非如梁先生之單純反對革命，而以良知所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暴力，其終極目的，亦在消免革命之禍。……故反對革命者當先反對暴力，當先排斥恃強為暴之政治。執果窮因，宜如是也。愚嘗怪梁先生既反對革命，而獨不反對暴力，有時且與暴力相依為命，……故凡依乎暴力以為革命之鎮壓者，無異惡沸而益薪，反對革命而適以長革命之果，依附暴力而適以受暴力之禍。即彼暴力之自身，亦將破毀於暴力之下而漸滅於不斷轉輪之中，無復自全之道矣。吾儕特患梁先生非能真反對革命耳！<sup>120</sup>

李大釗於此文分析「強力」對於政治的必要性，更將政治上的強力與「暴力」作出區別。所謂政治上的強力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政治力，另一種則是法律約束力。政治力表現於政壇人物之間的互動，而法律力則象徵國家主權的展現。如果發生政治力牽涉到法律力的情形，那麼在合法條件下，必屈就政治力來遵循法律力，以維護國家主權。如一旦發生政治力壓過法律力的狀況，就是李氏所謂不合法的強力，此即政治暴力。李大釗認為，雖然梁啟超和他同樣反對革命暴力，但梁卻屢次在政治上，依賴軍閥施展政治暴力。梁在同時，也就失去了政治信念。如此情況，與急進派革命所帶來的災禍比較起來，實尤有過之。換言之，對李大釗而言，在政治運作上，最嚴重的狀況並非革命派的激烈手段，而是偽調和派的作風。

從 1915 年到 1917 年，李大釗的民彝思想，經過不斷的政治經驗累積，而終於形成。根據前述分析，其內涵包括「民族論」、「民主論」以及「群眾論」三者。其層次井然，在思想上可說是相當有系統，也相當成熟。如此看來，李氏不僅僅是如他所說的是一位政論家，更貼近的說，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而思想本身，它同樣也必須面臨現實的考驗，並隨時作出更正以符合實際。當國家籠罩在新舊思想衝突，舊勢力隨時會反撲的歷史情境下，李大釗雖嘗試運用調和方法，建設符合他對於青春中華的想像，但終究面臨到了挫敗。於是，由於外部環境的衝擊，導致了李氏在民彝思想上必須要有所反應。而同時，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所提供的思想資源，恰好成爲了李大釗在思索如何進行思想內涵轉變的新材料。下章即接續說明，李氏從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過程。

<sup>12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暴力與政治〉，頁 178~180。





## 第四章 社會主義思想的醞釀到成熟

民國建立之初，李大釗的志業主要在於議會民主運動。李氏作為政論家，對西方民主思想內涵、政黨政治的運作以及制憲問題，都曾有過討論，其目的是為讓中國實現西方民主。然而，在中國學習民主的漫長道路上，卻著實遇到不少困難。先後經歷政黨惡鬥、洪憲帝制和張勳復辟，都讓李氏感到挫折。此當新文化運動期間，在政治失意之餘，李大釗亦開始追隨陳獨秀、胡適，將其注意力轉向更為基礎的思想文化革新運動。這段時期，李氏的文章風格與方向丕變；進入北京大學後，李更轉而成為新文化思想界的導師。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社會改造思想以及五四事件的影響，使得李大釗更加清楚，惟有透過社會革命才能改變中國。本章重點即聚焦於五四後期，李氏是如何從一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逐漸轉變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最後將信仰歸於馬克思的複雜過程。以下先交代李大釗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背景。

### 第一節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根源

李大釗等新知識分子，在五四扮演著重要的思想領導角色。儘管五四之初，李大釗與陳獨秀的政治態度並非一拍即合，日後李氏與胡適的救國思想和作法，更是漸行漸遠。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同於堅守傳統的保守派，這群知識青年共同享有一套來自西方的「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這不僅是他們彼此間溝通思想的媒介，還是理解自身所處國家社會境遇的知識來源。<sup>1</sup>尤其在西方文化相較於中國強勢的外在環境，中國知識青年就不得不使用西方觀念，來解讀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和挑戰。從這個觀點切入思考，便可理解中國現代史的發展，不是全盤接受外來因素影響，而是必須以中國人作為知識載體，運用西方觀念來主動詮釋過去、設計現在和想像未來。若此，對李大釗政治思想及其轉變過程，方能有正確認識。

<sup>1</sup> 王汎森在書中〈自序〉說明，人是詮釋性的動物。當一個新概念出現時，他們就會將它作為思考自己處境和命運的工具。而語言的特質就是，它不僅表達了社會現實，同時也建構了社會事實。詳見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頁181~182。

## 一、黎明初現的文化啟蒙

辛亥革命之後，雖然革命黨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政府，但傳統保守派仍在思想文化上堅守著陣地，他們開始不但與新思潮人物保持一定距離，且隨著袁時期的政治風向，時有反攻態勢。如當時康有為在北京成立孔教會的組織，鼓吹孔教主義；接著社會又提出恢復祭孔，崇奉孔教為國教，甚至在政治上興起恢復帝制的輿論。這都在在顯示民初時期的保守派，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動盪的年代中，為反對舊思想的復甦，促成陳獨秀於 1915 年在上海創辦起《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其刊行目的，在於「破舊立新」。他們反對封建傳統思想，鼓吹新思想和新文化，並以青年為讀者對象，那是因為「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sup>2</sup>隔年，李大釗同樣也在其展現民族盛衰的歷史循環論觀點的〈青春〉一文中，將脫離白首，以創造青春中華之責任，托付給了青年。需特別注意的是，陳、李二人雖對青年抱有高度而近似的期許，然而早期他們對於青年實際的政治和社會作用，其看法仍相當保守。在新文化運動之初，陳獨秀、胡適等《新青年》同人即有默契的，將《新青年》定位成一純粹論理性的刊物，聲言 20 年不談政治，而此刻正專注於民主議會政治改革的李大釗，亦表現出對於學生運動的保守態度：

獨吾國今日之學生問題，乃為社會最近所自造之階級身分，而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階級、一得此身分之後，乃以此階級身分之故，社會反與為冰炭之質，柄鑿之勢，所學無論其為何科，社會皆不能消納以應用之。一般耆舊老宿，一聞「學生」二字，即搖首蹙額，似一為學生，即於中國社會為無用。而學生者，又不能不謀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勞。於是無問其所學為工、為農、為商、為理、為文、為法政，乃如萬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求人討無聊之生活。<sup>3</sup>

此處不但說明李大釗對社會上「學生階級」的看法，還從側面表現出當時中國由舊社會過渡到新社會時，尚未能適應的情形。自從清末廢科舉、辦西學，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逐漸轉變為現代的新知識分子。民國以來，當他們脫離舊的教育體制，進入

<sup>2</sup> 陳獨秀，〈社告〉，載於《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1 號，1915 年 9 月 15 日。

<sup>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學生問題〉，頁 86。

到一個未臻成熟的新型社會，學科知識與工作應用之間，必然產生青黃不接的困境。由於學生未能適應新的社會生活，日久便會受到社會排斥，甚至因為城市習氣影響，大都會引導他們走向政治道路，如其對於政治無遠大理想，或自甘墮落成爲沽名釣譽之徒。李氏認爲，這種因社會特意排斥的群體，便會成爲「階級」；而「學生階級」的形成，更是當時普遍的社會問題。

「學生階級」所引發的問題，不僅造成社會人力資源的浪費，就李大釗看來，如未能將這些人才適當地送往社會各角落發揮正向作用，還可能引發中國的社會革命。中國自漢代以來，即有書生論政的政治傳統，同時又受到「近代思潮之激動」，而學生的特質正是其「神腦最易染化」。<sup>4</sup>所以當社會排斥學生，引發其不平感受而長久鬱積於心，如此也就不難想像他們會如何進行反政府的活動。未來發生以全國爲範圍的學生串聯和社會運動，這一點著實爲李氏所預料。因應「學生階級」造成的社會問題，李大釗的解決方案，是提出宣洩青年才子精神和氣力的方法。他提議青年應「組織遠征之隊伍，出萬里長城，開闢新利源，並藉以開發。」同時要敦親睦鄰，使「吾蒙、回、藏諸同胞，與之相親近相融洽，消除從來之誤解，杜絕外人之離間。」<sup>5</sup>

李大釗寄望議會制度和政黨政治的改革，來改變民初政治的亂局。雖然李氏在新文化運動之初，強調新思想與新文化的引進和吸收。並希冀透過長期教育，逐步改變中國的傳統性質，以「青春哲學」爲基礎創造青春中華；但此刻李大釗關於整體社會的構想，仍具有濃厚的「和諧論」色彩，李氏對政治上的保守與激進，社會生活上新與舊之間的矛盾，仍持以「調和」觀點，李自然不樂見學生的政治革命運動出現。有趣的是，李氏發表有關學生階級問題文章的同時，正是 1917 年俄國二月革命發生後不久。當時李大釗對於二月革命，和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有著相當濃厚的興趣。然而，那僅僅是對於歐洲社會運動初步的研究和了解，尚未能改變李氏政治思想結構的內涵，也未能改變李大釗對學生社會作用的消極態度。如前章所述，李大釗是在同年 7 月張勳復辟事件之後，感到調和方向的失敗，才逐漸走向激進的社會革命道路。但不可忽略的是，新文化運動對於李氏政治思想的變遷，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sup>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學生問題〉，頁 87。

<sup>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學生問題（二）〉，頁 88。

## 二、人道關懷與科學態度

李大釗雖著意於政治，但他卻和許多知識青年同樣受到五四初期的文學革命影響。文學革命開始起於陳獨秀和胡適之間的書信往來，當時胡適仍在留美期間，胡在給陳的信件中，提到新文學的「八不主義」，大致規劃出現代中國文學體裁的寫作標準。<sup>6</sup>1917年1月，胡適接受陳獨秀的鼓勵，將其主張撰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並刊於《新青年》。胡適的文學改良主要受到美國文學界影響，其改良依據是文學的進化理論。胡適認為，每個時代都應有自己的文學。<sup>7</sup>其主張的現代文學，就是以白話文寫作的新文學。

從胡適的文學改良態度出發，更進一步地，陳獨秀認為應該在白話文體裁的基礎上，對傳統文學承載的意旨和內涵加以改造，如同掀起一場革命。2月，陳獨秀接續發表〈文學革命論〉，強調現代文學要符應當代國家社會，須具備國民性、社會性和寫實主義的特質。<sup>8</sup>易言之，文學寫作的目的，是要突破舊時代所有的階級隔閡，文學作品不應像過去一樣束之高閣，或藏諸名山；而應貼近當代國民的文化和精神特質，方能反映現實，引起民眾關懷社會，以發揮新文學的當代作用。

1918年1月，《新青年》自四卷一號改以白話出版。此時當段祺瑞「再造共和」之時，李大釗經章士釗推薦到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隨著文學革命的進展，李氏從該年起亦多以白話文寫作，同時李大釗也注意到俄國的寫實文學，早年李氏即曾盛讚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其「身為貴族，而甘於菲食敝衣，與農民為伍」的美德。<sup>9</sup>如今李大釗研究俄國文學和青年文學家的特質，了解到該特質之所以與社會現實接近，是因為俄國專制政治壓迫社會下層的結果。俄國人民被剝奪了政治和言論自由，所以自覺之俄國青年才會「相率趨於文學以代政治之事業」，而「以政治之競

<sup>6</sup> 「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倣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載於《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

<sup>7</sup> 胡適曾提及：「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絕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載於《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

<sup>8</sup> 「余干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載於《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

<sup>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介紹哲人托爾斯泰〉，頁174。



爭寓於文學的潮流激盪」。<sup>10</sup>李氏對俄國文學和社會的關懷，無疑是中國現實環境中的倒影，反映五四青年的救國心理，而文學革命實有以促成之。李大釗秉其質性，尤其明顯表現出對社會弱勢關懷的人道主義，此種訴諸於感性的人道主義，和新文化運動中所重視的理性科學態度，兩者既相成又矛盾，但卻同時成為李大釗政治思想轉變過程的重要特徵。<sup>11</sup>

文學革命不但造就中國從傳統文學到新文學的轉向，提供現代文人抒發情感和社會不平的工具，它對於現代科學的發展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僅從中國文學史的脈絡探討文學革命意涵，是明顯不足的。畢竟以新文學作為思想的載體來看，它改變了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方式。<sup>12</sup>對此，必須了解以北京大學和《新青年》同人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他們開始運用報刊和組織力量，宣傳白話的寫作方式，以全國為範圍，各地眾多的知識分子，慢慢地接受和採用新文體與他方知識階級進行交流。他們不再用「文以載道」的文言文，改以白話文宣揚民主和科學觀念。具有科學式分析的文字，也因為白話文簡潔明瞭的特性，且得力自日本轉譯過來西方專有名詞的引進，<sup>13</sup>而開始在中國知識界出現。

文學革命中的李大釗，顯然沒有魯迅般特殊的文學造詣。除了一些古典詩詞作品外，如果李氏也有所謂的白話文學創作如〈雪地冰天兩少年〉一文，其中也僅僅是以一半虛構性的故事，來宣洩其民族情懷。<sup>14</sup>其後李大釗，也並未朝向寫實主義的新文學之路發展。但李氏以科學態度進行分析的文字，卻是相當豐富。李大釗在中國面臨的許多問題上，積極展現科學精神，如探討中國社會的「自殺」課題。它同時也充分展現李氏內心深層的人道關懷。

李大釗曾有一段時期相當關心國內青年的自殺問題。自 1913 年至 1922 年間，亦斷斷續續針對該議題做過一些研究和檢討。如最早在 1913 年 9 月發表的〈原殺〉，

<sup>1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文學與革命〉，頁 233。

<sup>11</sup> 張灝認為五四思想不但複雜且具兩歧性。思想特色的其中一個面向，就是「理性」與「浪漫」兼具。李大釗亦有相同的思想特質。他們在以理性態度探討國家社會問題時，又帶有熾熱的情感，因而轉成一種對理性的宗教信念。詳見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106~113。

<sup>12</sup> 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頁 409。

<sup>13</sup> 根據統計，1896 到 1911 年間，日本共有 956 本書被譯為漢文，1912 到 1937 年間則達 1759 種。相較之下，1896 到 1911 年間，日本從漢文譯的書僅有 16 本。由此可知，由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效以及日文多漢字的特性，中國早年吸收西方知識的管道，實多來自於日本。詳見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載於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 年），頁 186。

<sup>14</sup> 詳見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雪地冰天兩少年〉，頁 230。

1915年8月的〈厭世心與自覺心〉，1919年先後有〈北京的「華嚴」<sup>15</sup>〉、〈新自殺季節〉、〈一個自殺的青年〉、〈青年厭世自殺問題〉，以及1922年1月的〈論自殺〉等。從李氏一連串論及自殺問題的文章來看，可以細察李大釗在文學革命前後，其科學態度上的表現及轉變過程。

在文學革命前，李大釗於〈原殺〉一文中，首先表示了對人性的基本觀點：

夫好生惡死，物之性也。愛平和，疾殘暴，又人之情也，今之人胡以反是。生也弗樂，死也弗悲，背平和而蹈殘暴，是物失其性，人失其情，天地失其常。<sup>16</sup>

李大釗所言的人性，是珍惜生命的，是害怕死亡的，是重視和平的，是厭惡殘暴的，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何以當時的中國社會，卻仍舊充斥著暗殺或自殺的情形呢？爲了弭殺，李氏接著便分別探討民初盛行暗殺、自殺的因素。其中關於自殺事件的原因，分析如下：

宇宙萬象，影響於人類精神上之變化者至極複雜，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即如蔣君自殺一端，就蔣個人觀之，則出於一時憤激。……若就社會見象觀之，則蔣君自殺之見象，實為無量之他種社會見象促動之結果。今人輕身好殺，相習成風，模仿或其一因。……復次社會不平，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復次，政俗不良，人心懷厭倦之思。……復次絕望亦為自殺之最大因緣。<sup>17</sup>

上面這一段文字，說明了李大釗爲追尋一社會問題的起因而進行研究，其目的是爲了解決該社會問題。科學態度之發生，往往就在於此。它最初起源自人類對外界問題的好奇心，其後用特定方法，主動積極地去探索其原由，最後找到對該問題的合理解釋。但此時李氏雖已有某種科學態度的萌生，但其進行研究的方法，卻仍算不上是「科學」。李大釗此處對中國青年自殺原因的研究，僅就蔣方震自殺未遂一事爲例，<sup>18</sup>並延伸其對於自殺事件的個人觀點。首先，李氏排除自殺者個人行爲的主觀因

<sup>15</sup> 此處的「華嚴」非指佛教之宗派，而是「華嚴之瀧」，為日本著名之瀑布。其位於本州樞木縣日光市日光山，是著名的宗教聖地和觀光景點。1903年京都帝國大學學生藤村操，因困惑於人生問題，先於此間一棵樹上題寫「岩頭之感」，後又投入瀑布自殺。從此，便常有日本青年來此自殺。此處借指為北京常有人自殺的淨業湖。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厭世心與自覺心〉，頁417，註39。

<sup>1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原殺〉，頁44。

<sup>1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原殺（暗殺與自殺）〉，頁46-47。

<sup>18</sup> 蔣方震（1882-1938），字百里，浙江海寧人。1901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並曾於東京主編《浙江

素。其次，他在複雜的社會和心理諸現象當中，運用個人的直觀經驗，推斷出自殺的社會成因，是自殺者對於周遭環境的模仿、激昂、厭倦和絕望。但是其中對於研究對象，並無採用取樣、比較和分析的過程。如此探討社會問題的研究方法，與西方當時所謂「科學」的本質，實有很大的距離。

還必須注意到的一點是，李大釗其後在〈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亦表現出對於青年自殺一事的價值判斷：

今吾少年，亦欲以湘水之波，擬彼華嚴之瀧，人其又謂我何也。且時日害喪，國恥難忘，充吾人之薪膽精神，遲早當求一雪，即懷必死之志，亦當忍死須臾，以待橫刀躍馬，效命疆場，則男兒之死，為不虛死。不此之圖，一朝之忿，遽效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是人而不戰而已屈我於無形，曹社之鬼，嘻笑於其側矣，是皆於自覺之義有未明也。<sup>19</sup>

所謂的科學研究，強調的是因果關係的連結。它必須排除主觀價值評斷。但李大釗對於該問題之研究，實抱有一種極為深刻的人道關懷，他認為青年自殺是逃避的，是悲觀的，更是不愛國的行爲。雖然不能否認科學研究的推動，基本上都有來自於主觀價值動機的因素。然而在研究過程當中，應盡量避免它對於研究結果的影響，方能呈現較為客觀的研究成果。西方的科學研究精神，不外乎此。然而在文學革命前，中國知識分子常使用具有濃厚的道德規範意味，以及常用典故的文言文寫作，該文體的思考表達不具簡潔、明確的特點，實不利於其接受西方科學式分析的思考模式。

上述現象，約莫在文學革命之後的 1918 年開始轉變。5 月，李大釗在〈新的！舊的！〉一文中，透露出他對於西方科學觀點，有了更新的認識：

欲研究一國家或一都會中某一時期人民的生活，任取其生活現象中的一粒微塵而分析之，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質。<sup>20</sup>

潮》刊物。1906 年至 1910 年間，曾赴德學習軍事。辛亥革命後，擔任浙江都督府總參議。1912 年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1913 年因學校經費受制於陸軍部的問題，曾用槍於師生面前自殺，未遂。著有《蔣百里全集》。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原殺〉，頁 353，註 7。

<sup>1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厭世心與自覺心〉，頁 140。引文中出現的「曹社之鬼」，為李大釗在文言文援典故之例。《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官，而謀亡曹。」後用「曹社」或「曹社之鬼」代指國家將亡。可參考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644。

<sup>2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新的！舊的！〉，頁 196。

雖然該篇文章主題，並非專門探討西方科學觀。但從李大釗無意寫出的這一段文字，便能發現李氏開始接納、吸收到較為接近西方科學的方法。此刻他已有近於社會科學統計中，由樣本推論到母體性質的觀念。李大釗運用此科學觀點，重新研究社會的自殺問題，便別有一番新的景像。首先李氏在〈新自殺季節〉一文對青年自殺的問題，表現出與過去不同的態度：

有人說自殺是壯烈的行為，他們又有什麼壯烈？有人說自殺是罪惡的行為，他們又有什麼罪惡？以我看來，社會上發生了自殺的現象，總是社會制度有些缺陷。我們對於這自殺的事實，只應從社會制度上尋找他的原因，研究怎麼可以補那缺陷。什麼壯烈啦，罪惡啦，我們都不能拿來獎勵或誹謗人家處決自己生命的舉動。我們應該承認一個人為免自己或他人的迷惑麻煩，有處決自己生命的自由。

從這段文字可以知道，李大釗開始盡力擺脫過去對於自殺問題，那近乎宗教和道德的觀點。此刻他認為個人的自殺意圖，會因人及其所處環境而異。所以對每個自殺事件都給予單一的價值判斷，似乎並不公允。而且，還要在不危及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尊重自殺者的意志。取而代之的是，李氏以接近西方科學的態度，認為造成社會自殺事件的共通原因，應來自一個可以被觀察到的社會整體制度，而非捕風捉影又抽象的心理因素。這個觀念預設了社會是個有機整體，社會的運作有其自主力量，個人行為對其幾無影響。於是李大釗認為解決社會自殺問題的方法，就是找出社會整體制度的缺陷，而無關乎個人的道德因素。

其次，李大釗科學觀轉變的原因，還受到西方社會科學著作影響。1919年11月，因青年林德揚自殺一案，李氏繼續發表〈青年厭世自殺問題〉以及〈論自殺〉等文章，以表示對當時舊社會制度的不滿。其中內容還引用到一位西方學者，恩里科·莫爾塞利（Enrico Morselli）所著的《自殺論》。<sup>21</sup>接下來探討自殺問題，李大釗不僅提出十九世紀是一個物質文明，由進步到腐化的自殺時代。<sup>22</sup>並以世界為範圍，從自然環境、人種、生理與年齡、婚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面向，說明自殺

<sup>21</sup> 為義大利社會學家，曾任都靈大學、費拉拉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對於促進精神病治療設施的改革有很大的貢獻。在精神病學及具心理學特點的社會病理學等方面，有深入研究，並有《自殺論》等論著。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青年厭世自殺問題〉，《李大釗全集》，頁368，註7。

<sup>22</sup> 「這自殺時代」誘引人逼迫人上自殺的途徑去，也和「自殺季節」的誘引和逼迫一樣。因為十九世紀末年的世界，已經充滿了頹廢的氣氛，物質文明漸漸走入死境，所以牽著人也到死路上去。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青年厭世自殺問題〉，頁121。



成因。更重要的是，他還列舉出各國自殺人數的統計數據，以資佐證。<sup>23</sup>由此可見，雖然提倡新文學的李氏，在文學革命之後並沒有成為白話文學作家；然而，李氏仍因此對於西方的科學觀有了進一步的學習、理解，並透過白話文展現出一種不同於過去的科學式分析語言。這一點，與傳統文學到現代文學內涵轉變，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對李大釗而言，愈接近西方科學觀念，日後將愈有助於其建立起認識西方科學理論的心理基礎。此外，在〈論自殺〉一文中對世界自殺共通原因的探討，實際上即反映李氏和當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舊社會制度包括婚姻、經濟組織、社會風俗和教育制度等等的不滿。再加上新文化運動期間，中西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省，更促使李大釗要尋找出一條不同於西方歷史的道路，以求解決中國社會制度的整體性問題。

### 三、對於大戰起因的省思

歷史人物對其所處時代重要歷史事件意義的判讀，是研究該人物思想的重要材料。前文探討李氏對社會青年自殺的看法，其中關於社會整體制度的檢討，不僅道出自張勳復辟後，李大釗對政治的消極態度，也說明其對傳統社會價值的不滿。這和當時社會反封建的聲浪相符。然而李氏的反封建，和陳獨秀的全盤西化論又有所不同。李大釗的態度是以調和觀點，將中西文明各自的優點進行辯證式的統一，形成一種適應現代生活的新文明。

李大釗認為，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動的，東方文明的本質是靜的，其相異是因其歷史發展依據的風土不同。<sup>24</sup>隨著時間的前進，世界歷史的合流，經過近代中西文明長期接觸，不可否認當時西方文明較東方要來的強勢。由於目下正處於動的世界，所以李氏主張要積極學習西方文明的優異之處。他期盼中國能在靜的文明基礎上，創造一種動的生活，<sup>25</sup>並由青年學生來擔此重任。換言之，李大釗並非無條件地接受西方文明，他還要在原有文明的根本上來接納它。延續著對東西文明的評價問題，關於引發近代國際戰爭的普遍原因，以及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定位和檢討，便成為中西文化思想價值的爭議焦點。

<sup>2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論自殺〉，頁19~36。

<sup>2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頁96。

<sup>2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頁97。

抱持對國際事務的關心，李大釗相當關注自 1914 年 7 月引發的一次大戰及其戰局變化。但依據現有材料，幾乎難以發現李氏在大戰初期對歐戰的敘述和評價。<sup>26</sup>反觀李氏在戰初的文章內容，主要仍多集中於國內的反袁運動，及袁後制定新憲的討論。由於自歐戰開始，正值中國政治未穩之時，所以李大釗在關心國內之餘，亦無暇表示對歐戰的意見。李氏在言論中提到歐戰問題，還要等到 1917 年之後。大戰後期，在英、美的邀集下，中國也面臨到是否參與大戰的問題。若從民族主義的立場來看，李大釗贊成中國參戰，並藉此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同時，李氏也開始注意到人類引發戰爭的起因，和一次大戰在人類史上的意義。

首先，李大釗探討近代世界以來，人類頻頻引發戰爭的普遍原因：

余曩居日本，時聞彼邦政界山斗，奮勗其國人者，輒提二義以相警惕。彼謂地球之面積有限，人口之增庶無窮，吾人欲圖生存，非依武力以為對外之發展不可。蓋優勝劣敗，弱肉強食，天演之義，萬無可逃者也。此其所據，全根於馬查士之人口論與達爾文之天演論。<sup>27</sup>

文中指出，近代國際戰爭發生的普遍原因，在於馬爾薩斯（T. R. Malthus）的人口論，以及達爾文（C. R. Darwin）的天演論。人口論主要在說明，世界人口的成長是呈幾何級數增加，而糧食的生產量則是以算數級數增加。所以隨著時間演進，未來糧食生產將不敷人類食用。馬氏的悲觀心理，預言了糧食供應不足的饑饉世界。如何控制世界人口成長速度，成為當時的重要課題。而達爾文的天演論，則在赫胥黎（T. H. Huxley）的引申下，將自然界物競天擇的規律運用到人類社會。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一段擇優汰敗的過程。這兩個理論相輔相成，形成了近代西方列強向外拓殖的理論基礎。

戰爭所以發生，其普遍原因除了來自人類族群之間為求生存而相互競爭，同時也是作為解決世界人口過庶的手段。日本原是一狹小島國，因而極受該西方理論影響。亞洲擴張主義一時成為日本對外關係的重要方針。1915 年 5 月，袁政府宣布接受日本二十一條中 1 到 4 號的要求。1918 年 5 月，段內閣與日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將中國軍隊隸屬化，普遍引起國內輿論不滿。加上一次大戰結束後，在

<sup>26</sup> 早期中國學者將 1915 年 8 月 1 日在《風俗》雜誌第 1 期刊出，屬名「冥冥」的〈歐洲戰事談〉一文，視為李大釗的著作。可以說是李氏最早討論歐戰的文章。見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141。但根據朱成甲的研究，則否認之。本文亦採後者觀點。詳見朱成甲，〈《李大釗文集》中幾篇文章的考辨〉，《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1 期，1998 年，頁 267~269。

<sup>2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戰爭與人口問題〉，頁 23。

巴黎和會上攸關中日山東權益問題的爭論，似乎都在在顯示日本當時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是以人口論和天演論為基礎的國際侵略主義。

對此，李大釗表示反對。他看出「大亞細亞主義」主要是由日本少數的軍國主義者所提倡，所以李氏希望未來能以「解放民族」為中心的「新亞細亞主義」取而代之。<sup>28</sup>李大釗強烈反駁前述引發戰爭的普遍原因，尤其是對馬氏人口論的批判。李大釗在〈戰爭與人口（上）〉一文中，不但列舉西方學者對人口論的批評，提出西方重要國家人口增減的資料，並得到「今日之勢，不必慮人口之過庶，且將憂其過減」的結論。<sup>29</sup>此外李氏又從道德觀點，認為戰爭的普遍原因應來自人類根性中的貪與惰。<sup>30</sup>換言之，基於對西方理論的批判以及對人類共通惡性的理解，改變了李氏對引發戰爭原因的解讀：

人口繁殖，著見增加，益興辟疆拓土之思，其時著先鞭者，首推英倫。……各國既悚於人口過庶之說，迫於生存競爭之烈，復羨夫英人擴張版圖之成功，尤而效之，爭地構兵，世界乃從茲多事矣。……當是時也，官僚政治之勢焰，黃金萬能之迷信，亦從軍國主義之幟，蔓延於世界，深固而不可拔。縱有代議制度、社會政策之反響，稍事抑裁，卒不免釀成今日全歐之大亂。<sup>31</sup>

從歷史發展來看，近代帝國主義的始祖是英國。各國又恐於人口論造成的影響，紛紛學習英國向外擴張，從此國際間戰爭日繁。但李大釗認為，西方國家因人口過庶而引起戰爭，那不過是宣戰的藉口，其真正原因應在於人的貪惰。而貪惰的主體，無非就是各國政府擁有權勢的官僚。在李氏眼中，這群官僚團體雖將民族大義訴諸於戰爭，然其實質仍是為謀取私人利益。觀諸事實，其證不鮮。當時國際間密約盛行，如段內閣時期與日本簽定密約，是為鞏固皖系軍閥勢力。英日同盟的形成，是因英國想保障在亞洲的殖民利益；而日本則是想取得英對其占領中國東北利益的承認。這些在國際間縱橫的利益關係，和各國內部的官僚階層皆有密切聯繫。從此，官僚政治包覆著軍國主義外衣，即使是假各國民主議會或社會力量來反抗之，仍無法避免各國因爭奪利益所造成的亂象。最終在維護國家利益的正當性口號下而引發的戰爭中，其犧牲者無疑大多是各國因戰爭導致物資缺乏而流離失所的人民。

<sup>2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頁270。

<sup>2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戰爭與人口（上）〉，頁56。

<sup>3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戰爭與人口問題〉，頁25。

<sup>3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戰爭與人口（上）〉，頁44。

其次，是李大釗對於「一次大戰」的評價問題。在確認戰爭普遍的起因後，李氏將引發一次大戰的禍首，直指各國的官僚政治。一戰實際上就是由各國官僚主義，擴大成爲各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這無疑顛覆李大釗對西方民主議會的理想。由於民初貪敗的軍閥和官僚與其他軍國主義的利益勾結，使得李氏必須重新思考民主的本質和實踐方法。由此，李大釗觀察問題，已傾向將官僚與人民兩者對立起來：

吾人於此而得二種教訓焉，一民主主義與愛國心不惟不相反，而且相成也。世恆有疑民主主義推行之既極，其國民之愛國心，必以日見消滅者，而証之今日之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一官僚政治之國，無論外患若何危迫，其民終以內政改革為務，甚至乘機革命亦所不恤也。<sup>32</sup>

此處李氏除了說明民主主義與愛國心兩者相生相成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以人民爲主體的民主主義，其愛國心不僅表現於對外的民族主義，還表現在對國內的政治改革。甚至在外敵環伺的情況下，對於不合民主精神的官僚政府，即便由人民發動革命將其推翻，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見，李大釗於大戰中除了注意到國家之間民族利益的矛盾，更強調參戰各國國家內部階級之間經濟生活的矛盾。

到了一次大戰後期的 1917 年，可以發現李大釗的民主觀念有了明顯的變化。其變化是，李氏原持有的民彝思想中以制度爲方法的政治民主觀，巧妙地結合了以群眾爲主的集體主義，開始走向以人民爲中心的社會民主道路。其展現在李大釗對歐洲各國社會黨的思想與活動的關注：

凡持社會主義者莫不反對戰爭。蓋有戰爭，則資本家因軍需品之供給、軍事公債之應募而獲豐厚之利益，其下級勞動社會，則為國家驅入淒慘之戰場，以生命血肉為犧牲，結果乃以益富者之勢力，而長其橫暴。故在開戰之當初，各國之社會黨，皆竭力為戰爭之妨止，迨其無效，則向之本其主義、黨綱絕對反對戰爭者，而亦贊成戰爭，甚且置身行伍之間矣。……論者或惜其失敗，或咎其矛盾，實則彼等所以出此者，殆以交戰國之雙方，均有一為社會黨所反對之目標，即 Caesarism（專制主義）與 Czarism（沙皇主義）是也。<sup>33</sup>

由上面引述的文字，可見李大釗的反戰態度和歐洲社會黨的社會主義精神，有若干符節之處。李氏所厭惡的官僚和資本家，可以算是來自同一社會群體。他們在社會

<sup>3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大戰中之民主主義（Democracy）〉，頁 98。

<sup>3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歐洲各國社會黨之平和運動（上）〉，頁 123。



上占有政經優勢。相對地，多數位於社會下層的勞動階級，則大都受到官僚和資本家驅使，陷入一場不名譽的戰爭而成爲最大的受害者。即便如此，歐洲各國的社會黨最終還是選擇參戰了。但他們參戰的理由，並非是受到民族主義號召，而是要舉起民主與自由的大旗，以對抗德國的專制主義和俄國的沙皇主義。

隨著戰局發展，1917年俄國發生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專制政體。而德國近來政治也開始放棄專制獨裁，並給予議會更大的權力。加上戰事持久導致各地饑饉頻傳，平民對於安定生活的訴求等等因素，使得歐洲社會黨當初參戰的積極因素已然消失，轉而要追求終戰與和平。他們開始推動「平和運動」，運用社會動員的力量對政府示威，並促進社會黨跨國界的大聯合。這讓李大釗相當嚮往和期待日後社會黨的動向，「赤旗」又是否真能帶來戰後和平。雖然大戰何時結束，以何種方式結束，在當時仍沒有正確答案。但可知李氏對於大戰的態度，是傾向於社會主義的一方。李大釗認爲一戰是少數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戰爭，而非全民咸認同的民族戰爭；戰爭應責任應歸於操弄民意的官僚和資本家，而非戰敗國；戰爭是爲抵抗專制主義，而非爲國家利益；戰爭是爲平民而戰，而非爲資產階級；戰爭的目的，不應爲一國的勝利，而是國民追求的「自由」、「和平」與「麵包」。<sup>34</sup>

綜上所述，自1915年到1917年間，新文化運動的曙光初現，李大釗經歷了一段由保守到激進的思想過渡。新思想的引進、白話文的提倡，帶給李氏運用西方科學思考的材料和工具；在文化啓蒙期間累積的知識、經驗，便成爲日後李大釗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心理基礎。然不可忽略的是，李氏思想中帶有的人道關懷，以及對外來思想持有批判性的吸收態度，都影響到往後李大釗對於馬克思主義內涵的詮釋和理解。

如就李大釗思想前後的變化來看，1917年腐敗的軍閥政治，動搖了李氏自留日歸國以來所建立的民彝思想基礎。舊帝制的復甦與軍閥操弄下的偽調合民主，使得李大釗不得不反省民主的本義和實踐方法。李大釗對於民主議會制度的信任，到了同年7月的張勳復辟發生之後，才算是真正結束。在這段期間，李氏政治思想出現了短暫的矛盾與真空。一方面，他一邊關注歐洲社會黨的國際聯合運動，一邊又期待美國總統威爾遜所代表資本主義的世界和平方針。<sup>35</sup>另一方面，在強調自由必要靠革命犧牲，甚至以生命來換取的同時，又排斥革命作爲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這使

<sup>3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歐洲各國社會黨之平和運動（下續）〉，頁136。

<sup>35</sup> 「然吾人終信平和之曙光，必發於太平洋之東岸，和解之役，必擔於威爾遜之雙肩也。今且拭目俟之。」詳見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威爾遜與平和〉，頁268。

得李大釗的政治理想幻滅之餘，並無傾向南方國民黨的意向。反而是從人道主義立場，從西方社會主義中汲取新的養分，以重新築起民彝思想的大廈。

## 第二節 社會主義思想上的發展

1917年後半期，李大釗的政治思想雖然出現矛盾，但有漸由保守朝向激進的社會主義跡象。1918年初，李氏經由章士釗推薦進入北大，與當時的學生團體和社會運動有了更緊密的聯繫。1919年五四事件發生之後，李大釗則更樂於公開闡述並信仰馬克思主義。前後兩年間，李氏政治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轉向，主要還是受到當時國內、外環境的影響。過去中共史家解釋馬克思主義如何於中國傳布的問題，多強調「外因」說。即認為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為中國帶來了馬、列的社會革命思想。<sup>36</sup>其後中國共產黨的降生，主要也是得力於共產國際的扶助。如此詮釋，主要還是受到毛澤東早年對中共早期歷史觀點的影響。它是一種政治語言，其歷史解釋常常隨著政治立場而改變。它充分反映當時中蘇關係的變化。<sup>37</sup>本文則企圖兼顧「內因」的解釋。前節曾說明李大釗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形成接受社會主義的心理基礎。在本節則要繼續述說，李氏是在何種內、外條件的契機下，逐步接納社會革命思想的心路歷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外因沒有什麼重要性。個人內在思想的變化，仍須先從外在的大環境開始談起。

### 一、迎向社會主義的契機

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發展，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清光緒年間推動維新變法，引起知識分子對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的興趣。西方社會主義思想也在同時，伴隨民主立憲思潮一起進入到中國。他們接受西方知識的渠道，主要來自留外學生的引介，以及日本相關的西學書籍。雖然早在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已將社會主義思想納入他

<sup>36</sup>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在處理中蘇關係的歷史問題上，宣稱「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段話為往後中共早期的歷史書寫，確立了基本論調。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卷，頁1471。

<sup>37</sup> 其後，有關中共早期歷史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說明共產國際在中共建黨的過程，僅僅扮演著後起的角色。這個歷史問題的本質，在於探討中共究竟是俄國革命輸出，還是本土革命運動的產物。如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中，它同時也是個政治問題。詳見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89~91。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115~118。

的民生主義。作為中國第一個正式社會主義組織的中國社會黨，其創始人江亢虎，<sup>38</sup>也開始宣導重視婦女平等與教育問題。但根據廣東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復對他們的評論，孫和江都並非倡導社會革命，而僅僅是提出社會政策。<sup>39</sup>換言之，孫、江二人的社會主義思想，皆傾向社會改良，而非推翻既有的社會體制。當時政治上的改革路線，主要還是聚焦於如何在中國落實西方的民主議會制度，而非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平等與社會正義。但不容否認的是，傳統中國的大同思想與現代西方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相遇，使得中國理想的烏托邦社會能夠在一個新的思想基礎上，持續地對中國知識階級造成影響。不論他們所信奉的是何種救國的主義，對於未來希望中國能夠達到「盡其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普遍成為民初新知識分子在政治社會改革上的終極目的，李大釗亦不例外。

即使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很早便傳入中國，且知識青年一直都懷有世界大同的理想，但它真正要成為中國政治社會改革的主流，還必須等到1919年「五四事件」的發生。因為一次大戰結束的幾個月後，中國社會輿論對巴黎和會的結果表達不滿，導致國內反日本帝國主義愛國運動的興起。反帝國主義，同時也意謂著反對其背後支持著帝國主義的官僚體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是在這樣的思想環境條件下，產生了接受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契機。

李大釗也是在1919年5月這一場激進思潮的洪流當中，歷經對民初民主議會制度的信心崩潰，以及對美國總統威爾遜無法在和會上堅持其十四點和平原則的失望之餘，從而傾向激進的社會革命。然而作為「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其接受社會主義的契機為何，常常為中共史家所聚焦，並產生許多不同的說法。依據相關歷史人物的回憶記述：第一，有許多史家指出，李氏在民國建立之初，便曾接觸中國社會黨的社會主義思想。第二，也有學者認為，李氏在留日時期，即間接受到日本社會主義思潮影響。這兩者的共通點是：他們皆傾向認為在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有所謂社會主義思想醞釀階段的存在。<sup>40</sup>

<sup>38</sup> 中國社會黨領導人江亢虎，最初在海外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想，於1911年7月在上海發起社會主義同志會。辛亥革命成功後，將其改組為中國社會黨。其政綱如下：贊同共和；融化種界；改良法律、尊重個人；破除世襲遺產制度；組織公共機關，普及平民教育；振興直接生利之事業，獎勵勞動家；專徵地稅，罷免一切稅；限制軍備，並力軍備以外之競爭等。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146~147。

<sup>39</sup>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32~133。原書見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40-141。

<sup>40</sup> 實際上，關於李大釗最早接觸到社會主義的契機問題所引發的爭論，反應出史學研究者背後的民



如上述的回憶和說法可信，那麼李大釗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醞釀，將引導李氏日後成爲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但如此形成的歷史論述，將產生許多未能解釋的問題。例如，當時李大釗究竟是在何種環境下，以何種方式接觸社會主義。要持續追問的是除了馬克思主義，其他社會主義思想的成分，是否曾在李氏政治思想的內涵中留下痕跡。上述的重要問題如未能解決，便很難明白李大釗往後對於社會主義內涵的理解和調適。如要探討李大釗接受社會主義的「契機」，就有必要考慮當時整體的思想環境和李氏個人的思想狀態。

首先，是關於李大釗早期加入中國社會黨的問題。根據部分回憶錄記載，1912年冬，在北京的李大釗曾在曹百善引薦下，與負責籌辦中國社會黨北京總部的陳翼龍見面。陳、李二人相談甚歡，李氏隨後便加入中國社會黨。其後，陳翼龍因宋案反袁而遭政府捕殺，江亢虎等中國社會黨人亦被通緝，李大釗則避居樂亭縣祥雲島。<sup>41</sup>有學者依據這項材料，認爲李大釗早在加入中國社會黨時，就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sup>42</sup>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爲，僅僅根據回憶錄很難證明李氏曾加入中國社會黨。

即使李大釗未曾加入中國社會黨，從其他相關資料佐證，李氏至少和該黨有密切關係。<sup>43</sup>但這是否就可以認定李大釗的政治思想從此受到社會主義影響，仍有疑問。如從李氏所處的思想環境來看，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治思想的主流，是如何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府。當時的思想衝突，主要還是發生在封建傳統壟罩下的新舊勢力之間，而非社會階級之間。李大釗早期參與中國社會黨的興趣，似乎不是因爲他對西方社會主義內涵的理解，而很可能是對於傳統中國烏托邦思想的一種心理投射作用。如檢閱當時李氏著述，便可以發現其主要關心的政治議題，仍集中在政府的組織架構。李大釗談論政治的立場和態度，仍侷限於民初既有的民主政黨體制。甚至有一段時期，李還加入了擁袁的保守陣營，且主張集權政府。換句話說，當時李大釗的政治思想與思潮主流相當符合。

其次，是關於李大釗在留日時期的思想學習問題。早期日本學者曾根據李大釗

---

族立場。強調民初中國社會黨對李氏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重要性，也就削弱了外來國家影響的因素。相對的強調留日時期的重要性，則突顯了李大釗思想當中的日本因素。這兩種觀點，雖然都強調了早年李大釗有一段社會主義啟蒙時期，但仍是處於一種對立狀態。如中國學者朱文通便認爲，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啟蒙，應該是在1912到1913年間，而非日本學者所說的留日時期。朱文通，〈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發展歷程新探〉，《河北學刊》，第27卷，第1期，2007年，頁115~116。

<sup>41</sup> 詳見張次溪，〈陳翼龍先生事蹟匯錄〉。該文收錄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60~61。

<sup>42</sup> 朱文通，〈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發展歷程新探〉，頁117。

<sup>43</sup> 詳見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146。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發現其中部分的文字內容，主要是參考自日本社會主義者河上肇的相關著作和翻譯文章，這一點已經證實。<sup>44</sup>但如據此認為，李大釗是在1914到1916年的日本留學時期，最早經由河上肇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則仍待考證。<sup>45</sup>經過後起學者研究，李氏在日本求學的兩年半間，河上肇正巧到歐洲留學一年半。在河上肇歸國後，不但不曾在李大釗就讀的早稻田大學任教，甚至連馬克思的重要著作《資本論》也未曾讀過。既然當時河上肇並非一位社會主義者，更遑論李大釗會受其馬克思主義影響了。<sup>46</sup>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想要受到河上肇的影響，還必須推遲至1919年之後。即便在留日期間，李氏思想不受河上肇影響，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李大釗也很有可能受到任教於早稻田大學的社會主義者安部磯雄的影響。

留日時期的李大釗，是否接受安部磯雄，或是其他日本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影響。這個問題的意義，似乎還是要回歸到當時的思想環境來觀察。此時日本自1910年「大逆事件」以來，<sup>47</sup>正值社會主義的嚴冬時期，一直要到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學界才逐漸開始出現大量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譯介文章。<sup>48</sup>在日本社會激進言論備受政府壓抑的氛圍下，李氏沒有充分吸收和學習社會主義思想的客觀條件。再就留日的學習情況來看，當初李大釗雖因自視缺然選擇留日，學習動機甚為強烈；然而在早稻田大學求學時，李氏卻將大部分的時間用於參與國內的反袁運動，其學業表現非但不佳，甚至最後因缺課過多而遭校方退學處分。這並非是要說明李大釗在留日時期沒有思想學習的成長，正是因為這一段思想學習與政治實踐的過程，李氏在日本完成其民彝思想的架構。但其中卻沒有什麼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容。

從李大釗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思想狀態，來觀察其接受社會主義的契機，可以發現李氏在參與民初中國社會黨活動期間，以及留日時期這兩個人生階段，都沒有充

<sup>44</sup> 在1970年後的日本學界，齋藤道彥最早將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與河上肇在《社會問題研究》所載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對照。參見後藤延子著，劉助仁編譯，〈戰後日本關於李大釗思想的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第6期，1990年，頁71~72。

<sup>45</sup> 早期後藤延子對李大釗思想的研究便持此觀點。參見後藤延子著，王青等編譯，《李大釗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頁81~82。

<sup>46</sup> 彭明、楊奎松，〈李大釗政治思想演變的歷史考察〉，載於彭明，《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十講》（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32~333。

<sup>47</sup> 1910年6月，日本的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因捲入部分社會主義者暗殺天皇的計畫被捕。經最高法院公審，大逆罪包含未遂在內，皆是唯一死刑。幸德並於翌年1月接受了死刑。前後日本政府對於社會主義者的打壓，最終以幸德的死作為結束，史稱「大逆事件」。該事件造成往後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進入相對地蕭條時期。詳見今井清一著，楊孝臣、郎唯成、楊樹人譯，《日本近現代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2卷，頁50~52。

<sup>48</sup>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15。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37~38。

分的環境和思想條件接納激進的社會主義。在李大釗對民初議會政治失望之前，李氏所嚮往的，是透過民主議會實現新中國的願望。換言之，李大釗那時是關注在政治制度層面的實踐，而非社會革命，甚至社會改良似也未曾考量。即便當時有接觸過社會主義思想，如就李氏整體思想內容而言，也僅具消極的作用。李大釗接受社會主義的前因後果，仍必須從外在環境和內在因素來加以觀察，才可能明白李大釗政治思想前後的變化和程度。所謂契機，也就是在內外條件結合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和大多數五四激進分子相同，新文化運動之後的李大釗始具備充分的思想條件，並且在北洋軍閥專政的陰影下，受到俄國革命風潮波及，因而對其原有的政治思想基礎造成撼動。以下，先說明外部因素的國際情勢發展。

## 二、俄國革命的中國反響

毛澤東曾在 1949 年中共建政後不久提到：「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句對早期中共歷史的論斷雖有一定的準確性，但也並非完全說明真實情況。<sup>49</sup>的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受到知識分子矚目，和 1917 年俄國社會革命的成功背景有很直接的關係。但實際上，馬克思及其思想受到中國人注意的時間點還要早得多。1902 年，梁啟超就曾在文章上批評過馬克思。到了 1905 年，馬克思的重要著作《共產黨宣言》，其中部分內容，最早便由與孫中山同一革命陣營的朱執信在日本同盟會的《民報》上翻譯出來。<sup>50</sup>

雖然馬克思的名字很早便為中國知識分子所知，但其龐雜的思想似乎仍不受時人理解和欣賞。清末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仍是以「無政府主義」的形式流行。在當時社會各層面以「解放」為主題的時代，<sup>51</sup>無政府主義所主張反對一切形式的權力和宰制關係，很容易為中國知識青年所接受。換言之，思想偏向左傾的社會主義青年，慣於將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和語言，視為一種理解中國問題的共通「政治話語」，而非具有政治立場的「意識形態」。所以後來中國的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

<sup>49</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310。

<sup>50</sup>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編譯，《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頁 58~59。原書見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p. 52-53。

<sup>51</sup> 李大釗即認為：「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國民之運動，解放之運動也。解放者何？即將多數各個之權利由來為少數專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蝕、凌壓、束縛者，依離心力以求解脫而伸其個性復其自由之謂也。於是對於專制主義而有民主主義，對於資本主義而有社會主義，是皆離心力與向心力相博戰而生之結果也。換言之，李氏認為權力中心隨著離心力而分散，是世界未來的趨勢。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政治之離心力與向心力〉，頁 141。

大多數都曾經歷過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階段。以無政府主義作為認識馬克思主義內涵的跳板，成爲一種解釋中國馬克思主義出現的「內因」解釋。這一點在下文會有更清楚的說明。顯然在十月革命之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語言在中國，仍屬於非主流的社會思潮。

誠然，十月革命引發中國激進社會主義分子的熱情，使國內五四運動性質產生轉變，開始由文化啓蒙走向社會革命。但很早便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卻並未在十月革命後即刻加入激進的社會革命路線。李氏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尚有一段傾向社會主義的醞釀期。這一段醞釀期，並非在李大釗參與中國社會黨，或是留日期間；而是自 1917 年，受到外部的俄國革命熱力影響下而開始的。

俄國是近代中國北方的大敵。因此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俄國的批評和理解，不少是出自民族主義立場。但其中亦不乏嘗試運用理性、客觀態度去認識俄國問題者。李大釗早在十月革命前便已注意到俄國問題。民國建立後，李氏即開始接觸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文學和思想。李從托氏的立場和觀點出發，明白俄國的政治發展，甚至遠較中國落後。<sup>52</sup>俄國社會中存在的虛無黨，用的是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手段，來表達對沙皇專制的不滿。托氏則嚮往以農村勞動主義和基層的群眾力量，來改造當時俄國社會。換言之，對李大釗而言，俄國專制政治所造成的社會混亂，無異於「腐敗的清廷」，隨時都可能引發流血革命。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一次大戰發生未久，李氏對於俄國問題仍局限於對俄國情的認識，所以還未將該國問題提升至世界共通的社會問題看待。

李大釗對於俄國問題，有著更深刻的理解和觀察的時間點，與其說是在一次大戰後期的十月革命，不如將它提前到同年發生的二月革命。在二月革命結束後不久，由於對國際局勢的持續關注，3 月，李大釗發表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一文。雖然俄國革命消息，仍以片段的方式陸續傳到中國，未能知「共和赤幟已否樹於伯脫羅古拉德（當時的彼得格勒）之城頭」<sup>53</sup>但李氏在文中，已將俄羅斯革命定義爲世界革命的風潮。究竟是什麼樣的世界風潮呢？李氏認爲它是「帝王之運命，將漸絕於茲世。即彼依其末光之官僚政治，亦將以失所憑依而日即消沉。」<sup>54</sup>李大釗正是延

<sup>52</sup> 「俄政之暴，著稱於時。方謂哥薩克鐵騎，足以制反抗之發生。昂頭四顧，莫予毒也。而虛無黨徒，遍佈全國，權位之雄，每粉身碎骨於烈彈之下。社會恐怖，政情陰暗，正未知爆發於何日？」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政治對抗力之養成〉，頁 97。

<sup>5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頁 1。

<sup>5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頁 1。



續民彝思想中的民主觀，來評價這次二月革命及其引發的風潮。俄國沙皇的專制政體將被赤幟推翻，而官僚主義會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淘汰。

前者推翻專制政體的理由相當明確，但後者李大釗所謂的官僚政治，則必須加以澄清。從李氏學習法政的背景來看，早在 1913 年發表的〈論官僚主義〉中，李大釗即曾以西方政治學的觀點說明：「官僚主義者，乃近代各國建官之一種政策，即國家建官宜據學識為陟降之主義也。」<sup>55</sup>由此可知，李氏自身也明白，政治學中的官僚主義是學術研究中的客觀定義，它同時也是西方民主政治必要的一環。但如前節所提到的，後來李大釗卻將各國官僚主義視為引發大戰的原因之一，其理由何在？此刻李氏所使用的「官僚主義」一詞，已不能和立憲代議制劃上等號，而是類似於西方近代歷史曾出現的「開明專制」。它實際上是君主立憲制的變體。君主立憲制以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君主本無實權。然而「開明專制」雖在名義上注意到人民應有的基本權利，但君主卻仍擁有權力。君主利用現代官僚體制，作為施展權力的工具。沙俄自 1905 年日俄戰爭失敗後，由於內部紊亂而逐漸朝向立憲主義國家發展。<sup>56</sup>但此時俄國雖號稱立憲，但實則為一種「開明專制」。俄國內閣大臣在政治上仍舊是對君主負責，而非人民。此點成為李氏歸納俄國革命的近因之一。<sup>57</sup>

除了將二月革命視為世界的革命浪潮，李大釗宣揚二月革命的正面意義，其中還有更積極的內部動機：

邇來復辟運動之說，雖屬無根，然使國外政治之潮流，稍有傾於「官僚政治」之趨勢，則此剪除未淨之謬種，難保不附之以復萌。今以俄人莊嚴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同接以灌潤吾國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政之不可復興。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於今亦可不嘗試。有嘗試焉，必且撻國民之怒，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終以激成險烈可怖之變動。此則宜引俄為前車而速自覺察者也。<sup>58</sup>

1917 年的中國，正面臨內部新舊思潮對立的高峰，清室復辟之說甚囂塵上。作為民

<sup>5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1 卷，〈論官僚主義〉頁 49。

<sup>56</sup> 在 1905 年至 1907 年間，俄國境內發生了範圍廣泛，以反政府為目的社會動亂。其中包括恐怖攻擊、罷工、農民抗爭、民眾暴動等等。此事導致 1906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制定等同於憲法的「基本法」、成立國家「杜馬」立法議會並施行多黨制。詳見李邁先，《俄國史（上）》（台北：國立編譯館，1969 年），頁 351~356。

<sup>5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頁 5~6。

<sup>5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大革命之影響〉，頁 21。



主共和思想信仰者的李大釗，堅決反對「賢人政治」，或政治上的「新英雄主義」。<sup>59</sup>末代皇帝溥儀，如在中華民國的立憲體制基礎上重新登極，那麼中國便將成爲另一個沙俄時期的開明專制王朝，或像是日本寺內正毅內閣一樣，那自然非李氏所願。俄國二月革命成功的例子，此刻正好被李大釗借來，用以向國人宣揚民主政治是世界性的普世價值，並且警醒那些在國內專搞復辟運動的舊勢力，千萬不可違逆國民意願，免得造成社會可怖之動亂和無可挽回的社會後果。

李大釗對於二月革命的認識，明顯是置身於中國的政治情況下出發的。他主要指責的對象是各國的專制政府和官僚主義，破壞了世界的民主制度。當時李氏的思想內涵，遠遠沒有社會主義和階級對立的成分。但隨著李大釗越深入地分析、理解國際戰爭的原因，以及對歐洲社會黨發起「平和運動」的研究興趣。李氏開始從第三者立場，觀察歐洲社會黨發展的事業，並透露出對國際社會主義的期待。對李大釗而言，這在戰時可謂「最可注目之一事」，但是「此種運動之效果若何，殊難爲確切之測度。」<sup>60</sup>雖然此刻李氏對於社會主義還停留在觀察階段。但不可否認，他對於歐洲社會黨在大戰後期的和平作用，給予極高度的評價。

如毛澤東所言，十月革命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過程的一個轉捩點，李大釗也確實受到十月革命很大的影響。然而，李大釗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接觸十月革命，以何種方式接受該革命事件背後的思維，此便成爲研究李大釗政治思想獨特性的重要切入點。與二月革命相仿，十月革命的消息同樣是由國內外報章雜誌的管道傳到中國境內，李大釗能嫻熟地掌握相關資訊。但就現有文獻看來，李氏並無像對二月革命一樣，立即對十月革命提出觀點，要直到隔年 6 月，李大釗才陸續發表關於俄國問題的重要文章。最晚要到一次大戰結束，李氏才正式公開正面評價十月革命。爲何李大釗會間隔如此長的時間，才對十月革命產生反應？此處留下的疑問，常爲研究李大釗的學者關注。而此處想提出的解釋是，李氏並非在十月革命一發生，便明白該事件的歷史意義。在李氏政治思想發展的過程中，對於十月革命的認識，和一次大戰所帶來的反省，是不可分割的兩個重要部分。

首先，有關李大釗接觸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後情況，現有材料鮮少言及。根據林伯渠回憶，李氏曾於 1918 年 3 月致信向林介紹十月革命的情況。<sup>61</sup>然而在差不多的

<sup>5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俄國大革命之影響〉，頁 21。

<sup>6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歐洲各國社會黨之平和運動（上）〉，頁 123。

<sup>61</sup> 林伯渠，〈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作成於 1956 年 10、11 月，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

時間，李大釗進入北大圖書館供職，協助蔡元培專忙於新北大的建設，應無暇深究該事件之意義。且此刻當值李氏對軍閥專政以及民主議會制度絕望之時。在李大釗這一段政治思想的矛盾與真空期間，對於如此突如其來的十月革命事件，似乎也無法立即準確闡發其歷史意義。所以李氏對十月革命的發生確是知情。但就現有文獻來看，李大釗對十月革命當下的評價仍未明朗。

為解答上述疑問，如就李大釗是以當時歐洲社會黨的活動，作為認識社會主義思想的脈絡進行考察的話，或能得到一項可能的解釋。從該思想來源的管道，此刻李氏傾向的社會主義顯然不會是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社會主義」，而是近似於與政府當局妥協下的社會主義。李大釗的思想接近於「第二國際」，其中又以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最為重要。他們最為激烈的方式，是計畫發動一場「總同盟罷工」(General Strike)，癱瘓資本主義政府，取得工黨在民主議會中的主導權。<sup>62</sup>換言之，李大釗原來即不贊同流血革命。他對於當時歐洲社會黨主張的平和運動的期望，似乎並不包括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推翻統治階級。從李氏日後為十月革命辯護的文句來看，亦可發現當時中國社會對十月革命的看法，除了得到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歡迎，更多是被認為造成中國社會不安與動亂的來源。<sup>63</sup>當十月革命一發生，李大釗或許也曾為此躊躇而對它產生懷疑，所以沒有立即對十月革命提出正面回應。這一點說明李氏並未如許多中國史家所認為，在第一時間就立即響應十月革命精神的號召。

其次，李大釗為何開始接受、並正面評價俄國十月革命，主動去研究其背後布爾什維克所代表的「革命社會主義」思想，這和當時中國知識界所發生的東西文化論戰背景，有直接的關係。

伴隨 1915 年新文化運動對於舊傳統思想的批判，東西文化論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言自明。它延續上一代中國的洋務與守舊、維新與洋務、革命與立憲之爭的脈絡發展下來。<sup>64</sup>不同過去的是，此刻中國知識界引發的這場文化論戰，不論是內涵的廣度和深度，或是在各方面所提出具有革命性的見解，例如對「國民性的改造」，對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 31。

<sup>6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歐洲各國社會黨之平和運動（上）〉，頁 125。又見唐納德·薩松 (Donald Sassoon) 著，姜輝、于海青、龐曉明譯，《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24~25。

<sup>63</sup> 「須知一個新命的誕生，必經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有了母親誕孕的勞苦痛楚，才能有兒子的生命。這新紀元的創造，也是一樣的艱難。這等艱難，是進化途中所必須經過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庶民的勝利〉，頁 255。

<sup>64</sup> 譚雙泉，〈李大釗與五四前後東西文化論戰〉，載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研究論文選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9 年)，頁 123。

當時中國人心的震撼，是大幅超越以往的。它所關注的問題，主要圍繞在東方與西方文明的特質、優劣，以及彼此的關係。其目的無非是為在世界文明的進化過程，確認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作為新知識分子的李大釗，自然不會錯過這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化論爭。

首先加入這場文化論爭的，是仍在上海主辦《青年雜誌》的陳獨秀。陳氏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強調，東西文明的發展各成體系，「若南北之不相並，水火之不相容。」<sup>65</sup>異文明間的不可調和性，就像當時中國南北的對峙情況一般。所以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可說是典型的「全盤西化」論者。相較於陳氏，較為保守的《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筆名滄父），則指出雖然中國對於歐洲文明的吸收，已是勢不可擋，然而西方國家在一戰後，卻也曝露其文明的野蠻和破壞性格。所以不同於陳獨秀，杜氏是站在對東西文明的反省基礎上進行論述。杜亞泉認為，不論東方抑或西方，「凡社會之中，不可不以靜為基礎，必有多數之靜者，乃能發生少數之動者。」<sup>66</sup>所以他勸說中國人不要厭棄自身靜的文明，而盲目地去嚮往西方動的文明。更準確地說，在東西文明調和的問題上，杜氏是從中國文明本位的立場，去統整西方文明而成為一世界新文明，以救濟當時國內價值迷亂的人心。<sup>67</sup>

相較陳獨秀的激進態度，李大釗和杜亞泉則同屬文化調和論者。李氏認為「宇宙大化之進行，全賴有兩種之世界觀，鼓馭而前，即靜的與動的、保守與進步是也。」<sup>68</sup>但在分析方法上，李不同於杜在東西文明內涵作靜態的比較，李大釗則傾向將東西文明的交匯視為一動態過程，並說明吸收西方文明長處的必要性。李氏和杜氏在探討東西文明時，雖同樣是以「東方文明主靜，西方文明主動」的特色來加以界定，並將兩者對立起來。但在李大釗的人生哲學中，其對於現實環境的敏感，不能不讓他將中國文化當中靜的特質，強調在動態的「生活層次」，而非指向靜態的「文明本質」。所以李氏在〈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一文中的著眼點，不僅是作東西文明的內涵分析，而是指出當時中國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現象。<sup>69</sup>

中國社會矛盾現象的產生，主要源自外在動的生活已是不可抗拒，但其自身靜

<sup>65</sup> 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載於《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1915年12月15日。

<sup>66</sup> 杜亞泉，〈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載於《東方雜誌》，第13卷，第10號，1916年10月10日。

<sup>67</sup> 杜亞泉，〈迷亂之現代人心〉，載於《東方雜誌》，第15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

<sup>6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頁214。

<sup>69</sup> 「矧以數千萬年慣習自然之靜的生活，而欲革除之於一旦，此為必不可能之事，於是矛盾之生活現象，乃隨處而皆是。」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頁97。



的觀念卻仍尚待改變。如以靜臨動，往往會出現文化衝突現象。例如在器械方面，發生頻傳的輪船和火車意外事故；政治方面，則出現以賢人政治的人治思想施於以法治國的民主政治。種種生活上的不調和，將使「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粉碎。」<sup>70</sup>惟有接受西方文明特長，掃蕩靜止的文明觀念，才能確立東西調和之基礎。所以李氏的調和觀，是將東西文明兩者並立看待以進行整合，其意在「創新」。相較於同是調和論者的杜亞泉，其態度則傾向「守舊」。

李大釗的文明調和觀點，主要還受到日本文明評論家茅原華山的影響。一戰期間，日本學界和中國同樣都籠罩在東西文化論戰的氛圍。1910年代的日本，對內主張政黨內閣，對外主張自由貿易，作為當時首倡民本主義代表的茅原華山，對李大釗早期的青春思想便有某種程度的影響。<sup>71</sup>

從代表茅原思想的重要著作《人間生活史》（中文作《人類生活史》）中可見，李氏除了接受其中的時間觀，還繼承茅原部分的文明觀點。如李大釗認為，歐亞大陸因為中央高原俗稱「桌地」（table land）的地形阻隔，形成常年受到日光照射的「南道文明」，以及不常受日光照射的「北道文明」。南道文明因受到自然恩惠豐厚，其特質為與自然和解，為東洋文明；相對地，北道文明受到自然賜予為畜，其特質遂與自然奮鬥，是為西洋文明。<sup>72</sup>茅原思想表現的文明發展階段論，以及地理環境決定論，雖大部分承自西方觀點，但卻也引起當時日本學界重視。尤其是其主張為防止帶有「物質主義」的北道文明陷於破壞，便需與「平靜、調和」的南道文明結合，「未來時代人類生活偉大的進行曲，是從南北兩道向一致的世界而奏響的」<sup>73</sup>茅原的結論是，當屬於東方強調「靈」的第一文明，與西方強調「肉」的第二文明，兩者完全的結合，最終將形成「靈肉一致」的第三文明。而茅原正是從大和民族的立場，期望日本將來能成為第三文明的第三帝國，而其人後來也成為日本對外擴張主義論者。

從李大釗接受茅原思想的事實看來，可說明當時中日知識界的往來和同步性。然而站在不同的民族立場，李氏自然期望青春中華未來能夠進行一場「物心兩面」的改造，成為「靈肉一致」的第三文明。但此刻俄國十月革命的發生，卻讓李大釗發現通往世界進化發展的第三文明，已然現身：

<sup>7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頁216。

<sup>71</sup> 石川禎浩，〈李大釗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華山為例〉，載於《社會科學研究》（成都），第3期，2007年，頁142。

<sup>7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頁211。

<sup>73</sup> 石川禎浩，〈李大釗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華山為例〉，頁144。



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而東西文明真正之調和，則終非二種文明本身之覺醒，萬不為功。<sup>74</sup>

1918年7月，李大釗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給予俄國十月革命正面的評價。其中又重點分析俄羅斯文明崛起的意義。首先，就文明的發展來看，李氏認為文明既有暢勝之期，亦有衰歇之運。當時歐戰中的德國文明可謂如日中天，但最後仍無法避免走入極盛而衰的命運。至於俄羅斯的文明史發展，相較於其他歐陸國家算是後進，所以尚有向上發展之餘力。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俄羅斯正好位於歐亞大陸之交，其文化實兼有東西文明之特質。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文明內涵，包涵著「神」、「獨裁君主」以及「民」，分別代表具有東方文明色彩的東正教、沙皇制度，以及來自西方的人道主義思想。三者具有同等勢力。<sup>75</sup>直到十月革命推翻了宗教迷信與沙皇專制，彰顯出托爾斯泰式的人道主義精神，使得俄羅斯完成東西文明的融合，成就第三文明的創舉。<sup>76</sup>在東西文明論戰的背景下，李大釗正是借用來自日本茅原思想中那獨特的地理史觀和文明觀點，秉承著精神與物質，靈與肉的兩元對立，卻又兩相結合的第三文明概念，用以說明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意涵。此不同於茅原華山，可說是李氏思想中的獨創性部分。<sup>77</sup>

當1918年11月一戰結束，李大釗又先後發表象徵其思想日後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章，包括〈庶民的勝利〉及〈Bolshevism的勝利〉。這兩篇雖同是李氏為一戰的結束而作，但其中精神實際上是李大釗對十月革命意涵的擴大。簡言之，李大釗認為，從俄國十月革命到一戰的勝利有著意義的連續性。十月革命的精神在國際上，就是推翻戰爭期間的帝國主義和官僚政治；在社會上，就同歐洲社會黨的平和精神一般，由世界各國的人民，尤其是勞工階級，本著「互助」精神，<sup>78</sup>提倡自由、和平，以求自資本主義社會的桎梏中「解放」。不同於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國家主義精神，俄國革命站在世界主義的高度，是二十世紀革命的新信條，俄國的十月革命僅僅是一個開始。所以一戰表面上雖是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聯盟的勝利，但

<sup>7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頁214。

<sup>7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頁227。

<sup>7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頁227。

<sup>77</sup> 石川禎浩，〈李大釗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華山為例〉，頁147。

<sup>7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庶民的勝利〉，頁254。

李氏卻認爲一戰的勝利，實際上是庶民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同時也是勞工階級的勝利，社會主義的勝利。如以當時中國思想界普遍的保守氛圍來看，李大釗能夠從西方社會主義觀點評價一戰的結果，此與同時期新知識分子相較起來，李在思想上無疑是相當特出而先進的。對於俄羅斯文明的嚮往，亦造成李氏日後對布爾什維克產生濃厚的研究興趣。

上述主要是透過「外因」的解釋，說明李大釗從原有的資產階級民主立場，經過一戰期間歐洲社會主義思想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外來影響，使李氏從而改變、接受社會主義的民主觀念。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國接受西方社會主義思想，自清末以來已有很長的歷史。其中重要的代表即是無政府主義思想。該思想的主題在於社會的「解放」和「互助」。這些常用的概念，成爲知識分子共同理解中國問題的重要語彙。北大時期的李大釗既置身於思想界的中心，亦不免使用當時思想界所共用的政治語言。於是就「內因」的觀點來看，李大釗在「前馬克思」時期也曾受到無政府主義影響，甚至成爲爾後李氏馬克思主義內涵中的一部分。尤其到 1919 年 1 月的巴黎和會之後，中國普遍興起的社會運動，更促進了激進社會思潮的發展。

### 三、五四激進的社會思潮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不僅是一起學生的愛國運動。它開始讓中國社會大部分的階層，包括學生、商人和工人等，進行全國性的群眾聯合。更重要的是，它扭轉了新知識分子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思想改革路線，充分地讓他們體認到，要徹底改變中國的貧弱，靠著政治和思想兩個層面的改革是遠遠不足的。還必須進一步實踐社會的基層改造。所以五四運動引發當時中國知識界一股激進的社會思潮。該思潮內涵的來源，主要亦來自於西方。中國學界整體開始有如此的思維轉向，主要是自一戰結束後漸漸醞釀而成。

歐戰的結束，不只是在政治上對中國造成重要影響，在思想文化上也引起巨大衝擊。政治方面，中國作爲戰勝國，對於美國總統威爾遜及其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寄予厚望。「公理戰勝強權」，一時成爲新知識分子重要的宣傳口號。他們期待戰後的平和會議，能夠一舉掃除清末以來中國所接受的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與他國間的平等關係。然而，巴黎和會期間得到的結果卻事與願違。不僅中國代表團提出有關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追討所失國家主權的提議，被和會所拒絕。更甚者，事前由於英、法與日本的秘密協議，加上北京政府與日本對於山東問題早已有默契，

使得原來德國的山東權益，戰後將改由日本繼承，日後於是激起了全國性的五四愛國運動。威爾遜在中國的名望不再，巴黎和會的結果被視為各帝國主義間的利益協定，軍閥政府則被看作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言者。凡此種種，讓民初以來著意於民主政治改革的知識分子，經歷洪憲帝制和張勳復辟後，又再次受到嚴重打擊。

歐戰展現了先進文明中的人性暴虐，使中國新知識分子開始重新評估西方文明的價值。如梁啟超在遊歐歸國後，曾著《歐遊心影錄》一書，說明西方科學並非萬能。<sup>79</sup>對於中西文明的反省過程，不論是在政治或是文化上偏向保守的知識分子，他們選擇的道路，是重新拾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如梁啟超、胡適，此後他們便埋首於國故整理工作。相對地，偏向激進者，如李大釗、陳獨秀，他們則傾向運用西方文明中「反西方的要素」批判中國自身。這裡所謂「反西方的要素」指的是現代西方文明中，針對啓蒙時代以來發展的民主政治、科學態度、工業社會等等造成的社會問題，所進行的思考和反省。具體而言，即西方文明中具批判意識的社會主義思想。

雖然自清末開始，西方社會主義思想並不受中國知識界重視，但是到了五四時期，它卻一變成爲社會改造思想的主流。爲了兼顧李大釗政治思想轉變的「內因」解釋，因此有必要瞭解李氏初進北京大學，及其後從事相關活動的背景。

### （一）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

自 1917 年起，陳獨秀和胡適等新知識分子先後進入北京大學任教，北大漸爲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當時在北京辦報的李大釗「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發蹤指示。」<sup>80</sup>於是在章士釗引薦下，李氏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遂如願加入北大教授團，一同引領社會之風氣，執學界之牛耳。他們將新思想帶入北大校園，並培育了新一代知識青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爲中國請來了「德先生」(Democracy) 和「賽先生」(Science)。北大學生代表如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亦步亦趨，成立新潮雜誌社，創辦《新潮》(The Renaissance)，則希望爲中國帶來一場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

在北大，除了出版刊物，成立學會、發表講演會亦是傳播新思想的重要途徑。

<sup>79</sup> 「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資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梁啟超，《歐遊心影錄》(香港：三達出版公司，1961年)，頁 23。

<sup>80</sup> 參見章士釗，〈李大釗先生傳·序〉，載於張次溪，《李大釗先生傳》。

如李大釗和陳獨秀曾於 1918 年 10 月，組織過「社會主義研究會」。同時，由於北大紅樓新成，學校方面亦決定將文學院和圖書館，移到新紅樓的位址，日後即為五四運動重要的策源地。同年 11 月，李氏又另成立了「北京大學馬爾克思研究會」。<sup>81</sup>這些都符合李大釗在歐戰末期的思想傾向。然而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就當時中國的思想環境而言，頗為困難。由於北京並未放鬆對社會言論的控制，所以談論激進思想仍是一種忌諱。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甚為艱澀，李氏亦曾提及。<sup>82</sup>因此，馬克思主義對領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而言，並不易理解，更不用說是學生族群了。<sup>83</sup>但相對地，學生們不同於進入而立之年的新北大教授用傳達學術思想的方式影響社會。這群血氣方剛、充滿救國意志的年輕學子，選擇的是用組織學生團體的方式，形成改進社會的力量。

五四時期對於中國社會影響最深刻的，除了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之外，莫過於群眾運動的發展。其重要性在於，人們開始意識到透過群眾運動可以改變社會。在這段期間，中國社會群眾運動的醞釀和擴大，主要即源於學生運動的興起。五四時期學生運動的發展，可以追溯自 1918 年 5 月段祺瑞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一事。該協定允許日軍駐兵東北，訓練並指揮中國軍隊。此舉引起留日學生強烈不滿，他們成立「留日學生救國團」，返國後並聯同北京學生向北京政府請願。雖然請願活動受到官方鎮壓，但他們日後又串連了南北各地學生，組織全國性的「學生救國會」。該會的成立，不但為五四愛國運動建立基礎，實際上其精神亦是相互聯繫。<sup>84</sup>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 6 月，曾琦等留日學生因受到中日軍事協定刺激，開始會同國內友人，在上海準備籌辦「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該學會在日後被稱作是五四期間，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全國性學生團體。到了月底，他們在北

<sup>81</sup> 根據時任北大教授高一涵的回憶，他們當時「不是用馬克思，而是用馬爾克斯這個名字，為的是要欺騙警察。他們回去報告，上司一聽研究馬爾薩斯（與馬爾克斯相混），認為這是研究人口論的，也就不來干涉了。這個學會，先是公開的，後來就秘密起來。它的對內活動是研究馬克思學說，對外則是舉辦一些講演會。」詳見高一涵，〈回憶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同志〉，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年），頁 340。

<sup>82</sup> 「一個德國人說過，五十歲以下的人說他能了解馬克思的學說，定是欺人之談。因為馬克思的書卷帙浩繁，學理深晦。」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頁 15。

<sup>83</sup> 北大學生成舍我，在參加「北京大學馬爾克思研究會」的第一次集會後，回到東齋宿舍，把帽子一扔，說：「這個主義是『你的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主義，我可不贊成。」以後他就沒再去參加過。出自《新聞研究資料》，第 2 輯，1980 年 1 月，頁 150。轉引自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104。

<sup>84</sup> 詳見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頁 172~175。



京岳雲別墅召開正式的發起會議。<sup>85</sup>李大釗當時亦應邀成爲「少中」的發起人之一。奇特之處在於，該會成員主要是以學生爲主，而李氏是其中少數，甚至可能是其中唯一以大學教授身分加入者。<sup>86</sup>同時，根據曾琦〈戊午日記〉記載，李大釗是在岳雲別墅會議召開之後，才被邀約加入「少中」的發起。李並非最原始的發起人。<sup>87</sup>至於李氏爲何加入「少中」，原因之一在於他和陳洧及曾琦二人原來就有交誼。第二，「少年中國」的理念和命名原來自海外的「少年義大利」。<sup>88</sup>該精神和李大釗的青春思想可說是一拍即合。

由王光祈等人發起的「少中」，最初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sup>89</sup>其後爲了簡潔，在1919年7月「少中」正式的成立大會後，又改爲「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從前後文意看來，「少中」歷經近一年多的籌備，其精神始終未有明顯的轉變。由於對現實政局和官僚主義的深惡痛絕，於是他們鼓吹以社會改革爲政治改革的基礎，以參與社會活動來取代政治活動。<sup>90</sup>「少中」的原始精神，即是認定個人改造是社會改造的下手方法，而社會改造又是政治改造的下手方法，政治既經改造，國家也就自然有救了。<sup>91</sup>由此可見，參與「少中」活動在李氏的社會主義思想發展中，實具有某種代表意義。

五四時期的李大釗，是如何理解當時的中國社會呢？從文本分析能夠發現，李氏認爲中國社會，大致可以分作「光明」與「黑暗」兩個世界。<sup>92</sup>此處的光明，從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來看，它指的是知識文化的具備與否。所以知識帶來了光明，愚昧則帶來黑暗。李大釗所理解的中國社會，如觀察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那活在舊社會，受到舊思想束縛的人群，即是生活在黑暗當中。受到新文化思想刺激的知識階

<sup>85</sup> 「岳雲別墅者，本會成立史中最可紀念之發祥地也。到會者爲：陳君洧、張君尚齡、周君無、曾君琦、雷君寶菁、王君光祈六人。會議結果，公推王光祈爲起草員。遂由王君光祈草擬規約數十條，復在岳雲別墅會議修改數次，並邀同會員李君大釗商榷一切。當時列名發起者，則爲陳洧、張尚齡、李大釗、周無、曾琦、雷寶菁、王光祈七人也。」引自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241。

<sup>86</sup> 陳正茂先生在其專著中，曾詳細研究並整理「少中」會員相關的背景資料。詳見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台北：威秀資訊科技，2010年），頁215。

<sup>87</sup> 1918年7月21日：「午後潤璵（王光祈）、太玄（周無）來抄寫少年中國學會章程，旋以電話邀李守常來寓，約渠加入學會，縱談至晚十鐘始去，甚相愜也。」參見曾琦，〈戊午日記〉，《曾慕韓先生日記選》（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頁29。

<sup>88</sup> 赤松子（張尚齡），《人生滄桑六十年》（台北：五洲出版社，1971年），頁26。

<sup>89</sup> 王光祈，〈本會發起之旨趣及其經過情形〉，張允侯、殷敘彝等著，《五四時期的社團（一）》（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頁219。

<sup>90</sup> 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頁31。

<sup>91</sup> 陳啟天，〈少中與中國最早的反共運動〉，《寄園回憶錄》（台北：商務，1965年），頁133~134。

<sup>9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光明與黑暗〉，頁311。

級，則生活在光明世界。然而，這僅僅是就第一層意義上來講的。隨著中國民族工業在一戰期間的快速發展，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傳入，中國知識分子也開始學習以社會主義的觀點，來思考社會問題。所以第二層意義，則是由生產與消費的觀點出發。它指出社會中專事於生產的族群，勞動是他們的生活。透過勞動，實現快樂的「人的生活」，其世界是為光明。另一方面，社會專事於消費的族群，有著不勞而獲的罪惡。其物慾的展現，是人類世界萬惡的淵藪。他們所過的是屬於「鬼的生活」，是為黑暗世界。<sup>93</sup>

那麼，李大釗所謂光明與黑暗的世界，究竟實指何處？如將中國社會分成「城市」和「鄉村」兩個範疇，就第一層意義而言，城市是知識文化的中心，是全國知識分子的聚集之地，城市無疑是充滿光明的。而鄉村的農民，則多是無受過教育者，他們受到中國傳統家族社會的羈絆較深，他們的愚昧，讓鄉村壟罩在黑暗。<sup>94</sup>然而，如從第二層意義來看，其結果卻完全相反。城市大多是消費行為居多，它是人類欲望展現的場所，政客與商人相互勾結的舞台，其生活多處於人性黑暗的一面。相對地，鄉村中農民特有的天真爛漫，和勤勞踏實的生產和勞動精神，在生活中則處處散發著人性的光明。<sup>95</sup>所以不論城市，抑或鄉村，都有屬於它們自身的光明與黑暗。

由此可以發現，在李大釗內心深處，認為人性中的光明面，是出現在接近於小國寡民、雞犬相聞那般，如中國道家思想代表老子理想中的世界。<sup>96</sup>但一個很重要的時代變化是，隨著人類智識的成長，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國勞動階級中那傳統人性光明的一面，逐漸受到複雜的現代社會所掩蔽。就社會主義觀點而言，這個複雜的社會制度，就是資本主義式的經濟體制。在進步的城市中，它體現於資本家與勞工的勞資關係；在傳統的鄉村，它則發生在地主與佃農的租佃關係。它們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權力的結構。<sup>97</sup>在城市中的勞工與鄉村的農民，他們人性中「天真」的那一面，在複雜的社會剝削過程中，反而成爲了對社會的「愚昧」態度。這種愚昧，不僅是針對他們在社會結構和思想上受縛於舊社會，更重要的還包括，其身處於受資產階級剝削的結構當中，而竟不自知的社會困境。<sup>98</sup>在城市中，代表那知識光明的青年，

<sup>9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光明與黑暗〉，頁311。

<sup>9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青年與農村〉，頁305。

<sup>9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頁319。

<sup>9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青年與農村〉，頁308。

<sup>9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青年與農村〉，頁305。

<sup>9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頁319。

在精神上都要受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汙染，成爲鬼蜮。<sup>99</sup>更何況是中國遍地的農村，其黑暗可想而知。就是在這層意義上，李氏將農村視爲重要的中國社會問題。而「少中」組織的目的，正是要透過光明的代表—知識青年作爲主體，意在解放中國社會那些愚昧地生活在黑暗中的群眾。

## （二）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

上述李大釗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理解，實際上代表著知識分子共同的心聲。但他們對於社會問題如此深入思考，並延伸出對應的解決辦法，其背後並非沒有一定的理論根據。五四時期的中國正是處處要求「解放」的年代，使得原來在清末激進思潮中曾風行一時的「無政府主義」，又再度獲得青睞。早期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由於受到俄國虛無黨的影響，爲了顛覆清朝專制政府，實行一種暗殺的破壞主義。然而認爲暗殺重要政府官員是無政府主義的主要思想，卻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一種誤解。實際上虛無黨人並非無政府主義者，更確切的說是國家主義者。<sup>100</sup>雖然無政府主義的代表思想家克魯泡特金本人曾經說過：「我們的運動，用筆，用舌，用劍，用槍，用炸彈，用投票紙。」<sup>101</sup>但明白的是，盲目的「破壞」並沒有真實益處，暗殺手段是被反清分子借用的工具。他們對於無政府主義有關「建設」的思想層面不甚了解，但是它卻在五四期間開始大放異采。從 1915 年到 1925 年間，透過群眾運動的方式，無政府主義風靡中國不少有志於社會改造的知識分子。十月革命後，李氏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解，其中也有許多是受國內無政府主義影響。<sup>102</sup>

但是，將無政府主義歸納爲社會主義的一種類別，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認知錯誤。它最初主要來自極端的個人主義。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潮中，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來源可謂相當複雜。它主要傳承自傳統的自由主義，往後又受到社會主義思想衝擊而產生許多派別。像是個人主義的、集體主義的、工團主義的、互助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等等。<sup>103</sup>儘管各派所持觀點有所差異，但仍有共通的思想

<sup>9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青年與農村〉，頁 305。

<sup>100</sup> 吳雁南、馮祖貽、蘇中力主編，《清末社會思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434。

<sup>101</sup> 江春（李達），〈無政府主義之解剖〉，《共產黨》，第 4 號，1921 年 5 月 7 日。

<sup>102</sup>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頁 165。“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Chinese radicals initially viewe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not as a Marxist but as an anarchist revolution—or at least a revolution that was consistent with anarchist goals.” See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176。

<sup>103</sup> 安德魯·文森特（A. Vincent）著，袁久紅等譯，《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97。



主軸。根據希臘語源，「無政府」(Anarchy)一詞，意指「缺乏統治者」的狀態。<sup>104</sup>概論起來，無政府主義者的共同主張，是要廢除一切的統治形式。他們認為「民族國家」是強制和暴力的集合體；「政府」則是合法的強盜和犯罪組織。消滅國家和政府，建立在工團或是契約之上的自由聯合，才是最理想的社會形式。其最終目的，在追求個人思想與自由的完全解放，還有人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權利。

無政府主義之所以能吸引李大釗等知識分子的目光，不僅因為它的理念和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極為相近，同時它還充分反映五四時期，中國社會改革的理論需求。更重要的是，在個人成就的心理上，無政府主義思想內涵的豐富性，讓每個中國知識分子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需要，這是其作為一種社會哲學的力量所在。<sup>105</sup>就是在這一種「被選擇」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使得該思想逐漸在中國成為一種普遍性的革命話語。<sup>106</sup>換言之，李氏等五四激進知識分子，他們常常在無意間使用、甚至是擴大原來無政府主義語言中的概念，將「互助」視為一種普遍性的人際道德，而非限制在社會主義中階級觀念之下的互助與鬥爭關係，並以此描述並思圖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sup>107</sup>於是可以說，李大釗等激進知識分子雖受無政府主義語言影響，但他們卻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者。

不同於清末民初的政治激進分子，李大釗直斥沒有「群德」的暗殺行動是人世間的罪惡，是一種以暴制暴的手段。<sup>108</sup>他選擇的是無政府主義思想中具有建設意義

<sup>104</sup> 「無政府」(anarchy)一詞是由兩個希臘詞「缺乏」(an)和「統治者」(arkhè)所組成，其字面意思為「無政府」或「無統治者的狀態」。安德魯·文森特(A. Vincent)著，袁久紅等譯，《現代政治意識形態》，頁189。

<sup>105</sup>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頁78。“In explaining why anarchism has remained alive as a revolutionary faith in the West in spite of the failure of anarchists to achieve any important results, James Joll has observed that a basic strength of anarchism has been its offer of something for everyone; the diffuseness of anarchist ideology—its weakness as a practical radical ideology—has been its strength as a social philosophy.” See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83-84.

<sup>106</sup>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頁36。“The discourse on the social, as I have already observed, drew on disparate ideological sources in European socialism. Nevertheless, with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these ideological sources were integrated, however uneasily, into the language of a common discourse on revolution, and this explains the overlap between otherwise conflicting notions of the social. For the same reason, we may also view the effort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revolutionaries—anarchists, Bolsheviks, Guomindang socialists, among others—to appropriate the discourse, a way of talking about social revolution, as alternative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s different ways of interpreting the discourse by rearranging its terms, through which they sought to constitute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vol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oli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interests, which in turn were conceived in relationship to broader national and social interests.” See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38-39.

<sup>107</sup>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486。

<sup>10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1卷，〈原殺（暗殺與自殺）〉，頁45。



的內涵。在李氏追求民主的過程，逐漸體認到中國問題不僅要求政治改革，整體社會亦有必要重建。社會改造的目的，即在於解放社會中的人人：

現代的時代是解放的時代，現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對於國家要求解放，地方對於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對於本國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對於強大民族要求解放，農夫對於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對於資本家要求解放，女子對於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對於親長要求解放。現代政治或社會裡邊所起的運動，都是解放的運動！<sup>109</sup>

李大釗認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便是走向社會「解放」的目標。解放的意義，在於破除任何權力宰制的結構。該結構包括了世界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侵略，國家中央政府對地方的壓迫，國家內部的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傳統中國家父長制社會，對婦女和子女的權力控制。李氏認為，一個合理的改革程序是，從社會到國家，從地方到中央，再由被殖民者到殖民者的方向前進，最終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配合五四期間的社會改造思想，最初工作就是要將中國人民，包括工農、青年、婦女們，從基層社會的黑暗中解放出來。

社會解放的目的，不僅在於將個人從原有的權力結構中掙脫出來，更重要的還有思想解放。這裡的思想解放，還包括兩種對象。第一，是對未曾接受教育的人而言。因為社會權力結構的控制，同時亦伴隨個人思想對自我的控制，所以解放社會的第一步，就是向群眾傳播新思想。第二，是對知識階級而言。尤其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京政府，處處提防、限制國內過激派和過激思想的情況下，李大釗更加重視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sup>110</sup>換言之，其作法就是先讓一部分的知識階級有開明的思想，然後再將新思想傳達給芸芸眾生，使他們也能從舊思想的禁錮解放出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解放思想來源，是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的代表，克魯泡特金，及其提出的「互助論」(mutual aid)。在克氏理想化的公社組織中，人人本著互助精神，為需求而生產，及按勞分配的經濟思想，和中國人所嚮往那「各盡所能，

<sup>10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頁282。

<sup>110</sup> 「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斷斷沒有一點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樣禁止他、制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因為思想的性質力量，本來如此。我奉勸禁遏言論、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論自由來破壞危險思想，不要借口危險思想來禁止言論自由。」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頁346。

各取所需」的社會理想相當貼近。<sup>111</sup>克氏認為，人類社會構成的原理，和自然界的動物相同，都是基於互助的本性。互助原則，是社會發展的信條。它主要來自於歐戰的反省，以及對赫胥黎等人走向極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這樣的互助思想，充分得到中國新知識分子的共鳴，其原有意義並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擴大，而失去原有的無政府主義之義。<sup>112</sup>李大釗便曾為文批評「競存」的社會觀點。強調社會進化的原理，應是互助，而非互競。<sup>113</sup>這成為社會改造的思想主流，在中國的知識界引起一場廣泛的「互助運動」。

### （三）中國社會的互助運動

為普遍實現社會互助，「少中」會員左舜生即認為，必須透過成立「小組織」的方式。為的是脫離鬼域，營造一種人的生活。<sup>114</sup>這一點，實際上也是當時力主社會改造者的共通之處。為達到結構和思想上雙重的解放目的，便是要人人都能脫離舊組織，創造新組織的生活。<sup>115</sup>如此才能擺脫舊傳統風俗名教和資本主義的剝削，以培養新社會的道德觀。對此，他們分別在城市和鄉村，進行多項試驗工作。

城市方面，首先李大釗等人主張，凡生活於城市、鐵路周邊或是礦廠的工人，都應成立初步的工人團體，以捍衛自身權益。<sup>116</sup>進一步要做的是，「應該要求一種 Democracy 的產業組織，使這些勞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種均等機會去分配那生產的結果。」<sup>117</sup>成立工人的聯合組織，以決定生產和分配，這是來自歐洲的工團主義思想。其次，他們希望以「教育」和「勞動」方式，讓「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打成一氣」。<sup>118</sup>其具體行動，如受北大支持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在 1919 年初成立。該講演團主要領導人物，即北大學生領袖之一的鄧中夏。鄧不但是「少中」會員，日後亦

<sup>111</sup> 「我們可以說：一切村落中日常工作（如維持道路、橋梁、堤防、田間水道、伐林、種樹等等。）都是全村人民共同擔任的；村中的土地，亦由本村作主，出租於鄰村的農人耕種；村中草場的牧草，亦由村中收割；這情形好像托爾斯泰所描寫的那樣：當刈草的時候，老、幼、男、女皆來共同操作。共產村落制度，便應有盡有了。這些事實，日常習見於於俄國全部。」引自彼得·克魯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著，帕米爾書店編輯部譯，《互助論》（台北：帕米爾書店，1980 年），頁 299~300。

<sup>112</sup>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 486。

<sup>11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新紀元〉，頁 267。

<sup>114</sup> 記者，〈討論小組織問題〉，《少年中國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19 年 8 月 15 日。

<sup>11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頁 282。

<sup>11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騾馬〉，頁 315。

<sup>11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勞動教育問題〉，頁 291。

<sup>11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青年與農村〉，頁 304。

同李氏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北大講演團不僅在城內，還定期到城外的農村進行講演。其宗旨是「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sup>119</sup>在教育工人成爲知識階級的同時，李大釗亦盼望知識青年能加入勞工團體，實際參與勞動，以期許他們也能成爲工人階級。<sup>120</sup>

鄉村方面，由於受到日本文學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思想」影響，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注意和仿效。其理念主要來自互助論、烏托邦社會主義和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在 1919 到 1920 年間曾與李大釗有多次聯繫的周作人，便是從日本九州的日向新村，引進「新村思想」的重要推手。<sup>121</sup>周氏說明新村運動的原則，是以協力、自由、互助、獨立，作爲生活的根本。他概述了新村的精神爲：第一，各人應各盡勞動的義務，無代價的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第二，一切的人都是一樣的人；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却又完全發展自己個性。<sup>122</sup>在新村生活的小世界裡，將個人的「勞動」與「所得」分離。事實上，它間接否認私有財產，認爲人有自然賦與的生存權利，它不受外在環境剝奪。相對於權利的享有，人必須進行勞動義務。此處的勞動並非負擔的概念，而是強調在自然界中，人需要透過勞動展現其價值。而這份價值，又非因個人勞動的特殊情況形成差別。它強調人人平等，但在發揚平等的共性同時，卻又不消除各人擁有的個性。所以在勞動過後，村民可以不用煩惱生活上的衣、食、住，可以自由選擇要過的生活方式。李氏不僅爲響應新村運動，曾特別爲文介紹美國的宗教新村，和歐文（Robert Owen）的新村運動，<sup>123</sup>還不時鼓勵青年們「上山下鄉」，到黑暗的農村去過勞動生活，以散播知識的光明。

此外，還有青年的解放問題。「少中」不僅支持、實踐新村運動，還包括有「工讀互助團」。當時在學生界普遍盛行的工讀運動，除了受到留法勤工儉學的風氣影響，又得到蔡元培、胡適、周作人的支持。於是該團在王光祈指導下，在 1919 年底成立。它主張用半工半讀的方式維持生活。一方面，要使青年在經濟上獨立，以便

<sup>119</sup> 原文出自〈平民教育講演團征集團員〉，《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7日。轉引自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頁108。

<sup>120</sup> 王汎森，〈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載於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頁289。

<sup>121</sup> 日向為日本古代的令制國之一，相當於現今日本的宮崎縣一帶。

<sup>122</sup>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載於《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1日。

<sup>123</sup> 李大釗關於新村運動的文章有〈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歐文（Robert Owen）底略傳和他的新村運動〉兩篇。原來李氏在《星期評論》介紹完美國的宗教式新村後，還要介紹其他三派的新村，但卻因篇幅關係而中斷。原書見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頁151、245。

自被視為中國社會萬惡之源的家族制度解放。<sup>124</sup>另一方面，則要實現「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在李大釗看來，勞動生活作為一種「樂境」，讓社會普遍奉行一種「尊勞主義」的構想，這對於勞動青年而言，將會是一種階級意義的解放。<sup>125</sup>

至於婦女的解放，對改造中國社會的意義尤為重要。因為婦女占了約人口半數，相對於男子而言，她們是中國社會自由最受限制的族群。在舊家族制度中，婦女不僅要遵守三從四德，在經濟上也無法獨立自主。李大釗認為那如同是「半身不遂」的社會文明。所以在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上，婦女的解放應是重要任務。而解放的工作必須從廢娼開始；<sup>126</sup>然後再試圖聯合婦女，共同打破那男子專斷的社會；再者，聯合世界無產階級的婦人，共同打破有產階級的社會制度。<sup>127</sup>「沒有婦女解放的 Democracy，斷不是真正的 Democracy。」<sup>128</sup>

新互助組織的建立，主要目的在於改造社會，解放包括工農、青年、婦女等社會階層。不但打破舊傳統的束縛，還連帶改變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不論是在城市成立的工人組織，或是在鄉村的新村運動，它們共通的精神，在於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結合。其意在消除階級隔閡，符合無政府主義中的「工學合一」理念。這一點與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意識的產生，恰是反其道而行。此外必須釐清的是，這群以無政府主義思考中國社會問題的知識青年，他們所主張的社會改革，並非反國家主義。他們認知到，在那時中國各社會階層盡皆軟弱的情況下，<sup>129</sup>「強社會」是成為「強國家」的一項必要條件。所以反對「由組織產生權力」的觀點，只能在嚴格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者身上發現。由於思想本身具有的選擇性和跳躍性格，使得各人對外界事物的認知因人而異。這讓李大釗所理解的互助思想，其意義並不局限於社會改造，而更擴及到政治層面。

<sup>12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萬惡之原〉，頁356。

<sup>12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頁318。

<sup>12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廢娼問題〉，頁334。

<sup>12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戰後婦人之問題〉，頁299。

<sup>12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婦女解放與 Democracy〉，頁68。

<sup>129</sup>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特徵是，各階層的軟弱性格。有一個弱小的資產階級，還有一個更弱小的無產階級。所以在民初時期，並無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條件：即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並以之擔任引領國家發展的重要角色。在「弱社會」的狀況下，就沒有「強國家」的誕生，自然中國政治就只得任由軍事強人擺布。詳見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5~9。原書見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pp. 6-8.



#### （四）由互助走向大同世界

自中國社會基層發起的互助運動，其來源雖和政治領域沒有太大關係，但在李大釗所規劃的政治藍圖中，卻成爲一個重要的思想元素。李氏認爲「互助」的意義，不僅止於在社會上創造新的生產組織。互助作爲一種新的社會道德，其發揮範圍之大，可自身、家、國，乃至於天下。不僅是解放社會各階層，在軍閥割據的背景下，李大釗在政治上還主張「聯治主義」。<sup>130</sup>與擁袁時期的李氏明顯不同，相較於中央集權，此刻李大釗認爲要適度解放地方「個性」的自由。但這不意謂著分裂，在解放地方的同時，還要發揮「共性」的互助，以形成一個符合民主精神的廣大新聯合。<sup>131</sup>用現代的政治語言來說，就是建立一個類似於「中華聯邦」的組織。但如從國家主義的觀點來看，許多「少中」有志於社會改革的青年，其思想可能僅止於此。

然而，對於嚮往世界走向大同的李大釗而言，「中華聯邦」只是第一個步驟。在歐戰結束後，世界逐漸打破國家界線，國際政治和經濟交流日繁，世界的聯合組織也正逐漸形成。如召開巴黎和會，或是海牙的國際仲裁機制等等。李氏認爲，當各民族國家都成爲解放個性，又能發揮共性的聯邦之後，第二步，就是在美洲、歐洲、亞洲形成各自區域性的聯邦。第三步，就要聯合美、歐、亞三個區域性聯邦，成爲一個大的世界聯邦，如同威爾遜曾提倡的國際同盟。最後階段，就是聯合世界人類，組織一個人類聯合，將種界和國界都一併打破，如此便達到世界大同。<sup>132</sup>和同時期的社會改革分子相較，李大釗的互助精神，及其衍伸出對於世界政治發展進程的架構，顯然是相當突出的思想特色。此處也顯示李氏其身雖在社會改革，但心卻仍掛念於政治，說明了李大釗政治思想前後的一致性。

至於李大釗社會思想的混雜狀態，則呈現出其內在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思想矛盾是：在歐戰之後，李氏一方面積極宣揚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卻又相信基於「人道主義」的互助精神而推動的社會改革。由此出發，它在李大釗社會主義的價值體系中，形成了三個主要對立的命題。首先，對於社會發展

<sup>130</sup> 李大釗主張的「聯治主義」常讓學者將它與當時喧騰一時的「聯省自治」劃上等號，如陳志讓和 Jean Chesneaux 在其著作中，都將李氏視爲是聯省自治主義者。但根據李達嘉研析，當時「聯省自治」的提出首創於1920年8月。其本義開始不過是鼓吹湖南、四川結成「自治同盟」，以共同對抗北京政府，可說是在時局下所產生的一種應變措施，與李大釗社會主義觀點的聯邦思想實際上毫無關係可言。詳見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台北：弘文館，1986年），頁77~78。

<sup>13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頁284。

<sup>13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頁286。

的觀點，究竟是基於科學主義，抑或是人道主義？其次，從社會改革發展的過程來看，應該是要進行一場階級鬥爭，還是推展互助運動？再者，在這一場世界都將要面臨的社會變革浪潮，中國選擇的方式，是要由下而上的有血革命，還是由上而下的無血革命？<sup>133</sup>這些內在心理的矛盾衝突，在李氏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過渡成爲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思想意義。它不單單是個案研究，也能看作是對當時中國知識分子，逐漸走向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一個典型案例。<sup>134</sup>

爲解決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在矛盾，確立少年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李大釗於1917年7月發表〈階級競爭與互助〉，提出「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的新主張。文中將文明分作「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從人道主義出發，該主張基本上預設人類普遍存在著互助、博愛的道德觀念。而一切的社會主義思想，不論是「空想」或是「科學」的，都應建立在人類的道德觀點之上。<sup>135</sup>但同時，李大釗亦受到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影響。對於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剝削原理的「剩餘價值論」，李氏很爽快的接受了；然而就互助觀點的立場看來，「階級競爭說」卻是令李大釗感到相當棘手的部分。<sup>136</sup>爲了「調和」內在的矛盾觀點，李氏不得不作出如下解釋：

但是 Marx 明明的說：「所有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又說：「資本家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的生產方法採敵對形態者的最後。」又說：「人類歷史的前史，以今日的社會組織終。」可見他並不是承認人類的全歷史，通過去、未來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他的階級競爭說，不過是把他的經濟史觀應用於人類歷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於人類歷史的全體。他是確信人類真歷史的第一頁當與互助的經濟組織同時肇啟。他是確信繼人類歷史的前史，應該辟一個真歷史的新紀元。<sup>137</sup>

從上段文字可以發現，李氏開始學習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解釋社會發展。在馬克思的想法中，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化，透過階級鬥爭，社會組織也隨之改變。其中不需要靠人的意志，人類社會最終自然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而這樣的社會理想，李大釗卻認爲是一個人類互助與博愛精神完全展現的社會。爲

<sup>13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戰後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會革命與無血的社會革命〉，頁290。

<sup>134</sup> 詳見後藤延子，〈李大釗におかる過渡期の思想—物心兩面の改造—〉，載於《日本中國學會報》（東京），第22集，1970年，頁174~175。

<sup>13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階級競爭與互助〉，頁354。

<sup>136</sup> 參見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493。

<sup>13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階級競爭與互助〉，頁356。

了「調和」階級鬥爭觀點，首先，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階段，李大釗將階級鬥爭放入人類的「前史」。「前史」的終結要直到最後的階級鬥爭結束，此後就是人類互助精神完全發展的新世紀，階級鬥爭最終將被揚棄。

其次，雖然李大釗說明，階級鬥爭是人類前史發展的必經之路；但這並不意謂在人類前史的社會，沒有人性互助和博愛的一面。所以李氏認為在前史時期，物質改造的同時，人類的道德精神也要不斷地警惕和改造：

這個精神的改造，實在是要與物質的改造一致進行，而在物質的改造開始的時期，更是要緊。因為人類在馬克思所謂「前史」的期間，習染惡性很深，物質的改造雖然成功，人心內部的惡，若不剷除淨盡，他在新社會新生活裡依然還要復萌，這改造的社會組織，終於受他的害，保持不住。<sup>138</sup>

由此可見，不同於唯物史觀強調的自然發展觀，李大釗相當肯定人的「實踐」對於社會改造所發揮的積極力量。<sup>139</sup>在精神層面上即本著人道主義，以改造墮落的社會人心。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更為重視物質層面的改造。如果經濟組織沒有改變，那麼精神的改造便很難成功；經濟組織形成的「基礎構造」，是直接影響一切文化「表面構造」的力量。<sup>140</sup>所以李氏才會提倡本著勤工主義精神，要創造勞工神聖的組織。

如此看來，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李大釗最終沒有迴避掉階級鬥爭，而是將階級鬥爭放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時程表。又強調在階級鬥爭的人類前史，同時要發揮人性的互助。「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不但化解了科學主義與人道主義間的衝突，還說明除了階級鬥爭，亦要進行互助運動。它調和了李氏社會主義的思想矛盾，並「暫時」達到其內在思想的統一。至於革命實踐究竟要不要流血，以李大釗不喜爭鬥，不願以暴制暴的態度，可以想見李氏極不贊成。相反地，李氏隱約透露出相當欣羨英國的無血革命。<sup>141</sup>但中國人又實無英國人的政治天才，所以李大釗並不直接回答問題，反而是將問題留給了文章的讀者去想像。

總而言之，雖然「外因」很早便影響李大釗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但在後續發展，從「內因」解釋來考察李氏政治思想的變化，反而更能說明李早期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理解的混雜狀態，同時也否定早年中共史家常有的論斷：即李大釗自從受到俄國

<sup>13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頁12。

<sup>139</sup>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494。

<sup>14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頁12。

<sup>14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戰後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會革命與無血的社會革命〉，頁290。

十月革命影響，就自然毫無經過批判地成爲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那麼李氏在無意間，以無政府主義作爲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橋梁，要到何時才能到達彼岸呢？從理解的層次來看，李大釗爲化解互助的人道主義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兩者之間產生矛盾而作的〈階級鬥爭與互助〉，可以象徵是李氏社會主義思想混雜的最後。這種由內因造成的「前馬克思主義」現象，不久又經過胡適和李大釗在問題與主義論戰的爭辯，逐漸地爲李氏確立以馬克思主義爲中心的政治思想。

### 第三節 李氏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其中不能忽略的是：應將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兩者之間的前後因果關係，細心地加以區別開來。如此才更有利於理解五四激進思潮的複雜。<sup>142</sup>如前節所述，李大釗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來源豐富，包含無政府主義的互助思想、工團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等等，這不但說明五四中國面臨到的社會改革需求，也表現了新知識分子急於向外尋求救國方法的思想傾向。然而在吸收、運用新思想的過程中，對於這些思想，大多數的人卻僅重視其社會效果如何，卻不問是否適用於中國國情。所以新知識分子一開始對於這些來自西方而色彩紛呈的思想、主義，一時也沒有弄得十分明白，他們常會環繞在共通的社會目的，引述各家的解決辦法，如此便造成了一種思想混雜的局面。

#### 一、對馬克思的認識過程

如從李大釗自 1918 年下半年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朦朧的理解過程，便能見其思想混雜的特點。李氏首次注意到馬克思主義，是在歐戰結束之後。在他發表的〈Bolshevism 的勝利〉一文，便清楚的提到：

Bolshevism 就是俄國 Bolshiviki 所抱的主義。……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士（Marx）為宗主的；

<sup>142</sup> 德里克（Arif Dirlik）早已指出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直接關係：“In 1918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as still an attempted revolution, not a successful one. Its future was uncertain, its concerns unclear. Chinese reports on the Revolution in 1918, like those worldwide, showed some recognition of its leadership and ideological ancestry, but this was too vague to allow an ideological stand.” See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p. 25.



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sup>143</sup>

此處明確說明李大釗，是因為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黨，而開始注意到德國哲學家馬克思。但在同一篇文章中，李氏亦提到下列一段話：

他們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每個聯合都應該有個中央統治會議，這等會議，應該組織世界所有的政府，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裡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這是 Bolsheviki 的主義。<sup>144</sup>

如將李大釗描述布爾什維克的上述引文，和前一段引文兩相對照，則其中似乎有些違和感。因為就近代歐洲社會主義發展的脈絡來看，上述引文的描述，似乎還要更接近於革命的工團主義。他們希望成立工人的聯合團體，透過總同盟罷工的手段，以取代資本家和政府，主導社會的生產和資源分配。它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認為，應該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實踐極權主義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明顯不同的。雖然他們的社會目的，都是推翻資本主義體制，但在方法、手段上，卻又各有主張。於是在李大釗早期的革命話語中可以發現，互助運動、進行勞工聯合、推動總同盟罷工、組織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黨、宗奉馬克思主義等等，大致都讓李氏整合起來，被當作是一種廣義的「革命社會主義」。所以，在李大釗這段期間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發現到的馬克思主義元素，包括剩餘價值論、階級鬥爭說和唯物史觀等，都能被視為李氏所謂「革命社會主義」中的一部分。

當時李大釗對於社會革命可謂相當熱情，他認為世界歷史正掀起一股巨大的變化。「一九一四年以來世界大戰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奧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場大洪水。」<sup>145</sup>這場大洪水，將把過去陳舊的組織，腐滯的機能都一一掃清。而歐戰後世界的社會革命浪潮，也被李大釗比喻作日本九州的「櫻島」火山爆發的情形；就連沒有火山的地方，也要沾上一點灰塵。<sup>146</sup>

<sup>14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Bolshevism 的勝利〉，頁259~260。

<sup>14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Bolshevism 的勝利〉，頁260。

<sup>14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新紀元〉，頁266。

<sup>14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戰後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會革命與無血的社

李大釗的社會思想傾向，其中有許多因素，不能不說是來自中國以外的暗示。例如日本國內的貧富差距和勞工問題，及其因米價上漲而造成的「米騷動」事件等等，<sup>147</sup>都讓李氏深刻感受到，今日的政治問題，等同於麵包問題。<sup>148</sup>因應前述日本社會情況，大正民主時期的社團可謂相當活躍。當時提倡民本主義的吉野作造等人及其組織的黎明會，就很得李大釗認同。甚至讓李氏有志要在東方，同樣掀起一股黎明運動。他希望東洋民族能先協力結成一個聯合，日後再加入世界人類的大聯合。<sup>149</sup>這也就呼應李氏以互助精神發展的大同世界觀。

同樣在思想界，中、日都受到了俄國革命影響。自 1910 年發生大逆事件以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便進入了嚴冬時期。而在此刻日本社會矛盾日益嚴重的情形下，又重新引發思想界對於社會主義的關注。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高島素之等人創辦的《新社會》雜誌，從 1917 年到 1918 年間，就刊載許多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的河上肇，則於 1919 年 1 月開始刊行《社會問題研究》雜誌。<sup>150</sup>儘管他們的行動都受到日本官方的密切注意。

此處所以重點介紹日本社會和思想界的狀況，是爲了呼應一個觀點。就是在中國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過程中，不能忽略日本的中介作用。在很多的狀況下，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經過了日本的轉譯而來到中國。於是在日本和中國一同被捲入世界的社會革命浪潮時，李大釗對於東洋民族攜手聯合的信心，可說是其來有自。只要通過當時中外重要的印刷媒介，像是李大釗一類的知識分子，也都比較容易取得外來知識。李氏就是在中日思想界的共通背景之下，透過兩者的中介作用，取得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資訊，而當時北京的《晨報副刊》，就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媒介角色。

《晨報》的前身，即是 1916 年創刊的《晨鐘報》。1918 年，因報導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消息而遭封閉，<sup>151</sup>並於同年 12 月重新出版，改名爲《晨報》。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推展，《晨報》的「副刊」一即五四時期逐漸在中國報紙上出現的附錄，和當時的《新青年》等文化雜誌一樣，成爲了傳播白話文學和新思想的重要工具。自

會革命》，頁 289。

<sup>147</sup> 1918 年 7 月到 9 月，在日本因為米價暴漲而發生了「米騷動」事件。該事件的發生背景和原因，主要是來自「大戰中資本主義的猛烈發展和地主制下的落後農業之間的矛盾」。該事件最後迫使寺內正毅內閣下台，並由原敬組織新內閣。詳見今井清一著，楊孝臣、郎唯成、楊樹人譯，《日本近現代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年），第 2 卷，頁 119~122。

<sup>14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麵包問題〉，頁 274。

<sup>14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祝黎明會〉，頁 301。

<sup>150</sup>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 15。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 38。

<sup>151</sup>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727。

1919年4月起，署名「淵泉」的記者，便在《晨報副刊》上刊登〈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鬥生涯〉。5月，《晨報副刊》又另闢了「馬克思研究」的專欄，成為中國在五四期間，公開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開端。<sup>152</sup>其後，「淵泉」又陸續自日本輾轉譯載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馬氏資本論釋義〉等文章。其中從6月連載至11月的〈馬氏資本論釋義〉，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權威——考茨基（Kautsky）的重要著作《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以當時的學術環境條件，五四知識分子最初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很多都是從「淵泉」的譯文著手。根據文獻比對，代表著李大釗思想轉向的重要著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其中內容就很有可能是參考「淵泉」譯自河上肇的文章。<sup>153</sup>

早年部分學者認為，這個「淵泉」不是別人，正是李大釗。原因在於，李氏最初在《晨鐘報》擔任過編輯。雖然不久便辭職離去，但日後李大釗，仍陸續在《晨報》上發表文章，顯示其間關係仍然密切。李氏作為中國的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在《晨報副刊》上，以「淵泉」為筆名，發表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文章，顯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但近來，根據較新的研究結果發現，證明了這個「淵泉」不是李大釗，而是陳溥賢。<sup>154</sup>

陳溥賢，字博生，福建閩侯人，於1891年生，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和李氏相識，他們都共同加入了留日學生總會，參與過海外的反袁運動。1916年，陳溥賢和李大釗還一齊進入《晨鐘報》擔任編輯，直到1918年底，陳溥賢被《晨報》派往日本東京擔任特派員。陳一方面關注巴黎和會前後日本朝野的態度；另一方面，採訪引發日本社會熱烈迴響的黎明會，以及日本社會主義嚴冬之後，其思想界狀況及工人運動情形。<sup>155</sup>到了隔年4月，陳溥賢才又歸國，以「淵泉」為筆名，譯寫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文章，並於《晨報》上刊行。於是，陳溥賢這一條訊息的線索，便成為李大釗了解日本黎明會活動、開始接觸並著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渠道。陳、李二人的密切關係，可能一直延續到五四之後。<sup>156</sup>到了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陳溥

<sup>152</sup> 石川禎浩著，王捷譯，田子渝校，〈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思想與茅原華山、陳溥賢〉，頁15。

<sup>153</sup> 根據彭明和楊奎松的比較研究，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的部分內容，其中就參考了河上肇的〈馬克思社會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文。詳見彭明、楊奎松，〈李大釗政治思想演變的歷史考察〉，載於彭明，《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十講》，頁344~347。

<sup>154</sup> 石川禎浩著，王捷譯，田子渝校，〈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思想與茅原華山、陳溥賢〉，頁16。

<sup>155</sup> 石川禎浩著，王捷譯，田子渝校，〈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思想與茅原華山、陳溥賢〉，頁16。

<sup>156</sup> 1927年4月李大釗犧牲時，梁漱溟對陳、李關係有一段回憶如下：「我出寺門，路過陳溥生走來。他是福建人，與守常同主《晨報》筆政。」參見梁漱溟，〈回憶李大釗先生〉，載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回憶李大釗》，頁89。

賢加入了國民黨陣營。1949年他隨著中央通訊社撤往台灣，並於1957年逝世。

以陳溥賢作為一個案例，說明著當時中日思想界同樣都受到俄國革命影響，而且資訊同步交流，這個現象對李大釗和同時期的新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理解上頗有助益。但正如前文曾強調的，李氏是戴著中國原有的西方社會主義思想這樣一副眼鏡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所以當李大釗持有的互助思想遇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概念，其間所產生的矛盾就不得不讓李氏進行一段思想調適的工作。這項工作的具體成果，就是1919年7月發表的〈階級競爭與互助〉一文，文中從人道主義出發，將階級鬥爭的概念納入人類的前史，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互助的世界大同觀點，從而達到其內在思想的一致。然而這僅僅是暫時性的，該文的發表是李大釗在「前馬克思」時期的最後，因為過於理想的世界，往往禁不起現實考驗。

## 二、信仰歸於馬克思主義

五四期間，中國面臨的逆境，無時無刻不讓社會改革者感到憂心。在國際方面，對於巴黎和會在山東問題解決方面的不滿，讓李大釗看清國際社會，仍舊是一個資本主義主導的強盜世界。<sup>157</sup>在國內方面，南北議和的失敗，對於社會的民心士氣亦造成嚴重打擊。在社會改革方面，新村運動和工讀互助團的社會理想計畫，都因為經費問題，甚至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環境的制約，而經營不善。<sup>158</sup>由此，李氏從互助思想形成的大同世界觀，在許多方面，都產生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衝突。於是當李大釗的人道主義改革理想面臨崩壞之際，就為李氏往後接受全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1919年7月到1920年1月之間，可以說是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一段關鍵時期。

### （一）問題與主義論戰及其意涵

1919年初，胡適對中國過激主義的傳播，已感到不安。2月，正好杜威一家赴日遊歷、講學。這個消息，讓五四知識分子感到極為振奮。於是在中國的杜威弟子

<sup>157</sup> 「我們反對歐洲分贓會議所規定對於山東的辦法，並不是本著狹隘的愛國心，乃是反抗侵略主義，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頁337。

<sup>158</sup> 在一封李大釗給陳獨秀的信中曾提及：「我以為在都市上的工讀團，取共同生產的組織，是我們根本的錯誤。都市的地皮、房租這樣富貴，我們要靠資本家給勞動者的工資和商賈小業的蠅頭，維持半日讀書半日作工的生活，那裡能夠？」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都市上工讀團底缺點〉，頁179。



們簇擁之下，統一讓胡適寫信力邀杜威順道中國。<sup>159</sup>而當時對於中國問題亦有相當興趣的杜威，也就欣然接受了。4月，杜威一家到了上海。5月，杜氏目睹了五四學潮。<sup>160</sup>其後，又在中國南北各地講學。直到1921年7月返美，前後共長達兩年多的時間，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對於杜威、胡適而言，這不啻是一個絕佳機會，去向中國人宣導他們的美國社會價值和實驗主義哲學。但他們的思想，也明顯地與中國社會的激進思潮形成對立。

對杜威到中國這一學術界的盛事，李大釗在文字方面，似乎沒有積極表示。這和李氏自身社會的激進傾向或有關聯。往後胡適和李大釗等人之間，甚至引發了中國思想界重要的「問題與主義論戰」。這場論戰的發生背景，可以從陳獨秀被捕開始談起，當時主辦《每周評論》的陳氏，在北京新世界遊樂場散發主張市民集會和言論自由的〈北京市民宣言〉，而遭警察逮捕。由於北京政府正極力打壓「過激主義」和「過激派」，於是李大釗亦不得已走避鄉里，此情況下，《每周評論》自26期後遂由胡適代理編輯。經由胡適主導的《每周評論》一改原有的政治和學術立場，不但連載〈杜威講演錄〉，胡還於1919年7月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批評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先後引發藍公武和李大釗對於該文章的嚴正回應。

該論戰的爭論焦點，表面上集中於探討「問題」和「主義」的作用，與兩者之間的關係。他們針對中國問題的發生，在解決方法上提出不同意見，這是屬於方法論上的爭議。胡適一方認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為解決面臨的問題，而普遍盛行外來的主義，希望透過抽象的外來主義，來解決實際的問題；但因它脫離了中國社會的現實，所以這只能是一種空談，是沒有甚麼用處的。<sup>161</sup>「主義」的起源，原是應時勢而起，是根據某種特定時空環境下的「問題」，而產生的解決方案。這是一種實驗主義的精神，惟有將一個一個的實際問題分別解決，才能達到「社會改良」的效果。但在「主義」向外傳播的過程中，外來主義便只能是抽象的，而且容易讓有心

<sup>159</sup> 受過杜威教育的中國弟子，其中較有名氣者，包括胡適、陶知行、郭秉文、蔣夢麟等人。元青，〈杜威的中國之行及其影響〉，《近代史研究》（北京），第2期，2001年，頁134。

<sup>160</sup> 杜威對於當時如火如荼進行的五四運動的評價如下：「這場運動的感情成分多於思想成分。它還伴隨有誇張、混亂以及智慧與荒謬的雜合。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這場運動在開始階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徵。……人們可以譏笑整個運動不夠成熟，不夠深刻；也可以譏諷它是或多或少地把一些不相關的觀點、一些支離破碎的西方科學與思想胡亂地拼湊在一起。……但是，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未來奠定最牢固的希望基礎。」原文出自1921年杜威在《亞洲》雜誌上發表一篇題為〈New Culture in China〉的文章。轉引自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建譯，《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台北：桂冠圖書，2000年），〈導言〉，頁XLVII。

<sup>161</sup>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載於《胡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8年），頁343。

政客利用作為政治資本。<sup>162</sup>但須注意的是，胡適認為外來主義也並非毫無作用。它在解決中國問題時，一樣可以視作一種參考的學理、工具：

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肚裏，自然「會」起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sup>163</sup>

胡適寫作該文的出發點，原也是起於對當時北京政府的安福部首領王揖唐提倡民生主義的批判。但是胡適卻又乘機將該批判，擴大到整個中國思想界對於外來主義的傾心態度——那些偏好主義的知識分子們，得到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該議論一發，任職於《國民公報》的藍公武，首先便在報上發表〈問題與主義〉一文反擊胡適。藍氏的態度是贊成外來主義的，他認為「主義」原來就具有未來的理想性，而且是主義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某種問題的趨向、態度。<sup>164</sup>相對地，「問題」則是來自於實際利害，而且問題的形成過程，除了環境的客觀條件之外，藍氏更強調人為主觀因素。藍氏認為，在解決問題的程序上，是抽象主義在具體問題之先，人們必先有共同信仰的主義，才會形成共同的實際問題，方能生出解決的辦法。<sup>165</sup>

「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需要經過人的自覺，而在這個自覺的過程中，主義便成為了重要的思想材料。這一點李大釗和藍公武的意見是相近的，李氏在避居昌黎五峰期間，寫作〈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回應胡適的意見，其中無意附和了藍氏的想法：

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

<sup>162</sup>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載於《胡適文存》，頁343。

<sup>163</sup> 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載於《胡適文存》，頁372。

<sup>164</sup> 藍公武，〈問題與主義〉，載於胡適，《胡適文存》，頁351。

<sup>165</sup> 藍公武，〈問題與主義〉，載於胡適，《胡適文存》，頁348~349。

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sup>166</sup>

如上所述，李大釗和藍公武都不約而同地，加強了抽象的外來主義和實際的國內問題之間的聯繫。總而言之，胡適認為問題的解決方法和原則，只能從具體的問題出發形成；相對地，李、藍二人則認為，具體的問題必須先從理想的主義出發，再來考慮解決的辦法。

然而，如果只從「問題」與「主義」兩者的概念和彼此關係的爭論來看待這一場論戰，顯然無法闡明其深層意義。從中國近現代思想發展的脈絡觀察，問題與主義論戰可說是前者東西文明論戰的延續，文明論戰的本質主要在於探討東西文化的優劣，而其後於此一基礎上進行的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就是在中國發生了西方思想內部的矛盾。也就是說，問題與主義論戰的本質，是中國的實驗主義者與廣義的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對立，而廣義的社會主義則包括了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等。由此觀之，問題與主義論戰並非僅僅停留在其表面所提到的方法論層次，其間更大的區別，應回到各自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當中對於「真理」與「科學」觀念的探討。如果說問題與主義論戰是中國整體思想界發展中的一個階段，是對西方的「真理」和「科學」觀念進一步的釐清，那麼對於理解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便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中，相較起來，同是學習哲學背景出身的胡適和藍公武作的是名詞之爭，而胡適和李大釗則是一種社會的「改良」與「革命」之爭。胡適提及，如果我們只是高談主義，不去研究具體的問題，還要得意洋洋誇口說，談的是「根本解決」，那只是自欺欺人的夢話。<sup>167</sup>對此，李氏則辯護道：

若在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就可以用這工具作起工來。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

<sup>16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再論問題與主義〉頁1。

<sup>167</sup>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載於《胡適文存》，頁345

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sup>168</sup>

不論胡適還是李大釗，他們都重點提到了是否要「根本解決」的問題。胡適相當反對社會主義傾向的根本解決，而支持「社會改良」的路線。李氏則認為，在東方文化背景下，中國那種靜的、遲滯的社會必須要進行一次整體性的變革。至於雙方誰說得比較清楚有理，若仔細觀察胡、李二人思想前後發展的脈絡，這一場論戰顯然是胡適占了理論上風。

胡適受過美國教育，得道於哲學大師杜威，並以中國的實驗主義者自居。當杜威在中國期間，胡適不但擔任杜威的翻譯，亦發表了相關文章。除了介紹杜威的哲學和教育理念，還闡發了實驗主義的精髓。在《新青年》第六卷四號發表的〈實驗主義〉一文中，就清楚說明：「真理」不過是人類應付環境的一種工具。所謂的「科學」規律，是人造的，是假定的。學說真假的判斷標準，端看是否在實際上形成「效用」。<sup>169</sup>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胡適認同杜威的科學「方法」：首先，一切有用的思想，都是來自實際上的困難。其次，就是先找到疑難之點，究在何處？再者，提出種種假定的解決方法，並決定那一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方式。最後，被證明有用的假設，才成爲了所謂的真理。<sup>170</sup>

由此看來，問題與主義論戰中的胡適，是站在某種理論上的高度，與李大釗進行辯論的。相對地，李氏的思想狀況則是自十月革命之後，有了社會主義的傾向，主張一種廣義的革命社會主義，目標在於實踐世界的大同理想。然而，在支持李大釗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和架構方面，卻尚未有一定的理論水準。<sup>171</sup>如李氏在回應胡適有關批評根本解決的內容部分，也僅是淺淺說道「依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只要經濟構造一變動，一切表面的精神構造也跟著變動；只要經濟問題一解決，其他的社會問題也都能一起解決」類似這樣缺乏實證的話。換言之，胡適是在實驗主義的範圍，對本體論和認識論中所提到的「真理」和「科學」的堅信下，提出了方法論的問題；而李大釗此刻，連社會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都仍未明，更何況是在方法

<sup>16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再論問題與主義〉，頁6。

<sup>169</sup> 胡適，〈實驗主義〉，《新青年》，第6卷，第4號，1919年。

<sup>170</sup> 胡適，〈杜威之哲學的根本觀念〉，《新教育》，第1卷，第3期，1919年4月。

<sup>171</sup>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490。



論層次上作出全面回應。<sup>172</sup>這點是當時中國一群「前馬克思主義」者，在思想轉變過程中的一致特色。因此在胡、李相較之下，李氏思想中突顯出相對空虛的狀態，便成爲日後李氏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必要條件。問題與主義論戰對於李大釗思想發展的意義，即在於此。

## （二）真理與科學觀的確立

1919年9月，李大釗在輪由他主編的《新青年》第六卷五號「馬克思主義專號」上，<sup>173</sup>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上篇，主要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原理。到了11月，又發表了補充資本主義經濟論的下篇。前後整篇文章，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史上，甚具代表性。該文同時也被部分史家視爲是，李氏公開宣告自己成爲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字證明。然而，李大釗是否在該文發表後，就成爲馬克思主義者，這一點又常令人感到疑惑。那除了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可能還要問李氏本人才弄得清楚。但如前述對於社會主義的真理和科學觀的確認，這一條思想脈絡來看，這一篇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李大釗爲進一步補充、回應胡適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中所作的批評。

雖然李大釗自謙地說，以他平素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來談它，是一件僭越的事。<sup>174</sup>但不同以往，李氏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理論有了更清楚的交代。李大釗大致將馬克思主義的內涵分作三大部分：其一，是對過去的解釋，說明歷史發展的規律，即「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部分。其二，是關於現代世界的經濟組織，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剝削的原理，也就是「剩餘價值論」（文中作「餘工餘值說」）。第三，是關於將來的理論，是人們處於現狀，進行的革命策略，即爲實踐「階級鬥爭」（文中作「階級競爭」）。<sup>175</sup>三者順序層次井然，依照著一定的邏輯安排。其中，資本主義經濟論的部分，因爲涉及複雜的經濟學理，

<sup>172</sup> 胡適批評李大釗和藍公武等這一類，信奉外來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有「目的熱」和「方法盲」的毛病，原因或出於此。詳見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載於《胡適文存》，頁371。

<sup>173</sup> 有些學者認爲，〈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的寫作時間，是在李大釗避居昌黎期間的9月。但也有部分學者持不同看法，認爲原來《新青年》第6卷第5號的預訂出版時間是1919年5月，然而實際上卻延至9月。由於李大釗是當期主編，所以〈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的撰寫，當在5月之前。詳見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頁353，註1。李氏嘗試寫作該文的時間，確實值得商榷。然而，此亦無法代表李大釗在5月之前，對馬克思主義已有相當於該文內容的認識，其間也可能經過數度刪改，再於9月發表。5月之說，僅能說明李大釗剛開始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興趣。

<sup>17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頁15。

<sup>17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頁18。

所以李氏將它獨立寫成下篇。以下，將重點介紹李氏對於馬克思主義內涵的理解，以闡明其不同於胡適的「真理」與「科學」觀。

在解釋唯物史觀時，李大釗說明，一切歷史的發展動力，都源自於「物質」的力量。而在物質當中，又以「經濟現象」最為重要。所謂的經濟現象，指的就是社會的生產關係。其具體的表現，就是社會上所能看見的生產組織。這些生產組織，是作為人類社會的基礎構造；並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決定社會的表面構造。表面構造中，則包括了象徵著人類精神的法律、政治、文化等非物質的現象。這是馬克思主義當中，由經濟的下層建築，來決定道德的上層建築的概念。至於，歷史進程是如何改變的呢？根據唯物史觀，歷史的發展，就是位於下層建築的生產關係的轉變。生產關係發生變化的原因，依照馬克思的說法，是因為社會「生產力」的突破。當生產力越大，使得原來的生產組織無法容納它的時候，結局就是舊生產組織的崩壞，於是造成「社會革命」。<sup>176</sup>同時，適應新生產力的新社會組織因而誕生，相對應地，新的上層建築也將會隨之形成，產生出一套適用於新社會組織的新精神、新道德，人類歷史因而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在歷史唯物論的認識基礎上，接著要談李大釗對資本主義經濟論的理解。依據馬克思的說法，李氏認為，人類所生產的各種物品，其性質雖然各不相同。然而，它們都有一個可以共同比較的元素，那就是各種物品所含「勞工分量」的大小。這個勞工分量的概念，即李大釗所言的「工力」。它是工人在一定的勞動時間，所生產的勞動量。而另一個重要的概念，則為生產工力所必須的「工量」，它是為支應、維持工人生產一定工力的生活必需品。李大釗用了一個簡單的譬喻，說明了工力和工量的關係。如果將一個生產機械當作一個工人，那麼機械生產的物品就代表著工力，而維持機械運作動力的煤炭，就意謂著工量了。<sup>177</sup>如果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家庭手工業的經濟形態，勞動者因為擁有生產工具，所以生產出的工力，係完全由自己支配。其工量，亦應是來自於工力當中的一部分。但是，在現有的「資本主義社會」下，資本家乃挾其雄厚的資本，以工銀制的工廠體制，用「工量」的價格買下工人的「工力」，並取得其支配權。因為「維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價值，永不能與那工力的生產的價值相等」，<sup>178</sup>所以工力與工量之間形成的差額，即李氏所稱的「餘值」，它為資本家所竊取。而餘值相對應的勞工分量，即為「餘工」的概念。

<sup>17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頁27。

<sup>17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頁37~38。

<sup>17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頁38。

於是乎，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即在於此。為擴大個人利益，增加「餘值」，是資本家的手段。他可以透過提高工人的工作時間（工力），或是減少工人的工資（工量），來達到賺錢的目的。當一個社會長期如此，便會出現經濟上對立的兩個階級。一方是壓服別人，另一方是受人掠奪。這樣的兩種階級，在每個時代，都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在資本主義時代，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至於階級對立的起因，主要是來自於社會學上的競爭法則。「宇宙間一切生命都向『自己發展』（self-expansion）活動不已。……階級鬥爭是這種傾向的無量表現與結果中的一個。」<sup>179</sup>各殊異的經濟團體，為了生存，彼此陷入競爭狀態。一旦讓無產階級發現了資本家剝削的秘密，那麼他們便會開始產生「階級自覺」，進而為他們的命運不惜一戰。除推翻原有的經濟體制，甚而爭奪政治權力。所以根據唯物史觀，生產力的基本動因，造成了生產關係的變動，影響歷史的發展。而「階級鬥爭」，正是生產關係變動中，必經的社會現象，是一種革命「實踐」的策略和過程。它恰如一條金線，將有關過往歷史和現在的理論聯結了起來。<sup>180</sup>

由此看來，為完成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李大釗因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理和科學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傾向於相信，世間有一個規定著宇宙萬物一切秩序的唯一真理。祂並非古代的宗教迷信中，主宰宇宙的唯一真神；而是在近代西方經過科學革命、啓蒙運動之後，憑藉著對「科學」力量的過於自信，運用人類的經驗推論而察覺、描述，進而掌握到超越了地域、民族和國家界線的原理、原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就是這個時代下的產物。相較之下，胡適則是認為：「科學」是在實驗室中的一種方法。「真理」是經過不斷假設、實驗的結果而出現。<sup>181</sup>當在不同的實驗條件下，實驗出的結果自然也會隨之改變。所以，凡是在不同的時空環境，真理將不斷地在實驗中再生。換言之，胡適所謂的真理，僅僅適用於特定的時空。從上述的思想比較，可以發現李大釗的真理，可寫成英文大寫的「T」，胡適的真理，則是作小寫的「t」。兩者的真理觀，有著根本的差別。這在西方思想發展過程中，其實一直是個長久爭論不休的哲學議題，然而此刻卻發生在中國。對於真理認識的基本差異，也讓李大釗與胡適二人，分別走上了「根本改革」和「改良主義」的實踐道路。

<sup>17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頁29。

<sup>18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頁19。

<sup>181</sup> 胡適，〈實驗主義〉，《新青年》，第6卷，第4號，1919年。

### （三）研究中國方法論的完成

李大釗所以傾向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以李氏早期的思想內容來看，亦有跡可循。如在 1917 年前後，李大釗對中西文化的分析，從未來中國必然走向西方「動」的世界的結論，得到一種全歷史的單線發展觀點。此就類似於唯物史觀，預言世界將走向共產主義的共同未來一樣。約莫同時期，李氏認為真理是宇宙間絕對、客觀的本體，人必須藉由外部的科學方法來取得；但由於人自身研究條件的種種限制，也只能求趨近於真理；至於真理缺乏的部分，也只能以人精神中獨有的自信力，來彌補其不足。早期李大釗已有這樣大寫的真理觀，該內涵的空置，到了 1919 年的下半年，便為馬克思主義所填補。至於該思想中的不足之處，李氏亦以近於「信仰」態度的自信力來維繫之。<sup>182</sup>這種對主義的現世信仰，結合了李大釗持有的「重今」態度，<sup>183</sup>使得李氏將他的思想重心，特別放在主義的方法論和具體實踐層面。

雖然〈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內容，幾乎是來自外來思想的轉譯，李大釗基本上也肯定了馬克思主義。但必須注意的是，在他學習、轉換思想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味地全盤接受，而是一種批判性的繼承。這樣的批判觀點，集中在他所重視主義的方法論，尤其是關於「階級鬥爭」的論述。

首先，李大釗為解除一般人對階級鬥爭普遍懷有過激印象的疑慮，強調在馬克思的解釋裡，階級鬥爭只會出現在人類的「前史」。當前史過後，階級鬥爭結束，才是人類道德完全發展的真正歷史的開始。同時，李氏又從人道主義觀點，補充說明人類的互助與博愛精神，是與人類歷史相始終的，不論在何時皆可以積極發揮；於是李大釗有技巧地，平衡了前史階段發生的過激現象。<sup>184</sup>

其次，李氏又秉其行動派的態度，批評了歐洲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黨過於強調唯物史觀的定命論，他們認為集產制的社會終有一天會降臨。李大釗則指出，迎接共產世界的到來時，也必須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那就是聯合世界的勞工階級，進

<sup>182</sup> 在李大釗看來，布爾什維克所嚮往那無所不包的真理性質，在俄國來說，那是接近於「宗教」的權威。俄人並以其強烈的自信力以維繫之。詳見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Bolshevism 的勝利〉，頁 261。

<sup>183</sup> 「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宜善用『今』，以努力為『將來』之創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滅。」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今〉，頁 194。

<sup>184</sup> 王遠義認為，李大釗主張在過渡到共產主義階段時，以互助理想救補馬克思主義過於強調階級鬥爭之片面性。參見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 493。



行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由這些線索可以得知，李氏相當重視如何將理論用於實踐的方法，尤其是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之後，他也承認空談的理想太多，涉及實際問題的部分太少。<sup>185</sup>所以，研究實際問題，將是未來李大釗一個新的出發點；而其中一件相當重要的工作，就是分析中國的實際狀況，並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詮釋、解決中國問題。

在實踐的方法論上，李大釗的第一步是發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並陳述他的一個行動計畫。這個構想可溯自李氏的青春哲學，之後它又融入了「廣義的革命社會主義」思想，其中不但容納無政府主義的互助觀點，還跳脫出馬克思主義的定命論，強調一切要從現在的行動開始。所以在人類的前史，除了做經濟基礎構造的階級鬥爭，同時還要發揚人類互助的道德精神：

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等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sup>186</sup>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是物心兩面改造的運動，是靈肉一致改造的運動，是打破智識階級的運動，是加入勞工團體的運動，是以村落為基礎建立小組的運動，是以世界為家庭擴大聯合的運動。<sup>187</sup>

在「少年運動」的改造計畫提出之後，李大釗第二步的作法，是嘗試加強以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世界歷史和社會現象。1919年12月，李氏發表的重要文章〈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sup>188</sup>文中除了以達爾文主義來說明，道德並非超自然的神祕存在，而是一種社會發展而來的生存本能。還運用馬克思主義，加強了「道德」與「物質」的因果聯繫。如唯物史觀的原理，物質由下而上，決定著道德的內涵。李大釗在文中，便分別從宗教、風俗習慣、政治思想和政策三個向度，來舉例說明人類的精神道德，是如何受到物質結構的影響。

在宗教和風俗習慣的說明部分，李大釗雖然盡皆引用西方的歷史經驗，沒有直接涉及中國。但實際上，那是為間接批評中國舊傳統所作的理論準備。此外值得注

<sup>18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再論問題與主義〉，頁3。

<sup>18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頁35。

<sup>18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頁14。

<sup>188</sup> 根據後藤延子的研究，此篇是李大釗參考自堺利彥的〈道德の動物の起源及び其の歴史的變遷〉、〈宗教及哲學の物質的基礎〉二文寫成。而堺利彥的文章觀點，又是來自考茨基的《倫理與唯物史觀》一書。詳見後藤延子，〈李大釗における過渡期の思想—物心兩面の改造—〉，頁179~180。

意的是，在政治思想與政策方面的內容，從目前可見的文章裡，這是李氏第一次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以及新帝國主義的形成和實質，有了較明確的說明。<sup>189</sup>那將有助於李大釗走出過去的「均勢」觀點，改用近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重新詮釋國家間的關係。由此可見，李大釗仍持續深化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最後，在總結文章的論旨中，李氏還特別強調一個重要論點：

可是宇宙進化的大路，只是一個健行不息的長流，只有前進，沒有反顧；只有開新，沒有復舊；有時舊的毀滅，新的再興。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斷斷不能說是復舊。物質上，道德上，均沒有復舊的道理！<sup>190</sup>

這個觀念主要指出，隨著物質改變而變化了的道德，是不可能回到過去的。除非要它破壞了新的經濟結構，並回到舊的組織形態。<sup>191</sup>否則就一個文明累進的特質，那不太可能會發生。換句話說，此時李大釗找到了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最新」的理論後盾，且延續著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脈絡，對舊傳統持續進行批判，此處正是李氏開始全面運用唯物史觀，進行實際觀察的一個起點。

到了 1920 年 1 月，李大釗發表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在方法上更具重要意義。如果前者〈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代表李氏初步對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認識論的掌握；那麼後者就是李氏開始嘗試使用該主義套入中國環境，形成往後李處理中國問題的方法論。這是通往具體實踐的一個橋樑，它可以說是李大釗在一次大戰前後，思想經過一連串累積和變化下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性結論。

在思想變化的過程中，李大釗最早接受了茅原的文明進步史觀，開始從民族主義的角度，說明中國文明必須要從靜的文明，朝向動的文明發展。其中亦不乏自清末以來，中國追求「富強」的思想根源。為了應和過渡到新文明的變化，李氏主張政治的民主主義，最初也是希望以參與民主議會制度的改革來達成。但是在政治上舊勢力的無情反擊之下，開始讓李大釗轉念，改以透過社會的思想和自由解放的方式，同時達到政治改革目的。到此為止，是李大釗剛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時的想法。李氏的最終目標，是希望中國能成為像俄羅斯般的第三文明。

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地理決定論的文明比較觀點，其中蘊含著影響中國知識分

<sup>18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頁 113~116。

<sup>19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頁 117。

<sup>19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頁 149。

子日後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因素。<sup>192</sup>上述由靜的農業文明到動的工業文明的進化的思想，事實上隨著李大釗轉以對社會改革的關注，使他易於接受馬克思的社會進步觀點。它更清楚的說明，中國正是由過去專制的封建社會，開始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過程。如果說第一文明是指封建社會，第二文明是指資本主義社會，第三文明是指共產主義社會，那麼其間思想變化的連結性便很明瞭。李氏對於中國問題的實際應用，正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階段論開始著手。它的起點，就是根據唯物史觀，分析孔教的忠、孝觀念產生的原因，並分別說明其對傳統中國專制政治和大家族制社會的深刻影響：

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餘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作中國人的「萬世師表」，因他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這樣相沿下來，中國的學術思想，都與那靜沈沈的農村生活相照映，停滯在靜止的狀態中，呈出一種死寂的現象。<sup>193</sup>

當西風東漸，中國明顯被捲入世界歷史的脈絡之中。由於受到帝國主義的外來影響，中國在歷史直線發展的軌道上，開始擺脫靜止狀態。更明白地講，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乃處於封建社會結束，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在這個時間的重要關頭，李大釗於是更加緊批評中國舊傳統的腳步，指斥社會那些食古不化的行爲，都是一種「黑暗運動」。<sup>194</sup>相對地，李氏則提倡社會的「黎明運動」。然而，中國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出現了思想上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說人類的未來真如馬克思所言，最後會進入到一個共產社會的美好世界；那麼對落後於西方歷史進程的中國而言，李大釗期許下的中國式資本主義究竟該如何進行，又應於何時結束呢？

爲解決上述問題，李大釗完成中國問題方法論的第三步，便是探討中國社會問題的本質，以確認中國革命的立場和未來方向。一般而言，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中國要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中間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然後透過國內的階級

<sup>192</sup> 「即對李大釗來說，構成《人類生活史》基調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不外是一種說明東西文化差異的『客觀的說法』，有與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觀』相響應的地方。據此可以認為，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中，由倡導東西文明論到主張地理環境決定論，再到接受『唯物史觀』，三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邏輯關係。」引自石川禎浩，〈李大釗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華山為例〉，頁148。

<sup>19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頁145。

<sup>19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黑暗運動〉，頁59。

鬥爭方式，改變國家私有的生產結構為公有制。但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如下：

其一，在一戰期間，中國的民族工業雖有好轉跡象；但總體而言，工人人數及其階級自覺，仍顯不足。它說明了中國資本主義正處於萌芽時期。如就西方歷史經驗來看，英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自十八世紀中期以來，至今要約 200 餘年。德國雖後來居上，但自十九世紀初開始算起，也要 100 餘年的時間。換言之，西方的資本主義經驗，並不符合中國長久以來，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改革需求。

其二，另外一點與西方經驗不同的是，往後中國的改變，基本上是由西方所觸發的。由於來自列強的壓迫，使得中國不得不朝向新的歷史階段前進。在這個過程當中，西方的資本主義也在不斷地成長。各國資本家對於利潤的追求，使他們將資本、勞工、原料、生產與消費市場等的範圍，從國內擴大到國外；各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代表著他們的階級利益，於是也就傾其國家的力量，對外進行國際的商業戰爭。這就是世界的資本主義，也可稱作帝國主義。它即是列寧所言的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換言之，中國的無產階級不僅受到國內資產階級的壓迫，即使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相當貧弱，但他們同時還要受到世界各方的資本家剝削。如在一戰期間大量赴歐的中國工人所受到的歧視，與其戰後遭遇遣返的困境，便是很好的例子。<sup>195</sup>

因應西方的叩關，原來同受壓迫的日本，卻在明治維新之後，成功地成為新興工業國家。中國本來也可以學習日本的模式，然而基本上中日的國情不同，日本國小地薄，易於轉換；中國則是地大物博，農業基礎較厚，其改變亦較為困難。但諷刺的是，同是東方文明的日本，其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竟是偕同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中國經如此二重壓迫，外資入侵結果下產生的複雜問題，其間階級的剝削關係，就遠遠不是馬克思主義所想像的那樣單純。馬克思主義認為，可以透過生產力的改變，影響到生產關係的變化，這樣的一層因果聯繫，卻在中國受到外國資本主義控制的情況下，產生了不同的情況：

在一國的資本制下被壓迫而生的社會的無產階級，還有機會用資本家的生產機關；在世界的資本制下被壓迫而生的世界的無產階級，沒有機會用資本國的生產機關。<sup>196</sup>

<sup>19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頁 147。

<sup>19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頁 147。



因為生產力增加的因素，原來一個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可以透過階級鬥爭，改變原有資產階級的生產構造。但如受到外來帝國主義的壓迫，雖然生產力提高到該組織無法負荷的程度，但中國的無產者無論如何，也無法透過階級鬥爭的方式，去改變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構造。因為兩者關係，並沒有緊密的聯繫。如何重組在世界範圍影響下，中國內部的社會環境與革命的因果連結，就是李大釗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工作。李氏對此的回答是：

我們可以曉得中國今日在世界經濟上，實立於將為世界的無產階級的地位。

我們應該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產手段和生產機關同中國勞工發生關係。<sup>197</sup>

依據上述種種理由，按照李大釗所分析的中國實際狀況，有關革命的立場與問題，其重點就不在於國內的階級矛盾，而是外來的帝國主義。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革命不單是國家內部的問題，而是屬於世界的問題。中國所受到的壓迫，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其中一項案例。基於這項認識，李氏在中國的革命實踐方向，就不是等待漫長的資本主義時代的過去，而是要有工作上的準備。這項準備工作，也不是如當時西方社會黨所傾向進行改良式的，一種不流血的社會革命策略。李大釗所希冀的是：對外，在於聯合世界的無產階級，共同來打倒世界的資本主義；對內，則是傾向於對抗軍閥。因為軍閥本身，可以說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言人。李大釗的反軍閥思想，即源自於此。

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經李大釗調整後的中國革命方向，將原來中國無產階級與世界資本主義兩者之間關係的斷裂，又重新聯繫了起來。在某種程度上，它不但超越中國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的限制，將中國與西方放在同一個新的歷史起跑點上；同時它也泯除了西方與東方在社會革命問題上的空間界線，將社會革命由處於其中心的西方帶到了中國。<sup>198</sup>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李大釗修正、且超越了機械式的馬克思主義，而提出了具中國化意味的李氏馬克思主義。<sup>199</sup>

<sup>19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頁149。

<sup>198</sup>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505。

<sup>199</sup> 李大釗不僅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概念的分析，他又進一步觀察到，資本無法自存自養。資本必然會因為擴張，而在世界各地不斷地製造出無產者。在這個問題點上，李氏才會超越馬克思，提出世界的革命者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帝國主義，而不是任其自由發展。參見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477。

### 三、社會革命實踐與分歧

在五四時期傳入中國的眾多西方思潮中，李大釗最終選擇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作為他往後的思想信仰。不可避免的是，隨著各西方思想理論間的爭辯，以及探討中國問題的深化，皆使得原本因共同目的而暫時結合的知識青年，不得不因其所信，各自選擇走向認為適宜解決中國問題的思想道路。雖然在他們心中，同樣是為了一個民主、自由而獨立的中國理想而奮鬥，但卻因為彼此思想觀點和實踐方法的分歧，依舊使他們在問題的看法上漸行漸遠，甚至產生激烈的矛盾。

從前述杜威來到中國及其後引發的問題與主義論戰，預告了接下來《新青年》編輯群的分裂。從 1920 年 9 月 1 日的第八卷起，《新青年》便逐步從同人刊物向中共黨刊過渡，胡適後來則另外在北京出版《努力週報》，發表自身的政治觀點。雖然陳獨秀和胡適之間因為所奉主義不同而引發爭執，而李大釗本人在思想上也顯然傾向陳獨秀一方，但李氏謙和的個性卻也沒讓彼此的對立僵化，反而是以居中調和的角色出現化解衝突。<sup>200</sup>

除了上述圍繞在《新青年》的實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爭，接著自 1920 年起，又發生所謂的「社會主義論戰」。該論戰可從當時英國有名的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受到講學社之邀，於 10 月拜訪中國作為開始。羅素是在訪蘇行程後的幾個月來到中國的，他在思想上傾向社會主義，同馬克思一樣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毫不留情。羅素在上海中國公學發表了題為「社會改造原理」的講演中便指出，人性深處同時存在著兩種「衝動」，一種是「創造性衝動」(creative impulses)，另一種則是「占有性衝動」(possessive impulses)。前者說明人的勞動以創造和自我實現為目標，並同時滿足社會的需求，以得到有利社會的結果；相反地，後者卻是批判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們以獲取和占有勞動創造的價值為目的，變質為對人的奴役和摧殘的社

<sup>200</sup> 從一段李大釗致胡適的信件內容，可見當時李氏的為人形象：「我對於《新青年》事，總不贊成分裂，商議好了出兩種亦可，同出一種亦可。若是分裂而搶一個名稱，若是與《新青年》有關的人都爭起來，豈不同時出十幾個《新青年》，豈不是一場大笑話！我覺得你和仲甫（陳獨秀）都不是一定要搶《新青年》這個名稱，還是主義及主張有點不同的緣故。如果主張相同，在那裏辦，那一個人辦，成不了什麼問題。但是我覺得你們兩人都有點固執，仲甫一定要拿去廣東，你一定要拿來北京，都覺得太拘了一點。總之，我的意思不拘《新青年》在那裏辦，或是停辦，總該和和氣氣商量才是，而且兄和仲甫的朋友交情豈可因此而大傷，《新青年》如演起南北對峙的劇來，豈不是要惹起旁人的笑死，此點願兄細想一想，我不是說仲甫應該主張在粵辦，你不應該主張在京辦，不過仲甫的性情我們都該諒解他的——他的性情很固執——總之我很願意你等他的回信再決定辦法。……」引自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的歷史考辨—以 1920 至 1921 年《新青年》同仁來往書信為中心的探討〉，載於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 年），頁 225。

會，最終造成有害的社會結果。<sup>201</sup>

羅素的人道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使他比杜威更容易得到李大釗的傾心。在李大釗的文章中不但可見羅素思想的痕跡，<sup>202</sup>李氏領導成立的「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還曾經邀請羅素作有關社會主義的講演。羅素和杜威這些國際赫赫有名的西方學者願意受邀到中國，除了基於對中國文明的好奇心，主要還是為宣傳其主義和思想。但另一方面，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當然也希望能利用這個機會藉由這些思想界的大師，來為自身的主張作出背書和見證。在一次羅素於湖南的演講之後，當時陪同羅素的張東蓀不久即於11月初，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說明中國最迫切的任務應在「發展實業」，而不是實行社會主義。他也贊成羅素在觀察各地情況後，表示中國除了開發實業之外，無以自立的論斷。張東蓀的說法，其中自然有斷章取義的成分，然而羅素在途中又發表部分批評布爾什維克的言論，不免會讓張氏等人引為同盟，一時羅素便陷入了中國思想界的爭端，被誤會成一位社會主義的敵人。<sup>203</sup>學界一般都認為，此即社會主義論戰的導火線。

張東蓀主張「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在「開發實業」、「增加富力」，而「空談主義必定是無結果」的言論，<sup>204</sup>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時為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的李達、陳望道和邵力子等人都分別為文，反擊了張氏的意見。他們指出張東蓀原係披著社會主義者的外衣，而現在竟原形畢露，於是斥責張是個無主義、無定見的人，只會學時髦，說滑頭話。邵力子更提到，張東蓀在內地旅行得到的兩個結論：中國人真是窮到極點了、他們大多數沒有經歷過「人的生活」，這是連街頭小兒都知道的事，又何必旅行內地才能明白呢？如今，問題的關鍵應該在於用什麼「方法」去增加富力、開發實業；而不在應否增加富力、開發實業。<sup>205</sup>圍繞在實業問題，李大釗也加入了該場論戰。不同於問題與主義之爭，此時李氏已能運用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武器，來捍衛自身的信念。

<sup>201</sup> 馮崇義，《羅素與中國—西方思想在中國的一次經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年），頁44-45。

<sup>202</sup> 「精神改造的運動，就是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代墮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來對他的同胞；把那占據的衝動，變為創造的衝動；把那殘殺的生活，變為友愛的生活；把那侵奪的習慣，變為同勞的習慣；把那私營的心理，變為公善的心理。」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頁12。

<sup>203</sup> 馮崇義，《羅素與中國—西方思想在中國的一次經歷》，頁166。

<sup>204</sup> 引自張東蓀，〈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載於新青年社編輯部編，《社會主義討論集》（廣州：新青年社，1922年），頁32-33。

<sup>205</sup> 引自邵力子，〈再評張東蓀君底「又一教訓」〉，載於新青年社編輯部編，《社會主義討論集》，頁39-40。

首先，李大釗認為「中國經濟之厄運已至，實業確有振興之必要，但謂振興實業而必適用資本主義，其謬已極。」<sup>206</sup>所以李主張非實行一種社會主義的實業不可：

不少人認為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首先着力於發展實業，以開發全國的事業，增加富力，從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廣大的下層農民富裕起來，認為這是最穩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却與此相反。我認為要在現存制度下發展實業，只能越發強化現在的統治階級而迫使下層農民為少數的統治者階級付出更多的勞動。……在現存制度下謀求實業的興盛，實質上就是要使我國的統治階級與各國的資本階級結合起來，這樣只能加強統治階級的力量，而決不會帶來其他任何好結果，這是顯而易見的。<sup>207</sup>

由上述文字可見，李大釗認為中國應先打破現存制度，再推行社會主義實業，以免重蹈西方資本主義之覆轍。這一點，明顯不同於社會改良主義者張東蓀等人所主張應先發展實業，再行社會主義的想法。

其次，張東蓀的意見所帶出的第二個疑問是，中國究竟有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針對此問題，李大釗在一封寫給費覺天的信中有如下表示：

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經濟勢力之外。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中國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業，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苦痛。中國國內的勞資階級間雖未發生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sup>208</sup>

此處李大釗同樣將馬克思主義靈活運用到中國情境，認為中國和世界有相同的經濟條件實現社會主義。惟須注意的是，李氏強調的經濟條件，並非指一國的經濟發展情況，而是強調是否有遭到剝削的事實。雖然中國自身並無出現明顯的階級矛盾，

<sup>20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社會主義下之實業〉，頁272。

<sup>20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的方法的考察〉，頁255。

<sup>20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頁277。



但隨著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國事實上已成為帝國主義蠶食的對象，所以中國的無產階級主要是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的壓迫。李大釗意識到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資本的流動沒有邊界，於是中國問題實際上和世界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因此中國同世界有相同的經濟條件來實行社會主義。更何況是西方國家都已從自由競爭進展到社會共營的歷史階段，但中國卻尚處於自由競爭的初步。在發展相對落後的情況下，中國亦「恐非取兼程並力社會共營的組織不能有成」。<sup>209</sup>所以李大釗的結論是，為抵抗國內、外的掠奪階級和資本主義，中國如要發展實業，必然要由生產者組織政府，以社會主義的組織來經營不可。

從上述發展實業的問題，便可明白同樣是社會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改良主義者仍因各自著重的焦點不同，而產生分歧。

接下來要討論的則是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們，在社會互助運動的大潮中逐漸分流的過程。前文曾述及，無政府主義的語言常被當時的知識分子用以理解和描述中國的政治社會現象，但其中有許多人實際上並非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所嚮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世界，雖同樣是其他社會主義者的理想，但其最重要的思想特徵，是要求個人擁有絕對的自由，因此他們反對以任何組織形式的權力去限制他人，甚至是反對國家。這一點，讓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站在對立面，因為後兩者恰是贊成以國家的組織力量主導中國的未來。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李大釗毫無疑問是贊同以國家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發展中國經濟。李氏認為應以生產者的政府和社會主義的組織來經營中國的實業，一方面，在相互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資本不能集中；但如果是社會主義制度，資本則可因國家力量的主導而集中。另一方面，中國因實業不發達而形成勞動力外流的問題，以及社會上充滿因傳統產業破敗而失業造成的流民問題，如仿照俄國辦法，不工作者不得麵包，他們也都能成為有用的勞動家了。<sup>210</sup>換言之，李大釗認為透過由生產者控制的國家權力，能夠有效支配國內散流的資本以及勞動力，以達到累積國家財富，並同時避免掉資本主義的禍害。實際上李氏即希望能以俄為師，學習近似於社會主義國家所實施的計畫經濟。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產生的衝突，似乎還要更早於社會改良主義者。繼劉師復之後，北大學生黃凌霜成為中國無政府主義的領導人。早在 1917 年他

<sup>20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頁 277。

<sup>21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社會主義下之實業〉，頁 272~273。

便與區聲白在北大成立「實社」，並出版不定期刊物「自由錄」。1919年1月，「實社」與「民聲社」、「平社」、「群社」等其他無政府主義社團合併，另組「進化社」，刊行《進化》雜誌，並由黃親任主編。5月，當《新青年》正著手出版李大釗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專號」，黃凌霜隨即發表〈馬克思學說批評〉一文攻擊馬克思經濟論和政策論的錯誤。自1920年1月起，在北大由易家鉞（易君左）、郭夢良、朱謙之等人另成立的無政府主義社團「奮鬥社」，也先後在其刊物《奮鬥》旬刊上發表〈我們反對「布爾什維克」〉、〈為什麼反對布爾雪維克？〉等文章，從無政府主義觀點批評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sup>211</sup>他們主要攻擊的是馬克思「利用國家權力限制個人自由」，以及布爾什維克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

思想激進的陳獨秀自然不會坐視無政府主義者的批評，9月陳氏在《新青年》八卷一號上發表〈談政治〉一文，可視為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無政府主義觀點的代表作。陳在文中指出，人無法脫離現實的政治。<sup>212</sup>即使無政府主義的反政治態度或存有真理，但就積極面而言，為徹底剷除資產階級千百年的基礎，利用政治和法律的強權防止資產階級的陰謀活動，以矯正他們的思想、習慣都還是必要的方法。易言之，雖然在民主自由的社會，沒有人會願意受到國家的限制；但以國家和強權作為一種實現社會主義的「工具」而非「目的」，卻是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意見。

相較於陳獨秀，現有文獻雖無發現李大釗直接回應無政府主義者的批評，但若細究李氏在同時期所發表的文章，仍能說明李是以一種迂迴的方式來反擊無政府主義者的挑戰。首先，李氏在1921年3月發表的〈自由與秩序〉一文，即指出個人「自由」和因強權而產生的「秩序」兩者，並非是矛盾而可完全分割開來的概念：

真正合理的個人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個人是群合的原素，社會是眾異的組織。真實的自由，不是掃除一切的關係，是在種種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寬裕的選擇機會；不是完成的終極境界，是進展的向上行程。真實的秩序，不是壓服一切個性的活動，是包蓄種種不同的機會使其中的各個份子可以自由選擇的安排；不是死的狀態，是活的機體。<sup>213</sup>

<sup>211</sup> 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263~264。

<sup>212</sup> 「你談政治也罷，不談政治也罷，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着你的；但我們要認真了解政治底價值是什麼，決不是爭權奪利的勾當可以冒牌的。」引自陳獨秀，〈談政治〉，載於《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

<sup>21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自由與秩序〉，頁253~254。

李大釗認為，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的，一旦離開個人，即無法談社會；而離於社會，亦無所謂個人。個人與社會原是事物一體的兩面，只是觀察的視角不同罷了。所以自由與秩序的關係並不造成衝突，恰是兩者相互包容而形成。此處可見李氏不僅間接地回應無政府主義者的批評，還巧妙調和了重個人自由的無政府主義與重社會秩序的馬克思主義兩者之間的矛盾。

其次，在社會主義論戰中，逐漸形成師法俄國革命路線的李大釗，亦隱約透露出對無政府主義的評價。其一，李氏先是盛讚俄國革命所展現的精神，其過激運動並不足慮。「列寧認為想建設新世界的組織，先有大破壞始有大建設。這種改造世界的新思想，是不是盡善盡美，是另一個問題；從事實上說，他們的精神是很好的，進步是很快的。現在俄國所行的政治是手段，不是目的。」<sup>214</sup>換言之，李大釗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所強調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都僅是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種「手段」。

其二，李大釗又考察了俄國革命黨的歷史，將其中心勢力分成三大系統，分別是無政府主義派、自由主義派和社會主義派。無政府主義派在過去虛無主義盛行時曾經是很大的勢力，但在1917年前後已非革命的重要元素了。<sup>215</sup>而後兩者才是當時促成俄國革命的兩大勢力。自由派的人原來相信即使沙皇存在，也能夠帶給人民自由，所以支持沙皇的立憲和議會改革，但沒想到改革是失敗的。自由派意識到皇帝制度與民主自由實不能兩立，於是發動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共和。其後，又因為掌權的溫和自由派不能滿足當時俄國普遍民粹主義的需求，於是不久激進的社會黨又發動了一次七月革命，推翻自由派政府，建立起社會主義俄國。在此，李大釗透過探討俄國革命的歷史，同樣間接地指出無政府主義早已過時，中國實應學習俄國的社會主義，尤其是布爾什維克的階級革命路線。雖然「將來俄國改造成什麼樣子，還不能定。可是將來與世界改造有絕大的影響，是無疑的」。<sup>216</sup>

由上述可知，當李大釗逐漸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中國的新知識階層也正不斷地進行著分化，尤其透過社會主義論戰，讓李氏注意到實現社會主義中國的「方法」問題。這個困擾著李大釗後半人生的重要問題，直到現在也無法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於是李大釗也只能選擇亦步亦趨地，跟隨社會主義老大哥俄國的步伐走。中國和革命前的俄國同樣有著思想落後，又不問政治的廣大農民階級，雖然教

<sup>21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俄羅斯革命之過去、現在及將來〉，頁282。

<sup>21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頁309。

<sup>21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俄羅斯革命之過去、現在及將來〉，頁282。

育他們也是一種辦法，但惟有依靠少數的智識階級領導革命，才能迅速達到政治和社會解放的目的。<sup>217</sup>此時李氏等馬克思主義分子已然受到俄共使者影響，正要組織一個以智識階級為主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然不可輕忽的是，李大釗雖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但同時又受到互助與聯合思想的制約，使得他更傾向願意在革命策略上，與其他擁有共同社會理想的團體合作，其中還包括無政府主義者，這些內容在下一章都會陸續提及。

綜而言之，李大釗從資產階級民主過渡到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治思想，是一段相當複雜但又有理可循的過程。以往學者們過於強調五四時期的文化啟蒙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等「外因」，促進了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但如能輔以「內因」觀點，則更能說明李大釗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內在的心理條件和國內的思想環境等原因，也都影響了日後李氏馬克思主義的內涵。尤其經歷了五四前後的三大思想論戰，分別在不同層面讓李大釗確信，中國未來必得走向東西文明調和的俄羅斯文明，並實施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階級革命。這不僅說明李大釗個人思想的變化過程，它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同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共通的心理因素。且值得慶幸的是，在思想論戰的過程中，知識分子也大都能夠從理性出發，堅持其所信，各自走向革命實踐的道路，而未演變成非理性的亂鬥。然而在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正如羅素曾批評的，雖然無政府主義者要求立即取消一切政治強制，是美妙無比但卻無法實現的烏托邦；但馬克思主義者將過多的權力賦與國家和政府，造成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度的權力壟斷，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同樣是失去了意義。<sup>218</sup>這一點，卻是當時的陳獨秀和李大釗所始料未及的。

<sup>21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頁308。

<sup>218</sup> 馮崇義，《羅素與中國—西方思想在中國的一次經歷》，頁47。



## 第五章 在北方共產革命運動的實踐

自 1920 年始，李大釗已然成爲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爲完成社會革命理想，李氏還必須將抽象的理論運用到現實中國社會，以形成具體的革命行動。本章重心即放在李大釗的革命實踐問題。最初李的革命構想，是以組織間互助、聯合的方式進行。然而，因其過於理想化，實際效果有限。當時蘇俄使者正紛紛西來。一方面，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急欲取得國際承認，期望與中國建交。另一方面，又根據「共產國際二大」決議，俄共開始將世界革命中心，從西方移往東方。因此中蘇在這段期間，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皆有頻繁的交流活動。於是在俄共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的降生，使得中國社會革命走向俄國式道路。中共的成立，確是直接受到俄共影響。然而革命實踐的成敗，仍有賴中共成員個人的特質和努力。李大釗作爲中共創黨領袖，在北方的共產革命運動，以及往後的第一次國共合作，都發揮了關鍵作用。惟不能忽略的是，這些革命行動背後，都帶有李氏獨特的個人意志。

### 第一節 中共在北京的組織過程

說明李大釗在中共北方活動的重要性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中共的成立背景。它和共產國際的政策指導有直接關係。1920 年 4 月，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 (Г. Н. Войтинский)，當時以記者身分，隨同秘書馬馬耶夫 (И. К. Мамаев)、翻譯楊明齋等一行人來到中國。其主要任務，大概是爲了調查中國、日本和朝鮮的社會運動的情況，物色當地適合的人物，組織亞洲地區的共產黨支部。他們先是抵達北京，透過北京大學的俄籍教師伊萬諾夫 (А. А. Иванов)、柏烈偉 (С. А. Половой) 的介紹，結識李大釗。<sup>1</sup>後來維經斯基等人又經由李氏推薦，到上海會見陳獨秀。這一段最初接觸的過程，後來成爲中共創黨時期研究的重要問題。但又因當時人的回憶不盡相同，於是形成許多不同說法。對於這些說法，在此有必要進一步釐清，方能準確說明李大釗在北方黨活動的重要地位。

<sup>1</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1 年），頁 85~87。

## 一、李氏與中共創立問題

談到中共的創立問題，不能不提中共黨史界盛傳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sup>2</sup>1919年9月，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的陳獨秀，在各界聲援之下獲得保釋。當下李大釗如釋重負地撰寫詩文，迎接陳氏出獄。<sup>3</sup>陳雖暫時恢復自由之身，但其活動卻已受警方注意。1920年1月，陳獨秀受邀到武漢講演。返京不久，政府方面在報上發現陳氏在武漢講演的內容，因此又讓警察找上門來。於是在2月前後，陳獨秀決定南避上海。根據高一涵事後的回憶，李大釗當時偕陳獨秀秘密出京。在天津途中，二人雇用騾車，喬扮商人，並共同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sup>4</sup>隨後，陳於天津搭船抵滬。一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從此離開北京社團。

以上這段黨史佳話，不但說明中共的創立，是一個自發的獨立事件，而且也暗示李大釗在1920年初，已有組黨動機。如按照上述事實，同年3月由李大釗主持而秘密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簡稱「研究會」），以及其後4月李氏與維經斯基在北京的會面，都會被理解成是圍繞在中共建黨一事的預備工作。<sup>5</sup>

然而，中共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亦非牢不可破。其中仍有許多未解之處，使高一涵回憶的真實性受到質疑。其一，高一涵曾於1927年、1963年，分別作出有關李大釗送陳獨秀出京避難一事的回憶。在1927年的版本，高氏提到了陳、李相約建黨的事情。但在1963年的版本，有關商議建黨一事卻隻字未提。其二，高在1963年的版本中，對於避難一事的回憶說明，竟然比1927年的版本還要詳細清晰，此亦有違常理。<sup>6</sup>其三，更為關鍵的是，在1920年的同一時間，高一涵人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陳、李二人逃離北京一事。高一涵能夠把事情經過說得栩

<sup>2</sup> 蕭超然，〈關於「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我見〉，載於《百年潮》（北京），第7期，2001年，頁18~26。

<sup>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歡迎獨秀出獄〉，頁258~259。

<sup>4</sup> 高一涵，〈李守常同志事略〉，載於《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5月24日。

<sup>5</sup> 吳家林、謝蔭明著，《北京黨組織的創建活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99。

<sup>6</sup> 有關高一涵對於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京的回憶，在1927年的回憶版本是：「時陳獨秀先生因反對段祺瑞入獄三月，出獄後，與先生（李大釗）同至武漢講演，北京各報均登載其演辭，先生亦因此大觸政府之忌。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畫組織中國共產黨事。」而相較於1927年的回憶如下：「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前往各地收帳的時候。李大釗同志雇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陳獨秀頭戴氈帽，身換王星拱家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蹟滿衣，光著亮發，坐在車子裡面，李大釗同志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帳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同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開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順利到了天津，即購外國船票，讓陳獨秀坐船前往上海。」

栩如生，其中恐怕有許多是來自道聽塗說的成分。<sup>7</sup>

相較於長年受中共政治習氣影響的高一涵，另一位身為中共早期要角的張國燾，其一生遭遇和所受的政治磨難，以及對往事的深層反省，無疑地使其回憶內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從張國燾對李大釗的景仰和密切的交往關係，使吾人更能一窺中共最初的創建過程，並側觀李大釗的人物性格。

1920年初，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素養比起其他知識分子，雖有一定程度的水準。但其思想的成熟，雖有可能構成組織活動，但並非「組黨」要件。雖然李氏和北大激進的學生團體，已開始談論社會問題，並有了具體的組織活動。例如他們在北京首次舉辦慶祝五一勞動節，有提倡勞工神聖的意涵。5月之後，張國燾在思想上，也受到李大釗的啟發，迅速向馬克思主義傾斜。但根據張的回憶，當時李大釗對於「組黨」一事，並無明確想法：

李先生和我雖然經常談論馬克思主義，有時我們還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工人運動的實際推進；但都還沒有組織中國共產黨，以及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決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五四運動前，即有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及俄羅斯研究會等擬議，但一直沒有具體進行。他和一些有為的朋友們，組織了一個少年中國學會，出版了一個《少年中國》雜誌，他原希望這個組織，能夠負起研究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但因會員們不盡贊成馬克思主義，無法實現他的願望。他認為現在應該組織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團體應暫不過問實際政治，除了研究、翻譯、介紹等工作外，還應從事一些工人運動。我贊成他的計畫，並主張邀集一些朋友來共策進行。<sup>8</sup>

李大釗所以沒有組黨想法，是因為自己和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仍不夠深刻，對於俄國革命情況知道的也還不多。<sup>9</sup>所以李氏此刻致力於馬克思研究。於是在3月秘密組織「研究會」。該組織雖避人耳目，但其最初並非是作為中共的先行組織而成立，是很明白的。

此外，張國燾在關於4月間，維經斯基和李大釗首次在北京的會晤，也有如下記述：

<sup>7</sup>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91。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117。

<sup>8</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頁86。

<sup>9</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頁82。

李大釗先生介紹威經斯基（即維經斯基）、楊明齋去會晤陳獨秀先生，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秘密使命。因為李大釗先生和威經斯基，後來都沒有說過他們之間有過甚麼初步的商談。大概李真的以為威經斯基是一位新聞記者。威氏與陳獨秀先生在初步接觸時，尚隱藏著他的真實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當時的介紹信祇是泛泛的。<sup>10</sup>

此刻張國燾正作為學生代表，為迎接蔡元培復職北大校長而到了上海，於是這段回憶，大概也是後來張與李大釗或是周遭友人的談話所拼湊出來的印象。雖然不是張的親身經歷，但對照事情的前後，該記述也並無矛盾之處。可以想見，當初維經斯基與李大釗的會面，大概也只能是泛泛之交。推測他們可能僅止於談到俄國革命後勞農政府和共產國際成立的大概情形，而並無提及組織中共一事。

維經斯基大概就是從李大釗的談話中，得知五四運動的情況。同時又遇上與北京政府建交的挫折，所以他們急於在中國民間，找到一個能兼具五四激進精神和全國性聲望的重要人物，作為組織中共的領導。而這樣的人物，此時避居於滬的陳獨秀無疑是很好的人選。於是在李大釗的引薦之下，維經斯基與陳獨秀取得聯繫，日後並協助陳以上海為中心，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

從上述分析可知，「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有許多不攻自破的弱點。中共的成立不能說是自發、獨立的事件，而應更近於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下的結果。然而該說也並非沒有反映部分現實，「相約建黨」或許是中共創建史的神話，但是「南陳北李」卻十足掌握了中共早期發展的重要線索。

## 二、北京中共組織的形成

李大釗於1920年10月成立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簡稱「北京小組」），是在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北方中共組織的前身。它與南方陳獨秀早在同年5月成立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遙相呼應，成為中共早期發展的兩個主要據點。當然也不能忽略各地小組的重要性，包括工人運動傳統濃厚的廣東，以及湖北、湖南等內陸省分，甚至海外的法國巴黎、日本東京都有中共的活動。如前文所述，中共的降生與維經斯基的策劃有密切關係。最初各地小組的成立，大概就是從陳獨秀

<sup>10</sup> 引文中的「威金斯基」與本文「維經斯基」係指同人，此處引用資料保留原樣。引自張國燾，《我的回憶》，頁87，註2。



與其所在的上海發起，此為陳以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威望，居中協調下的結果。「北京小組」的成立大抵也經過陳的授意，而實際工作的部分，則交由李大釗指導完成。

### （一）曾與李氏接觸的密使

除了維經斯基，也有其他證據指出早在維經斯基之前，已有其他俄共使者來到中國與李大釗接觸，甚至討論過組織中國共產黨事。該時間點約莫與陳獨秀南下同時，甚至還要更早。這些說明，無形中提高了李大釗和北京在中共創建史的地位。

首先，是在哈爾濱度過少年時期的布爾特曼（Н. Г. Буртман）。他在 18 歲那一年加入布爾什維克。五四愛國運動前後，他與天津、北京的進步知識分子，包括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建立了關係。布爾特曼還稱李氏是一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sup>11</sup>

其次，是同樣生長於哈爾濱的俄人荷荷諾夫金（Hohonovsky）。依照早期中共黨員彭述之的回憶，1924 年李大釗和彭在莫斯科一起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李曾當面向彭介紹荷荷諾夫金這個人。並談起在 1920 年初，荷作為伊爾庫茨克第三國際遠東局的代表，曾在北大建議李組織中共的往事。<sup>12</sup>

再者，是自 1918 年下半年始，曾先後於天津大學、北京大學擔任俄語教師的柏烈偉。他接受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後改為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指示到中國工作，而且與李大釗在北京的組織活動有密切關係。1919 年 9 月，柏烈偉將布爾特曼介紹給李大釗。1920 年 1 月下旬，當李在天津送陳獨秀南渡之後，即與黃凌霜、章志、胡維憲、姜般若、尉克水等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和愛國分子，一齊到柏烈偉在天津舊俄租界住處，商議是否有可能在中國傾向於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之間，建立一個不分派系營壘，傾向於一個共同目標的「社會主義者同盟」。<sup>13</sup>

根據梁冰弦回憶，該同盟的構想最初即是由俄共所計畫。在中國無政府主義領袖劉師復積勞病逝之後幾年，1920 年春，他們接到一封署名「布魯威」（即柏烈偉）以世界語寫成的來信。<sup>14</sup>信中不但讚譽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是自辛亥革命後領導五四

<sup>11</sup> 這段回憶，來自曾與布爾特曼共事的繆勒爾（A. A. Мюллер）。其後，又因美國研究李大釗的濫觴，邁斯納的引用而為人所知。詳見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譯，《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年），頁 128。原書見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 115、282。

<sup>12</sup> 詳見彭述之，〈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載於彭述之，《彭述之選集》（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 年），第 1 卷，頁 40~47。

<sup>13</sup> 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交往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年），頁 5。

<sup>14</sup> 世界語（Esperanto），原義為「希望者」，在中國最早被譯為「萬國新語」，又有「愛斯不難讀」、「愛世不難讀」、「愛世語」等其他譯名，後延用日本譯名「世界語」（世界新語）。它是由波蘭眼科醫生

和社會運動的重要團體，同時還希望他們能與布爾什維克黨人攜手合作。<sup>15</sup>當時留守廣州晦鳴學社的鄭佩剛，將信轉交給北大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使其能就近接洽。於是有了後來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為結盟一事的最初會面。依照石川禎浩深刻的分析，此處無政府主義者所稱呼的「社會主義者同盟」，即是日後中共組織中具統戰性質的「社會主義青年團」。<sup>16</sup>

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之前，俄共密使布爾特曼、荷荷諾夫金、柏烈偉等人的出現，以及他們和李大釗的接觸活動，都不約而同地加強了李氏和北京在中共創建史的地位。它同樣栽進了前述「相約建黨」的故事脈絡。然而，前文作為證據而引述的回憶，也常令後代史家懷疑。<sup>17</sup>如何甄別其內容的真實性，仍有待新資料佐證。

但整體看來，這些回憶內容其中亦無重大矛盾。大致可以整理出以下合理解釋：第一，如果說五四運動之後，李大釗是中國首位馬克思主義者，那麼自然會是急欲向東方發展的俄共所積極爭取的對象。於是布爾特曼與李大釗的接觸，以及荷荷諾夫金對李氏提出的組黨建議便相當合乎情理。而且李氏對荷的反應是，對於這樣重大的事情「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設想」、「不能單獨地解決」，最後還得詢問陳獨秀的意見，<sup>18</sup>這點反而印證張國燾回憶李氏對於組黨的態度。但僅憑如此，亦不能充分說明、提升李大釗在中共創黨的地位，其理由在於第二點，探討共產革命的輸出，不能忽略這些俄使的出身背景，以及俄共與中國因各方面接觸而產生的複雜情況。因為當時蘇俄對新西伯利亞一帶的控制仍未穩定，所以俄共在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對中國工作機關，彼此各自行事，互不統屬。<sup>19</sup>因此讓這些俄使的「正統性」頗受質疑。於是

---

柴門霍夫（Zamenhof）所創造的一種簡單易學的語言。由於他生於多民族混居而經常產生矛盾的環境，其自幼即希望消除語言隔閡，達到各民族的和解，所以最初世界語的誕生，即帶有世界大同的救世主義。這一點和無政府主義者主張消除國家、民族、政府、軍隊等政治形式的觀點不謀而合，於是宣傳與學習世界語，便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實現其理想的重要途徑。參見孟慶澍，《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圍繞《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開封：河南出版社，2006年），頁84~85。

<sup>15</sup> 關於1920年初「社會主義者同盟」的組成、活動與瓦解的史料，早期主要是參考自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梁冰弦，於1952年11月14日起，在香港《自由人》半周刊，以「海隅孤客」為筆名連載的〈解放別錄〉，共16篇。詳見海隅孤客，《解放別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8~10。

<sup>16</sup>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169~170。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189~191。

<sup>17</sup> 如鄭學稼對海隅孤客的回憶內容，便抱持懷疑態度，應有待後日文獻證明。鄭學稼，《中共興亡史》（台北：中華雜誌社，1970年），第1卷，下冊，頁504。

<sup>18</sup> 詳見彭述之，《彭述之選集》，第1卷，〈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頁43。

<sup>19</sup> 蘇俄建國後，對中國的工作機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系統。第一，為政府的外交部門系統。第二，為共產國際系統。第三，為俄國共產黨系統。俄共系統，又因遠東共和國的成立（為與日本建立緩衝地帶），而分作西伯利亞和遠東兩個地區，因而更形複雜。就俄共系統而言，俄共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在伊爾庫茨克的東方民族處，以及俄共遠東州委（後改為遠東局）轄下的符拉迪沃斯克分局的外國處，成為兩個對中交流的重要渠道。隨著1921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取代

也就很難評價李大釗和這些早期俄使的交流，在創黨工作上的意義和重要性。

## （二）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如能進一步理解俄使柏烈偉在中國的活動性質，便更有助於說明「北京小組」成立的前後過程。早在 1920 年初，柏烈偉即號召無政府主義者共同參與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這件事李大釗和陳獨秀二人，大概都已知情。柏烈偉的行動亦非出自個人，而是代表俄共立場。他們希望在成立中共之前，能夠率先團結中國大部分的社會主義分子。所以經由俄共指引，以及南陳北李的響應，全國各地大致都有類似的「同盟」出現。此刻遍布於南北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到了 1920 年 8 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後，紛紛成爲中共黨組織中負責培養優秀共產黨員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於是柏烈偉此刻扮演的角色便很明白，他是俄共設置在中國北方，負責協助李氏進行組織活動的代表。因此北京的社會主義者同盟，便可以說是「北京小組」成立的緣起。但同盟的形成，實不能忽略其中亦存有李大釗個人的意志。如前文所述，李氏最初並無明確的組黨意願。但他對於組織社會團體，卻極有興味：

看現今世界的趨勢，縱的組織日漸崩壞，橫的組織日漸增多擴大，就是中土各種民眾的自治聯合，也從此發軔了。將來學生有學生的聯合，教職員有教職員的聯合，商界有商界的聯合，工人有工人的聯合，農民有農民的聯合，婦女有婦女的聯合，乃至各行各業都有聯合，乃至超越國界種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聯合，合全世界而為一大橫的聯合。在此一大橫的聯合中，各個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sup>20</sup>

從上面引述李大釗於 1920 年 1 月發表的文字，可見其思想仍未脫離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互助、大同世界觀」。李氏嚮往社會廣泛的組織與聯合不僅限於國內，還要超越國界、種界。其後，李大釗在 4 月所作的〈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一文，將中國、日本、朝鮮，甚至是俄羅斯的青年，都包含進全亞洲的聯合和改造運動。<sup>21</sup> 李氏基於此信念而表現的具體行動，就是加入同年 8 月以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

了東方民族處，在伊爾庫茨克成立；以及蘇俄對遠東的控制較為穩定之後，才逐漸統一了對中窗口。詳見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 80~83。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 103~107。

<sup>2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頁 168。

<sup>2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頁 180。



大杉榮為中心，結合社會各團體於東京成立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sup>22</sup>

同時在國內方面，8月16日，少年中國學會的北京總部於陶然亭舉行茶話會。加上受邀與會社團，包括北京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團，以及天津覺悟社，總共五個青年團體。其中覺悟社的代表周恩來、鄧穎超等人，日後亦加入了中共。主持會議的李大釗，在會上作出如下表示：

本會之創立，原系研究學問團體，思想須極自由，主義自不一致；惟兩年以來，世界思潮既有顯然之傾向，而國內應時發生之無數小團體，亦莫不各有鮮明之旗幟；本會同人已經兩載之切實研究，對內對外似均應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也。<sup>23</sup>

從這一段話可知此會議的重要性，不僅是「少中」內部產生分裂的前奏。李大釗還希望能透過一個大家共同相信的「主義」，來聯合其他不同團體。在李氏心中，這個主義自然非馬克思莫屬。然而在其他團體面前，似乎也很難坦率明白地講。8月18日，他們正式成立「改造聯合」，並於9月通過聯合的《宣言》和《約章》。

雖然沒有更多的史料，能說明這個「改造聯合」在日後的成就。但綜合上述李大釗的諸多活動，可知社會主義者同盟、日本社會主義同盟，以及改造聯合等，都是自社會「組織」與「聯合」的整體脈絡發展而來。它實際上反映出李大釗個人的領導魅力，及其為實現相愛、互助精神，打破一切界線的主觀願望。<sup>24</sup>換言之，這場聯合運動充分展現李氏的個人意志，而且與柏烈偉在行動上達到某種程度的默契。這才是在「北京小組」成立前，北方組織活動的真實情況。過去說明這些活動是由

<sup>22</sup>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創立宗旨為：增進勞動者和勞動者子弟的完全知識，養成勞動者和勞動者子弟的高尚人格。查該同盟的名冊，其中便有「李大釗加支那北京大學內，丸山幸一郎加支那新支那社……。」的記載。它同時紀錄李氏曾購買50冊該同盟宗旨書。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322、548。前引文出現的丸山幸一郎(1895~1924)，筆名丸山昏迷、昏迷生。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大杉榮等人關係密切。他在北京擔任《北京周報》主編，曾刊登許多李大釗相關的談話和文字。由於他們的交誼，丸山很有可能就是介紹李氏加入該同盟的關係人。詳見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19~20。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43~44。

<sup>23</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在少年中國學會北京會員茶話會上的講話〉，頁212。

<sup>24</sup> 在張國燾回憶中的李大釗，極具個人魅力和領袖特質：「在北京，唯有李大釗先生一人，有可能聯繫各派社會主義人物，形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運動。他的個性溫和，善於與人交往，極具耐心而又沒有門戶之見。……且他自己也極富有青年的熱情，……。」日後李氏能成為中共北方的最高領導，是實至名歸。詳見張國燾，《我的回憶》，頁82~83。



俄共單方面的指示，或是為醞釀未來中共組織的解釋，自有其偏頗之處。這和過去中國歷代開國君主都會為其祖先進行追諡的動作，是同樣的道理。

當李大釗忙於社會組織的聯合，上海的維經斯基與陳獨秀，便開始著手各地中共組織的布置活動。在運作過程中，陳獨秀和李大釗之間雖有書信往返，但在政府嚴密的監視之下，信中對組織中共的事，也不可能談得太清楚。於是就必須透過一個往返南北的信使，負責傳達準確訊息。當時已受李大釗思想影響的張國燾，是一個相當合適的人選。因張與北京政府的對立愈加激化，於是他在7月下旬又南下上海。在滬期間，張拜訪了陳獨秀，而且對於組織中共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張國燾於8月下旬返京，又將與陳獨秀的談話內容轉述給李大釗。李略經考慮，也就毫無保留地表示贊成。<sup>25</sup>9月，他們開始進行多方聯繫。10月，正式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1月，建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北京社青團」）。最初的「北京小組」成員，包括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以及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陳德榮和張伯根、華林、王竟林。<sup>26</sup>而「社青團」中除了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為中共黨員，也有如陳廷璠、陳德榮和王伯時等無政府主義者參與。<sup>27</sup>雖然不久後，他們即因革命立場和原則問題，紛紛退出中共。但由此可見，最初「北京小組」的產生，和此前李氏領導的社會組織聯合運動，實有前後的繼承關係。

### 三、北京中共的準備活動

1920年8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象徵中國共產黨的成立。<sup>28</sup>其中「黨綱」明確規定了共產主義的基本信念及實踐手段。但在「政綱」方面，有關實際的重要政策和進行步驟的詳細內容，對一個新生的社會革命黨而言，卻仍然在求索階段。陳獨秀最初即對張國燾說過，我們只求做一個「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學生」。

<sup>25</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頁104。

<sup>26</sup> 吳家林、謝蔭明著，《北京黨組織的創建活動》，頁105。

<sup>27</sup> 此為1921年3月16日，「北京社青團」會議當中出席的無政府黨人名單，其中有來自北京政府密探「關謙」的第一手資料。「北京社青團」最早的活動狀況，大致可由這些資料掌握。原文出自《北洋政府步軍統領衙門檔案》，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506。

<sup>28</sup> 司馬璐依據中共早期史料認為，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的存在，沒有疑問。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於1920年5月，維經斯基與陳獨秀晤談之後。而中共臨時中央，則成立於1920年8月間。當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同時在上海宣告成立。陳獨秀等人，實已具備條件從個別的小組，進入大張旗鼓的活動。參見司馬璐編著，《中共的成立與初期活動—中共黨史暨資料選粹（第二部）》（香港：自聯出版社，1974年），頁34。

<sup>29</sup>這句話明白的表示，中共早期的創黨人物大多是懷抱理想主義的青年。他們要搭上十月革命的順風車，要朝向世界歷史的盡頭前進，然而在這一條開山闢路、披荆斬棘的過程，也將會表現出他們稚嫩、脆弱而缺乏經驗的那一面。

李大釗等人鑒於早期大部分共產黨員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都不深，所以第一步就是研究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這個工作主要是「研究會」的核心任務。由於擔心社會有過激指責，於是李大釗於3月秘密在北大成立該會。但那時僅僅是作為學術性社團。最初加入者亦以北大學生為主，包括張國燾、劉仁靜、鄧中夏、羅章龍、高君宇、何孟雄、朱務善、黃日葵、范鴻劼等人。中共成立之後，它儼然成為北京黨的下屬單位，負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其經濟來源主要靠會費和捐款，廣泛蒐羅各國有關馬克思的外文圖書，編譯、刊行馬氏學說的論文。羅章龍等德語系學生，便嘗試翻譯《馬克思傳》、《共產黨宣言》以及《資本論》等原文書籍。此外，會員不但要參加各專題的研究小組，還要定時召開討論會、講演會。李氏便曾於1922年2月受邀參與該會第一次公開講演，講題為「馬克思經濟學說」。

「研究會」的活動得到北大支持。由校方提供北大第二院，西齋宿舍的兩間房，作為該會主要的活動場所。因同校長室相距不遠，又有校警站崗，於是閒雜人等不得入內。根據羅章龍回憶，會員們親切地稱呼它為「亢慕義齋」，或是簡稱「亢齋」。其中「亢慕義」是來自德文共產主義的音譯。全文意思為「共產主義小室」(Das Kammunistisches Zimmer)。「研究會」的書籍都蓋有「亢慕義齋圖書」的圖章。「亢齋」屋內的牆上，則掛著馬克思的肖像。其兩側有對聯曰「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語句皆出自「南陳北李」。上聯說明研究馬克思主義，出來搞革命，就要有隨時進入監獄的覺悟。下聯則是冀望「研究會」中的南、北人，能夠團結互助、同心同德。此外，又加上了兩個口號曰「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其意在於破除校內舊思想勢力，建立一新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精神。當時被稱為「北方之強」的李大釗和其他「研究會」成員，便時常在「亢齋」舉辦內部聚會。<sup>30</sup>該「研究會」及其活動，要等到隔年11月才正式對外公開，12月正式召開成立大會。

其次，相較於抽象的理論研究，中共在實際工作上極為重視社會各階層的組織、聯合、動員和宣傳。尤其是陳、李二人皆曾提及對青年統戰工作的重要性。<sup>31</sup>不僅要

<sup>29</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頁96。

<sup>30</sup> 有關「亢慕義齋」及其活動的回憶，詳見羅章龍，《椿園載記》(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頁87~90。

<sup>31</sup> 李大釗對知識青年的期許如下：「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後盾。知

讓少部分急進青年作為先導，還要運用各種形式結合更廣泛的群眾。李大釗在這方面致力尤深，他幾乎主導了下列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社青團」。該團於 11 月借北大學生會辦公室召開成立大會，參加者包括張國燾、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羅章龍、劉仁靜、朱務善、黃日葵、李駿、楊人杞、范鴻劫、吳汝銘等 40 餘人，並公推學生會主要負責人高君宇為書記。<sup>32</sup>它最初聯合信奉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青年。其作用則在培養未來黨的人才。與成為黨員的條件相比，入選團員的資格遠較為寬鬆，這是為了在建黨初期能積極擴張黨的勢力。團員的任務，除了聯絡、組織進步青年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團員，還要參加國際會議。1921 年 3 月，國際少年共產黨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格林來到北京，他致函邀請中共派出代表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少共大會。北京區最後公推何孟雄為代表。但沒想到中共青年代表團一行人赴俄途中，卻在滿州里遭到軍警拘留。<sup>33</sup>

又根據北京政府密探「關謙」的諜報內容，可以觀察「北京社青團」的組織分工、決策模式、活動內容和組織定位。由此可推論出中共早期組織的發展概況。有關「社青團」的組織分工方面，一份清楚的資料顯示，在 1921 年 3 月 30 日召開的團第四次大會，有一張君提出臨時動議，建議將該團原有的「四部制」和「委員制」，改為「執行委員會制」。其改組之理由如下：

- (一) 舊有之四部制及委員制，有互無關聯之弊。(二) 將來本團人數增加，勢必不能人人俱負事務上之責任，或因此影響本團精神。若改行執行委員會制，則可以免此二弊，況同志皆係負責者，有事時自可隨時分擔職務。<sup>34</sup>

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於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知識階級的勝利〉，頁 174。陳獨秀則是從中國革命問題中，得到下述結論：「中國工業不發達，工人數量甚少，文化落後，因此一般工人還談不上階級覺悟，還不能成為共產運動的骨幹。但五四以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來，就是推進這一運動的先驅。」引自張國燾，《我的回憶》，頁 95。

<sup>32</sup> 吳家林、謝蔭明著，《北京黨組織的創建活動》，頁 181。

<sup>33</sup> 當時蘇俄與中國的主要陸路交通，可以乘坐火車，經由上海、北京、哈爾濱、滿州里、赤塔，再沿西伯利亞鐵路，經伊爾庫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達莫斯科。這條道路，成為當時蘇共和中共交流的往來要道，人稱「紅色絲綢之路」。參見葉永烈，《紅色的起點—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231。此外，在搭救赴會中共代表的討論中，李大釗曾有如下表示：「接各處來函，皆說上海代表自認過激，以致招禍，而學務局及本校事前未發證書、護照，此種彩色斷然不允援救，且時隔多日，恐更有不便。茲有黑省友人熟識督署，托為設法，料有八九成功。惟昨與之預算，往返交際等費，至少所需 300 元，再加孟雄回資，合計 400 元應用，請公決如何募捐。」引自 1921 年 4 月 25 日，關謙，〈關於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大會情形報告〉，《北洋政府步軍統領衙門檔案》，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509。

<sup>34</sup> 引自 1921 年 4 月 2 日，關謙，〈關於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大會情形報告〉，《北洋政府步軍



由於資料限制，僅知舊有四部之一為調查部，還有二職分別為書記、會計。最初團員不多，自然他們會選擇依照個人興趣、專長進行任務編組，將每個團員明確劃入四部，而四部直屬於書記。所以各部團員之間彼此「互無關聯」。但隨著團員增加，便容易將責任推向少數的主要團員身上，因而產生權力集中的隱憂。如改以執行委員會，其好處即在打破各部邊界，讓每個團員都能跨委員會工作。如此各團員之間便能形成緊密聯繫。更重要的是在團的決策方面，使得每個執行委員的地位均等，形成權力均分的「合議制」，象徵著「公議公決」精神。這是早期中共組織決策的重要特色，也讓多數團員都能成為實際上的負責人。最後這個改組提議獲得多數通過，於是即刻進行投票改選。各類執行委員合計 11 人如下：公推張國燾為書記委員；劉仁靜為會計委員；顧文萃、高君宇、祈某為組織委員；宋价、王伯時、某人為教育委員；李大釗、鄭振鐸、某人為出版委員。此外還決議執行委員會在每星期集議一次；團大會則每月集議一次。

「北京社青團」的主要活動，亦可由幾次大會的決議內容得知。其活動事項繁雜，其中包括：(1) 由於團內大多是知識分子，於是成員建議要多向全國中學生及工人宣傳，使其入團、(2) 有關黨、團員赴俄調查，及赴俄留學事、(3) 調查北京的平民學校、講演所，並使之社會主義化。(4) 有關工人組織運動。較重要者，是籌備 1921 年 5 月 1 日的勞動節慶祝活動。為此，「社青團」擬成立「五一運動委員會」，<sup>35</sup>負責在活動中指導群眾遊行，並舉行勞動大會。還要印刷、刊行宣傳小冊子，訴求工人基本權利。其宣傳內容大概是：每日工作 8 小時、在日常工作時間加薪、星期停工不扣薪金等等。不僅在北京地區，「社青團」更派員就近到天津、唐山和長辛店協助運動。其中長辛店工人在勞動節這一天，首度組織了「現代的」工會。<sup>36</sup>

經由上述活動，可以明確「社青團」在北方黨的定位。如就整體而論，北京小組代表著黨中央的意志。它堅守黨的理論、原則和方向。但地方黨領導人亦非外派，而是由地方意見領袖擔任，於是它又不失其地方自主性。在地方黨之下又指揮了兩個對等單位。其一為「研究會」，專責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其二是「社青團」，以

---

統領衙門檔案》，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507。

<sup>35</sup> 1921 年 4 月 25 日，關謙，〈關於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大會情形報告〉，《北洋政府步軍統領衙門檔案》，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510。

<sup>36</sup> 中共工運領袖鄧中夏指出，所謂「現代的」工會主要是為了與傳統中國勞動者組織的「行會」、「幫口」和「秘密結社」作出區別。而且，即便是有現代工會的形式，但如工會本身不具備階級革命性質，那麼仍算不得是「現代的」。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頁 1、10。



急進的知識青年負責地方組織活動，對象包含一般青年、工人和婦女。<sup>37</sup>由此可見，中共在地方基層的實踐，主要即是以「社青團」為主體向外推展，而李大釗在其中則是居於指導中心的人物。

還須補充的是，中共除了黨、團，還包括外圍組織。例如五四期間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中共成立之後，它自然成爲向工農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工具。此外，還有李大釗在1920年12月成立的「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其主要工作是編譯社會主義叢書、請名人講演。但實際上它還附帶聯合其他非共產主義青年的任務。該會宗旨是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它的目的，則是要討論解決「現在中國能否即刻實行社會主義」的方法問題。<sup>38</sup>

綜上所述，可知現今的中共黨史書寫中，某些過分強調李大釗和北京地區的創黨地位，實則不然。最初李氏對組織中共的態度不明，其原因或許和李才剛要踏出研究室，走向革命有關；又或因李氏覺得以其人望，無法作成如此重大決定。但無論如何，當成立中共一事得到陳獨秀首肯，李大釗無疑是中共創黨後的第二號人物，成爲北方黨領袖。在李氏帶領下，北方小組也出現許多像是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等積極的革命青年；如果沒有這些青年的幫助，中共在北方的組織工作也很難想像能夠完成。雖然俄共方面始終帶有指導中共的意味，但可以明白的是，李大釗仍是以個人的意志來實踐其革命，而非外力所能夠介入。

1920年8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11月，「北方小組」改稱爲中共「北方支部」，中共由此可算是成立了。到了1921年7月，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endrick Sneevliet)的催生之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一般咸認爲這是中共正式成立的日子。惟此時在北京的李大釗，正在領導教師的索薪鬥爭，而陳獨秀則在廣州擔任教育委員長，二人均分身乏術。「南陳北李」未能出席的「一大」，其在黨史的地位就不得不讓人質疑其重要性。也許正如唐德剛所言：「組織政黨搞革命正和開商店做生意一樣，至於何時『先行交易』，何時『擇期開張』，還是以他們做買賣的自己去宣布他們的『開張大吉』爲是。」<sup>39</sup>

<sup>37</sup> 陳獨秀曾言：「婦女方面，如由已覺悟的知識婦女帶頭發動，廣大的婦女群眾也能很快地組織起來。至於農民，大概是認爲現在還談不上，再則農民和共產主義實在距離得太遠。」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頁97。

<sup>3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3卷，〈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頁256。

<sup>39</sup>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99。

## 第二節 中共組織的聯合與鬥爭

中共「北方支部」成立之後，即以北京和直隸為中心向其他城市和外省擴張。直到國民黨發動「清黨」前，北方黨仍能持續發展。在組織成長的同時，中共亦研擬出他們最初的革命活動，其目的在於推翻資本家政權，以實現階級平等社會，其作法是對資本家和軍閥，作出各種形式的鬥爭。就早期中共整體鬥爭內容來看，北方黨的活動實居於領導地位，原因在於，其地恰為北京政府之所在，而且交通發達，使得以鐵路工人為中心的革命活動易於擴散。但在革命最初的嘗試，中共的鬥爭活動也漸漸顯露其組織弱點，他們不得不改採一種與「鬥爭」同時進行的「聯合」策略，於是中共在「最小限度」的範圍主張民主的大聯合，願意與「開明軍閥」合作推動民主革命，其後中共甚至加入國民黨，提倡全民參與的「國民運動」，李大釗亦以其個人思想和特質，在黨的聯合策略中發揮莫大效用。然而，中共也並沒有忘記他們仍然堅持在「最大限度」上，最終要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取得無產階級的勝利。

### 一、北方中共組織的擴張

在李大釗的策劃下，北方黨以北京為中心向外擴張。1920年11月底，中共「北方小組」改名「北京支部」。一大之後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地方委員會」（簡稱「北京地委」），以李大釗為書記，負責北京市黨務。到了1921年11月，為確保北方跨省工作的領導統一，根據「中共中央局」通令成立「北京區執行委員會」（簡稱「北京區委」）。除了北京，其領導範圍還包括直隸、河南、山西、陝西、察哈爾、熱河、綏遠、東北、內蒙古各省。<sup>40</sup>並由李大釗擔任「北京區委」兼「北京地委」委員長，責任堪稱重大。隨著黨員增加、組織擴大，以及工作量加重，中共北方組織層級也跟著提升。1924年底，成立「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簡稱「北方區委」）。<sup>41</sup>到了1925年10月初，中共中央為加強北方工作進行，將「北方區委」和「北京地委」的權責分立，由李大釗任「北方區委」書記，總領北方各省市工作。<sup>42</sup>

北京為中國首善之都，是民初各重要鐵路的中點。因著交通便利，加上沿路都市往往有工人聚集，所以給予中共很好的發展環境。李大釗時常派遣「社青團」員、

<sup>40</sup> 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358。

<sup>41</sup> 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428。

<sup>42</sup> 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傳》（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95。

研究會員，或是黨員到各地進行組織工作。他們的運作模式大概和「北京小組」相似。先是透過宣傳社會主義和組織「研究會」，以引起青年、工人等的興趣。進而成立地方的「社青團」和黨組織。如此北方黨的活動便以直隸為中心擴及外省，再由城市進入農村。此處先說明北方主要城市黨組織的成立過程。至於農村地區則在下一節談到農民運動時，予以補述。

首先，中共在直隸地區主要發展的城市，包括天津、唐山、保定、石家莊和張家口。

先從天津談起。在五四時期，李大釗與天津覺悟社、新生社的青年學生已有過接觸。1920年5月，在李氏的指導下，張太雷和于方舟等人在天津成立「研究會」。11月，張太雷和原覺悟社的譔小岑，籌劃組織「天津社青團小組」。但在1921年1月，張太雷轉往蘇俄參與共產國際工作，所以中途便停止了活動。後來，又得到李大釗協助，于方舟、韓麟符等人接續完成任務。同年11月，成立「天津社青團支部」。到了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夕，李大釗又於天津停留一周，指導于、韓籌建天津黨。於是在1924年3月，正式成立了「天津地方委員會」。

唐山自民初以來，即為北方重要的工礦業中心。有名的唐山製造廠、開灤煤礦，有為數眾多的工人，有利中共發展地方組織。早在1920年初，李大釗即派遣羅章龍到唐山進行勞動調查。5月，由北大「研究會」領導的北京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便引起唐山當地熱烈迴響。其後，唐山製造廠工人鄧培加入共產黨，成為唐山第一個中共黨員。鄧培積極參與唐山黨的籌建。1921年7月，成立了「唐山社青團」。年底，創辦工人圖書館，有利知識宣傳。1922年4月，成立「唐山地方委員會」。8月，經「北京區委」批准，建立「唐山地方執行委員會」。<sup>43</sup>

在保定，一樣是讓青年學生深入地方進行組織工作。1921年初，鄧中夏被保定直隸高等師範學堂聘為新文學教授，因此可就近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受影響者，還包括育德中學的學生。由於新思想的刺激，引起當地青年開始組織進步社團，發展活動。1922年2月，兩校的積極學生便聯合起來，成立「保定社青團」。12月，經過「北京區委」批准，王錫疆、楊其剛等人，從「社青團」員轉為黨員，並成立中共「保定小組」。

<sup>43</sup> 依照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當一個地方有兩個支部以上，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許可，該地方可推舉3人組成地方執行委員會。而當各區有兩個以上的地方執行委員會，如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時，得於該區推舉5人組織該區執行委員會。詳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冊，頁94

在石家莊，1920年下半年，李大釗曾指導鄧中夏、朱務善帶領平民教育講演團到該地演講，使工人對自身處境有所了解。1921年，正太路工人孫雲鵬，成爲石家莊第一個共產黨員。1922年8月，李又派遣張昆弟，以正太路密查員身分，暗中在石家莊進行工人運動。10月，建立了正太路「工業研究會傳習所」，是當時石家莊最大的工會組織。在1923年下半年，成立了「石家莊地方執行委員會」。1925年12月，建立「石家莊特別支部」。主要在正太路總機廠、石家莊火車站、大興紗廠等單位展開活動。<sup>44</sup>

在張家口，1921年12月，何孟雄接受李大釗指示，同樣以鐵路密查員身分，到京綏路工作。張家口位處京西，是京綏路段的中心，交通地位重要。何孟雄在張家口開辦工人夜校、文化補習學校、工人報告會、讀報組等學習組織，並且在當地建立工會。1922年5月，黨組織「鐵路工運小組」成立。1923年初，機務、廠務、車務三個黨小組相繼成立。到「二七事件」之後，又建立了「張家口鐵路車務工人支部」。到了1925年10月，正式成立「張家口地方委員會」。因地理位置因素，使張家口在中共北方運動中具有特殊地位。它成爲日後李大釗與國民軍建立合作關係，以及對內蒙地區擴張黨組織的重要跳板。關於內蒙黨的發展，將按照內容安排，於第三節詳述。

其次，直隸以外的北方各省，包括魯、晉、豫、陝、甘、東北地區，也都分別成立了黨組織。<sup>45</sup>

山東由於距離北京近，交通方便。於是早在1920年9月，便由北大「研究會」會員王燼美，在山東組織「研究會」。11月，在李大釗協助下，王燼美、鄧恩銘等人建立起「山東共產主義小組」。山西黨，主要是由「北方小組」成員高君宇負責。在1924年秋，建立了「太原支部」。河南黨的建立，則交給李大釗介紹入黨的游天祥、劉天章。其中劉天章對國民二軍胡景翼的統戰工作相當出色。在李大釗的關切下，1925年10月，成立中共「豫陝區委」，總領河南和陝西的工農運動。

陝西黨，亦是由李大釗介紹入黨的魏野疇所創立。1926年初，經過「豫陝區委」批准，成立了中共「西安地方委員會」。甘肅黨的建立，則倚賴國民軍協助。由宣俠父等中共黨員，於1925年冬成立中共「甘肅特別支部」。至於東北地區形勢複雜，爲日俄必爭之地，尤爲重要。由李大釗薦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吳麗石，自1924

<sup>44</sup> 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傳》，頁165。

<sup>45</sup> 詳見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傳》，頁168~170。



年秋歸國後，在東北成立中共「哈爾濱特別支部」。並於 1926 年初，成立中共「北滿小組」。此外，李又派遣任國禎在 1925 年 8 月，成立中共「奉天支部」。到了 1927 年春，包括奉天、大連、哈爾濱、吉林、長春、牡丹江等東北主要城市，都先後建立起黨組織。

由此可見，在李大釗的積極經營之下，中共黨組織在北方很順利地發展起來，並且為中共北方的工農運動，以及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奠定基礎。雖然自 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下令「清黨」之後，中共的北方組織活動遭到嚴重破壞。但在這段期間所累積的組織和革命經驗，卻為往後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在北方的優勢，埋下了致勝的革命種子。

## 二、革命運動的最初嘗試

研究李大釗在北方的革命活動，不能忽略來自中共中央的影響。在中共一大通過的《綱領》中曾提及：「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sup>46</sup>這一條綱領明確說明中共的政治目的，即是對國內的資產階級進行鬥爭，進而推翻由資本家支持的軍閥政權。而在一大《決議》也規定了中共鬥爭的原則、方法。該黨任務即以工人運動為中心，從教育工人開始，後成立產業工會，使工人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同時在鬥爭的過程中，「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sup>47</sup>中共中央最初的原則，雖然隨著革命情勢變化而產生轉變，但一開始仍為地方黨所奉行，李大釗及其領導的北方黨亦不例外，他們最初嘗試對北京政府進行抗爭，並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革命理論，從職工運動著手進行。以下將依序說明。

### （一）對北京政府的鬥爭

一般而言，關於中共從事的活動，都會習慣將它看作是一種「革命」。因為其社會「目的」基本上是革命性的。但如將中共的革命目的，表現在其實踐的「方式」，其行動又有可能是「改良」的。換言之，雖然中共的最終目的，在於顛覆現有的社會權力結構，企求社會平等。但除了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他們也不會放棄使用改良

<sup>46</sup> 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載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 3。

<sup>47</sup> 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載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 8。

手段。這種改良方式的呈現，即屬於社會運動中的抗爭行爲。它企圖透過體制內的途徑，達到政治改革效果。在中共建立初期引發的許多社會抗爭，多屬於此類性質。其中，李大釗便曾多次領導群眾對北京政府抗爭，期望政府能更加注意人民的教育權、選舉權、自由權、勞動權、女權等等民主國家的基本權利。

當北方黨正展開工作，北大教授李大釗，<sup>48</sup>首先面臨到政府造成的嚴重教育問題。由於軍閥連年征戰，軍費開支浩繁，教育經費多被挪用。於是 1921 年 3 月，北京政府開始斷絕教育經費，拖欠教職員薪金。此舉引起教育界一片譁然。自 14 日起，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的教職員宣布罷課，並於次日組織「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簡稱「教聯」）。該會決定由每校各派 3 人爲代表，並票選馬敘倫爲主席。李大釗則被指定爲新聞股幹事。這一場教育界對北京政府的鬥爭，從 3 月一直持續到 7 月才結束。雖然這在名義上稱爲「索薪」鬥爭，然而其背後尚有「鞏固教育經費」及伸張國民教育權利之目的。<sup>49</sup>

到了 4 月底，馬敘倫因病缺席，於是改以李大釗爲代理主席，繼續領導鬥爭。期間「教聯」多次召開會議，與政府交涉，也得到北京學生聯合會和社會輿論的支持。但卻仍很不幸地在 6 月 3 日，發生軍警毆打請願師生的事件。北大校長蔣夢麟受傷，教授馬敘倫、沈士遠等人則是頭破血流。就連李大釗也被打得昏迷倒地。「六三事件」的發生，無怪乎讓李氏覺得：「在這樣的政府之下，教育事業不僅現在得不到真正的發展，也絕無真正發展的希望。」即使因爲社會莫大壓力，靳雲鵬內閣在事後不得不與「教聯」妥協，使學校復課。但北京政府的表現，還是讓李大釗更加地確定：「我國不能安於這種政府，對之容忍姑息，而應當徹底改變它，這一時刻的到來已經不遠了。」<sup>50</sup>

從索薪鬥爭的性質來看，該事件或許應歸納爲李大釗個人的反政府行爲，而非黨的反軍閥活動。但李氏爲領導索薪鬥爭，以致無法出席同年 7 月召開的中共一大，實際上反映李對於社會組織互助、聯合的執著。這是李大釗政治思想在創黨前後的過渡現象。因爲那明顯和中共一大的創黨精神相違。一直要到中共二大之後確立了「民主的聯合戰線」策略，才使得李大釗的互助、聯合思想，在中共能夠以社會抗爭的形式得到很好的發揮。

<sup>48</sup> 1920 年 7 月 23 日，李大釗正式受聘爲北大教授。

<sup>4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在京師各團體聯席會議上的發言〉，頁 303。

<sup>5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就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總罷課問題發表的談話〉，頁 302。

由黨領導的社會抗爭，可以 1922 年 8 月於北京成立的「民權運動大同盟」（簡稱「民權同盟」）為例。該同盟的思想，源自五四對於基本民權的重視。從 1920 年起，已有學者如胡適、蔣夢麟、陶履恭、高一涵等人在《晨報》發表〈爭自由的宣言〉，主張個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自由。<sup>51</sup>它主要反對北京政府為鎮壓五四學潮，而限制基本人權的作法。「民權同盟」的成立，一方面是因為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系吳佩孚對於社會的「開明」態度，讓社會對實施民權有高度期待。另一方面，中共在二大後，也決定有組織性的在全國各大城市，聯合社會各界團體成立「民主主義大同盟」。<sup>52</sup>此與前者實係相同組織。李大釗在北京參與了「民權同盟」的發起，其中成員即包括國會議員李石曾、北大教授多人，以及加入「社青團」的北大學生。24 日，他們在北京湖南會館舉行成立大會。李大釗、李石曾、鄧中夏、高君宇、蔡和森、范鴻劼等人被選為執行委員。范鴻劼又兼宣傳股主任。

「民權同盟」執委李大釗、李石曾等人在 10 月 14 日發表的《宣言》中，向北京政府提出四大訴求：第一，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有絕對自由權；第二，普遍選舉；第三，勞動立法；第四，男女平權。他們的具體行動，首先是以請願方式，並透過部分議員支持，以取消《治安警察法》。<sup>53</sup>其次，訴請政府給予普遍民眾有選舉權。再者，中共進行工人運動的同時，又使「民權同盟」聯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展開維護勞工權益的「勞動立法運動」。最後，要求男、女在社會和法律上都能有平等權利。以北京民權運動作為先導，中共於全國各地包括寧、晉、陝、贛、川、滬、粵等，皆陸續成立「民權同盟」，宣導反封建與民主思想。<sup>54</sup>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釗在女權運動方面的努力。從五四時期開始，李氏即注意到「女權」是考察「民主」的重要指標。尤其是對長久處於家父長制社會的中國而言，居於半數的女性，大都受到男性專制。李大釗於是認為：

若想真正的「平民主義」在中國能夠實現，必須先作婦女解放的運動，使婦女的平和、美、愛的精神，在一切生活裡有可能感化男子專暴的機會，積久

<sup>51</sup> 求實，〈爭自由〉，載於《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16 號，1920 年 8 月 25 日。

<sup>52</sup>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 66。

<sup>53</sup> 1922 年 10 月 14 日，北京七十二團體代表，蔡元培、鄧中夏等為請願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向黎元洪遞交請願書。據密探載德報告：「據今日民權運動大同盟中人，尚不滿意酌量修改《治安警察條例》，擬日內召集大會進行，以達全部廢止，並由李大釗起草全文，再請願於參、眾二院，今正聯絡研究系及民黨議員代表主持。」詳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近代史資料》（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年），第 5 期，頁 108~109。

<sup>54</sup> 詳見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事件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頁 195。

成習，必能變化於無形，必能變專制的社會為平民的社會。沒有平民主義化的社會，斷沒有「平民主義」的政治。<sup>55</sup>

在李大釗看來，婦女的解放是中國是否邁向「平民社會」的關鍵。於是對女權的訴求，實際成為上述民權運動中的核心概念。尤其李氏強調對「勞動婦女」的解放，更添入了階級鬥爭意涵。

李大釗的女權運動實踐，和「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北京女高師」）有深厚的淵源。早在 1920 年 7 月，李氏便受聘至「北京女高師」講授〈女權運動史〉。在索薪鬥爭期間，李還曾擔任該校代表之一。1922 年 7 月，在李氏協助下，由「北京女高師」的積極學生成立了「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該同盟在 8 月 13 日舉辦的茶話會上，從李大釗主張「要求撤廢治安警察法、要求選舉法中列入女子、希望勞工保護法內加入女工保護之規定」的發言內容，<sup>56</sup>能夠判斷該女權同盟，實際上就是「民權同盟」的延伸。至此，李大釗對於中國女權運動的「思想」和「理論」，都已有清晰輪廓。

到了 1923 年 2 月，李大釗受邀至武漢為「湖北女權運動同盟會」講演。其中更提到了「方法」問題。強調凡是女性，不論是資產階級婦女還是無產階級婦女，都應在行動上聯合、互助，而不應分道揚鑣；而且為使女權團體有更鞏固之結合，「於社會上有公益團體之組織」，亦「須毅然加入」，勢力才得以擴張。<sup>57</sup>在此，不僅使得中共的民主聯合策略，從共同被壓迫的女性群體出發，有了很好的著力點。李大釗將「女權」與「民權」的理論和實踐完全地結合起來，也使其互助、聯合思想得到了極致地發揮。

由於社會普遍的民權需要，以及對軍閥政治的不滿，於是民眾遂將體制內的社會運動，推展至訴求召開「國民大會」的程度。1923 年 3 月，中日外交又陷入難題。在「收回旅大運動」的刺激之下，北京各界團體在天安門舉行大會。會上不但要求收回被日本霸占的旅順、大連，令《二十一條》無效。還要政府召集「國民大會」，以解決內政、外交諸問題。「國民大會」的訴求，說明當時北京國會已漸失其合法性。為一次性地解決國內、外繁複的問題，於是有必要從「國民大會」中選出新國會。

<sup>5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4 卷，〈平民主義〉，頁 129。

<sup>5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4 卷，〈在女權運動同盟會招待報界學界茶話會上的講話〉，頁 90。

<sup>5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4 卷，〈在湖北女權運動同盟會演講會上的演講〉，頁 151。



這項民眾訴求，更成為國共合作之後推動「國民運動」中重要的一環。以上大致介紹了李大釗和中共在體制內的社會抗爭。接下來，則接續說明北方黨在體制外領導的社會革命運動。其中又以職工運動為主。

## （二）北方職工運動情形

在職工運動方面，中共主要是以知識青年運動工人。要了解中國工人的生活，必須先分析中國工業的發展狀況。民初中國工業，如以產業別區分，多以輕工業為主，包含食品、紡紗、造紙、印刷、玻璃等等。此外，也有鐵路、採礦、冶煉、金屬加工的工廠。在現代工廠工作的勞動者，可以稱作典型的工人。但實際上，中共對「工人」的定義較寬，其中包括許多不在現代工廠工作的非典型工人，例如排字員、海員、人力車夫等等。再就地域別來看，中國各省的工業發展程度，又因歷史、地理因素而不同，所以各省工人的運動環境也就有所差異。像是上海和廣州的現代工業起步較早，於是有組織工會的雄厚基礎。而李大釗所在的北京，其現代工業則相對落後。然而不可輕忽的是，在北京雖不易組織一般工會，但其交通發達，為全國各鐵路中點的特色，使得聯繫各路工人相當方便。所以北方黨運動工人的主要對象，即鎖定在鐵路工人。<sup>58</sup>。在當時帝國主義以鐵路周邊利權作為侵略中國最主要手段的情況下，鐵路工運又同時具備強烈的反帝意涵。

### 1. 北方工運的準備工作

現代工人運動的發展有其階段性。首先從工人教育做起，然後是組織工會、發動經濟性罷工，最後進入到聯合罷工。不同於廣州有綿長的工運歷史，北方最早的工運要晚至五四才開始。反對巴黎和會期間，張國燾便曾到北京近郊的長辛店演講。他向鐵路工人宣導愛國思想，並組織救國十人團。而工人們也都熱情回應，進行一連串的罷工和拒日活動。惟此刻工運仍帶有濃厚的民族情懷，還沒有階級鬥爭的觀念。但這一次珍貴的罷工經驗讓參與的工人們意識到，他們實際上有能力改變社會現狀。有了這些鬥爭經驗的基礎，長辛店理所當然成為日後中共北方工運的重要據點。但在青年黨員與工人接觸，仍存在有「工學界限」的問題。<sup>59</sup>由於文化、生活背

<sup>5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就中國工人運動問題與《北京周報》記者的談話〉，頁61。

<sup>59</sup> 羅章龍，〈羅章龍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載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頁11。

景的差異，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所以青年一開始的任務，就是貼近、了解工人的勞動生活，如此才能深入分析中國工人問題。這是一個從理論到實踐的重要過程。當時張國燾、鄧中夏便時常搭火車在京、長間往返，為的就是要深入了解工人的勞動情形。

民初北方鐵路工人的勞動狀況，可以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為例。根據當時工人回憶，工廠的上層人物，包括廠務總管、廠長，都是由法國、比利時等外國人擔任。作為下級主管的工頭，則負責基層的工人管理。工頭一旦招工，一些為生存而離鄉背井，來應徵工作的窮苦人家，必須經過「考工」的體力測驗。但如無事先送禮打通關係，體能再好也是無用。即使順利當上工人，也有「短牌」和「長牌」之分。「短牌」即所謂臨時工，不但薪金低，而且工作不穩定。如果是「長牌」亦不必慶幸，也要逢年過節給工頭送禮，否則別想漲工錢。<sup>60</sup>

此處鐵路工人的工作條件，在勞動時間的安排上，每人每天工作平均約 10 小時。而且時常加班，一個月僅休息 2 個星期日。在待遇方面，一般工人每人每月薪水平均約 8 到 9 元。只有少數工匠的月薪能到 18 元。相對而言，工頭每月都有 50 元以上，甚至到 100 元。廠長則可達到月領 400 元。一般工人的薪水微薄也罷，平時如犯小錯，或是被看不順眼，就要遭「罰」金的處分。如果工人沒有妻小，就必須在工頭安排的「鍋伙」生活。<sup>61</sup>由於身不由己，遭到工頭訛詐，或是為其做私工，成為變相的奴隸，那也是常有的事。除此之外，據李大釗觀察，由於工人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所以往往錢一到手，便是吃喝嫖賭，在短期內便揮霍殆盡，如此更加重工人的生活負擔。<sup>62</sup>於是，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準，便成為進入階級鬥爭前的首要工作。

為加強北方黨與工人階級的內在聯繫，所以有必要深入進行工人勞動情況調查與工人教育工作。首先在 1920 年 11 月，北京黨組織出版了《勞動音》周刊，由鄧中夏、羅章龍負責編輯。《勞動音》的出版，一方面是為「記述世界勞動者的運動狀況，以促進國內勞動同胞的團結」。另一方面，是要向各地工人徵文，蒐集各處工廠

<sup>60</sup> 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廠史編委會編，《北方的紅星—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六十年》（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 年），頁 8。

<sup>61</sup> 「那時候有很多當工頭的家裡都立了『鍋伙』。凡是歸工頭管的工人就都得吃他的飯，住他的房，聽他擺布，大伙兒整天生活在一起，這就是『鍋伙』。」王春榮口述，〈「鍋伙」裡的生活〉，載於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廠史編委會編，《北方的紅星—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六十年》，頁 25。

<sup>6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唐山煤場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驢馬〉，頁 315。

的組織、制度和勞動情形的細節，以供同人研究和分享。<sup>63</sup>其次，到了隔年1月，長辛店的「勞動補習學校」正式開學。其中又分作日、夜校。日校主要讓工人子弟學習，夜校則供一般工人就讀。當「社青團」在工作布置完成之後，李大釗亦曾親自到校觀察，並為工人群眾演講。此外，在積極對工人領袖的發掘和栽培之下，工人代表史文彬成為長辛店第一位中共黨員。長辛店的史文彬與唐山的鄧培，都可算是工人中黨欲延攬的積極分子。上述活動除了有助於工人的階級自覺，形成工會組織，還醞釀出後續具有經濟目的的罷工行動。

## 2. 朝向聯合罷工邁進

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必須有組織活動。成立勞動補習學校，是組織工會的起點。最初工人對組織工會一事，亦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疑問在於「為什麼要幹這類會黨的事」。<sup>64</sup>但在中共的宣傳之下，當工人對工會組織和目的有了大致了解，並且經過「社青團」長期的商談和勸服過程，長辛店終於在1921年五一勞動節那天成立了工會（1922年4月後改名「工人俱樂部」<sup>65</sup>）。

就在長辛店成為北方的一顆「紅星」之後，全國工運隨著中共組織發展而加速進行。中共一大召開不久，8月於上海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簡稱「書記部」）。<sup>66</sup>「書記部」直屬於中共中央，首屆主任為張國燾。張發表了成立《宣言》，說明「書記部」的目的，是為了「要聯合與改組已成的勞動團體」，並「建立中國工人們與外國工人們的密切關係」。<sup>67</sup>它實際上成為中共在全國職工運動的指揮中心。「書記部」出版《勞動周刊》作為官方刊物，並且在各地設立分部。

其中在北京成立的「北方分部」以羅章龍為主任，王燼美為副主任。他們又另

<sup>63</sup> 心美（鄧中夏），〈我們為什麼出版這個《勞動音》呢？〉，《勞動音》，1920年11月7日。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71~73。

<sup>64</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頁115。

<sup>65</sup> 最初長辛店成立工會，還必須事先問過工頭意見。但教育程度不高的工頭，哪裡知道那是階級鬥爭的組織。只覺得這事新鮮，又能登報揚名，所以最初都同意並親自參與工會。但後來工頭漸知工會底細，於是與工人形成對立。後代中共黨史遂塑造出工頭鄧長榮的形象，及其遭毆打一事。其後長辛店工會改組為「工人俱樂部」，並排除了工頭、司員、巡警的加入資格，成為純正的工人組織。由此可見，最初中共進行工人運動時，仍必須調查、運用當地的社會網絡。為了實踐工作順利，還必須適應地方情況，犧牲部份組織原則。這在各地工會的成立過程，大概都有類似的情形出現。詳見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廠史編委會編，《北方的紅星—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六十年》，頁72、84-91。

<sup>66</sup> 曾長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於「一大」以前〉，載於《近代史研究》（北京），第2期，1986年，頁280~281。

<sup>67</sup> 詳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載於《共產黨》，第6號，1921年7月7日。

外出版《工人周刊》，宣導無產階級革命。「北方分部」由於負責範圍廣大，人手稍嫌不足。<sup>68</sup>經過北方黨的會議討論，亦決定從「研究會」中徵集人員加以協助。其後，經「北方分部」計畫，在長辛店、唐山、南口、豐台等處各設立了幾所工人學校，以激發工人革命意識。鄧中夏、羅章龍、何孟雄、李梅羹等人亦分別到長辛店、唐山、南口等地，以及京綏、京漢、隴海、京奉、津浦等各路沿線組建工人夜校。<sup>69</sup>11月，在「北方分部」領導下，隴海路工人開始舉行罷工。提出開除洋總管、增加工資、不准裁人減薪、逢年節和星期日一律休工等要求。

在社會平靜的表象下，各地工人的教育和組織工作正暗中密切進行。直到1922年1月的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始劃破一片寧靜。在中共黨史書寫裡，從這次海員大罷工到隔年2月的「二七慘案」這段期間，被稱作是「中國第一次罷工的高潮」。<sup>70</sup>香港海員罷工的原因同一般工人差不多。他們除了工資微薄，還要受「包工制」剝削。其待遇和外國船工相比，亦相差懸殊。雖然此次罷工遭到官方鎮壓，發生了「沙田慘案」；但同時也讓資本家的利益蒙受巨大損失，最終罷工獲得成功。海員工會得到與香港政府的妥協，被視為對英帝國主義的勝利。李大釗總結這次勝利的原因，固然是靠著海員自身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其他地方工會組織的聲援和捐款也是必不可少。<sup>71</sup>李氏在此明確指出「聯合罷工」的重要性，這個概念在往後將得到很好的發揮。5月，「書記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中共在這一次不分黨派的工會組織會議中取得主席地位，並通過多項決議。其中一項《罷工援助案》值得注意。該案主要說明罷工的原則、方法：凡每地發生罷工，必須通知各地工會，特別是「書記部」。各地工會在接到罷工通知之後，就要大力宣傳，通電慰問，捐款援助。如資方執迷不悟，更要舉行同情罷工，形成區域甚至是全國性的聯合罷工行動。<sup>72</sup>如此對於爭取鬥爭的勝利，以及擴大政治影響上，實具有積極效益。

在一般情況下，政府與資本家的利益往往互相掛鉤。當中共將觸角伸入鐵路工

<sup>68</sup> 「北方書記部工作範圍管轄北方12省和16個大城市的工人運動，即：順直、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熱河、察哈爾、綏遠、甘肅、奉天、吉林、黑龍江和北京、天津、開封、太原、濟南、青島、西安、蘭州、瀋陽、長春、哈爾濱、鄭州、洛陽、徐州、蚌埠、張家口。後來全國鐵路總工會所管轄的全國各鐵路工會，亦包括在內，所以事實上北方書記部涉及範圍很廣。」引自羅章龍，〈羅章龍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載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頁5。

<sup>69</sup> 王永璽主編，《中國工會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頁102。

<sup>70</sup>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22。

<sup>7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就中國工人運動問題與《北京周報》記者的談話〉，頁59~60。

<sup>72</sup>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73。



人，北京政府一方亦嚴陣以待。民初以來，以梁士詒、葉恭綽為首的交通系，長年把持國內鐵路及周邊利益。交通總長的人選，亦大多為該系出身。尤其到 1920 年直皖戰爭之後，交通系得到張作霖協助，由梁士詒組織內閣。當時中共在長辛店開辦的工人學校和工會，才要開始產生社會影響；政府對此過激運動，不會置之不理。交通系為分化工人階級力量，首先，在工人教育方面，擬增辦各路學校 30 餘所，並特設職工教育委員會，創立職工教育養成機構，欲取代中共的工人學校。其次，又指使各路員司，以同事同鄉關係拉攏部分工人，組織團體。如在京漢路的鄭州，便成立了交通傳習所；粵漢路之徐家棚，則組織「天津同鄉會」。這些團體又與中共指導的工會，形成對壘。於是，中共在北方發展工運的過程中，交通系成了最大的絆腳石。<sup>73</sup>

但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開始對中國職工運動的傾向有利。這一度讓李大釗充滿期待。1922 年 5 月底，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直勝奉敗。當時直系軍閥吳佩孚在國中頗得人心，李大釗的友人白堅武又恰在吳佩孚處擔任幕僚。6 月初，李即透過白的關係，赴保定與吳佩孚晤談二日。會談後不久，吳隨即通電發表四大政治主張，其中一項就是要「保護勞工」。<sup>74</sup>中共於是乘此機會，利用吳佩孚欲剷除交通系的心理，建議吳及其親信交通總長高恩洪，在京漢、京奉、京綏、正太、隴海、津浦等鐵路沿線派遣密察員。該建議順利被採納之後，李氏即調派何孟雄、張昆弟、安體誠、陳為人、包惠僧等人以鐵路密察員身分，實際從事鐵路工人運動。在年底之前，鐵路工運有了很好的進展，京漢沿路成立了 16 個工人俱樂部。<sup>75</sup>此外，在同北京政府的鬥爭方面，「書記部」於 8 月順勢發布了《勞動法大綱》，<sup>76</sup>欲聯合「民權同盟」和全國工人共同展開「勞動立法運動」。冀望在直系軍閥保護勞工的主張下，讓勞工權益能真正受到國家法律保護。

<sup>73</sup>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 24~25。

<sup>74</sup> 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後，吳佩孚提出的四大政治主張為：國民大會、恢復法統、保護勞工、主權獨立。

<sup>75</sup> 1921 年以來，京漢沿路各站工人組織工人俱樂部。到 1922 年底，共計有長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順德、彰德、新鄉、黃河、鄭州、許州、鄆城、駐馬店、信陽、廣水、江岸等 16 處。參見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 85。

<sup>76</sup>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於 1922 年 8 月公布的《勞動法大綱》，其主要內容包括：承認勞動者有集會、結社、罷工和締結團體契約及與國際聯合的民主權利；實行 8 小時工作制，每星期有一天休息，須要延長工作時間時，必須得到工會同意，禁止雇用 16 歲以下童工，保障男女工人享受補習教育的機會。詳見王永璽主編，《中國工會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年），頁 107。

### 3. 總工會成立的悲劇

李大釗亦曾慮及與這些「開明軍閥」合作，仍存在許多不穩定因素。軍閥仍將鐵路視為私產，他們大多和資本家站在同樣的經濟立場。吳佩孚雖主張「保護勞工」，但也僅是一時籠絡人心的手段。實際上，吳氏不能不擔心那逐漸發展起來的鐵路工運，會危及他們對鐵路的控制權。另一方中共亦深知其理。軍閥鎮壓工運的例子所在多有。不久前才發生的黃、龐流血案，仍殷鑒未遠。<sup>77</sup>在這場災禍之後，李大釗即為《黃龐流血記》一書作序。他哀悼且沉痛地表示：「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sup>78</sup>從這些跡象可以預見，這次中共與軍閥短暫的合作即將破裂。8月，在鄧中夏領導下，長辛店舉行大罷工，造成南北交通中斷。其訴求是開除工頭、增加工資、短牌換長牌、改善生活待遇、並使工人俱樂部有推薦工人之權，最後工人取得妥協。此次罷工的勝利，迅速蔓延到各路工人。接著又有9月的京奉路山海關機器廠罷工、粵漢路武長段全路罷工。10月的京綏路全路車務工人罷工。11月的京奉路唐山製造廠罷工。12月正太路石家莊機器廠罷工。1923年1月的津浦路機器廠聯合埔口碼頭工人罷工、粵漢路徐家棚工人罷工等等。他們的訴求大致雷同，而且也都獲得局部勝利。此時勞動者們逐漸覺醒起來，他們迅速地從經濟性質的鬥爭，提升到反抗軍閥以爭取自由的政治鬥爭。<sup>79</sup>

長辛店8月罷工以來的一連串勝利，促使鐵路工人朝向成立「全路總工會」的階段性目標前進。1923年1月，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在鄭州召開第三次會議，決定於2月1日公開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書記部」方面亦給予全力支持。但全路總工會的成立，似乎已逾越吳佩孚的底線。京漢路的收入一直是吳佩孚的軍餉重要來源。在成立大會之前，吳佩孚即曾向工會代表們表示反對。到了大會當天，當工會代表及來賓向普樂劇園的會場進發時，過程中竟遭軍警包圍，多有阻撓。後來大會好不容易召開，宣布總工會正式成立，卻又馬上被強制解散。在軍閥的壓迫之下，總工會於是秘密決議移至江岸辦公，並於4日計劃實行京漢路總同盟罷工。在罷工《宣言》中，嚴厲要求查辦鐵路和軍警當局人員，並賠償大會損失。但沒想到，雖然同盟罷工實現，造成全路客車貨車停擺，讓軍閥和帝國主義蒙受巨大損失，

<sup>77</sup> 1920年黃愛、龐人銓發起組織湖南勞工會，從事工人運動。1921年他們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1月，二人在湖南長沙的華實紗廠罷工過程，慘遭軍閥趙恆惕殺害。詳見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32~34。

<sup>7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黃龐流血記》序〉，頁62。

<sup>79</sup>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29。

卻也醞釀出接下來的悲劇。到了7日，吳佩孚乃密令軍警以武力鎮壓工運，逼迫工人上工。軍警在江岸慘殺工人數十，傷者數百。其中，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和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施洋不幸犧牲，史稱「二七慘案」。

李大釗此刻，正在武漢各大學舉辦演講。對罷工事件亦相當注意，曾經會見罷工領導人陳潭秋、施洋等人。朱務善當時亦以北大學生代表的身分到了武漢。據朱的回憶，在「二七」發生之後，李氏「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蒼白，鬍子也似乎比以前變黑了」。他們共同分析「二七」事件，李大釗表示：「我們早就認定了吳佩孚和中國其他軍閥完全一樣，我們從前接受了白堅武的意見，派我們的同志到各鐵路上參加工作，並不相信吳佩孚的什麼保護勞工政策……。」<sup>80</sup>事隔一年，李氏又回憶道：「去年『二七』前幾天，兄弟適因演講事情到漢口，親看同志為集會結社自由做很大的運動，又見如狼似虎的軍人殘殺工人，及在船上又知道留血的事情，今天回想起來，實在難過。」<sup>81</sup>

「二七」之後，3月，工人團體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追悼林祥謙、施洋的大會。羅章龍和高君宇，亦編寫《京漢工人流血記》一書，詳述事件始末。<sup>82</sup>京漢全路罷工的失敗，對北方職工運動造成重大的傷害。首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從此不能在北京立足，於是遷往上海。其次，是北方各鐵路工會一律遭官方封閉。重要的中共領袖，亦遭北京政府通令緝捕。根據曹錕向北京巡閱使王懷慶發出「關於偵查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革命機關，宣傳共產主義」的密電。內文即稱：「李大釗在該校內設有秘密機關，傳布過激說……。」要「密飾幹探，切實偵查。……密達政府，依法懲辦。」<sup>83</sup>中共過去兩年來在北方鐵路工運的慘澹經營，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中共工運領袖鄧中夏，對於此次罷工失敗曾作出如下分析：第一，雖然當時黨和工會關係密切，但依照黨規，工人要加入黨員困難重重。不僅須要經過數月考察，還要得到「書記部」推薦。如此繁複的手續，無法積極吸納工人中的優秀分子入黨。第二，在推展工運的同時所發生的嚴重錯誤是，他們並沒有在工會中建立起黨組織。工會行動竟是以黨員個人影響去作成，而非由黨組織領導。<sup>84</sup>換言之，起初創建中共

<sup>80</sup> 朱務善，〈回憶守常同志〉，載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回憶李大釗》，頁161。

<sup>8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在廣州追悼列寧並紀念「二七」大會上的演講〉，頁393。

<sup>82</sup> 該書作於1923年3月。全文收錄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頁433~583。

<sup>83</sup> 參見《北洋政府熱察綏巡閱使署檔案》，卷號：1025、90。轉引自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390~391。

<sup>84</sup>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42。

的這一群青年，對於組織工作仍未有經驗，也反映出早期中共組織的脆弱。因此，在「二七」之後，中共開始傾向與志同道合的政治集團合作，以建立一個「組織強大」的中共為目標。

### 三、轉向與政治集團合作

為達到社會主義理想，中共除了對軍閥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同時也與理念相近的社團合作。李大釗領導的北方黨，始終秉持著互助、聯合精神。雖然他們對於往後如何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尚無頭緒。但李氏認為，目前惟有透過民粹式的「群眾運動」，才能完成中國的社會革命。而且為改善中共最初組織弱小的處境，他們也必須聯合其他團體。中共自有與其他政治勢力聯合的需求，但其中亦不能忽略來自共產國際的影響。共產國際除了協助組織中共，同時亦尋找其他可能合作的對象。在其壓力之下，中共願意放棄對其他政黨採取獨立、攻擊的態度，轉而犧牲部份組織理念，與其他政治集團協商合作。這樣的「權宜之計」，讓他們先後注意到「開明軍閥」陳炯明和吳佩孚。但由於對中國國情生疏，所以過程中面臨許多挫折。最後，他們才找上當時雖實力不足，但卻擁有真正革命熱情的孫中山。

#### （一）與「開明軍閥」的接觸

俄共在中國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尋找具備反帝、親蘇、且有實力等三項條件的盟友。<sup>85</sup>時自詡為「社會主義者」的粵系軍閥陳炯明，首先得到俄共注意。陳受到孫中山重用，於1920年8月粵桂戰爭之後，成為實際控制廣東的實力派軍人。陳的對外態度，不但傾向蘇俄；在他的言談中，又無不嚮往建設一社會主義之中國。<sup>86</sup>12月，維經斯基便與陳獨秀到廣州拜訪陳炯明，雙方開始建立良好關係。不久，陳獨秀即受陳炯明之邀，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但中共一大精神認為，黨員基本上不得身兼政府官員或是國會議員，除非經過特許。<sup>87</sup>所以，陳獨秀在臨行之際，還曾致信李大釗，商量是否要應陳炯明之聘。李氏對於此事極為肯定，他們打算在陳

<sup>85</sup> 何雲庵等著，《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19~192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217。

<sup>86</sup> 「君等如能重回祖國傳播俄國革命種子，則國人必起而共同奮鬥，建立一嶄新之社會主義中國。」引自陳炯明，〈致旅俄中國工人弟兄書〉，作於1920年5月8日，載於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上卷，頁460。

<sup>87</sup>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載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4~5。



炯明的保護之下，在廣東發起中共組織和社會運動。此處顯示出，中共在原則與行動之間，乃保有相當彈性。

如要更好地說明李大釗，在中國各政治勢力間聯合過程中的角色，就不能不提直系軍閥吳佩孚。最初的聯吳方針，即是由俄共所決定。前文曾提及，早年蘇俄對中國有多重的交流管道，它們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並未統一起來。所以在各單位各行其政的結果下，使得蘇對中的工作情況相當複雜。如此山頭分立的現象，亦出現在俄共如何去選擇他們在中國的盟友。如遠東共和國方面，當時由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В. Д. Виленский-Сибиряков）負責遠東地區的革命工作。維經斯基出使中國，與他有很大的關係。在威廉斯基對中國的政治調查報告中，即認定吳佩孚是中國具有真正實力，且能左右全局的要人。<sup>88</sup>換言之，對俄共而言，吳是相當值得拉攏的對象。由此可信，維經斯基除了在中國協助組織中共，同時還向中共傳達與吳合作的秘令。李大釗於是在中共與吳佩孚洽談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然而，李大釗之親吳，亦非完全承自俄共一方的要求，其中亦反映李氏的主觀意志。至少在「二七」之前，李大釗都是將吳佩孚視為「開明軍閥」。為了順利發展工人運動，吳能夠暫時成為李的聯合對象。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蓬萊人，曾是清末秀才。於民國之後改從軍，入直系曹錕旗下，扶搖直上。其後奠基洛陽，成為直系洛派，時人又稱玉帥。在民初軍閥中，集褒貶於一身。五四期間，吳曾連電指責段政府，提出取消中日密約、重新召開國民大會等主張，一時備受推崇。直皖戰爭後，當華盛頓會議決定山東膠濟鐵路由中國贖回自辦，時梁士詒內閣竟接受日使建議，欲借日款贖路，行中日共營之目的。吳佩孚乃通電痛斥梁等「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sup>89</sup>當時各省督撫均響應吳。民間方面，全國各地的農工商學界組織「救國贖路集金會」，反對向日借款贖路；李大釗亦大力推廣，並作〈膠濟鐵路略史〉一文，期使該路終能「復歸故主」。<sup>90</sup>到了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復任總統的黎元洪，原請吳佩孚擔任陸軍總長，吳固辭不受，專注於地方經營。吳一貫地主張恢復法統、與西南各省開誠合作、將「聯省自治」納入制憲精神。一時南北頗有統一之望。<sup>91</sup>

<sup>88</sup> 何雲庵等著，《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19~1923）》，頁232。

<sup>89</sup> 余非，〈北洋人物誌（五）吳佩孚傳〉，《新知雜誌》，第3年，第2期，頁86。載於朱傳譽主編，《吳佩孚傳記資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頁5。

<sup>9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膠濟鐵路略史〉，頁57。

<sup>91</sup> 余非，〈北洋人物誌（五）吳佩孚傳〉，《新知雜誌》，第3年，第2期，頁88。載於朱傳譽主編，《吳佩孚傳記資料（一）》，頁6。

由此觀之，李大釗之親吳，亦受其自身對吳觀感的影響。吳佩孚所以被認為開明之處，就在於他能表現出不重私利，將國家利益擺在第一位。這一點讓他不同於一般軍閥。不僅使他受到蘇俄注意，也廣為各國媒體所知。吳時被譽為北洋時期最有希望統一中國的軍閥。因此他成為登上美國《紐約時報》封面的首位中國人物。

李大釗的親吳行動，早在直皖戰爭後便有進展。當時直、奉勢力共管北京，中共也才在上海建立臨時中央，李氏此時卻早已透過友人白堅武，得知吳佩孚方面的情報。<sup>92</sup>白是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時期的同學，畢業後擔任過記者。不同於李氏走上政治批評路線，他從事政治活動，往後又成為吳佩孚相當倚重的幕僚，時有吳的小內閣之稱。維經斯基在中國期間，也曾同柏烈偉透過李的介紹拜訪白堅武，從而得知吳的動向。<sup>93</sup>就在這時，俄共遠東局方面亦決定推動聯吳，希望與這一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合作發動一場民主革命，以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為暫定目標。

李大釗不僅在俄共的聯吳政策中扮演牽線者，同時也不時流露出個人對吳佩孚的期待。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奉張被逐出北京，改由曹、吳控制局面。時人對吳佩孚頗有寄望。當胡適離開《新青年》不久，即在北京自辦主談政治的《努力周報》。此時胡順應時勢，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sup>94</sup>文中向曹、吳提出南北議和、裁去冗兵冗官、採用直接選舉、國家財政量入為出等等建議。其中最要者，就是掃除政府貪官汙吏。當政者如能多邀集幾個「好人」組織「好人政府」，<sup>95</sup>即能廓清民國政治。這個主張經胡適大力宣揚，獲得蔡元培、王寵惠等在內的知識分子同意。他們聯合在文中署名。李大釗當時也以北大圖書館主任身分，加入了聯署。

不論是陳炯明，抑或吳佩孚，都是俄共極欲爭取的合作對象。其基本條件皆符合俄共期待。雖然陳、吳的階級成分，被定位作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sup>96</sup>但就革命相對落後的中國，他們卻是走在歷史前端的進步分子。他們除了擁有雄厚的實力，可

<sup>92</sup> 1920年9月24日，白堅武的日記內容如下：「孫漢忱到京，余暢敘吳子玉處近日內情，晚宴之於瑞記飯莊，約李守常、王勵齋作陪，王未到。」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杜春和、耿來金整理，《白堅五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冊，頁274。

<sup>93</sup> 1920年10月10日，白堅武於日記中記述：「昨，俄勞農代表包利克（柏烈偉）、外金斯克（維經斯基）來談中國現在並將來，俄之組織統系可為鑒也。」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杜春和、耿來金整理，《白堅五日記》，第1冊，頁277。

<sup>94</sup> 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第2期，1922年5月14日。收錄於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619~620。

<sup>95</sup> 1922年9月，在直系吳佩孚的支持下，署理國務院總理組成王寵惠內閣，人稱「好人政府」。當時直系內部「津保派」曹錕，和「洛派」吳佩孚對立激化，王寵惠遭到津保派責難。同年11月，財政總長羅文幹被總統黎元洪命令逮捕，於是王寵惠內閣上台後不久便倒台。

<sup>96</sup> 何雲庵等著，《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19~1923）》，頁235、252。

能實踐中國的統一。更重要的是，他們也都表現出傾向蘇俄，且重視勞工利益。因而在政治立場上，呈現出「中間偏左」的傾向。

然而，除了滿足上述外部條件，民主革命的目標是否實現，還必須靠著一種革命家的心理特質。即堅信一套政治理想，並以此化作規劃國家未來方向，而綿綿不絕的行動力。這也是所謂「開明軍閥」難以做到的一點。經過時間的考驗，就愈加顯露其軍閥本質。陳炯明公開傾蘇、倡導勞工神聖的口號，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為了得到外交支持，取得群眾擁戴。這在陳炯明與孫中山，對中國統一的意見上出現分歧後，產生很大的變化。由於陳主張的「聯省自治」與孫的「北伐政策」產生矛盾，造成 1922 年 6 月陳炯明政變。政變之後，陳很快便與蘇俄脫離關係，轉與英國合作。陳炯明主張的地方分權，很快地被共產國際視為是維護個人的獨裁統治。<sup>97</sup>至於聯合吳佩孚的過程中，也出現不少變數。首先在直皖戰後，曹錕和張作霖等對於蘇俄仍存有敵視態度。其次，雖然最初吳佩孚對蘇展現友好，但其真正有興趣的合作對象仍是英國。第三，吳相當不滿於蘇俄對外蒙的占領政策。<sup>98</sup>即便如此，吳佩孚與蘇俄之間的曖昧關係，仍要持續到「二七」之後才確認結束。

## （二）李氏與國共第一次合作

最初由於蘇俄不明中國國情，導致與「開明軍閥」合作的不穩定關係，使得俄共有必要重新檢討對合作對象的要求條件。不同於遠東俄共系統的威廉斯基，來自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著不同的看法。馬林認為，即使中共未來盟友，滿足反帝、親蘇、有實力的條件，但如果不具備真正的革命精神，也無法促成中國統一。自南北分裂以來，「中國統一」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對中國民主革命者而言，統一象徵國家從此進入穩定、建設、繁榮。但就蘇俄和中國社會主義者來說，統一除了有反帝、反軍閥意味；更重要的，它還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條件。這一點早期中共並未曾注意，直到共產國際千方百計地去提醒他們。所以馬林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中國找到一個能真正完成中國統一使命的革命者。日後國共合作，即與馬林有很大的關係。以下先介紹馬林的個人背景。

馬林是荷蘭籍的共產主義者，他曾先後在荷屬印度、印尼進行工人運動。1920

<sup>97</sup> 馬林，〈訪問中國南方的革命家—個人印象點滴〉，作於 1922 年 9 月 7 日。收錄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第 2 卷，頁 243~244。

<sup>98</sup> 何雲庵等著，《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19~1923）》，頁 235~236。



年7月，馬林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從而與中國革命產生關係。會上討論了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決定將世界共產革命的中心，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會議後，馬林得到列寧推薦，成為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其任務就是查明是否需要在中國成立官方的辦事機構，並責成與中、日、朝、東印度、印度支那的聯繫。<sup>99</sup>到了1921年6月，馬林以記者身分抵達上海。首先，他的工作是促成中共召開一大。根據張國燾回憶，馬林是個不平凡的人物。「他這個體格強健的荷蘭人，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的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sup>100</sup>因為馬林上述的個人特質，亦曾招致部份中共人士不悅。

其次，馬林的第二項任務，是研究中國的革命情勢。除了理解中共內部組織情況，在中共一大結束之後，馬林又經由張繼介紹，於12月和孫中山在廣西桂林相見。這一次會面，對馬林往後的國民黨政策影響極大。到了1922年1月，馬林又和陳炯明有過三次詳談。這段期間，馬林積極地蒐集革命情報，對孫中山在香港海員大罷工時期的表現，給予高度評價。3月，馬林在北京寫了兩份呈給莫斯科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告。其中要求蘇俄政府派出使團，前往廣州與孫中山建立關係。<sup>101</sup>馬林根據他過去長久在印尼的革命經驗，敏銳地察覺到孫中山是個和他具有同樣氣息的人物，是中國真正的革命家。於是馬林與陳獨秀商量，中共是否有加入國民黨的可能。但此舉卻招致陳的不滿。

在早期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陳獨秀與馬林不合，是眾所皆知的事。陳和馬林之間，常因為中共是否接受共產國際領導的問題，而引發衝突。1922年4月，陳獨秀致信維經斯基，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並表示國、共的革命理念不合。<sup>102</sup>但在同月，於浙江杭州舉行的中共中央全會上，馬林又不死心地重提中共到國民黨內部活動的建議，但不放棄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此議雖引起中共多數反對，但也讓中共做出讓步。同年7月的中共二大，中共正式成為共產國際支部，確立了「民主的聯合戰線」策略。<sup>103</sup>換言之，中共開始願意犧牲無產階級革命的理念，和其他政治社

<sup>99</sup> 參見葉永烈，《紅色的起點—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實》，頁231。

<sup>100</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頁136。

<sup>101</sup> 道夫·賓(Dov Bing)，〈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收錄於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7。

<sup>102</sup> 陳獨秀，〈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作於1922年4月6日。收錄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頁222~223。

<sup>103</sup> 中共在二大之後，正式成為共產國際支部，確立了「民主的聯合戰線」策略。



會團體對等地聯合起來，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運動。即使如此，由於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共組織的貧弱，讓馬林不能不用他強勢的作風，引導中共的國民黨政策，從「聯合」轉為「入黨」。此舉自然引起中共人士極力反彈。他們擔心中共可能因此失去自主性。於是到7月上旬，馬林只好快快地回到莫斯科。

早期共產國際與中共的衝突，不論是來自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權力問題，或是中共與國內政治團體間，或競或和的關係，其性質主要都反映出中共的自主性要求。雖然中共最後因為受限於俄共經費和革命經驗的支持，而只能順從共產國際的指令。<sup>104</sup>但從上述的爭執過程看來，國共合作接下來成功與否，其主要關鍵仍掌握在中共一方的態度。如果說在共產國際的安排下，國共合作的計畫已取得了天時、地利，那麼李大釗則是適時發揮了「人和」作用。尤其是在中國如此講求倫理觀念的社會，特別強調人際關係的建立，這是達成團體間合作的重要門徑。從國共商談合作的這段期間，可以發現李大釗善於交際的一面。

首先是出現在中共內部意見的統合。當馬林在莫斯科，正式得到共產國際執委會「讓中共加入國民黨進行活動」的指示之後，<sup>105</sup>旋於8月初回到中國。在上海，馬林向孫中山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同一時間，李大釗和陳獨秀亦多次拜訪孫中山，似乎就是討論國共合作是否可能的問題。在馬林的催促之下，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在29、30日於杭州西湖召開會議。這場「西湖會議」，對於國共合作有著重大意義。會議上馬林雖然拿出共產國際具有權威性的指示，要求中共加入國民黨，但仍引起陳獨秀、張國燾和蔡和森等人反對。會上經過激烈爭辯，李大釗則傾向以「調和」方式解決。李首先附和馬林意見，認為國民黨的組織鬆懈，黨員思想沒有受到太大的約束；卻又同時兼採陳獨秀所謂「有條件的服從」。結果決定先讓少數中共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以作為日後兩黨合作的橋梁。<sup>106</sup>於是在李大釗的居中協調下，使這場會議最終符合共產國際期望，也取得了黨內一致的意見。

<sup>104</sup> 有關陳獨秀對共產國際和馬林的態度，可參酌李達的回憶：「（陳獨秀）有一次，又發怪脾氣，接連一個月拒絕和馬林他們見面。我去勸他時，他說：『我們可以獨立幹革命，勿須接受第三國際的指導。』我說：『國際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是馬克思的教導，中國革命沒有國際的援助能夠成功麼？他對此默然無語。」引自李達，〈李達談馬林〉，作於1958年7月1日。收錄於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頁94。

<sup>105</sup>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聽完馬林所作，有關中國革命情勢的完整報告之後，於1922年8月發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指令〉。文中說明：「共產黨人應該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把擁護共產黨的人組織成一些小組。靠這些小組形成一支大軍去宣傳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鬥爭的思想，建立中華民國和組織反對中外剝削者的階級鬥爭的思想。」原文收錄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頁324。

<sup>106</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頁244~245。

西湖會議結束之後，李氏即與林伯渠一同會見孫中山，與孫討論「振興民黨以振興中國的種種問題」，而且是「暢談不倦，幾乎忘食」。9月初，李大釗便和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等人，透過張繼的介紹，由孫中山親自主盟，加入了國民黨。

其次，李大釗的人際能力，還表現在與孫中山合作的協調。在談論此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中共政治合作策略的轉變過程；以及李大釗在諸多策略之中，如何作出選擇。從1922年9月李入國民黨，到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一大，有將近一年半的時間。這段期間，中共在政治上的聯合策略，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在1923年2月7日發生吳佩孚屠殺鐵路工人事件之前，中共是既聯吳又聯孫。到「二七」之後，則是完全以聯孫為目標。

中共選擇聯吳或聯孫的問題，在俄共內部形成互相矛盾的兩種意見。其一，是來自維經斯基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分析。他對中共抱持樂觀態度；認為中共有能力組織、領導並代表中國的無產階級。<sup>107</sup>在政治聯盟策略上，則傾向聯合具有強大勢力的吳佩孚。雖然維經斯基也同意和國民黨組成民主的聯合戰線，但他卻不滿孫中山一貫的軍事作風，以及孫欲聯合張作霖打擊直系的傾日態度，所以維經斯基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其二，是馬林的觀點。1922年7月，在馬林呈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份重要報告中，即說明中國的工業落後，農民普遍對政治不夠關心。在中國沒有堅強的無產階級情況下，南方的革命情勢卻大有可為。國民黨的黨綱，使得各種不同的團體都能夠加入。因此讓中共到國民黨進行活動，便成爲一種必要。<sup>108</sup>至於馬林眼中的吳佩孚，只是個軍事方面很好的組織家，對於政治欠缺長遠理想。而陳炯明在叛變孫中山後不久，即被視作社會主義的叛徒。

從現有史料觀察李大釗的政治聯盟策略，可以知道李氏與維經斯基和馬林，雖都曾有過接觸，但卻很難看出李究竟秉承何旨。當李大釗一取得國民黨籍，旋即離開上海，趕往洛陽，與白堅武等共商南北政情。<sup>109</sup>返京之後，李又接受了《北京周報》記者的訪問，隨後刊登〈中國統一的方策與孫吳兩氏的意見〉一文。這篇文字

<sup>107</sup> 維經斯基在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中，給予其正面評價：「總的說來，你們的工作方針是正確的。不論在宣傳鼓動工作中，還是在組織問題上，你們都貼近中國年輕無產階級的需要，這表明，你們的組織已開始走出馬克思主義小組狀態，並作爲一個政治組織而站立起來。」維經斯基，〈維經斯基給中共中央的信〉，作於1922年8月，莫斯科。收錄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117。

<sup>108</sup> 參見〈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載於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頁17、20-21。

<sup>109</sup> 1922年9月9日，白堅武於日記中記述：「守常及李曉滄約余同看元鐵木耳墳，途中共談南北政情、人事之短長得失大略。」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杜春和、耿來金整理，《白堅武日記》，第1冊，頁378。

的合作色彩濃厚，係在調和孫、吳對於中國統一的不同想法。說孫、吳二人在「中央必須備有強大的兵力，然後依靠這種力量削弱各省督軍的武裝，與此同時還要承認縣的自治權力並不斷發展這種權力」<sup>110</sup>的觀點上達成一致。李大釗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後，欲加入孫中山、聯合吳佩孚，以完成中國統一的想法，在此昭然若揭。

李大釗的構想，因而跳脫出維經斯基和馬林的對立，形成第三種選擇。能夠說明如此作法的理由，可以說是來自李氏的調和觀點。由於李在面臨組織的決策分歧時，常常以中道的態度來統合他人相反意見，所以往往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成為李大釗獨特的處世哲學。事實上，後來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內部，也經過上述兩種意見的爭辯和統一的過程。最後他們也決定中共使用「聯孫為主，聯吳為輔」的政治合作策略，並交由自 1922 年 7 月從蘇俄派往中國的外交特使越飛（A. A. Иоффе）來執行。然而事情往往不盡如人意。一方面，由於吳佩孚在外蒙古和中東路問題上，屢與蘇俄發生衝突，合作形成困難。另一方面，孫、吳關係漸漸出現裂痕。吳佩孚對奉作戰勝利後，強化了武力統一中國的野心。而孫中山自從受到吳氏的拒絕合作，<sup>111</sup>也開始籌劃與皖段、奉張結成三角同盟，對抗北京的直系勢力。直到 1923 年 2 月 7 日，吳佩孚下令鎮壓京奉鐵路工人大罷工，才讓李大釗真正放棄對於孫、吳合作的期望。

「二七」之後，中共總結教訓，認為要完成社會革命，必先有一強大的黨組織。於是，中共遵從共產國際執委會對於國共合作的決議。<sup>112</sup>中共的工人運動逐漸採取守勢；與國民黨的政治合作，則從「聯合」走向「入黨」。在 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正式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其中提到依照中國現狀，國民革命之大本營在於國民黨，所以大會決定中共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但加入國民黨的同時，仍須保存自己的組織，並吸收國民黨內部的親共人士，同時強化中共群眾基礎。<sup>113</sup>此處提到所謂的「國民運動」，其實就是指在中國面臨帝國主義和軍閥壓迫下，

<sup>11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4 卷〈就孫吳兩氏統一中國的方策與《北京周報》記者的談話〉，頁 94。

<sup>111</sup> 「孫逸仙見吳佩孚不流於汗，曾派徐紹楨赴洛陽訪問吳氏，欲與合作，但吳氏另有一套看法，認為孫的三民主義為權利的主張，與其『民德主義』的義務觀念相反，故不相從。是後有孫張三角同盟的形成，吳氏之敗，部分基於此。」引自余非，〈北洋人物誌（五）吳佩孚傳〉，《新知雜誌》，第 3 年，第 2 期，頁 89。收錄於朱傳譽主編，《吳佩孚傳記資料（一）》，頁 6。

<sup>112</sup> 詳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1923 年 1 月 12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頁 76。

<sup>113</sup> 詳見〈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載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 146-148。



聯合開明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活動。所以國共合作的意義，不僅是兩黨之間的合作，而且是不同階級與各方群眾之間的聯合。

「二七」後的李大釗亦強調「國民運動」的重要性。他說：「一個政治革命的黨，必須看重普遍的國民的運動。要想發展普遍的國民的運動，必須有普遍的國民的組織。」<sup>114</sup>同時還指出國民黨過去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在南方劃地自限，遠在中國廣大的中原和北方卻沒有革命基礎。由此可見，國共的結合有彼此互補的需求，所以中共加入國民黨勢在必行。而且國共合作之所以可能，除了共產國際的指導，以及中共內部意見的統合；更為重要的是，李大釗與孫中山二人在性格上有極為相似之處。自陳炯明政變以來，孫中山便一改對蘇俄態度，積極地希望從對方得到援助。為取得信任，他不得不同意蘇俄在外蒙和中東路的主張。如果回顧孫過往的革命經歷，其中許多不乏是為革命目的，而進行原則上的妥協。孫中山說「最重要的是統一中國」。為了統一，隨時可以「準備同接受我的條件的任何首領合作」。<sup>115</sup>孫的妥協態度，實際上反映其革命的實用主義。這雖然讓孫在革命過程呈現軟弱的一面，但是他卻又有自信，將情況變得朝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sup>116</sup>這一點和李大釗的「調和」思想在某種程度上相契合，使得國共合作在最初便有很好的開始。

選擇李大釗作為國共合作的中共代表，而不是陳獨秀、張國燾，這大概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1923年1月，經李大釗和林柏渠安排，越飛南下上海與孫中山簽訂《孫越宣言》，確立了「聯俄容共」政策。6月至10月間，李氏為聯繫國共合作一事，勤於往返京、滬、粵三地。10月的北京，在曹錕賄選總統的漫罵聲中，國民黨改組一事加速地進行。蘇俄方面則派遣鮑羅廷（M. M. Бородин），以蘇俄駐廣東革命政府代表的身分來到廣州。在孫中山的號召下，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國民黨代表廖仲愷以及中共代表李大釗，針對國民黨改組問題，三方緊密協商。終於在眾人引頸企盼之下，於1924年1月召開了為國民黨改組而進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綜上所述，中共自一大後的發展，可見其革命策略具有彈性空間，而且形式多樣的特質。從最早的「組織獨立奮鬥」開始，他們即透過體制內的社會抗爭，和體

<sup>11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4卷，〈普遍全國的國民黨〉，頁169。

<sup>115</sup> 詳見〈孫逸仙給越飛的信〉，作於1922年8月27日，上海。收錄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110。

<sup>116</sup> 史扶鄰（H. Z. Schiffrin）著，邱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台北：谷風出版社，1988年），頁2。



制外的社會革命進行鬥爭。縱然在鬥爭實踐的失敗中，發現當時中國共產革命的條件仍未成熟，政治上也還沒有一個統一政府。但中共還是能夠正視革命的現實環境，輔以「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朝向以完成民主革命作為中期目標的方向前進。然而如此靈活的策略運用，也並非中共單方面所能致；而是經過共產國際與中共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在其間，非但沒有顯得如陳獨秀、張國燾那樣左右不定，反而是感到游刃有餘。李氏以其領袖般的魅力，以及注重調和思想的處事哲學，使得每當中共在面臨重大轉折時刻，都能適時發揮其關鍵作用。而李大釗仍會在接下來的國民革命中，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

### 第三節 國民革命的經過到犧牲

從國共正式合作這一刻起，中共即號召全民，共同參與這場以民主革命為目標的「國民運動」。不久，又因馮玉祥發動首都政變，使得革命情勢扭轉。一方面，在北京有孫中山推動「國民會議」促成會，希望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南北統一。另一方面，在國共指導下，全國各地亦陸續出現工農運動。他們期待能改善工、農基本生活，甚至採用武力抵抗來自資本家和軍閥的剝削。尤其李大釗在這段期間，重視農民的革命性，強調以工農聯合的策略，將農民階級拉入「國民運動」陣營，為往後毛澤東提出的農民革命理論奠定基礎。乍看之下，中共「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相當成功；但在國共內部，對於社會革命觀點的基本矛盾卻又日漸擴大。即使李大釗和中共對於北伐及其成功貢獻甚多，但「反赤聯盟」與國民黨右派的結合，最終還是讓李大釗走向為革命而犧牲。

#### 一、國共合作的初步成果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在廣州正式開幕。這一次會議確立了國民黨改組，以及國共合作路線。如見李大釗的會議職務分工，可見李在其中居於重要地位。孫中山在會議中以總理身分擔任大會主席。而李大釗則不只被指派為大會主席團的五名成員之一，還是大會宣言、國民黨章程草案、出版及宣傳等審查委員會委員，地位可以說僅次於孫。雖然大會期間，國民黨代表如方瑞麟等人對中共加入國

民黨一事，提出「黨內有黨」的質疑。<sup>117</sup>但有了孫中山的堅持和親共人士的護航，李大釗仍能義正辭嚴地加以反駁，並印發《意見書》說明中共入黨的正當性：

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我們若脫離了國際的組織，不但於中國國民黨沒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損失。因為現代的革命運動是國民的，同時亦是世界的，有我們在中國國民的組織與國際的組織的中間作個聯絡，作個連鎖，使革命的運動，益能前進，是本黨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國際所希望的。<sup>118</sup>

對中共而言，會議的結果是選出的 24 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包括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三人為中共黨員。有關中執委的各部組織，除了設立一秘書處和組織、宣傳、調查、軍事部之外，還增設了青年、工人、農民、婦女四部。此處說明了在共產國際和中共的協助下，改組後的國民黨從一個以軍事行動為主的革命黨，轉而開始重視到群眾和社會運動。

### （一）國共合作在北方的發展

到了 30 日，大會正式閉幕。隔日，孫中山隨即召開國民黨中執委第一次會議，組織國民黨中央黨部，並選出各部部長。會中決定在上海、北京、漢口、四川、哈爾濱（實際上僅前三者設立），設立國民黨地方執行部，由中執委分別前往組織，規定其所轄區域，並指導地方黨務。李大釗負責的是北京執行部的工作，<sup>119</sup>因而李實際上成為國共在北方的領導人。3 月 8 日，中共北京區委進行改組，由李大釗任委員長，蔡和森為秘書。4 月 20 日，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正式成立，李大釗擔任執行部部長兼組織部長，秘書又為蔡和森。經由上述人事安排，可知國共在北方的發展，實有明顯的互利關係。國民黨一方，需要藉由中共原有在北方的基礎來擴充黨員，相對地，中共則要利用國民黨這塊合法招牌，正當化他們在地方進行的群眾運動。

<sup>117</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653。

<sup>11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4 卷，〈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頁 391。

<sup>119</sup> 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 412。

北京執行部所轄區域爲：京、直、魯、豫、熱、察、綏、奉、吉、黑、內、哈爾濱、晉、甘、新，共十五省區。組織架構中除卻軍事部，大致仿效中央黨部。其工作卓然有成者，依次說明如下。

第一，在北方黨員人數方面，迄 11 月止，以繳領的入黨願書和黨證數目爲憑，共計約 14000 人。但在北京軍閥嚴密監控的情況下，多有願書和黨證未繳領者，所以實際黨員數，應還要更多。

第二，關於地方黨部設立，以直隸爲例，代表直隸省出席國民黨一大的成員，包括于樹德、李錫九、王法勤、于方舟、韓麟符、陳鏡湖六位。其中除了王法勤，其餘皆爲共產黨員。這些代表在會後即負責直隸省黨部的籌建。他們的作法是，在建立中共黨團組織的同時，也一面把國民黨組織建立起來。1924 年 4 月，于方舟、李錫九等人在天津成立國民黨直隸省臨時執行委員會；並於隔年 6 月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建立「臨時黨部」。1925 年，國民黨中央復派張繼等人，爲直隸省黨部籌備委員。於 1926 年 3 月成立籌備委員會，並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式產生「中國國民黨直隸省黨部」。其中江浩、李錫九、于方舟爲常務委員，皆中共出身。<sup>120</sup>

全省範圍內的市、縣（區）黨部也都陸續建立。1924 年 5 月，李錫九到保定進行國民黨改組。年底，在中共「唐山地委」協助下，成立國民黨唐山區分部。1925 年 5 月，于方舟赴容城組織革命活動。地方黨部主要的發展模式，即以中共黨、團員加入國民黨的方式進行。至 1927 年春，保定、容城、博野、蠡縣、阜平、完縣、涿縣、安平、饒陽等地都成立了黨部。根據統計，從 1924 年初到 1926 年 5 月，直隸省有國民黨縣、市黨部 53 個，黨員達 5300 人。<sup>121</sup>

第三，有關群眾運動的領導方面，1924 年間的北京群眾運動，主要以學生爲主。雖然其中有許多學生已加入國民黨；但因當時北京執行部和北京市黨部組織仍未堅強，活動還是由北京學生聯合會主導。到了 1925 年初，孫中山應馮玉祥電北上議事，北方黨務始有急速發展。直至同年「五七國恥」紀念日後，成立了學生黨團組織，才讓北京群眾運動轉由執行部主持。而到五卅運動期間，執行部在北京群眾運動的組織、聯絡和領導方面，則有更出色的表現。

然而，因爲環境的種種不良因素，北京執行部的運作情況實際上並不順利。在該組織的工作《報告書》內容提到：

<sup>120</sup> 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民國上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82-83。

<sup>121</sup> 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民國上卷》，頁 84。

當時因規模過大，經濟困難，曹吳極端壓迫，橫捕張國燾諸同志，以及石委員瑛辭職、李委員大釗被迫出京諸情形，各部強半停止辦公，惟秘書處常務委員會，仍尋覓秘密地點，指揮各省市籌備員，秘密進行，籌設各地黨部。<sup>122</sup>

組織不振，首要原因在於經濟問題。北京執行部的經費來源，主要來自黨中央撥款和地方自捐款。由於所轄範圍廣、用費龐大。其支出項目，包括各團體愛國活動的援助、大量宣傳品和機關報的印刷費用、辦公場所的租金、員役津貼和各項雜支等等，皆讓執行部捉襟見肘，導致黨的宣傳和組織活動進展緩慢。其次，北京政府亦加緊通緝中共人士。1924年2月7日，「全國鐵路總工會」於北京秘密成立，由張國燾等人任幹事。5月，總工會遭查封。經內務部下令，京師警察廳於21日捕獲張國燾。張於審訊後，供出李大釗為中共北方領袖。由於在京形勢危急，李氏隨即協長子葆華走避昌黎五峰。此後北京執行部的工作，便全交由秘書處暗地進行。中共中央為李大釗安全起見，不久又指示李領導中共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辦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簡稱「共產國際五大」）。

## （二）參加「共產國際五大」

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的代表，除了李大釗，還包括王荷波、彭述之、劉清揚等人。在李大釗的一生中，此次前往莫斯科的意義非凡。除了曾經留學日本，李氏過去並無其他旅外經驗。蘇俄，則是他此生前往的第二個國家。停留時間，從1924年6月到11月，一待就是將近半年。李大釗此行，除了讚嘆其幽深、偉大的絕景和異國風情，更加觸動李內心深處的，是能以中共代表的身分，到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朝聖。這不由得讓李氏充滿期待。關於此行目的，當然不單純是為了避險。更重要的是，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還得利用這一次機會，向上匯報國共合作的進展狀況。

「共產國際五大」的會期從6月17日開始，到7月8日結束。大會共聚集約50餘個民族的共產黨代表，場面蔚為壯觀。從遺留下來會議的速記紀錄可見，在7月1日的第22次會議，由「秦華」代表中共，提交了關於中國革命情勢的《報告》。這個「秦華」不是別人，正是李大釗在旅俄期間，為小心起見而起的化名。至於《報

<sup>122</sup> 原文載於《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刊》，第10號。收錄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671。



告》的由來，據學者考證，它並非針對當日會議所提出問題的答覆，而是事後補編進去的文件。早在大會開幕前，這篇《報告》即由李氏撰寫初稿，並經過與其他團員討論、修改完成後，呈送共產國際。<sup>123</sup>實際上，李氏在大會並無作過特別的報告或是發言。

有關該篇《報告》內容，先是概述近來歐美帝國主義如何與軍閥勾結，侵吞人民利益；而在中蘇外交問題上，帝國主義又是千方百計的阻撓。即使在中蘇建交之後，仍舊繼續挑撥離間。<sup>124</sup>再來就是說明自國民黨一大後，國共合作的大致情形。改組後的國民黨不但開始接觸群眾，也跟著唱起反帝、反軍閥的口號。其通過的新政治綱領，對內方面，包括「實行工人立法和保護工人組織」、「改組農業體制，改善農村生活條件」等扶助工農的政策。對外方面，則堅持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誓要「取消同外國簽定的一切關於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及外人在華政治權力的不平等條約」。<sup>125</sup>由此可見，經共產國際指導，中國民主革命的聯合策略可謂相當成功。中國革命問題因而成爲共產國際大會焦點。

大會結束後，中共代表團員陸續返國。李大釗在留蘇期間，除了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指導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中共旅莫支部黨員，還參與不少「見習」活動。大學暑假，李先是在近郊的馬拉霍英卡，訪問了少年先鋒隊。少年們展現的精神氣度，象徵著新時代的來臨。9月初，李氏到了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宿於國際海員之家。列寧格勒的樸素、大方，令李大釗戀戀不捨。<sup>126</sup>在當地除了參訪勞動宮、橡皮工廠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近郊的兒童村及其生活。李氏由此體驗到，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工人兒童享有完善教育、娛樂的幸福。這和中國在資本主義剝削下的上海童工，恰成強烈對比。<sup>127</sup>

但是，當李大釗正感於社會主義之「優越」的同時，中國南北卻又傳來不幸的內戰消息。北方由於英、美和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矛盾，關外張作霖又時時不忘復舊仇。於是在9月中旬發生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南方情況，則因廣州商人對

<sup>123</sup> 李玉貞，〈附：關於李大釗在蘇聯講話和文章的說明〉，載於《近代史研究》（北京），第6期，1985年，頁5~6。

<sup>12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的報告〉，頁3。

<sup>12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的報告〉，頁4。

<sup>12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蘇俄民眾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赤都通訊〉，頁18。

<sup>12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上海的童工問題〉，頁27。

孫中山親共、北伐政策不滿；所以在英國支持下發動廣州商團事變。當這些消息傳到蘇俄，引發群起不滿。俄人首先在莫斯科組織「不許干涉中國」協會，痛斥英政府干預中國內政。而後又以共產國際為中心，在世界各地成立相同組織。當時常有反帝示威遊行，甚至俄國工人還致電英國職工大會，要號召英國工人反對麥克唐納（J. R. MacDonald）的政策。<sup>128</sup>在 22 日，該協會於莫斯科大劇院舉辦大會。會上齊聚來自英、法、日、蘇等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李大釗也很榮幸地受邀演講。在李的講詞中，透露他在蘇俄的一切遭遇。李親身體會到中國人的問題，已和他周圍不同種族的人群產生了密切關係，中國革命並不孤單。世界的無產階級和東方受奴役的人們，要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進行解放運動，最終取得自由和獨立。<sup>129</sup>得到這一層理解之後，李大釗在蘇俄的日子也接近尾聲。10 月，因應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的新局勢，李氏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於 11 月下旬準備返國。

## 二、激起第二波革命浪潮

1924 年 9 月發生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同時也是英、美和日帝對北京資源的角逐戰。最後以奉勝直敗收場，日本同樣是勝利方。影響戰爭結果的關鍵在於，原屬直系的馮玉祥於 10 月 23 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並使居於前線的吳佩孚作戰失敗。事後馮玉祥在北京舉行政治軍事會議，決定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對國共而言，國內政局開始傾向對國民革命有利。李大釗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返回中國。在政治方面，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不忘召開民眾提出已久的國民會議。在社會運動方面，因「二七」而消沉的工人運動始有重生之機。此外，農村的革命性也受到了中共注意。由是激起第二波革命浪潮。

### （一）國民會議的推動

北方最強的直系軍閥業已擊垮，使孫中山有機會實現南北統一的計畫。孫認為，首先應恢復一個合法的國會，制定一部人民的憲法，以選出合法的總統。然而 14 年過去了，第一屆國會早已失去效力。所以召開全國性的國民會議，遂成為當務之急。行前，孫中山於 11 月 10 日在廣州發表《北上宣言》，內容「主張召集國民會議，

<sup>128</sup> 李玉貞，〈附：關於李大釗在蘇聯講話和文章的說明〉，頁 7。

<sup>12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在莫斯科大劇院「不許干涉中國協會」組織的大會上的演講〉，頁 14~15

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之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sup>130</sup>且受邀參與會議的對象，不僅有共同反對曹吳各軍、政黨，還包括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等社會團體。然而，孫中山雖於12月4日抵津，卻為肝病所困遲遲無法入京。

另一方面，同樣站在反帝、反軍閥立場的中共，即便國民會議會選出右派政府，也是全力支持。<sup>131</sup>於是在國共合作之下，國民會議成為「國民運動」重要的一環。到了1925年1月孫中山入京後，工作開始有很大的進展。在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協助下，第一階段乃先以各界團體行「直接選舉」選出的代表為基礎，在各省區成立一預備會，即所謂「國民會議促成會」。為充分表現民治精神，他們歡迎各界人士前往參觀。在北京地區，為了讓一般民眾更了解國民會議的真相，以得到更多民意支持，又特別設立宣傳股。其工作除邀請名人講演，還舉辦廣泛的通俗講演。李大釗亦是受邀名人之列。1月17日，李大釗在北京師範大學，發表題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後之國民運動」的講演中指出，有些人以為反帝運動是義和拳思想的復興，這是一項極大的錯誤。<sup>132</sup>由此說明李氏捍衛國民會議的決心。

到了第二階段，當各省代表齊聚北京，決定在3月假北大第三院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會中強調，今日之政府實非人民之政府。所以此次大會應說明三種意義：第一，人民要力爭自由與權利，不希求實力階級之賞賜。第二，人民應相信自己有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實力。第三，肯定國民會議能夠團結全國，代表國家的權力機構。<sup>133</sup>總而言之，國家問題應交由「國民自決」。在外交方面，他們說明帝國主義，是如何使中國變為殖民地的歷史。為了恢復民族獨立與自由，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遂為要務。簡言之，國民會議即一恢復國家權力的機關。在內政

<sup>130</sup> 參見〈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收錄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1卷，頁297。

<sup>131</sup> 「此臨時政府如果成立，本黨當然不能妄想他是國民革命左派的政府，或甚至還不是中派；然而我們却準備贊助他，只要他確能防止帝國主義者分裂中國或共管中國之因謀，只要他確能鎮壓一切反革命的軍事行動，只要他不妨礙一切平民參與政治之機會。」參見〈中共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原文載於《嚮導》，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305~306。

<sup>132</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後之國民運動—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演講〉，頁38。

<sup>133</sup> 〈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京報》，1925年3月2日。轉引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695。

方面，他們反對軍閥的武力主義，認為軍隊應屬於國家，而非為軍閥的私鬥而犧牲。在人民自由方面，則要廢除一切警治與軍治，恢復絕對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對實業、商業、教育等諸問題，也提出確切要求。至於，備受壓迫的工、農、婦女等社會弱勢，除了要求具體改善，更應與之團結一心，以促進國民大會之成功。<sup>134</sup>

雖然國民會議運動看似有了初步成果，但最後卻沒有成功。當馮玉祥約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同時卻也邀請段祺瑞入京，擔任臨時執政。段於1924年11月21日抵京之後，便立即通電各省，說明為解決時局糾紛，籌備建設方案，於是擬組織「善後會議」。<sup>135</sup>觀其會員名單，乃治軍人、政客、學者、各黨派於一爐。其中絲毫沒有人民代表，恰與孫中山的「國民會議」形成對立。時被選為「國民會議運動委員會」委員長的李大釗，即批評並否認善後會議。然而政權在段，那時在病榻上的孫中山，也不得不作出讓步，遂「不必堅持預備會議名義，但求善後會議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sup>136</sup>但孫的建議仍不為段採納，於是孫、段遂告決裂，直到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

孫中山生前，由於安福派的施壓，「國民會議促成會」即難以自保，不但所發會報多被政府截留，會議相關消息，政府系報紙亦不願登載。孫病逝之後，段祺瑞更是毫無忌憚，不但國民黨系的《民國日報》被封，政府亦復派遣軍警，壓迫各報館和通訊社，無端逮捕新聞記者；而且又大力扶持國民黨反共人士，宣傳國民黨的分裂，<sup>137</sup>於是國民會議運動至此告一段落。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李大釗對孫中山的景仰，甚至使李氏願親為孫舉柩，由此見證了李、孫之密切關係。此外李大釗又親筆為孫中山提寫輓聯，除了瞻仰這位「砥柱於革命中流」、「揚民族大義」、「決將再造乾坤」的革命家，還要革命後代能夠「遵依犧牲奮鬥諸遺訓，成厥大業為英靈」。<sup>138</sup>

<sup>134</sup> 羅敬，〈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之經過與結果—1925年4月25日北京通信一〉，載於《嚮導》，第113期，1925年5月3日出版。轉引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704~707。

<sup>135</sup> 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的電文內容，詳見沈雲龍，〈段祺瑞與善後會議（上）〉，《傳記文學》（台北），第46卷，第2期，1985年，頁12。

<sup>136</sup> 參見〈覆段祺瑞電〉，1925年1月17日。收錄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1卷，頁562。

<sup>137</sup> 羅敬，〈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之經過與結果—1925年4月25日北京通信一〉。轉引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703。

<sup>13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輓孫中山聯〉，頁45。



## （二）工人運動的復甦

當國民會議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沉寂已久的工人運動逐漸復甦。從中共對中國工運史的分期來看，自 1924 年北京政變始，至 1927 年蔣介石發動「清黨」之間，是為工運的第二次高潮。<sup>139</sup>原本曹、吳鎮壓工運的政策，因為北京易主而中斷；加之奉張和皖段的明爭暗鬥，更形成一個相對自由的政治空間。於是中共遂欲回到「二七」前的工運規模。首先，在北方地區救出在保定、北京、天津及其它各處被捕的工會領袖。張國燾因而獲釋。其次，是為戰爭中失業的鐵路工人恢復工作。再者，重新建立起「二七」前遭到封閉的各路工會。並於 1925 年 2 月 7 日，召開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會中決定加入國民革命，促成國民會議，進而形成革命活動的橫向聯繫。

同時，全國各處罷工活動蜂起。1925 年上半年間，北京雖然近代工業不發達，卻也出現空前未有的罷工景象。1 月的電車罷工，3 月的織布廠、財政部印刷工人、菜園工人、造紙工人、鐵鋪工人、瓦木匠等罷工，以及 4 月的瓦作工人、宣化皮行工人罷工。其訴求皆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sup>140</sup>山東則出現膠濟鐵路罷工。罷工勝利之後，成立膠濟鐵路總工會。武漢、廣東也陸續出現罷工鬥爭。尤重要者，為上海、青島的日紗廠工人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活動。為了有效團結工人，5 月 1 日，中共聯合其他大型工會，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會中提出工農聯合、剷除工賊（右派工人團體）、成立全國總工會，以及加入赤色國際等重要決議。

必須一提的是，日本運用國家資本的力量，在中國上海、青島、滿洲等地投資設立紡織廠。他們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還有免納關稅的「優待」，增強產品競爭力。於是外人能輕易占取中國市場，進而吞併中國企業。此外在帝國主義壓迫下，日本紗廠工人的生活更是乏善可陳。上海工人所得雖較其他地方為高，但仍不敷基本生活的使用。又由於工時長、工作環境不佳，工人的身心備受煎熬。長期的勞資矛盾，終於引發上海、青島日紗廠工人的罷工。雖然日資本家主張雙方調停，但同時又借助日政府對奉系軍閥施壓，使得工潮無法制止，最終在上海釀成「五卅慘案」。全國各地，也跟著發生同情罷課、罷工、罷市的現象。其中影響深遠的，是連帶引起廣東、香港對英帝國主義的抗爭，造成長達兩年的「省港大罷工」。

<sup>139</sup>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 125。

<sup>140</sup>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 128。

工人運動發展至此，可謂進入第二次浪潮的高峰。全國勞工由南而北，有意識地以實際行動，反抗帝國主義對中國和工人階級的剝削。它在同一時間，與北京的國民會議運動相互輝映。與「二七」之前不同的是，工人已不僅是為自身經濟、地位而奮鬥，更多地是為國家的自由、獨立著想。而且他們也越來越重視與農民的合作。然而，日後奉系軍閥的得勢，更穩固了日帝在中國的力量。工運的擴大，又不免讓原來處於對立的英、日兩國，有了重新合作的基礎。這對往後的「國民運動」形成極大隱憂。

### （三）農民運動的興起

根據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國的無產階級除了工人之外，實際上還包括約占全國人數 70% 以上的農民。民初時期的農民生活困苦。在軍閥統治之下，他們平時負擔苛捐雜稅，又有抓丁之憂。惟中共創建時，乃將重心放在工人運動。箇中原因，或許和共產國際及馬林對中國農民不抱有革命期望相關。<sup>141</sup>此外，由城市知識分子領導的共產革命，將其觸角先伸往城市工人，沿著主要交通要道擴張到各大城市的方式，也較符合實際。然而，這不代表中共最初沒有考慮農民問題。早在中共成立之前，李大釗便已關注到農村的黑暗情況。<sup>142</sup>直到「二七」工人運動失敗，中共活動轉入地下之後，始注意到由廣大農村實踐革命的可能性。

使農民問題從想法進入到實踐，主要來自彭湃在廣東推動的農村改革。往後，中共習得南方農民運動經驗，而漸推及至北方。在 1923 年 6 月召開的中共三大，通過《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其中提到，在地方上要組織農民機關，以對抗土豪劣紳。<sup>143</sup>國共合作之後，中共開始積極吸收農民加入「國民運動」的聯合戰線，並欲取得控制農民的主導權。到了 1925 年 5 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第一次農民

<sup>141</sup> 「中國人口中，廣大的群眾是農民，他們雖然貧窮，但差不多都有少量土地。內地同海外資本主義世界幾乎不發生任何關係。……所以，農民群眾對革命完全漠不關心，並且尚未表現出政治上的重要性。」引自〈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2 年 7 月 11 日。收錄於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頁 12。

<sup>142</sup> 「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於極點。那些臧官、汙吏、惡紳、劣董，專靠差役、土棍作他們的爪牙，去魚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謀自衛的方法，結互助的團體。他們裡邊，有的是剛能自給的有土農夫，有的是厚擁田疇的地主，有的是專作農工的佃戶，有的是專待雇傭的工人。他們不但不知道結合起來，抗那些官紳，拒那些役棍，他們自己中間也是按著等級互相凌虐，去結那些官紳棍役的歡心。」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2 卷，〈青年與農村〉，頁 305。

<sup>143</sup> 參見中共三大文件，《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 359。

代表大會同時在廣州召開，決定實施「工農聯合」的政策。確立以城市為政治中心，由工人領導農民進行鬥爭的方針。<sup>144</sup>

### 1. 將農民納入民主聯合戰線

隨著中共農民政策的轉向，李大釗也開始撰述中國農民問題的文章。其中直接相關者，包括李在蘇俄期間發表的〈中國內戰與中國農民〉，以及返國後寫成的〈土地與農民〉、〈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從這些文章可以依序觀察，李氏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中國農村的殘破現象。又說明應該用何種方式，達到耕地農有、平均地權的目的。

由帝國主義壓迫而產生的中國問題，其原因乍看是來自國內外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但經李大釗分析，其最根本因素，卻是來自因帝國主義而導致農村經濟的加速破敗。如就中國歷史觀察，歷來改朝換代，正是起於土地分配不均所造成的農民革命。這是土地長期兼併的結果，也是中國治亂循環的一般過程。尤其近代受帝國主義影響，更加速土地兼併，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形成「兵匪」。清末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事件就是實際例子。

不同於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方式，雖然帝國主義和中國內地農村，沒有產生直接關係；但由於中國是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農經濟，帝國主義仍得以透過商品大量傾銷，間接壓垮農村原有的手工業生產。<sup>145</sup>又加上軍閥的苛捐雜稅，使得不能生活的農民，只得賣妻鬻田，形成中國流動、殘破的流民階層。他們有的在國外提供便宜的勞動力，成為帝國主義賺取利潤的工具。在國內則成為城市工人的主要來源。流民如沒有工作，只能落草為寇，或是被軍閥吸收利用。<sup>146</sup>

經由上段論述，李大釗在理論上，順利地將農民階層納入國民革命的陣營，積極爭取他們加入反帝、反軍閥運動。然而雖然帝國主義、軍閥加速農村經濟的破敗，但直接與農民產生利害矛盾的，卻是那些善於兼併的地主豪紳。在李大釗所取得有關中國農村的統計數字中，將農民階層大致分作富農、中農、小自耕農、佃農和雇工。李又根據農民數和可耕地數的變化，得到「中農呈現破產趨勢，小農則持續喪失土地」的結論，其中含有「豪強兼併土地集中的意義」。<sup>147</sup>至於佃農和雇工的生活，

<sup>144</sup> 參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文件，《工農聯合的決議案》。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頁643。

<sup>145</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中國內戰與中國農民〉，頁31。

<sup>14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中國內戰與中國農民〉，頁29~30。

<sup>147</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土地與農民〉，頁77。

則又更劣於小農。這樣的情況由南至北，最終將會形成全國農民的破產。因此農民的革命策略，自然不同於工人階級。李氏認為，有了革命青年的下鄉領導，首先應推廣農村基礎教育。其具體作法即聯合鄉村教師，開辦「農民補習班」，以利階級意識的灌輸。其次為提高貧農地位，必須讓他們自行組織「農民協會」，對抗鄉村舊有的資產階級貴族政治。再者考慮到軍閥、土匪的擴大，農村應成立「地方自衛軍」。<sup>148</sup>用當地的話說即是「民團」。<sup>149</sup>以下將以直隸為例，說明北方黨在農村建立組織和推行農民運動的情況。

## 2. 農村黨組織的建立與農民運動

北方農村最早建立的中共黨組織，在直隸省安平縣。安平縣最早的黨員李錫九、弓仲韜，皆在北京與李大釗結識，並由李介紹入黨。他們被李氏派往原籍進行活動。為了宣傳馬克思主義，弓仲韜在台城村創辦平民夜校，並於1923年10月，建立「安平縣台城特別支部」。到了1924年8月，已陸續增置了「北關高小支部」、「敬思村支部」。於是在一定的基礎上，召開了縣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選舉出「中共安平縣委員會」，由弓仲韜任書記。<sup>150</sup>

樂亭縣是李大釗的故鄉，也是較早建立黨組織的地方之一。李氏推薦黨員王岑伯擔任樂亭中學校長，又派王德周任該校英語教員。表面上是從事教育，但實際為進行組織活動。在1924年暑假，組織社青團「樂亭中學支部」。12月，進一步建立中共「樂亭縣中學支部」。到了1925年6月，中共「樂亭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由王德周任書記。<sup>151</sup>

從上面兩例可見，中共在農村建立黨組織的方式和城市相差不遠。總體來看，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北方黨主要沿著京漢、京綏、正太等主要鐵路和工礦都市，向外擴散至農村地區。在博野、蠡縣、深澤、井陘、阜平、平山、靈壽、行唐、元氏、贊皇、無極、晉縣、藁城、饒陽、大名、順德、磁縣、豐潤、玉田、遵化、薊縣、巨鹿、完縣等地建立起黨支部。<sup>152</sup>由於得自之前工人運動失敗的經驗，中共此時已體認到，必須讓地方黨作為領導農民組織和運動的核心。

<sup>14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土地與農民〉，頁84~85。

<sup>149</sup> 「民團」為各種社區出於自衛目的，由地方名流領導的準軍事團體，並成為1920年代如雨後春筍湧現的紅槍會組織基礎。參見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池子華、劉平譯，《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184。

<sup>150</sup> 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傳》，頁165~166。

<sup>151</sup> 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傳》，頁166。

<sup>152</sup> 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民國上卷》，頁89。



由於農村的保守性格，早期農民運動的訴求主要集中在抗稅抗捐，而非鬥爭地主。從 1926 年 12 月中旬到 1927 年底，饒陽、三河、磁縣、遷安、正定、晉縣、玉田等地，陸續出現反抗奉系軍閥苛捐雜稅的請願。以正定縣為例，1927 年 6 月，農民拒絕預繳 1928 年上半年的田賦，以及加徵討伐馮玉祥的「討赤捐」。在中共正定縣委解學海的幫助、領導下，他們組織遊行示威，至縣公署抗議。最後迫使縣知事宣布緩行預繳田賦，且免徵「討赤捐」。<sup>153</sup>

為籌集軍費，軍閥想盡各種辦法剝削農民。因而引發玉田、遵化等地反抗「旗地變民」鬥爭。所謂旗地，係指清代滿人入關後圈占的土地。農民必須定時繳納旗租給滿州貴族。辛亥革命後，政府將旗地歸還人民。但 1926 年秋，奉系軍閥為支付戰費，於是美其名要將旗地變為民有地，強迫民眾以高價買回地權。為抗交稅款，1927 年 1 月中共「玉田縣特別支部」召開農民代表會議，組織農民協會。他們聚眾到縣議會、縣公署抗議，最終獲得勝利。1 月中旬成立中共「玉田縣委」，派遣張金言、陽春霖到遵化繼續展開「旗地變民」鬥爭。3 月建立了以塔壽、興旺寨、城子峪為中心的 3 個「區農會」，約 50 多個村莊成立「村農會」，會員達 2000 餘人。他們手持刀、矛等傳統武器直逼縣城，最後讓縣長答應緩徵「旗地變民」款。<sup>154</sup>

### 3. 農民革命的不穩定因素

除了積極設立農村黨組織，傳統農民在地方自行組織的「民團」，也成為中共吸收對象。尤其是民初以來，在淮北地區勢力龐大的「紅槍會」。顧名思義，他們最常使用的武器，是飾有紅纓的木槍。其分布從豫北、魯西到直隸南部。1926 年 7 月，中共中央通過《對於紅槍會運動議決案》，提到紅槍會是軍閥政治下的產物，是農民原始的自衛組織。<sup>155</sup>李大釗也認為，這些具自衛功能的準軍事團體，有實力抵抗軍閥，能成為國民革命的有生力量。<sup>156</sup>然而，這些都是中共在革命前提下，對紅槍會的政治判斷。客觀地說，紅槍會實際上和中國原始的農民組織與叛亂，有密切關係。在兵禍連結的情況下，為維護地方利益，於是由村莊名流領導、組織農民的防衛武力。紅槍會和義和團有深厚的淵源，他們同樣利用民間宗教來凝聚成員，而且宗族和地緣觀念深厚。其組織目的，是為達到抗官抗捐、抵制土匪的效果。其中最為弔

<sup>153</sup> 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民國上卷》，頁 99。

<sup>154</sup> 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民國上卷》，頁 99~100。

<sup>155</sup> 參見〈對於紅槍會運動議決案〉，1926 年 7 月。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第 2 冊，頁 216。

<sup>156</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頁 129。

詭的一項特色是「民匪不分」。其意為：「一旦自己的財產基礎遭到破壞，防衛者便會迅速滑向掠奪者。」<sup>157</sup>於是今日是良民，明日卻變為土匪的情形多不勝數。由於上述種種特點，使得中共對於紅槍會的統戰策略上，有許多不可預期的因素。

中共傾向為紅槍會戴上革命光環。為拉攏農民，中共接受他們既有的反革命特質。陳獨秀首先將紅槍會視為洪楊時代農民革命的遺緒，要適時引導他們在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旗幟之下。<sup>158</sup>李大釗亦為文附和，說明紅槍會確是「代表農民利益為防備兵匪，反抗苛捐稅而組織的事實」。<sup>159</sup>雖然李氏也注意到其中不穩定的因素，但仍以樂觀態度予以說服。在李大釗看來，原地方豪紳所組織的民團，被認為是土豪利用農民的「匪化紅槍會」，非自衛的紅槍會。農民持有的地域觀念，被李說是頗有階級覺悟的質素。紅槍會反對洋人，被李認為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表現。紅槍會要求「真主」，是透露出農民對秩序的渴望。至於農民的迷信，李認為亦是農村客觀事實的反映。<sup>160</sup>所以，李氏提出對傳統紅槍會的「現代化」工作，首先要改造紅槍會成為真正的農民組織，進而組織農民協會。其次，要使他們了解其階級地位，擺脫狹隘的鄉土主義。再者，藉由使用新式的武器，來衝破他們原有對刀槍不入的迷信。<sup>161</sup>

中共北方區委先後派員至大名、肥鄉、南和、磁縣、隆平、邯鄲等縣，接近紅槍會首領，並促其內部各派聯合反對奉系。像北方長年受到軍閥迫害的地區，使中共運動農民武裝反抗軍閥，有很好的起點。大名的紅槍會明確提出「反對苛捐雜稅，開始武裝革命的口號」。在 1927 年上半年，直南地區的紅槍會便聯合黃沙會、天門會等農民武裝團體，在許多地方驅離了奉系軍閥及其地方官吏。<sup>162</sup>

雖然北伐期間，被派往紅槍會進行運動的于樹德報告稱，共產黨已得近三分之一的河南紅槍會支持。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如日後前往河南的農運幹部鄧良生所提到的，河南的「守舊性很強」，而且「紅槍會並不是革命的組織，乃一種封建的組織」，因為「他們絕對服從地主的命令」。又由於語言問題，導致工作進展不順。<sup>163</sup>不僅如此，當中共在信陽槍決 24 名土豪劣紳時，卻令紅槍會殺害了中共農運幹部和黨員；

<sup>157</sup> 參見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著，池子華、劉平譯，《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 (1845-1945)》，頁 174。

<sup>158</sup> 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 2 卷，〈紅槍會與中國的農民暴動〉，頁 1073~1076。

<sup>159</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頁 129。

<sup>160</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頁 129~131。

<sup>16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頁 131~133。

<sup>162</sup> 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民國上卷》，頁 102。

<sup>163</sup> 1927 年 7 月 9 日，《武漢中央農民部第十二次部務會議紀錄》。轉引自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 年)，頁 373。

他們還切斷京漢線，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此外依照中央農民部統計，河南農民協會的人數雖居於全國第二位；但根據朱其華調查，那誇大的數字其實是紅槍會會眾的數目。他們名義上效忠共產黨，卻很少服從黨的指揮。<sup>164</sup>和南方以貧農為基礎的農民運動不同，實際上北方的紅槍會，是由地方豪紳領導的民團，貧農與地主有共同的利害關係，他們聯合起來對抗外來的軍事力量。這一點不如李大釗所預期，使得中共早期的農民運動，遇到重大的阻礙。<sup>165</sup>

### 三、在燃燒生命後的餘暉

當「國民運動」進入北伐階段，第一次國共合作也接近尾聲。李大釗為營造有利北伐情勢，運動西北軍馮玉祥加入國民革命；同時北方區委又發展內蒙黨組織，打通蘇俄與中國的革命聯繫。當時馮玉祥雖是惡名昭彰的「倒戈將軍」，但馮不同於前文曾提到的「開明軍閥」。他不但尊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又自稱是無產階級工人之子。於是馮軍動向對於北伐成功與否，確有積極影響。然而，蘇俄和共產主義勢力在中國的迅速擴張，又使得帝國主義和反共人士不得不提高警覺，最終導致國共合作破裂。在北方的李大釗因而身陷「反赤」危機。

#### （一）李氏最後的革命鬥爭

「國民運動」的發展，歷經了促成國民會議召開、地方的工農運動，最後走向以武力打倒軍閥政府。在完成國家統一共同旗幟之下，經分化後的軍閥，亦須極力爭取加入國民革命。馮玉祥即是顯明的例子。1922年5月，歸屬直系的馮玉祥原為河南督軍。馮作為軍閥，在實力上為曹、吳所顧忌；但其實力第一，救國第二的思想，又使得他在北洋軍閥中落落寡合。促成馮日後發動政變的原因，不是因為孫中山的影響，也非日本的拉攏，而是出自內在的生存因素。<sup>166</sup>由於受吳佩孚排擠，10月，馮玉祥調任為有名無實的陸軍檢閱使，在南苑練兵。其後，吳又企圖以兵餉制約馮。馮玉祥就是在地盤和兵餉問題不得解決之下，才決心倒直。

<sup>164</sup> 朱其華，《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上海：新生命書局，1932年），頁3~9。

<sup>165</sup> 朱其華，《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頁19~32。

<sup>166</sup> 李朝陽，《走向新民主主義中國—馮玉祥與近代中國政治》（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74~75。

### 1. 爭取馮玉祥加入國民革命

早在北京政變前，國共皆極力爭取馮玉祥加入「國民運動」。孫中山曾多次派遣徐謙說馮反直，先後贈送《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向馮宣傳革命。另一方面，李大釗早年在灤州起事已和馮玉祥有一面之緣。此刻當馮受吳排擠，李親身至南苑向馮勸道：「孫先生在南方，馮檢閱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協力，效法蘇俄，刷新政治，中國就有前途。」馮因而高興表示：「教授一夕談，勝讀十年書。」<sup>167</sup>這一次會晤，對馮的政治轉向有重要影響。此外，在英、美帝國主義控制北京的情況下，蘇俄與共產國際方面除了推動中國革命，又必須兼顧其在中國的利益，所以也願意嘗試選擇馮作為合作對象，與直系對抗。於是有了李大釗的穿針引線，被吸納入國民革命的馮玉祥，遂發動北京政變，並將其軍隊改組為「國民軍」。

當然，馮玉祥的革命行動，或出於愛國真誠，但仍不能忽略其中「實用主義」的考量。<sup>168</sup>長久以來處於直系邊緣的馮系，不但待遇差，而且缺乏兵餉、裝備落後。在與曹、吳利益矛盾的情況下，只能尋求外援。自北京政變後，英、日帝國主義從此對馮反感，難與之合作。在眾軍閥的利益分配下，1925年2月初，馮玉祥赴張家口就任西北邊防督辦，成為名副其實的「西北軍」。從地緣上看，馮有利與蘇俄建立關係。李大釗在此的角色至關重要。為堅定國民軍的革命意志，李大釗與徐謙多次往返北京和張家口，力促國民軍聯俄。使馮通過他們與蘇俄駐中使館聯繫，以取得軍事援助。<sup>169</sup>同時為建立國民軍的政治基礎，李大釗還建議馮玉祥在軍隊內部設立政治俱樂部，要求軍人研讀三民主義。<sup>170</sup>為了維持合作關係，馮氏也不加反對。

隨著北方政情發展，國、奉之間成見日深，形成國民軍與直系聯合反奉的局面。11月，馮玉祥又拉攏奉系新派郭松齡倒張作霖，卻因日軍介入失敗。這一次倒戈事件，讓英、日感到來自蘇俄的威脅，於是促成反奉聯盟瓦解，讓直、奉、晉、魯合

<sup>167</sup> 余華心，〈馮玉祥與共產黨交往片段〉，《紅旗飄飄》，第27期，1983年。轉引自閻稚新，《李大釗和馮玉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頁35。

<sup>168</sup> 李朝陽，《走向新民主主義中國—馮玉祥與近代中國政治》，頁85。

<sup>169</sup> 1925年3月，經過雙方談判，蘇俄答應給予國民軍包括武器和軍事顧問的援助。運輸路線決定以火車經西伯利亞運至上烏金斯克，再用汽車轉運到外蒙首都庫倫（今烏蘭巴托），然後再由國民軍設法運到張家口。參見肖裕聲，《李大釗的軍事活動》（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頁57。

<sup>170</sup> 「李大釗以國民黨黨員的身分向顧問組的領導人提出建議，共同勸說指揮部，使他們確信在軍隊裡進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結果，擬訂了軍隊政治學習的共同計劃。根據李大釗的建議，俱樂部應當成為政治工作的基礎。要在俱樂部周圍建立各種政治與文化教育組織，在俱樂部裡開設研究政治經濟學小組和研究孫文主義小組。並且預定成立10個俱樂部」引自維·馬·普里馬科夫（B. M. Примаков）著，曾憲權譯，《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願兵的札記（1925-192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10~11。



作共組「討赤聯軍」，從而威脅國民軍。自從蘇俄勢力跨入中國之後，國民軍時被稱為「北赤」，孫中山在廣東的政權即為「南赤」。就是在李大釗等人的奔走下，讓原來可能僅是軍閥間的混戰，提升到具有反帝、反軍閥性質的戰爭。雖然不久後，國民軍被逐出北京，執政府倒台。馮玉祥因不得志，而由蒙入俄。但在中共的努力下，退守南口的國民軍，已然具有革命思想。北方區委在其內部，也發展了黨組織，訓練出像是史可軒、鄧小平等未來中共重要的軍事幹部。<sup>171</sup>此時要求加入中共的楊虎城，在往後參與西安事變，大大地改變中國現代史，便能見其影響之深遠。<sup>172</sup>

## 2. 在內蒙古地區的組織工作

因應國民革命形勢，爭取馮玉祥的同時，西北三特別區即內蒙，包括熱河、察哈爾、綏遠，亦成為戰略要地。鞏固對內蒙的控制不僅有利「北赤」發展，該地區更成為蘇俄援助中國革命的要道。回溯蒙古問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蘇即圍繞在外蒙和中東路的利益，而遲遲無法建交。雙方雖於1924年5月31日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議》，暫時恢復邦交；但也僅是擱置爭議，並未解決實質問題。到了1925年3月外蒙紅軍的撤退，和當時聯馮政策的成功與中共深入內蒙建立組織或有關聯。<sup>173</sup>不同於北京政府對外蒙的主權論，李大釗從民族自決、自治的觀點切入。李氏認為蒙古自民國以來，不但受外來帝國主義蹂躪，還有國內王公貴族的壓迫。直到最近因蘇俄干涉，以及喇嘛教活佛逝世的影響，「蒙古民族的解放運動，遂與中國國民革命的潮流相接」。<sup>174</sup>換言之，在蘇俄指導下，中共所以拉攏蒙古族，協助外蒙自治，甚至走向獨立，和當時國民革命情勢有很深的關聯。

中共對蒙古族進行統戰，必須尋找一適合的根據地。張家口位處直隸西北，為京綏路中點的重要城市。北京政變使張家口的戰略地位愈形重要，遂成為「北方區委」的工作重點地區。1925年初，王仲一、江浩受命成立「張家口特別支部」。在

<sup>171</sup> 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後，得到蘇俄和中共的軍事援助。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鄧小平，就是中共第一批被抽調到國民軍的人員之一。在馮部中鄧除了擔任政治部領導職務，還兼任有「第二黃埔」之稱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政治處長（校長為史可軒）。而當時正是由北方區委李大釗總領國民軍的政治工作。未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代領導人的鄧小平，遂與李大釗在同個時代擦肩而過。其中同樣在國民軍工作的中共黨人劉伯堅，是二人都認識的橋樑人物。可參考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鄧小平人生紀實（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68~73、100~103。

<sup>172</sup> 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事件篇》，頁314~315。

<sup>173</sup> 外交部詢問李家鏊。李氏復電稱：「蘇聯在蒙布置完備，蒙軍成立，故蘇軍可放心先期撤兵。」原載於《收駐俄李代表（9日）電》，1925年月11日，外交檔案，03/32/498/01。轉引自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243。

<sup>17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5卷，〈蒙古民族的解放運動〉，頁47~48。

馮玉祥進駐張家口之後，10月成立了中共「張家口地方委員會」，以蕭子暉（蕭三）為書記。同月「國民黨察哈爾特別區黨部」成立，實際上成為前者對外工作的名義。「張家口地委」不僅深入當地工人和國民軍工作，而且也奠定對蒙工作的基礎。

早在孫中山北上之時，內蒙的有識之士即齊聚北京，醞釀組織內蒙古國民黨和召開內蒙古國民代表大會，但因孫逝世無成。1925年9月，中共第四屆中執委第一次擴大會議通過《蒙古問題議決案》，確認中共對蒙關係是「應當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運動與全中國的解放運動結合起來」。重要責任在於「使蒙古人中先進的民權主義分子，尤其是蒙古的智識階級，歸到革命這方面來」。<sup>175</sup>10月，李大釗以國民黨中央駐華北特派員的身分赴張家口。期間協助建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並於13日，在張家口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選出中央領導機構、宣布民主革命綱領和各項政策。更重要的是創建了「內蒙古特別民軍」，成為北方由中共領導的軍隊。<sup>176</sup>

11月30日，「北方區委」在張家口召開「西北農工兵代表大會」，宣布「內蒙古農工兵大同盟」成立。大會選出李大釗擔任大同盟書記，韓麟符、趙世炎為副書記。大會雖以京綏路工人為骨幹，但內蒙地區的勞動階級，主要還是農民，所以仍以農民階級為號召。由此可見，中共又展現出其具有彈性的革命策略。李氏周旋其間，促成內蒙古的革命黨與大同盟密切合作，有助於內蒙革命活動。李大釗多次往赴張家口的重要意義，即在於積極營造北方有利國民革命的形勢，為北伐提出貢獻。

## （二）革命中的戲劇性犧牲

對於李大釗多少有些理解的人們，不少會為李氏短暫而又充滿光輝的生命，感到不勝唏噓。和古今中外的革命者相差不遠，李大釗為革命而獻身，在中國現代史上看來，無疑充滿著戲劇性。這在當時中國社會各界，是一件多麼令人震驚、悲痛的消息。若加以深究，李氏之死亦非事發突然。以下便從歷史分析，由外而內梳理出李大釗在革命中犧牲的背景和原因，進而探討李氏的革命實踐意涵。

### 1. 「赤色」與「反赤」的對立

首先是關於蘇俄與英、日在中國利益的矛盾。1924年下半年起，因為中蘇建交

<sup>175</sup> 見1925年10月，〈蒙古問題議決案〉。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6）》，頁492。

<sup>176</sup> 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事件篇》，頁276。

引起帝國主義對蘇俄的疑慮。又由於中共推行工農運動，使國內反帝聲浪愈振。8月發生的廣州商團事件，是英國和廣州的資本家對孫中山傾蘇的抗議。1925年的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是勞動群眾和學生聯合對英、日帝國主義的控訴。這不得不讓列強向中國提出緩和反帝運動要求，與段祺瑞執政府協商於10月召開「關稅特別會議」。然而該會議，雖名義上是檢討對中國不平等條約的關稅問題，實際卻是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利益分贓，反而招致社會不滿。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於是領導群眾，進行訴求「關稅自主」的示威遊行。他們召開國民大會，誓要驅逐段執政。<sup>177</sup>

反帝運動持續到1926年3月，又進入另一高潮。由於國、奉不和發生戰爭。12日，日本軍艦掩護奉艦進入天津大沽口，遭到馮玉祥砲擊。次日，日本公使即抗議中國違反《辛丑條約》，不得在大沽設置軍事建物的規定。並邀集八國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帝國主義的強硬行徑，自然引起群眾憤懣。18日，國、共聯合號召北京地區社團，在天安門舉行大會。會中議決一致反對八國通牒、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會後李大釗又組織群眾到執政府請願，但卻遭士兵槍擊，民眾死傷慘重，李氏亦不免負傷。武裝士兵對平民的暴力行爲，讓魯迅不得不嘆其爲「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史稱「三一八慘案」。

慘案當日，段祺瑞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爲由，通緝李大釗等人，<sup>178</sup>北京從此陷入白色恐怖。英、日帝國主義意識到蘇俄威脅，說服直、奉等成立「討赤聯軍」，4月即讓執政府倒台，國民軍退至南口。當奉系入京，張作霖更稱「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處死刑」。<sup>179</sup>當時報界名人邵飄萍、林白水，皆遭殺害。在帝國主義引導下，國內外隱然出現「赤」與「反赤」兩大陣營，處於如此詭異的對立氛圍，南、北赤的合作，形成反帝反軍閥的北伐態勢；卻也讓北京的李大釗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由於北方工作困難，國共人士多已南下。按《辛丑合約》規定，中國軍隊不得擅入使館區，於是李氏接受蘇俄建議，將國共的北京領導機關，遷入東郊民巷蘇俄大使館西院的舊俄兵營。儘管前後有許多親友勸說李氏離京，中共中央亦派遣羅章龍，指示李大釗赴武漢成立中央分局，但李氏仍不爲所動，堅留北方進行革命工作。<sup>180</sup>這或許就是李大釗所認定的個人「使命」。

<sup>177</sup> 詳見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678。

<sup>178</sup> 參見〈段祺瑞政府的通緝令〉，《京報》，1926年3月20日。收錄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858。

<sup>179</sup> 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事件篇》，頁305。

<sup>180</sup> 羅章龍，〈齋齋回憶錄—記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載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回憶李大釗》，頁56~57。

## 2. 國民革命運動的內部分裂

其次，是探討國共內部的不和諧因素。當初孫中山雖主張「聯俄容共」，但自始即讓許多保守的國民黨人表示疑慮、反對。孫當時的考慮是希望得到俄援，從中共經驗取得社會基礎，並影響中共人士信仰三民主義，藉此壯大國民黨的革命力量。疑慮和反對的人士則是擔心，國民黨的黨權會遭中共竊奪。但因孫中山在黨中至高的權威，使得國共合作依然成行。不少人會說這是孫中山乾綱獨斷的結果。但即使在國民黨改組之後，黨內反對聲浪仍是此起彼落。劉成禺、馮自由、謝英伯等人於廣州號召反共人士秘密集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人不得攘奪國民黨黨統。但沒想到警告書未發，鮑羅廷和李大釗便搶先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禺等人「不守黨員紀律及挑撥國共惡感」。<sup>181</sup>此件孫雖宣布無罪，但往後國民黨人依舊頻頻舉報中共，著意在黨內形成黨團。

直到孫在北京逝世，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每況愈下。鮑羅廷扶持「有野心」的汪兆銘和「難相與」的代理大元帥胡漢民爭權，並將原來黨內的個人領導制，改為集體領導的委員制，共黨於是逐漸取得領導地位。<sup>182</sup>由於中共氣燄日張，8月，「容共」政策主要推動者廖仲愷在廣州被刺，此事涉及國民黨保守分子。鮑遂利用此事，大力鎮壓黨內右派，其中包括林森、鄒魯、謝持等國民黨重要人士。他們陸續出走廣州，在1925年底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中執會，形成另一個國民黨中央，史稱「西山會議派」。此刻軍閥的「討赤聯盟」已成，同時「南赤」內部竟也出現最大的反共陣營。無獨有偶，廣州在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後，黨內傾右的實力派蔣介石，亦得到左右全局的力量。<sup>183</sup>共黨方面則改「採取守勢」，並同意支持蔣「即刻北伐」的建議。

即便內爭如此，國共之間對於國民革命的目標仍頗為一致。1926年7月蔣介石的誓師北伐，有利暫時統合黨內左右分歧。而且北方因為李大釗等人堅持續留北京活動，對北伐也產生一定貢獻。其一，李積極爭取國民軍加入革命，並於南口戰役以國民軍22萬，前後牽制直、奉、晉聯軍近60萬。<sup>184</sup>李大釗和國民軍將領、蘇俄軍事顧問等早已計畫，在撤守南口前，至遲於4月中旬要在南口加設防禦工事。<sup>185</sup>此

<sup>181</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335。

<sup>182</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338。

<sup>183</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343。

<sup>184</sup> 肖裕聲，《李大釗的軍事活動》，頁73。

<sup>185</sup> 維·馬·普里馬科夫（В. М. Примаков）著，曾憲權譯，《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願兵的札記



次戰役，國民軍從 5 月堅守到 8 月中旬，才被迫退守包頭，使吳佩孚對南方國民革命軍作戰處於不利。其二，李敦促馮玉祥自蘇返國，參與北伐。由於察、綏戰局有變，李大釗電告時亦在蘇的于右任，促馮歸國，主持西北大局。至 9 月中，馮玉祥抵達綏西五原，見到殘軍敗容，即安慰將士道：「我是沒有辦法而去，有了辦法而來。」<sup>186</sup>遂自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向全國發布《宣言》，採行李大釗「進軍西北，解圍西安，出兵潼關，策應北伐」的指示。<sup>187</sup>意在解西安 8 個月之圍，出潼關與中原友軍相呼應。其三，李又獻三策，試圖分化奉、直、魯、晉。首先，利用張宗昌（魯）奪取孫傳芳（直）在江蘇的地盤，避免北伐軍與張、孫同時作戰。其次，游說直系駐河南的原國民二軍舊部靳雲鶚、田維勤、魏益三等，使之北拒奉、東拒魯、西與國民軍攜手。再者，李大釗更聯絡閻錫山（晉），曉以大義，說服閻加入國民革命。<sup>188</sup>李氏極為重視馮、閻關係的和諧，從中進行安排。為日後蔣的第二期北伐，營造有利形勢。

中共北方區委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響應蔣介石的北伐行動，使「南北二赤」彼此輝映，共同完成孫中山國民革命的遺志，此誠然為歷史佳話。然而，國共合作的內部矛盾，也因為雙方在革命方式和領導權問題上的分歧，而逐步擴大。北伐期間，蔣介石明令禁止社會運動擾亂治安。但中共卻依然實行激烈的工農和反帝運動。期間產生的「過火」現象，招致地方人士和英國不滿。又當武漢政權建立後，國民黨內鮑、蔣二人的衝突達到白熱化，陳獨秀又計劃以軍事活動倒蔣。政治孤立的蔣介石，只得轉而接受上海商人經援，斷然於 1927 年 4 月 12 日實施「清黨」。國共合作的破滅，使得李大釗在北京的處境更加危險。

### 3. 李氏之死及其革命實踐意涵

李大釗正是在「三一八」後北京的白色恐怖，以及國共間的同床異夢中，坦然走向他人生的最後旅程。躲避於蘇俄使館的李氏一家，期間雖透過聯絡員與外界聯

（1925-1926）》，頁 177。

<sup>186</sup> 劉貫一、孔廣耀、陳天秩，〈憶黨在馮玉祥部隊的工作〉，《巴彥淖爾盟黨史資料》，第 4 輯，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803。

<sup>187</sup> 馬文彥，〈李大釗敦促馮玉祥回國策應北伐的經過〉，原書見《黨史資料通訊》，第 9 期，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788。

<sup>188</sup> 在《中央政治通訊》第 14 號，李大釗的一封信中，曾引述其派人回覆閻錫山（字百川）的內容：「如為民族革命之大業者，則百川今日所處之境，真所謂千載一時之良機，不容或失者矣。現在革命軍之勢力已足控制長江，國民軍亦且雄視西北，倘來歲春深反奉戰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數萬健兒加入我革命軍方面作戰，則榆關以內胡騎全清，易如反掌耳。」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守同志來信〉，頁 154。

繫。但 1927 年初，李大釗的隱匿之所，早已為京師警察廳打探出來。「經過三月，所有黨中一舉一動，無不知之，各重要分子所住房間號數，俱已調查明晰，並經分析繪圖報告。」<sup>189</sup>4 月 6 日那天恰好是清明節。張作霖得到各國公使默許，即派奉軍入東交民巷，搜捕到李大釗等中共黨員。

李大釗等人被捕之後引起各界譁然，皆希望張作霖能「寬大處理」。政治討論會推舉梁士詒、楊度，向張陳述理由。此次東郊民巷事件重大，為各國觀瞻所繫，若非正式交付法庭，僅由軍法裁判，實對國家前途貽害甚大。<sup>190</sup>教育界方面，則聯合北京各大學校長商討營救辦法。其中提到：「李大釗係屬文人，請交法庭依法審訊。」<sup>191</sup>就連奉系楊宇霆也接受章士釗勸說，為李大釗陳情。一時在輿論上，交付法庭說要比送交軍審有力。而奉方也主從寬處理。惟在警廳辦理各項手續未竣，以及證據未檢查完畢之前，暫時亦難以確定。

未能預料的是，案情迅速地轉向不利。經警廳近 20 日的審訊，最終決定以享有法權機關，包括安國總司令部軍法處、京畿衛戍司令部、京師高等審判廳、京師警察廳，用聯席會議方式召開特別法庭。而且僅經 25、26 日的預審，隨即於 28 日，以「實系赤黨，宣傳共產，意圖擾亂公安，顛覆政府」為由，判決李大釗等 20 位中共黨人處以絞刑。其中過程不免起人疑竇。極可能是因為政治因素影響到司法結果。據 29 日《晨報》載，就在行刑前不久，有一「前方重要將領」和「南方某要人」，分別電告張作霖將所捕黨人速行處決，以絕後患。5 月 12 日的《民國日報》更指明此二人分別是張學良、蔣介石。<sup>192</sup>時奉軍正逢討赤，蔣才宣布「清黨」，所以張、蔣二人有充分理由發出上述電文。李被絞殺時才 38 歲。據說行刑當日，李大釗至死神色未變、從容就義。隨後，張作霖將俄使館搜出文件，派人譯編為《蘇聯陰謀文証匯編》，作為蘇聯欲赤化中國的證據。可以說，正是在帝國主義拒蘇的氛圍，以及南北反赤運動的響應之下，造成中國共產黨北方首領李大釗，為革命而犧牲的結果。

往後的中共黨史書寫，往往將李大釗視為共產主義鬥士，中共革命的犧牲者。李氏作為中共創黨領袖，在中共黨史中自有其重要地位，但如僅就黨史範圍評價李大釗的革命實踐，似乎有其侷限。從革命的活動內容來看，李氏固然在中共建立、

<sup>189</sup> 〈黨案破獲經過補志〉，《世界日報》，1927 年 5 月 1 日，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871。

<sup>190</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872。

<sup>191</sup> 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事件篇》，頁 338。

<sup>192</sup> 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事件篇》，頁 342。

擴張北方黨、統一戰線以及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實際上，黨組織的建立和工農運動，大都仍放手由張國燾、鄧中夏等青年黨員進行，李氏自身則熱衷於與非中共團體的合作。周旋於不同團體間的任務，或許正是領袖人物的職責所在。但這在李大釗身上，卻又產生其特殊意涵。其原因來自李氏思想的自成一格。

李大釗在「前馬克思」時期形成的「互助、大同世界觀」，如將其思想元素進行重組，往後便能以不同形式，成為中共的「民主聯合策略」，以及國共合作的「國民運動」理論。於是乎，李大釗的革命實踐不僅是為完成中共交付任務，還是其個人政治理想的自我實現。更重要的是，從當時傾向聯合的革命趨勢來看，李氏政治思想如實地反映出該時代的精神。

就整個時代背景來看，李大釗的革命實踐意涵早已跨出中共格局，使李大釗的歷史地位，在中國現代史的革命序列當中，介於陳獨秀與孫中山之間，成為一種特殊、而能發揮重要作用的中介者。另一方面，中共早期具有彈性的革命策略，和李氏思想亦不無關聯。它影響了許多青年對於共產革命理想的實踐和想像。由是，或許可以將李大釗的思想、學說、環境，借用「李大釗時代」<sup>193</sup>一詞，來概括說明中共初期的互助、聯合特徵。然而，隨著孫中山和李大釗相繼過世，也就意謂著該時代的結束。中共早期具備的互助、理想精神，也就被更為深刻的政治權謀、鬥爭所取代。總而言之，李大釗的革命實踐，是個人思想與時代精神相融的產物，它同時也標誌出中共早期的歷史特色，而非被中共所標誌。如此評價李大釗的革命實踐，方為恰當。

<sup>193</sup> 〈西安追悼李大釗同志〉，《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6月8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889。





## 第六章 結 論

從清末到民初，不同以往的朝代遞嬗，是中國自傳統進入現代的歷史巨變。在這段艱辛過程中，有許多知識分子活躍在現代史的舞台，上演著經典戲碼。這不禁令人想起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以及三國時期人才濟濟的歷史盛況。他們拋頭顱、灑熱血，不是爲了個人，而是爲民族、國家的未來。在這部驚心動魄的劇本裡，李大釗無疑是其中的要角。由於受儒家教育影響，李氏有著悲天憫人的胸懷，且抱有世界大同的理想。在新式教育洗禮下，他希望藉由對中國傳統政治的改革，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特別是李大釗似乎有意避免捲入政界權力的漩渦，情願以在野立場對政治提出見解和批評。這種超然於物外的學者身分，使他成爲五四青年的導師。後來對國內政治的失望，不得不讓李大釗急於尋求另一種救國方法。在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啓示之後，使他轉向成爲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未來李大釗即和一群有志之士，領導愛國青年建立中國共產黨，實踐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於是奠定李氏在中國革命史的地位。

本文目的即在探討李大釗政治思想變遷，與革命實踐的過程。研究中可以發現，學界對此大致能粗分爲兩種研究取向：一種是「作爲革命者的李大釗」；另一種則是「以李大釗作爲革命者」。乍看之下這像在玩文字遊戲，但前後研究的著重點卻大不相同。前者慣於從革命史觀角度，塑造李大釗的人物和歷史，雖然它很能說明一個時代趨勢，並評價李氏的過去和功績，但卻相對容易忽略過程中的細節，尤其是放棄了「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動和積極性。而後一種研究取向則有助於補充前者之不足。李大釗的政治思想，或許還稱不上是自成一家，或對當代造成重要影響。然而此處強調的概念，並非是歷史上先知先覺的偉大人物；而是生活在歷史過程中的人們，是實際擁有「選擇權」的主體。即使這個選擇，分別受到先天和後天環境限制，但研究一個人爲何在某時間點做了某種選擇，在人文學科研究中，確是不可輕忽的。

本文嘗試從「人」的角度出發研究李大釗。觀察李氏是在何種條件限制下，作出思想和行動的選擇。並期望能將李大釗從革命史觀中「解放」出來，從而呈現李氏的不同風貌。因此，本論文相當重視歷史大環境在各層面對李大釗的影響。包括

政治、社會以及思想等環境因素。在政治方面，如民初的議會制度和軍閥政治，以及重要的涉外事件，尤其是來自日本的因素；社會方面，如白話報刊的出現、正醞釀中的集會結社風氣，以及新社會階級的形成；而思想方面，如當時新舊思想交雜的狀態，還有新文化運動引起的思想革新等等。上述諸因素又彼此交結在一起，形成李大釗生活的時代。如何抽絲剝繭，釐清這些因素與李大釗政治思想的因果關係，遂成為研究重點所在。以下將從「思想」與「實踐」兩個向度，說明本研究的發現。

借用李大釗的話：「欲研究一國家或一都會中某一時期人民的生活，任取其生活現象中的一粒微塵而分析之，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質。」<sup>1</sup>如果上述命題有部分的真實性，那麼透過李大釗，也就能間接了解李氏所處的時代內涵。尤其是在五四期間，許多青年知識分子轉信馬克思主義，對往後歷史造成重大影響，其原因常引起學界關注。所以早有學者指出，可將李大釗思想的研究看作是「關鍵個案」(critical case)。從李氏政治思想變遷的過程中，吾人便能分析整理出，造成其思想變化的研究「變項」(variable)。其蘊涵的代表性，也就可能會是改變同時代人們思想的共通要素，進而可用來描述民初思想變遷的大趨勢。然而，分析歷史共通性因素時，還要能兼顧其中的個別因素和偶然性，如此才能完整描繪出一個時代的真實。

在民初「知識爆炸」與「價值混亂」的背景下，研究人物思想自有其難度。不可否認的是，因外來威脅導致的強烈民族情緒，是改變中國大眾心理的重要變項。李大釗在青年時期的「君憲」以及「反滿」思想，即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展現。追求新中國的自由、獨立，往後一直是李氏政治思想的基調。此外，李大釗和五四知識分子，都不約而同有著相似的經歷。雖僅僅是少數，但他們在思想上都有過革命性的轉變，從而突破地方的遲滯性格，提升到以民族、國家層次來思考問題。受到西式教育影響，他們也逐漸擺脫儒家傳統的「華夷之辨」，並期望民主觀念能在中國落地生根。李大釗「民彝思想」的提出，即是進行西方民主中國化的工作。此也象徵李氏政治思想，從儒家跨越到以民主主義為核心的階段。換言之，因內憂外患而凝聚的民族心理驅使下，李大釗等人的政治思想，已然超越清末的中體西用論，而逕自走向全盤西化。

雖然李大釗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曾經歷類似的思想震盪過程；他們救亡圖存的目的也相當一致，但如此卻無法充分說明，李氏與他人在日後實踐救國的差異表現。造成李大釗行動的獨特性，首先在於代際因素。由於代際彼此成長條件不一，

<sup>1</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2卷，〈新的！舊的！〉，頁196。

導致個人未來往不同的方向發展。尤其是在變化急遽的時代，即使將代際間距縮短觀察，也能發現其中明顯的差別。如梁啟超與陳獨秀、李大釗年歲雖相差不遠，梁氏早年卻傾向以加入政府的方式，從內部進行議會政治改革。相較於梁的作法，陳、李則不喜政府帶有的官僚習氣，而希望由外部對政府提出改革訴求。其中，李大釗有過參與清末國會請願的特殊經驗，使得李比陳在心態上更能接近五四青年。其次，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在每個不同時代的社會，人們傾向於維持生活原狀是社會常態，但或多或少也都會出現部分反社會心理的人。一旦社會發生巨變，加劇對現實不滿的人們，極有可能形成欲顛覆現狀的群體，造成革命活動。如觀察李大釗早年政治上擁袁到反袁的過程，其嚮往「秩序」的表現，即明顯看得出李雖是思想堪稱急進，但實際上竟是政治行動的保守主義者。這一點，就明顯不同於激進思想和行動如一的陳獨秀。

必須澄清的是，雖然李大釗先後曾經擁袁，並支持段祺瑞的參戰案。但這並不證明李氏和他們同屬於舊時代的人物。此時指導李大釗政治行動的是民主思想，而非追隨政治強人的英雄主義。這段期間，李氏認為中國惟有學習西方議會民主制度，才能實現民族國家的獨立。為完善民彝思想內涵，李大釗又進一步提出「青春哲學」，將中國比喻作風燭殘年的老者。而擁有創新思維的「青年」，正是國家化白首為青春的希望。它實際上抨擊中國雖進入到一個新時代，但卻出現政治、文化界仍是由老輩和封建思惟所把持，青年無志可伸的矛盾現象。面對政治新老交替，和中西文化交雜的價值混淆，李大釗選擇以保守的「調和」方式，化解來自社會不同層面的衝突。為維繫民主價值，李氏結合中國傳統的調和思想和西方政黨政治理念，強調國內議會人士，必須從惡性的「互競」，提升到良性「競存」的政治涵養。然而這方面的努力，距離現實太過遙遠。民初政治的守舊勢力，和政壇上因爭權奪利的機會主義造成的「偽調和」，兩者最終形成中國民主改革之路無法突破的障壁。在失望之餘，李大釗對議會民主的期待，要直到張勳復辟事件才真正宣告放棄。

國內政治亂象，同樣使知識青年覺得灰心。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的動機，即希冀以文化啓蒙的方式改變舊世界。五四運動於焉展開。在普及新知識、新文化的過程，不能忽略時代條件。除了應有的傳播媒介，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主要仍透過鄰國日本吸收西學新知。從李大釗早期的留日經歷，以及其返國後依舊持續關注日本學術的動向來看，中日文化界因頻繁交流，而帶有資訊同步性質。這一點說明中國已然無法置身世界之外。李氏和五四青年的思想，也都會受到國外因素影響。其

一，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不時讓中國知識分子感到擔憂。李大釗即提倡以和諧的中華民族為中心的「新亞細亞主義」，代替其亞洲侵略主義。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造成巨大衝擊。經由大戰原因分析，使李大釗排除了天擇說和人口論造成的民族擴張因素，將戰爭禍首指向各國官僚主義，因而突顯中國軍閥政治的貪婪本質。其三，因一戰引發的東西文明論戰中，李大釗又站在批判西方文明的立場，從日本茅原華山取得調和東西文明，繼而超越之的「第三文明」啓示。於是十月革命後擺脫君主專制和官僚主義，而充分展現人道主義的俄羅斯文明，遂成為李大釗所嚮往新的文明型式。尤其是後兩點在不同程度上，動搖了李氏對西方議會民主的信念。

說明李大釗如何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是本研究第一個焦點。一般解釋都會強調俄國十月革命，以及五四運動的啓蒙作用，造就一群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青年。然而如此敘述不僅稍嫌簡略，而且也不完全說明事實。在引進眾多西方思潮中，艱澀難懂的馬克思主義不易為知識分子所理解。李大釗或許是其中少數特例。但為了將李氏「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原來的西方本體作出區別，實有必要進一步分析。一個人思想的轉變，意味著個人價值觀從「破壞」到「重建」的過程。造成李大釗政治思想改變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其議會政治活動在現實中遭遇挫折。由於政治實踐無法達到原來政治理想的目的，失敗經驗便會反饋到個人原有思想，形成調適。在調適階段，思想的「創造」於是有了可能。

所謂思想的「創造」，亦非毫無邊際的空想。它是一段運用個人所能得到的外界思想資源，將其社會理想予以具體化的過程。以往學者多從「外因」解釋李大釗思想的轉變。如一次大戰期間，李氏對歐洲社會黨運動的興趣，還有十月革命意義的闡發。使得李氏逐漸能從社會主義的角度思考、解決國內問題。但如能輔以「內因」觀點，則更能說明李大釗政治思想過渡的細節。其中包括五四時期提倡的科學思維，它使李氏具備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基礎。而關注青年自殺和麵包問題的社會關懷，則成為往後李氏改造社會的積極動機。尤其受到五四愛國運動影響，使得社會青年開始意識到能夠透過社會動員來改變社會。他們運用早在清末傳入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掀起社會廣泛地「互助運動」。李大釗受到當時大眾化的社會革命語言薰染，於是也跟著提倡社會的「互助」與「解放」。在這段被稱為李大釗政治思想的「前馬克思主義」時期，可以發現其內在心理基礎、思考問題的人道主義出發點，以及所處周遭環境的思想資源，某種程度決定了往後李氏馬克思主義的內涵。



編織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的成分來源複雜，其中包含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歐洲的工團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此並非個人特例，而是徹底反映因政治腐敗，使五四知識分子未經批判，急於向西方求取治國要方的心態。這些未經嚴格區別的社會思潮，在此或能稱為廣義的革命社會主義。它們的共通點是希望藉由社會途徑，達到改造國家的效果。期間，李大釗對馬克思有進一步的研究興趣。這和李氏的好友，時在日本擔任特派記者的陳溥賢不無關係。但使李大釗真正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仍必須歸功於圍繞在李大釗與胡適之間的「問題與主義」論戰。該論戰讓李氏意識到其社會主義基礎，薄弱到無法和實驗主義者胡適相抗，以至於李往後一面倒向研究理論內涵深厚的馬克思。從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到〈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章的發表，便象徵著李氏馬克思主義從本體論、認識論到方法論的完成。

惟須注意的是，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表示他完全拋棄了過往思想。如李氏的儒家大同理想，此時轉化作馬克思、列寧式世界主義的胸懷。其民彝思想的民主觀，則是由政治參與的平等，漸變為社會普遍的平等。再者，李大釗始終是個忠實的民族主義者。雖然李氏表面上屏除民族觀點，強調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但實際上李並無否定民族主義，反因為他主張以世界革命的方式完成中國的獨立，而更加強烈。如何進一步消除國界、種界完成世界大同，則是置後的問題。此外，除了思想前後的繼承關係，李大釗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其中也蘊涵著「創造」成分。李氏服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論，但為了淡化「階級鬥爭」帶有的激進印象，李特別強調它只發生在人類的前史，並加強現世的互助精神以均衡社會觀感。這一點為往後中共的革命策略，預備了彈性調整的餘地。再者，李大釗又從馬克思觀點，重新詮釋中國當前的革命方向。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發達的歷史背景，發展落後的中國，其革命對象便不會是國內資產階級，而應是剝奪國家和社會財富的軍閥、官僚及其背後影武者的帝國主義。於是李氏遂一變其政治、社會改良路線，朝向體制外的反帝、反軍閥的革命發展。由此可見，李大釗即是在對中國處境的認知基礎上，經過思想的選擇、組織與創造，完成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而將中國與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聯繫起來。

本研究第二個焦點，是探討李大釗在北方共產革命的實踐過程。其中牽涉問題相當廣泛。首先，在分析李氏的革命行動時，不可避免會陷入組織與個人之間的研究框架。個人特色往往會淹沒在龐大的組織之中。尤其中共的成立，絕大因素是來

自俄共提攜。所以如何將李大釗置於這多方的權力場，並適當說明其革命特徵，即為本文要點所在。根據研究發現，李大釗的革命實踐不僅游離出中共中央的既定路線，還反將其個人的革命意志加諸於中共自身。其因或來自李在中共黨內的輩分和馬克思主義修養。李氏在中共一大前後，雖已確立社會革命路線，但其「保守」的革命性格，卻令他嚮往英國式的光榮革命；即使歷來革命的成功必然要流血、犧牲，但李仍企圖用代價最低的方式取得成果。於是李大釗最初訴諸民粹，主張社會各方面互助、聯合的群眾運動，實有背於共黨在一大《綱領》中的閉鎖主義。

中共一大《綱領》的精神，雖反映最初黨員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持，然而它卻不符合革命實際。相較於中共的稚嫩，老成的俄共早已根據中國特殊的革命環境，研擬出民主革命的聯合策略。俄共所持的革命現實主義，恰與李大釗個人獨特的革命意志產生交集。所以當陳獨秀、張國燾等人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為國共合作一事鬧得不可開交時，李氏不僅成為代表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溝通、協調的橋梁，還持續在往後中共的聯吳、聯孫策略上扮演要角。這一點，不但在組織中突顯出李大釗個人善於為革命目的，而與他人達成妥協的調和特質；其在中共早期革命過程中引發的關鍵作用，也是同期黨員所無法取代。

其次，是論李大釗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在中國革命實踐的問題。這關乎李氏及其領導的北方黨，在中國共產革命中扮演的角色。雖然馬林早已指出中國工農階級脆弱的本質，但北方黨最初仍舊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發展工農運動。試圖學習西方階級鬥爭經驗，抵抗資本家對勞工剩餘價值的剝削。依此，李大釗在實踐革命的同時，亦充分利用地方條件。在工業尚未發達的北京地區，以其交通樞紐的優勢地位發展鐵路工人運動，成為中共早期革命工作的重點。然而，因吳佩孚血腥鎮壓京漢路罷工造成的「二七」事件，無疑重挫李大釗和北方黨的革命意志，也讓李氏決心在革命手段上，從群眾運動轉往軍事武裝路線。

不僅如此，將西方社會理論套入中國的現實環境，亦會產生不同文化、地方的距離。已有學者指出，當時中國華北地區的階級矛盾並不顯著，更多是來自國家與社會、外來入侵者與在地群眾，以及新舊文明價值之間的矛盾。<sup>2</sup>而共產革命實踐的過程中，在中共企圖將中國社會政治化之前，地方上又早已被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或血緣、地緣等關係網絡所覆蓋。例如在工人運動方面，雖然北方黨一開始便能

<sup>2</sup>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4。

適應地方，先是利用工頭的威信組織工會，後讓工人驅離工頭，使之成為真正的工人組織。但中共接下來，卻又無法掌握更多受其他利益驅使的右派「工賊」出現。在農民運動方面，李大釗雖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加強帝國主義與軍閥造成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因果聯結，並注意到淮北地區紅槍會等農民傳統自衛組織的革命潛能。但農村的社會網絡和既有矛盾，以及槍會本身「民匪不分」的反革命特質，皆不利於共產革命理論的實踐。更重要的是，就連北方黨自身，也都必須依賴這些關係網絡建立起來，黨的革命活動也因而深受其具備的分裂性格影響。<sup>3</sup>它的隱憂在於，一旦失去像李大釗這樣具有跨省號召力的人物，北方黨很快便會分崩離析。

「二七」罷工的失敗，更突顯中共組織的內部矛盾和力量不足。但即使共產革命實踐遇到許多來自不同層面的困難，李大釗仍能以其領袖魅力，暫時統合地方黨由下而上對中共的撕裂力量；並運用其靈活的革命策略，適應中國多變的革命環境。一方面，李大釗在「前馬克思」時期持有的互助、聯合思想，在此適時地成為中共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隨著革命情勢的轉變，李大釗對於革命的新論述亦不斷在形成。自中共創黨以來的行動而累積的所有不利情況，都迫使中共必須提出一套更完整的革命論述，主張中共革命的正統，藉以凝聚組織的向心力。尤其國共合作期間在孫中山逝後，李大釗為孫在中國的革命定位如下：

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國的革命的正統，而淘洗了他們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會、哥老會一類的民間的民族結社，改進了他們的思想，使入於革命的正軌。一九〇〇年合併興中會與三合會、哥老會而為中和黨、興漢會。一九〇五年，又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二次革命失敗後，又在東京改組中華革命黨。一九二四年又在廣州改組中國國民黨，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使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與世界革命運動聯成一體；使民族主義的秘密結社，過渡而擴成現代的工農團體，一體加入國民革命黨；使少數革命的知識階級的革命黨，過渡而成為浩大的普遍的國民的群眾黨。這都是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繼往開來，鑄新淘舊，把革命的基礎，深植於本國工農民眾，廣結於世界革命民眾的偉大功績。<sup>4</sup>

上段引述的文字，不僅道出孫中山一生的革命經歷，還說明孫正是承接自太平天國

<sup>3</sup>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頁 27。

<sup>4</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頁 102。



革命的正統。李大釗會如此重視孫中山，和當時國共合作的革命情誼和李個人對孫的人格尊崇或有密切關係。但李氏如此大費周章寫作該篇長文，實際上亦隱含有某種特殊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在確認孫在中國革命史的位置之後，更強調此後中國走向了共產革命的道路。此舉不但說明中共的革命係來自正統，也意圖鞏固孫逝後中共續留在國民黨的合法地位。然而正當李大釗極力化解內部分歧，統合中共參與國民運動的同時，國民黨左右對立的激化，以及國內外反赤勢力的結合，最終仍導致國共合作破裂，李氏也因此在北伐期間為革命而遭張作霖捕殺。

李大釗戲劇性的犧牲，為他短暫的生命畫下了句點，但有趣的問題在於，為何過去李大釗的革命形象長期以來被歷史所忽視。一方面，蔣介石「清黨」之後，在國民黨的歷史書寫中往往將李大釗視為陰謀家；其領導國共合作的目的，是企圖篡奪國民黨黨統。另一方面，國共合作失敗後的中共，又隨即陷入「兩條路線的鬥爭」(two-line struggle)；陳獨秀不久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罪名遭放逐出黨，隨著毛澤東在黨內的得勢，一部遵照毛「正確路線」的中共黨史形塑而成，在這部黨史中，如何界定李大釗的歷史成為棘手問題。由於李的早逝，不易為其作出政治定位，更重要的是，在中共建政後以毛路線為政治正確的基礎上，李大釗在中共黨史的領導角色，遂被中共史家有意的隱晦，以致毛最初進入中共核心而排除了南陳北李的「中共一大」，被抬至很高的地位。也只有將李大釗對革命的貢獻限制在 1921 年之前，他才能夠與毛澤東共存，放入以毛為中心的黨史編纂中。<sup>5</sup>

直到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才願意逐步放手評價李大釗的歷史。1983 年 10 月 29 日為李大釗誕辰九十四周年紀念，同時在北京舉行李大釗烈士陵園的落成典禮上，鄧小平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時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則代表中共中央宣讀〈李大釗烈士碑文〉，首先對李氏的革命貢獻給予肯定。<sup>6</sup>接下來是在 1989 年李大釗的百歲誕辰，由中共中央親自主持關於李大釗的研究討論會，會上總書記江澤民讚賞李氏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共的創黨元老，接著胡繩和胡喬木的演說，也都肯定李作為中國共產主義先行者的地位。有了官方評價的出台，黨史家始有研究李大釗的權限，也就在這樣的機緣下，近來中國陸續有許多關於李大釗的文獻和著作出版，且越能呈現李氏在革命過程中的真相。由此議題出發，李大釗過去晦暗不明的歷史不但得以

<sup>5</sup>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What Is Wrong with Li Dazhao,"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p. 67.

<sup>6</sup> 〈李大釗烈士碑文〉全文收錄於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 495~499。



「撥雲見日」，亦能突破以往以毛為單一中心的黨史觀。

胡喬木說，像李大釗這樣重要的歷史人物，其歷史本身就是黨史的一部分。應當聯繫當時的歷史環境，對他們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以作出客觀的評價。<sup>7</sup>這在中國二十世紀 80 年代逐漸解除政治禁忌的當下，已算是很大的進步。歷史，正是由人書寫而成，過去書寫歷史的人，往往握有政治權力。但隨著民主深化、知識普及和日漸開放的社會，歷史的書寫也就不再是少數階級的特權，惟社會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吾人才得以用多元觀點表達不同的意見和立場。李大釗即生長於思想自由處處受到限制的時代，也因此在他決意選擇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能夠於堅定其信仰的同時，闡發思想自由的真價。這一點在今日，甚至往後，都是值得發人深省。文末，茲引李氏透關數語，以供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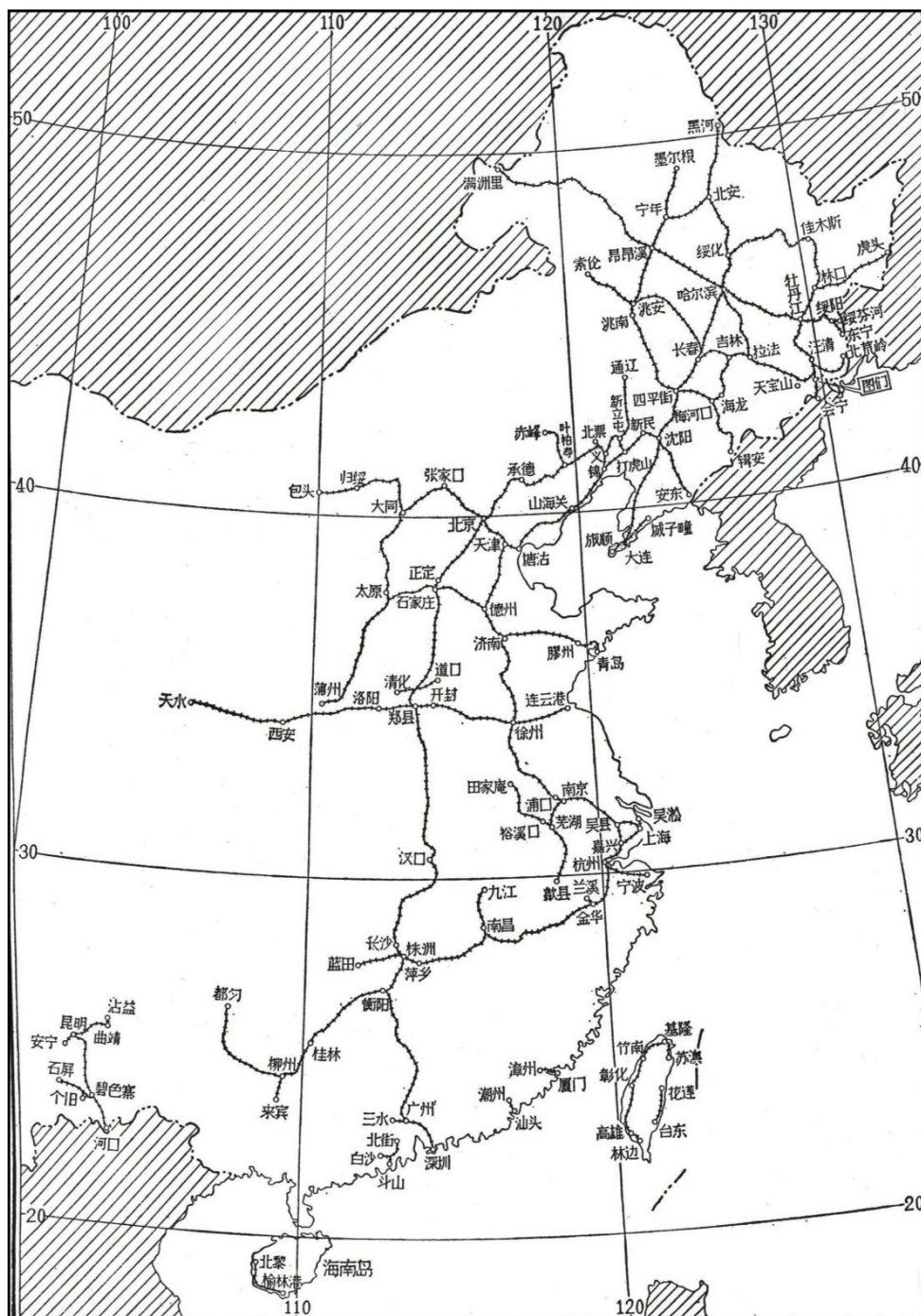
禁止人研究一種學說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惡。禁止人信仰一種學說的，犯了教人虛偽的罪惡。世間本來沒有「天經地義」與「異端邪說」這樣東西，就說是有，也要聽人去自由知識，自由信仰。就是錯知識了、錯信仰了所謂邪說異端，只要他的知識與信仰，是本於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實，一則得了自信，二則免了欺人，都是有益於人生的，都比那無知的排斥、自欺的順從遠好得多。<sup>8</sup>

<sup>7</sup> 胡喬木，〈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李大釗〉，載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李大釗研究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頁16。

<sup>8</sup>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2卷，〈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頁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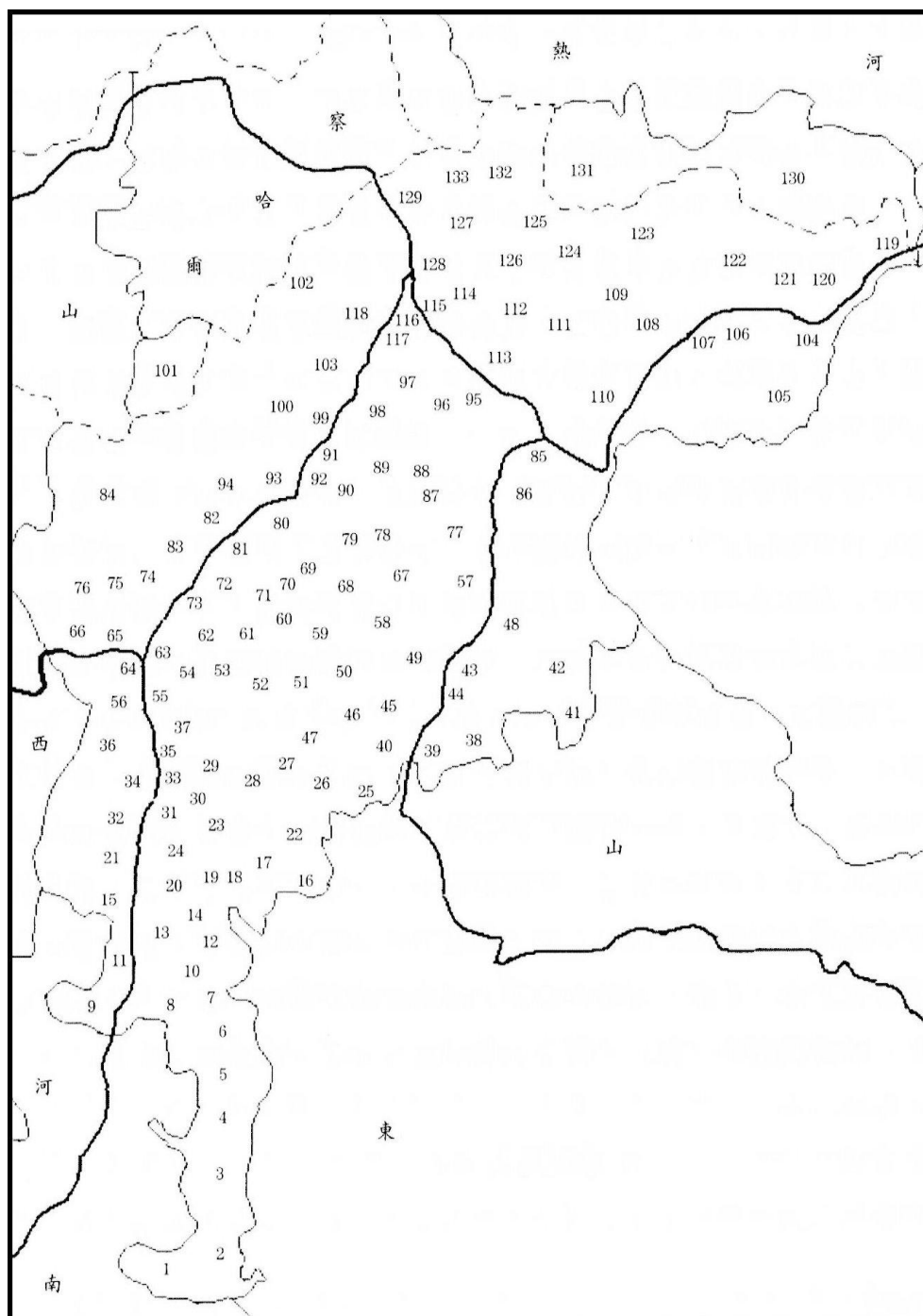


# 附錄一：中國鐵路分布圖（1879-1948）



資料來源：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398~399。

## 附錄二：1930 年代前期的河北省



資料來源：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12~13。



圖例說明：1.長垣；2.東明；3.濮陽；4.清豐；5.南樂；6.大名；7.廣平；8.成安；9.磁縣；10.肥鄉；11.邯鄲；12.曲周；13.永年；14.雞澤；15.沙河；16.清河；17.威縣；18.廣宗；19.平鄉；20.南和；21.邢台；22.南宮；23.鉅鹿；24.任縣；25.故城；26.棗強；27.冀縣；28.新河；29.寧晉；30.隆平；31.堯山；32.內邱；33.柏鄉；34.臨城；35.高邑；36.贊皇；37.趙縣；38.寧津；39.吳橋；40.景縣；41.慶雲；42.鹽山；43.南皮；44.東光；45.阜城；46.武邑；47.衡水；48.滄縣；49.交河；50.武強；51.深縣；52.束鹿；53.晉縣；54.藁城；55.欒城；56.元氏；57.青縣；58.獻縣；59.饒陽；60.安平；61.深澤；62.無極；63.正定；64.石門(石家莊)；65.獲鹿；66.井陘；67.河間；68.肅寧；69.蠡縣；70.博野；71.安國；72.定縣；73.新樂；74.行唐；75.靈壽；76.平山；77.大城；78.任邱；79.高陽；80.清苑(保定)；81.豐都；82.唐縣；83.曲陽；84.阜平；85.天津；86.靜海；87.文安；88.新鎮；89.雄縣；90.安新；91.容城；92.徐水；93.滿城；94.完縣；95.安次；96.永清；97.固安；98.新城(高碑店市)；99.定興；100.易縣；101.涞源；102.涿縣；103.涞水；104.昌黎；105.樂亭；106.灤縣；107.唐山；108.豐潤；109.玉田；110.寧河；111.寶坻；112.香河；113.武清；114.通縣；115.大興；116.宛平；117.良鄉；118.房山；119.臨榆；120.撫寧；121.盧龍；122.遷安；123.遵化；124.薊縣；125.平谷；126.三河；127.順義；128.北平；129.昌平；130.都山；131.興隆；132.密雲；133.懷柔。

「——」：省界；「—」：鐵路；「-----」：長城。



# 徵引書目

## 一、中文部分

### (一) 一手資料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杜春和、耿來金整理，《白堅五日記》，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6）》，第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回憶李大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

毛子水註譯，《論語今註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民初時期文獻編輯小組編，《中華民國建國文獻：民初時期文獻·第一輯·史料三》，台北：國史館，1998年。

司馬璐編著，《中共的成立與初期活動—中共黨史暨資料選粹（第二部）》，香港：自聯出版社，1974年。

朱熹，《朱文公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年。

朱傳譽主編，《吳佩孚傳記資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

朱其華，《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上海：新生命書局，1932年。

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赤松子（張尙齡），《人生滄桑六十年》，台北：五洲出版社，1971年。

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廠史編委會編，《北方的紅星—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六十年》，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中）》，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

胡適，《胡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8年。

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上卷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

梁啓超，《歐遊心影錄》，香港：三達出版公司，1961年。

梁啓超著，吳松、盧雲昆、王文光、段炳昌點校，《飲冰室合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陳獨秀，《實庵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

陳啓天，《寄園回憶錄》，台北：商務，1965年。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台北：學海出版社，1967年。

曾琦，〈戊午日記〉，《曾慕韓先生日記選》，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彭述之，《彭述之選集》，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年。

張允侯、殷敘彝等著，《五四時期的社團（一）》，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

新青年社編輯部編，《社會主義討論集》，廣州：新青年社，1922年。

載德，〈載德探報（一）〉，載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近代史資料》，第5期，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維·馬·普里馬科夫（В. М. Примаков）著，曾憲權譯，《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願兵的札記（1925-192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羅章龍，《椿園載記》，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

《少年中國月刊》（北京），第5期改至上海發行。

《甲寅雜誌》（東京）

《民國日報》（漢口）

《共產黨》（上海）

《東方雜誌》（上海）

《新青年》（上海）

《新教育》（上海）

《嚮導》（上海）

## （二）專書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

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交往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

王潔主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事件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王永璽主編，《中國工會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鄧小平人生紀實（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

孔恩（T. S. Kuhn）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今井清一著，楊孝臣、郎唯成、楊樹人譯，《日本近現代史》，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史華慈（Schwartz）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

- 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史扶鄰 (H. Z. Schiffrin) 著，邱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台北：谷風出版社，1988年。
- 朱成甲，《李大釗傳（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 朱成甲，《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 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傳》，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 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 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民國上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朱開宇，《科學社會、地域秩序與宗族發展：宋明間的徽州，1100-164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4年。
- 安德魯·文森特 (A. Vincent) 著，袁久紅等譯，《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著，安思利 (Douglas Ainslie) 英譯，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李大釗年譜編寫組，《李大釗年譜》，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台北：弘文館，1986年。
-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
- 李朝陽，《走向新民主主義中國—馮玉祥與近代中國政治》，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
- 李邁先，《俄國史（上）》，台北：國立編譯館，1969年。
- 李瑄根著，林秋山譯註，《韓國近代史》，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7年。
- 汪榮祖，《史學九章》，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9年。

- 肖裕聲，《李大釗的軍事活動》，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
-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
- 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1999年。
- 何雲庵等著，《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19~192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 吳漢全，《李大釗與中國現代學術》，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吳家林、謝蔭明著，《北京黨組織的創建活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
- 吳雁南、馮祖貽、蘇中力主編，《清末社會思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 孟慶澍，《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圍繞《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開封：河南出版社，2006年。
- 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出版社，1984年。
- 彼得·克魯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著，帕米爾書店編輯部譯，《互助論》，台北：帕米爾書店，1980年。
-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柯文（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後藤延子著，王青等編譯，《李大釗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
-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晉榮東，《李大釗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唐啓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 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唐納德·薩松（Donald Sassoon）著，姜輝、于海青、龐曉明譯，《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
-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編譯，《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悉布費（S. B. Fay）著，于熙儉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
- 章伯峰、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
- 陳茹玄著，《民國憲法及政治史》。收錄於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906）》，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 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台北：威秀資訊科技，2010年。
-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三聯書店，1983年。
-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建譯，《中國啓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台北：桂冠圖書，2000年。
- 馮崇義，《羅素與中國—西方思想在中國的一次經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年。
-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台北：中國出版社，1973年。
- 張次溪，《李大釗先生傳》，香港：神州圖書公司，1951年。
- 張灝，《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04年。

-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1年。
- 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台北：時報文化，1979年。
-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
- 楊念群，《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台北：考選部，1991年。
- 葉永烈，《紅色的起點—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池子華、劉平譯，《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 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1卷，下冊，台北：中華雜誌社，1970年。
- 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年。
- 閻稚新，《李大釗和馮玉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
- 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
- 譚汝謙、林啓彥譯，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

### （三）論文

-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載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台北），第13卷，第4期（2001年），頁477~513。

元青，〈杜威的中國之行及其影響〉，載於《近代史研究》（北京），2001年第2期，頁130~169。

石川禎浩著，王捷譯，田子渝校，〈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思想與茅原華山、陳溥賢〉，載於《文史哲》（濟南），1993年第5期，頁12~19。

石川禎浩，〈李大釗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華山為例〉，載於《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007年第3期，頁141~149。

朱成甲，〈《李大釗文集》中幾篇文章的考辨〉，載於《近代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1期，頁269~279。

朱文通，〈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發展歷程新探〉，載於《河北學刊》（石家莊），2007年第1期，頁115~119。

朱志敏，〈李大釗參加「研究系」活動質疑〉，載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研究論文選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329~333。

李玉貞，〈附：關於李大釗在蘇聯講話和文章的說明〉，載於《近代史研究》（北京），1985年第6期，頁5~6。

李國祁，〈德國檔案中有關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項記載〉，載於李國祁，《民國史論集》（台北：南天書局，1990年），頁311~323。

沈雲龍，〈段祺瑞與善後會議（上）〉，載於《傳記文學》（台北），第46卷，第2期（1985年），頁10~18。

呂明灼，〈李大釗對儒家理想社會觀的繼承與創新〉，載於《文史哲》（濟南），2000年第5期，頁93~99、128。

宋教瑛，〈中共建黨前知識份子思想探源（1915-1921）—論陳獨秀、李大釗思想之轉變〉（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林秋志，〈李大釗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

胡喬木，〈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李大釗〉，載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

- 研局編，《李大釗研究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頁7~16。
- 後藤延子著，劉助仁編譯，〈戰後日本關於李大釗思想的研究〉，載於《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1990年第6期，頁69~73。
- 馬建白，《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台北：中國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
- 彭明、楊奎松，〈李大釗政治思想演變的歷史考察〉，載於彭明，《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十講》（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8~356。
- 張玉法，〈民國初年對政黨移植問題的爭論〉，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上冊，第4期（1973年），頁127~149。
- 張玉法，〈民初政黨的調查與分析〉，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5期（1976年），頁121~129。
-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載於《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文化，1980年），頁19~33。
- 曾長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於「一大」以前〉，載於《近代史研究》（北京），1986年第2期，頁280~281。
- 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的歷史考辯—以1920至1921年《新青年》同仁來往書信為中心的探討〉，載於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年），頁183~248。
- 蕭超然，〈關於「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我見〉，載於《百年潮》（北京），2001年第7期，頁18~26。
- 譚雙泉，〈李大釗與五四前後東西文化論戰〉，載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研究論文選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23~133。



## 二、外文部分

- Dirlik, Ari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Press, 1989.
- Dirlik, Arif.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Meisner, Maurice.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 Weigelin-Schwiedrzik, Susanne. "What Is Wrong with Li Dazhao,"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pp. 56-74.
- 石川禎浩，《中国共産党成立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
- 後藤延子，〈李大釗におかる過渡期の思想—物心兩面の改造—〉，載於《日本中國學會報》（東京），1970年第22集，頁174~187。